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Marxist Studies

从MEGA¹到MEGA²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

FROM MEGA¹ TO MEGA²:
the History of *Marx / Engels Gesamtausgabe*

— 赵玉兰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从MEGA¹到MEGA²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

所属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作者：赵玉兰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161-1975-4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413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MEGA¹的前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全集的努力

第一节 马克思在世时出版《马克思文集》的尝试

第二节 恩格斯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构想和努力（1883—1894年）

第三节 恩格斯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活动（1894—1895年）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¹的历史性诞生

第一节 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铺垫——梁赞诺夫的前MEGA¹时期

第二节 十月革命胜利后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酝酿与准备

第三节 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及相关资料的搜集活动

第四节 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正式启动

第五节 MEGA¹的历史性诞生

第三章 MEGA¹的重大挫折——梁赞诺夫时代的终结

第一节 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作的终止

第二节 梁赞诺夫的政治劫难

第三节 马恩研究院的彻底清洗

第四节 梁赞诺夫之死

第五节 梁赞诺夫领导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历史贡献

第四章 MEGA¹在后梁赞诺夫时代的短暂继续与最终夭折

第一节 1931年年初MEGA¹的编辑现状及前景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手稿状况及新的MEGA¹总体方案

第三节 1931—1935年MEGA¹卷次的出版情况

第四节 1935—1936年马恩列研究院收购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努力

第五节 MEGA¹的最终夭折

第五章 MEGA²的历史性诞生

第一节 MEGA²前史的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有关出版新版MEGA的构想

第二节 MEGA²前史的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期筹备MEGA²的努力

第三节 MEGA²的历史性诞生

第四节 苏东剧变后MEGA²的继续前进

第六章 MEGA²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

第一节 MEGA²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的确立简史

第二节 MEGA²的编辑准则

第三节 从编辑准则看MEGA¹与MEGA²的关系

第七章 MEGA²的出版情况及第Ⅲ、Ⅳ部分已出版卷次的内容

第一节 MEGA²各部分各卷次的内容划分及出版情况

第二节 MEGA²第Ⅲ部分已出版卷次内容

第三节 MEGA²第Ⅳ部分已出版卷次内容

结语

参考文献

一 外文文献

二 中文文献

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自20世纪70年代启动以来，以其所提供文本、文献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客观性和过程性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虽然到目前为止，该版本已出版的卷次与计划出版的卷次（114卷）比较起来刚刚过半，但是这些已经出版的卷次和正在编辑出版的卷次，已经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且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发端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源头上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认识。

20世纪末，MEGA²通过两个途径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一是随着MEGA²的陆续出版，中央编译局根据已经出版的MEGA²版本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 and 未出版的文献资料重新校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陆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虽然截至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部分卷次仍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这些最新版本向读者呈现的信息，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面是非常广泛的。其二是来自MEGA²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编辑出版的卷次、手稿文献和国外相应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随着近几年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国外专家学者的来访、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另一方面是大量国外文献资料被翻译进来，使得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MEGA²的最新编辑动态、国外研究最新进展有着较为直接的了解和迅速的反应。

苏东剧变的发生，使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块状分割，以其僵化和教条的特征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而且，由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经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得到解读、传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不仅在西方世界的学界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那里更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20世纪早、中期就已经在西方学界出现了不同于苏联解读模式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研究态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20世纪末，随着苏东的剧变，西方学界再次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研究趋势，这一趋势伴随着MEGA²的编辑出版，体现了人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基础对其思想进行有机、统一地再认识的迫切要求，这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新的呼声，这一呼声也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回到马克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一种递进关系，其一是从苏联教科书模式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回归，这体现在人们重读经典著作的热情之中；其二是伴随着MEGA²的编辑出版，从翻译版本向原文本及其辅助材料的深入，这体现在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追捧热情之中。

人们的这一追捧热情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一，奠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合作的产物，只有历史考证版提供的原文献，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展现这一合作过程，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文本研究价值，而且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也只有MEGA²提供的著作版、马克思手稿版和恩格斯编辑版才能够向人们呈现马克思的写作与恩格斯编辑版本之间的关系；其二，呈现在MEGA²第IV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笔记、摘要等等，对于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变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其三，基本思想的解读往往有赖于基本概念，而对基本而又重要的概念和术语，一词多译、多词同译的情况无论对于哪种语言的翻译来说，都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对于一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选择权，只有通过阅读原文本的阅读才能掌握在读者自己手中。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MEGA²所提供的原始文本、文献资料引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极大兴趣，依据可靠的文本、文献资料，准确、客观、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有力的呼声。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打出了“回到马克思”的旗号，并且尝试着进行MEGA²文献、文本的研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工作没有在原文本的角度上继续展开。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研究》作为国内第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在诸多学者们的期盼中产生了。

我们的课题自2002年6月立项至2011年12月结项，历经了十年的过程。作为国内第一个以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我们的经历颇有点类似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历史考证版从零开始的探索过程，再加上语言的制肘，我们这十年走得很辛苦。

根据研究团队的具体情况，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形成和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至MEGA²版在中国的传播史。

从MEGA的形成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对MEGA¹和MEGA²的编辑史、MEGA²的基本情况包括编辑准则的介绍，尤其是对MEGA²第III部分收录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的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对第IV部分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记和摘录目录的说明。我们认为，第III部分的内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第IV部分的内容对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研究经历与其思想发展源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关于MEGA²基本情况的介绍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历史考证版有基本的了解。我们也刚刚获悉，中央编译局即将对

MEGA² 第IV部分的内容进行10卷本的编辑出版，我们期待着这一珍贵史料的面世。

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文本、经典著作在中国自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这百年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包括最早的片段介绍、翻译，一些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经典著作的“选集”、“文集”、“全集”的进展，并且借助于MEGA²提供的基础性资料，对一些重要概念、术语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的变更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二个方面主要以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MEGA²资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内容、文本进行专题性研究。这部分包括从几个重要文本来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发展的历程、马克思的国家观、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在时代境遇下的辨析及结合近几年中国的文本研究现状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等内容。这一部分还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创作史研究，从《共产党宣言》与其早先几种相关文本的关系中来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历程。由于MEGA²中收录《共产党宣言》的卷次至今没有出版，该部分对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是以德文版为基础进行的。

第三个方面以MEGA²第II部分为阅读对象，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马克思在6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由哲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变的过程，关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的批判和研究思路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核心思路的形成及其发展线索。通过对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基本思路形成历程的分析，比较清晰地再现了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尽可能真实地展现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也同时展现了经济关系史的发展逻辑。

围绕着这三个方面，我们就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内容、某一个专题还相继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将这些讨论集册出版。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历程伴随着国内对历史考证版关注度的增长，同时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已经开始为国外同行所重视、所关注。国内外MEGA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局面。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研究成果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而国内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介绍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主要还是借助于英文的渠道；这与国外大量的资料、信息、研究成果向国内输入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对等的局面，除了我们的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的中文水平与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不相称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得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传出国外。国外学者要达到翻译中国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中文水平，从比较普遍的角度来说，至少还要历经十年的积累和磨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学术成果双向交流的外流通道。

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国内在历史考证版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象征着一个良好的开端，尊重历史、尊重文本、尊重学术规范、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的精神得到弘扬、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模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体系中解脱出来，以更加准确、客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文献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精神，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源头上在准确地认识、解读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梳理，从而发挥其帮助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困境和危机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MEGA²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客观和富有现实感的领域。

国内MEGA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日益壮大的局面，而且这一研究还受到国内学术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自2002年我们的课题立项以来，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批准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5—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先后批准了多项以MEGA²为专题的重点研究项目、一般研究项目和青年研究项目。

一方面这些新课题的立项预示着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壮大的学术领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有一些年轻学者甚至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这一研究工作而正在积聚着外语的能量，当这些后继的具有良好的外语条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素养的年轻学者能够继续拓展MEGA²的研究工作时，我们相信，这一研究工作将进一步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MEGA²所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依据于这些文献资料的研究和解读，对于已经习惯传统解读模式的人们来说，在思想上会形成一个冲击，由此产生两种具有反差性的心理反应：或者是对MEGA²的研究奢望过高，希望MEGA²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克服苏联解读模式一切弊端的马克思，进而夸大MEGA²的魅力，将其神秘化、神圣化，由此引发对MEGA²的盲目崇拜心理，甚至不切实际地期待MEGA²研究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完美无瑕的、能够抵御一切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种种诘难的马克思；或者是由于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定式而为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新解读的不确定性、新呈现的文献资料的复杂性所困扰，尤其当MEGA²资料所呈现的马克思，在一些方面也会像常人一样其思想有着客观来源、并且在一些问题上也会发生困惑、犹豫、反复、甚至出错时，尤其是当传统上被视为一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文本资料中体现出差异时，一些习惯于传统解读模式的人在心理上感到难以接受。

这两种态度与MEGA²编辑出版和研究精神所追求的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是不相容的，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强调，MEGA²的基本特征是呈现原文本、原创作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资料、通信等等能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借助于MEGA²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点不可无视，但是对MEGA²加以无限拔高或者使其神秘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MEGA²编辑原则所追求的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真地对待人类思想宝库——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精神，无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精神是否能够、或者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MEGA²的编辑出版所提供给我们信息，已经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和研

究成果中展现了其独一无二的资源价值、理论视野和现实意义。

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强调：首先，历史考证版研究并不是、也不可能否定或者取代一百多年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积淀了一百多年以来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心血、智慧，饱含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结晶。人们为这一实践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增长起来的智慧，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决不是文本研究本身可以替代的。

历史考证版研究的意义只是在于，借助于MEGA²提供的更加客观、准确的文献资料，结合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理论在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出更加深入、具体、客观的研究；其次，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非非MEGA不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即使从国际范围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本土语言的翻译文本是最便捷、有效率、大众化的研究资源，从而也是最基本的阅读资料。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无论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都是在译者们精心翻译、审核、遇到难点集体讨论、专家把关等一系列严格程序下完成的，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翻译版本。

最后，我们要向在本课题立项过程中提出创意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李德顺研究员、李鹏程研究员、吴元梁研究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这一道充满活力的新的靓丽风景线；向在本课题执行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大关注和帮助的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谢地坤研究员等诸位领导、研究人员、图书资料管理员、科研处等有关部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难以顺利的走过这艰辛的十年；向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科研局的韦莉莉老师表达我们真心的感激之情，没有她的支持和宽容，这一切都无从说起；向在课题的结项过程中认真审读我们的资料并对我们提出中肯评价和宝贵建议的李景源研究员、庄福龄教授、梁树发教授、李鹏程教授、王东教授表达我们未尽的谢意，他们的批评、建议会在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同样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和远方的荷兰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致以谢意，该研究所在数十年的时间中搜集和保存了多达70%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原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第二版，不同语言文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文选集”、“单行本”等等以及完备的研究杂志、史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荷兰科学院的协议项目为我们的课题组成员提供了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进行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阅读、研究和咨询专家学者的宝贵机遇，向中-荷合作项目的荷兰方负责人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米歇尔·克里特克（MichaelKratke）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荷兰之行不可能付诸实施。

我们还要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晓芳老师的支持和辛勤付出表达我们的谢意，没有她的努力，我们的成果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读者从我们的致谢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一系列研究作品的面世，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背后是社会力量、甚至国际社会力量的支撑。

这套书出版以后，我们期待着真诚的学术交流、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是苛刻的吹毛求疵，在此基础上开拓繁荣的学术研究局面、严谨的思想探讨氛围，共同肩负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理论思想资源。

魏小萍

2012年12月 北京

前言

近些年来，MEGA（Marx-Engels-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随着MEGA²各部分各卷次的出版及其在国内的引介、讨论，MEGA这一德文缩写词日益成为学界的一个常用术语或者基本概念。一般而言，MEGA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一种版本形式，同我们所熟知的中文一版、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者俄文一版、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首先就表现在，上述各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只是名义上的“全集”，它们并没有真正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而MEGA作为一种历史考证版本，它的第一要义就是收录文献的全面完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简单来说，MEGA这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本形式具有三个鲜明特征：第一，全面完整；第二，忠实于原文；第三，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写作语言。首先，就全面完整而言，它既是指收录的每一份著作、文献自身的全面完整，又是指收录著作的各阶段准备材料或者稿本的全面完整，更是指收录类型如著作、手稿、书信（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他人的书信，还包括他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笔记和摘录等的全面完整。全面完整是历史考证版本的根本特征，它建立在尽可能全面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基础上。其次，就忠实于原文而言，它是指完全依照其本来面目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章。就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出版、未完成的手稿、摘录、笔记而言，无论是删除、插入、修改还是异文都应该在文本中全面地展现出来，不落掉任何细节。最后，就采用原初写作语言来说，这也是历史考证版的应有之义，它其实与第二点“忠实于原文”具有同样的精神实质，即原原本本地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避免译介或修订所造成的偏差甚至歪曲。

除了上述三个特征或者三大维度，MEGA还具有另外一个维度，即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在MEGA这种版本形式中，所有的文献、著作、书信、摘录、笔记等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不论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还是私下进行的书信交往，不论是不同时期的初稿、草稿、手稿还是各种各样的摘录、笔记，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予以展现。由此，“全面完整”、“忠实于原文”、“采用原初写作语言”三大维度再加上一个时间轴，就构建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整体框架。

迄今为止，MEGA共有两个版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一版（MEGA¹）和历史考证二版（MEGA²）。历史地来看，MEGA¹与最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自诞生之始，它就与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

梁赞诺夫可谓是MEGA¹的灵魂人物，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像他那样与MEGA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从某种程度上讲，梁赞诺夫就是MEGA¹的代名词，MEGA¹就是梁赞诺夫的代名词。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放宽，就会发现，事实上，梁赞诺夫几乎倾其一生都在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的伟大事业。早在20世纪初，确切地说，从1909年起^[1]，他就以梅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以下简称“《遗著选》”）所截止的年代——1850年为起点，着手搜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和北美所发表的报刊文章，而这一大规模的搜集、鉴别、整理和编辑活动的成果，就是堪与倍倍尔和伯恩斯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以下简称“《通信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理论》，尤其是与梅林的《遗著选》相媲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年）。随着搜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的深入进行，梁赞诺夫逐渐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构想，而这一构想随着1913年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到来，也就是马克思著作版权行将失效的时限的到来而显得愈发迫切。这一主观构想与客观情势的结晶就是1911年1月1日梁赞诺夫联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2]提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维也纳出版计划”。在这份不足三页的计划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出版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马克思著作的手稿和各种不同版本相对照的、带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要斟酌，是否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个人、党史以及科学等方面的联系而把它们共同出版。”^[3]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时机的不宜，这份旨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在欧洲流亡十年的梁赞诺夫返回俄国参加革命，并且最终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此后，梁赞诺夫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负责俄国的工会事务，同时，他也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科学管理以及档案资料保护工作。正是在这一历史新时代的开元时期，一项极为重大、影响深远的科学使命降临到他的身上。

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道：“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4]2月2日，列宁再次致信梁赞诺夫，进一步细化了他的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5]

历史地来看，列宁的这两封短信在MEGA¹的编辑出版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第二封信，与梁赞诺夫自20世纪初以来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可以说，它是继“维也纳出版计划”之后更具操作性的MEGA实施纲领，它成了波澜壮阔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直接动因。作为苏联最具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作为身体力行地从事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学家，梁赞诺夫成了列宁所倡导的这项宏大工程的最佳领导者与实施者。

1921年，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研究院”），列宁亲自委派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开展大规模的搜集、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乃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活动。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马恩研究院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就是后来的俄文一版《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梁赞诺夫进行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梁赞诺夫为之奋斗了近2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活动终于进入了历史性的实施阶段。

总的来说，编辑出版MEGA¹是一项规模极其宏大的科学事业，它的主干、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搜集、整理、辨识和编辑活动，而围绕着这株主干旁逸斜出了纷乱杂陈的众多枝节与分权，例如：马恩研究院的构成设置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任用、职能分工；研究院国外通讯员的任用、分布、任务安排；马恩研究院与各个私人、公立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进行的档案资料乃至整个图书馆的购买事宜；研究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使用、复制所进行的沟通、协商以及协议的签署；研究院与其他科研机构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就MEGA¹达成的合作协议；MEGA¹编辑原则的制定、具体的编辑进程乃至最后的排版、发行；与MEGA¹的编辑出版活动相配套的学术刊物如《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编辑出版，等等。这诸多方面使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彻彻底底地成了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如果没有一位既富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又与国外科学研究机构联系密切的科学家，没有一位既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又可以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保管人直接打交道的领导者，那么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实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梁赞诺夫作为这一“恰当位置的恰当的人”^[6]，正是凭借其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凭借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熟稔与了解，凭借其与国际性的科学组织、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密切联系，使MEGA¹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有条不紊地、极为高效地运作了起来。

从1921年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到1931年2月被捕，梁赞诺夫用十年的时间使马恩研究院这所年轻的学术机构一跃成为“公认的国际马克思学中心”^[7]，而他领导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共同编辑出版的MEGA¹更是成为最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自1927年第I部分第一卷的第一分册出版以来，MEGA¹收录的大量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书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震撼。与此同时，梁赞诺夫本人亦凭借其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凭借其深厚且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以及为苏联马克思学奠定的坚实基础，被马恩研究院副院长恩斯特·崔贝尔(Ernst Czóbel)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家”^[8]。

然而，如果说，正是由于有了梁赞诺夫，MEGA¹才生如夏花般灿烂的话，那么，也正是由于梁赞诺夫，MEGA¹最终像昙花般猝然凋零。一个人与一项事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正负效应在梁赞诺夫与MEGA¹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1930年恰逢梁赞诺夫六十岁寿辰，苏联全国上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他本人的声望亦随之达到生命的巅峰。然而，就在这风光无限、繁华气派的盛景下却隐藏着深重的政治危机。仅仅在一年之后，1931年2月15日夜，梁赞诺夫被捕，住所被查封；次日，梁赞诺夫被开除党籍，罪名是“他知晓并支持苏联国内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活动，与苏联国内的孟什维克以及国外总部建立了联系”^[9]。4月中旬，梁赞诺夫被流放到伏尔加河畔的小城萨拉托夫，彻底离开了莫斯科，从而也与他从事数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事业挥手作别。1937年6月，梁赞诺夫再次被捕；1938年1月21日，在不过十五分钟的全封闭审判之后，梁赞诺夫被秘密执行枪决。此后，梁赞诺夫便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忌，苏联官方对之讳莫如深。尽管苏联最高军事法院在1958年决定恢复梁赞诺夫的名誉，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杂志和书籍中，依然看不到有关梁赞诺夫的字眼，甚至在涉及MEGA¹编辑史的地方，也鲜有梁赞诺夫的名字出现^[10]。梁赞诺夫就这样尘封于历史之中，不为人知。^[11]

梁赞诺夫与MEGA¹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梁赞诺夫的政治悲剧亦是MEGA¹的悲剧。一方面，1931年2月梁赞诺夫被捕后，马恩研究院亦遭到了彻底的清洗，在250多名科学工作人员中，107名被解雇，17名被调离。同时，分散各地的科学通讯员亦解聘的解聘，流放的流放。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丧失了一大批富有马克思主义学养、具有MEGA编辑经验的科学工作者。另一方面，梁赞诺夫所组织开创的MEGA¹编辑出版事业的国际合作网络亦日益瓦解，许多国外科学机构、合作伙伴不愿再对斯大林统治下的马恩研究院提供支持^[12]。于是，MEGA¹编辑出版事业不得不由本身已经千疮百孔的马恩研究院独力支撑。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冲击和内部变动，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并没有就此终止，它在后梁赞诺夫时代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1931年4月，阿多拉茨基继任为马恩研究院院长。同年11月，马恩研究院同列宁研究院正式合并，新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列研究院”）直接归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在新的组织机构中，原来的马恩研究院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部，专门负责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于是，在新的领导班子和机构设置下，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再次起航，希冀能够完成梁赞诺夫所未竟的事业。从1931年至1935年，马恩列研究院出版了7部MEGA¹卷册，它们分别是第I部分第3—7卷、第III部分第4卷以及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特别卷（收录《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些卷次中，除了关于恩格斯的特别卷之外，其余卷次其实早在梁赞诺夫在任时就已经基本准备好、只待出版了。

1936年之后，便不再有MEGA¹卷次正式出版了。事实上，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急剧恶化最终使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全面夭折。早在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就对MEGA¹形成了重大打击，它彻底失去了德国的出版阵地，不得不撤回苏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发行。随着苏联国内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且不说马恩列研究院的科学工作人员不断受到批判甚至遭到解雇，就连院长阿多拉茨基也难以幸免。1938年年底，他由于“愚蠢的政治盲目”，确切地说，由于在任职八年之后还没有全面地修改、纠正梁赞诺夫所主编的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遭到批判。1939年年初，阿多拉茨基被罢免研究院院长之职。之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不得不倾出全力保家卫国。于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彻底终止了。

需要补充的是，1939年和1941年，几乎是由保尔·韦勒独立编辑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由莫斯科外语文学出版社分两卷出版。这可谓是MEGA¹第II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的唯一硕果，更是整个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最后一枚成果，尽管这两卷并没有采用MEGA¹的卷号。

虽然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历经坎坷，并且最终夭折，但是它所搜集、整理的数量庞大的资料和文献、它所编辑出版的轰动世界的MEGA¹卷册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且珍贵的文献依据，它也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和出版学的宝贵

财富。正是由于MEGA¹所彰显的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势增长，尤其是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一批来自苏联以及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酝酿继续当年未竟的MEGA¹编辑出版事业。尽管这一讨论、酝酿持续了20年，前后经历了种种曲折、中断，MEGA出版构想也历经了种种更改与修订，但是最终在苏联与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努力下，符合新时期历史考证版原则与精神的新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²在1975年正式诞生了。这一次，国际合作特别是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东德的合作成为MEGA²得以诞生的根本基础。

历史地来看，相对于MEGA¹，作为后来版本的MEGA²具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就资料储备来说，由于在MEGA¹时期积累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原件和复制件，苏联成为MEGA²重要的资料宝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颠沛流离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因此，梁赞诺夫当年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获得的复制件成为许多文献的唯一底本。这使得苏联方面所拥有的文献遗产更加珍贵、更具价值。第二，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祖国，德语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母语。在编辑原文版的MEGA²的过程中，德国方面的参与可以充分保证MEGA²文本、语言的质量与水平。第三，MEGA¹作为源头活水对MEGA²的编辑构想、总体规划、编辑准则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MEGA²可以站在MEGA¹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状况，结合时代最新的版本学的历史考证原则，编纂出具有更高学术水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本，而无须从零开始摸索创造。

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苏联与东德最高领导层的支持下，在双方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努力下，MEGA²的出版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从1975年到1990年苏东解体，MEGA²共出版了43卷(册)。其中，第I部分(著作)出版了14卷，第II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出版了15卷(册)，第III部分(书信)出版了8卷，第IV部分(摘录、笔记)出版了6卷。

然而，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使得MEGA²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1990年前后，苏联与东德的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MEGA²顿时陷入重重危机，风雨飘摇。为了避免MEGA²再步MEGA¹的后尘，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一方面，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临危受命，它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柏林科学院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在1990年5月22日签署协议，建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以下简称“国际马恩基金会”)，全盘接管MEGA²的编辑出版活动，相应地，MEGA²各卷的版权也转移到国际马恩基金会名下。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也为MEGA²的继续奔走呼号。1991年12月，1521名日本学者在题为“我们主张继续进行MEGA工作”的呼吁书上签名，声援MEGA²编辑出版工程，这成为这场国际呼吁浪潮中的最强音。最终，MEGA²幸运地经受住了政治风云变幻的强大考验，得以继续扬帆前进。

如今，MEGA²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知名的文献版本。仅就德国来说，它是与《歌德全集》、《莱布尼茨全集》等齐名的经典作家历史考证版本，销量甚至还要更好。当然，在这套享有盛名的珍贵版本背后凝结着诸如格奥尔奇·巴加图利亚、英格·陶伯特、尤根·罗扬、罗尔夫·海克尔、大村泉等国际众多知名学者多年的研究与考证的辛劳和汗水，更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MEGA的开创者梁赞诺夫及其助手恩斯特·崔贝尔、弗兰茨·席勒、保尔·韦勒等著名的以及大量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与艰辛。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回顾MEGA这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形式的诞生与发展，追溯MEGA¹与MEGA²的历史形成，具体地剖析其编辑理念与原则，客观地评价其成败得失，就是要全面展现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史上的这段极不寻常却又极为辉煌的历程。

MEGA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能够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文献版本，是能够让我们最深切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真义的珍贵文献。对它背后的曲折历程的认识，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认识，而对它本身的研究，将是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必由之路。

[1] 梁赞诺夫在为倍尔和伯恩斯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1913年)撰写的评介文章中提到，早在1909年，他就开始尝试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参见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Die Neue Zeit*, 32 (1914), Band 2, S. 566, Anm. 3)。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也提到：“早在1909年，我就开始尝试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不为人知的文章。”(参见N. Rjasanoff,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1862*, Band 1,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20, S. IX-X)

[2] 他们包括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卡尔·雷纳(Karl Renner)。

[3]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Jg. X XVIII, 1983, S. 127.

[4]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07页。

[5] 同上书，第108—109页。

[6] Rolf Hecker, “Rjasanovs Editionsprinzipien der ersten MEGA”,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S. 12.

[7]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5 (1930), Leipzig: 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 S. 416.

[8] Ernst Czöbel, “Rjasanov als Marxforscher (Zum 60. Geburtstag D. Rjasanov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Jg. 4, Wien u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30, S. 401.

[9] 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sanov”,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10.

[10] 一个难得的例外就是1972年由海因兹·施戴恩和狄特·沃尔夫出版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之历史命运的著作——《伟大的遗产》。

在该书中，作者对梁赞诺夫所从事的MEGA¹ 编辑出版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赞他“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灵魂上是一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参见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Berlin:Dietz Verlag, 1972, S.80-90。

[11]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政治形势的解冻，关于梁赞诺夫以及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许多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才被解禁，重见天日。梁赞诺夫本人亦在被“禁忌”半个世纪之后，终于重返科学话语舞台。由此，我们也才得以在这里对梁赞诺夫及MEGA¹ 进行详细述评。

[12] Rolf Hecker, “Hans Stein -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und Korrespondent des Moskauer Marx-Engels-Instituts (1925-1929)”,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 18.

第一章 MEGA¹ 的前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全集的努力

毫无疑问，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一项规模极其宏大、需要倾注大量人力物力的事业。首先，它需要坚实的文献基础，需要占有尽可能全面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其次，它需要扎实的人才队伍，需要大量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专家学者、科研助手；再次，它需要长期的文献整理、编辑和出版时间，需要一群人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最后，所有这一切还必须依赖于政治层面的持续的、坚决的资助与扶持。因此，世界上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一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¹）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诞生，就绝不是偶然的事了。尽管如此，当我们追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历史诞生过程时，仍然可以发现，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乃至全集的构想其实就已经萌发甚至实施了。只不过，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些计划都没能得到有力的推进，最终都失败了。

第一节 马克思在世时出版《马克思文集》的尝试

早在马克思在世时，他就有过一次出版自己文集的尝试，尽管这一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但它却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历史上出版马克思文集的第一次努力。

1850年年底，马克思与海尔曼·贝克尔（Hermann Becker）通过书信商量了一系列出版事宜，其中一点就涉及以分册的形式出版马克思的文集。在这一年12月2日致贝克尔的信中，马克思谈道：

1. 你知道，舒贝特先生把我们的《评论》^[1]办得多么糟糕。我想，最近几天，他那里就要出版最近两期。我希望这个刊物（从二月份起）作为季刊继续办下去，每个季度二十印张。更大的篇幅就有可能采纳更加丰富多彩的材料。你能否承担出版的责任？需要什么条件？
2. 我的一位朋友把我一本反对蒲鲁东的书从法文译成了德文，并为其写了一篇序言。为此我向你提出同上面一样的问题。
3. 我拟了一个计划，准备给读者提供一套由若干篇幅不大的小册子组成的现代社会主义文献……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件事，那末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工作。^[2]

正是在与贝克尔讨论这一系列出版计划时，马克思提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想法。之后，这一想法迅速扩展，马克思希望贝克尔能够出版他的文集。在未流传下来的1850年12月13日致贝克尔的信中，马克思委托他出版自己的“所有文章”。^[3]按照当时的设想，这套文集预计出版两卷，每卷400页，共计50印张。第一卷将收录马克思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闻集》、《莱茵报》、《德法年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社会明镜》等刊物中发表的文章以及在三月革命之前发表的一系列专题论文。^[4]第二卷主要收录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中发表的文章。

对于马克思的提议，贝克尔欣然接受，并着手准备编辑、印刷工作。在首次发表于MEGA²的贝克尔于1850年12月底致马克思的信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文集》的进展情况。“我多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把最初的印张寄给你。……从1月1日起两个排字工人将不间断地排印《文集》。它采用加拉蒙字体，34行，如果你想的话，每页32行也可以。……装帧没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只是纸张将不是英国产的。印刷纸的价钱涨了25%—30%，质量却糟糕了100%。”^[5]另外，贝克尔还谈到，几天后会通过伦敦和科隆的包裹快递公司给马克思寄去一套老的《莱茵报》。这显然仍是《马克思文集》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在该文集的第一卷中将收录马克思发表于《莱茵报》的文章。按照MEGA²编者的推测，身在伦敦的马克思当时可能并没有现成的《莱茵报》，所以才请求科隆的贝克尔帮他弄到这套报纸。尽管贝克尔在12月底的信中谈到“几天后”会把这套报纸快递给马克思，但是实际上，直到1851年2月3日，贝克尔才告诉马克思：“今天，老的《莱茵报》及手稿发给你了。”^[6]

在收到报纸后，马克思迅速进行了文章的挑选和修改工作。按照MEGA²第I部分第10卷的考证，马克思修改和编辑了以下文章：《〈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论离婚法草案》、《〈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摩泽尔记者的辩护。A和B》、《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答“邻”报的告密》、《〈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莱茵—摩泽尔日报》。^[7]这些文章计划收录在《文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后续分册中。当然，后续分册的内容不会仅仅限于这里提到的马克思亲手修订的文章。在校订完这些文章后，马克思立即把这套《莱茵报》寄回了科隆。正如他在2月28日致贝克尔的信中写的，“希望你收到了《莱茵报》”^[8]。

客观地讲，整个《马克思文集》计划的进展还是相当顺利的。1851年4月，科隆出版了80印刷页的《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它收录了马克思写的《评鲁普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的一部分。然而，尽管有如此高效的出版速度，但是在普鲁士反动政府的统治下，进步书刊仍然必须面对查封、停印的命运。在1851年5月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就提醒马克思：“你的内兄……以值得赞许的劲头正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僚国家的布鲁士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9]这里所谓马克思的“内兄”，正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Ferdinand von Westphalen）。他当时担任普鲁士的内务大臣，极力扼杀进步思想。显然，恩格斯的预见是正确的。如果说，在1851年5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非常放心地谈道：“贝克尔把他的排字房和印刷所迁到了佛尔维耶；看来，政府的迫害没有损害到他。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已寄来，但是只有一本。”^[10]那么，这只能说，马克思对形势的估计偏于乐观，因为政府的迫害魔爪很快就伸向了贝克尔，尽管他提前采取了转移排字房和印刷所的措施。

1851年5月，政府对科隆共产党人迫害的最终结果是，贝克尔被捕。《马克思文集》的后续部分再也未能继续出版。这一结果，我们在马克思的书信中也可以有大概的了解。在1851年5月1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道：“由于我的可尊敬的内兄

大臣的干涉，我的东西……又一次被停止付印了。看来，贝克尔在佛尔维耶遇到了困难。”^[11]这里所谓的“内兄大臣”自然就是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在1851年8月致海爾曼·艾布納爾（Hermann Ebner）的信中，马克思再次谈到了这件事，“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一次就是，他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隆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集》的出版……”^[12]

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的迫害、由于贝克尔的被捕，或者一句话，由于政治时机的不宜，计划中的《马克思文集》最终在出版了一个分册之后便夭折了。^[13]在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的反动统治下，这种结局对于进步著作来说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经历了这次失败之后，由于忙于《资本论》的写作，忙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再也没有尝试出版自己的著作集。在他的有生之年，这样的计划鲜有听闻。不过，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出版马克思文集乃至全集的声音再一次开始此起彼伏了。

第二节 恩格斯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构想和努力（1883—1894年）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出版马克思文献遗产的重任就落到了恩格斯的肩头。面对大量未经整理的马克思遗稿，再考虑到尚未完成的《资本论》，恩格斯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工作计划：首先，必须完成《资本论》；其次，撰写一部马克思的传记；再次，撰写一部德国工人运动史以及第一国际史；最后，出版马克思的全集。

在1883年4月30日致倍倍尔（August Bebel）的信中，恩格斯写道：“现在，我已六十三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14]显然，此时恩格斯考虑更多的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传，前一项工作因为其本身的未竟状态而亟待完成，后一项任务则由于马克思的离世而显得日益迫切。因此，在恩格斯这里，出版全集的计划还远未进入他的工作日程安排。毕竟，仅《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整理就需要占用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不说时时还会有计划之外但却必须完成的校对、修订工作。在1883年5月22日致约翰·贝克尔（Johann Becker）的信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了他的工作计划：“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全了下来，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除了其他一切，传记也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15]可以看出，尽管恩格斯非常看重撰写马克思的传记这一任务，但是完成《资本论》是他为自己设定的、应当为亡友完成的首要任务。在完成《资本论》之前，绝不考虑进行这些后续工作。

然而，尽管恩格斯一心想尽快完成《资本论》，从而拿出足够的时间撰写马克思的传记，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但是，各种各样的出版任务，如《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三版、英文版等的校对修改事宜，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通信包括与世界各地的革命者的广泛书信联系，再加上身体的不适尤其是晚年的眼疾，都夺去了恩格斯大量宝贵的时间，从而使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编辑活动中。我们不妨看看下面几封信：

1883年6月中旬，恩格斯致信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讲述了自己繁忙的工作情况：

我要做的事简述如下。

（1）整理遗物，而且几乎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旧的书稿。这些东西一大堆，而且非常乱。缺的还很多，许多纸包和箱子甚至还没有打开！

（2）准备第三版^[16]，把法文版所作的种种修改和某些补充加进去，还要看校样。

（3）利用现有的机会出版英译本（我今天为这件事访问了这里的一个大出版商），然后亲自校订译文（由穆尔来译，他是很出色的翻译……）。

（4）核对第二卷开头部分的三、四种稿本，做好付印准备工作，并把第二卷全部誊清。

……^[17]

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去世后，尽管恩格斯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和编辑上，但是他依然需要为各种重要任务分心操劳，如引文中提到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三版，还有英文版。另外，身体的不适也会干扰他的工作。在1884年1月底致《正义报》编辑查理·菲兹吉拉德（Charles Fitzgerald）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我不仅在最近而且在较长的时间内工作已经排满，我要再答应为贵报撰稿，那就太轻率了。近半年来，我因病无法好好工作，现在体力稍有恢复，使我能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18]

尽管身体刚刚恢复，尽管要马上集中精力展开《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但是恩格斯的工作日程依然满满当当。在1884年4月11日致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信中，恩格斯谈道：“这以后我将立即转入第二卷的工作，此外还要：（1）校订你们的《贫困》；（2）为该书法文版加注写序；（3）校订英译稿，该书现在必须加劲赶出来；（4）现在还有《杜林》以及法国方面还可能送来校阅的东西。”^[19]显然，恩格斯虽然想集中全力准备《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但是需要由他亲自过问、亲自进行的重要著作的校订、写序工作依然很多，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成为他晚年工作的常态。因此，出齐《资本论》这一他为自己设定的首要工作任务没有能够像他最初预想的那样在两三年内完成，而是一直拖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于是，随着《资本论》出版工作的一再拖延（尤其是第三卷），出版马克思全集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也就被恩格斯相应地顺延到了未来，成为“将来的事情”。^[20]

不过，尽管在1883年至1894年间恩格斯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出版上而不考虑马克思全集

的出版事宜，但是他仍然在一些场合因为某些人的询问而谈到了他对全集的考虑。我们不妨在下文中梳理一番。

在马克思去世不久即1883年4月30日致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李卜克内西谈过出版马克思全集的事情。一切都很好，但是这方面的事情和狄茨出版第二卷的计划一样，人们忘记了，第二卷出版权早已交给迈斯纳了，其他一些较小的著作也应首先交给迈斯纳出版，因此只有在国外才能办到。要知道，还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之前，就认为甚至《共产党宣言》也不能在德国刊印，——除非作为一个在你们的审判案中宣读过的文件刊印。”^[21]可以看出，对于全集的出版，恩格斯已经有两点考虑，第一，由于迈斯纳（Otto Karl Meißner）是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出版商，因此，全集中的其他著作最好仍由迈斯纳出版；第二，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仍然有效，因此，为了避免查禁的命运，马克思的全集只能在国外出版。在1883年8月27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的一部分遗著必须在国外发表”的想法，并强调对此“无论如何要做好准备”。^[22]正因如此，他才希望能够与伯恩斯坦采取面谈而不是通信的方式，商讨可以接受的处理办法。

在1884年2月5日致彼得·拉甫罗夫（Петр Лавров）的信中，恩格斯也谈到了马克思全集的出版，“在出版马克思全集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困难，而且这仅仅是我们要克服的许多困难中的一个困难。我手上大约有六十个印张（每个印张合十六个印刷页）马克思和我在1845—1848年间的旧稿。在这全部稿子中，只能发表摘要，但我在把《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整理完毕以前，还不能动手做这件事。所以就只能等了”^[23]。这里所谓“同样的困难”，恩格斯是指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马克思全集同未来的《资本论》第三册都可能在德国遭到查禁。这里，恩格斯再次强调全集的工作要让位于《资本论》，只有在《资本论》完成后才可能进行全集的工作。同样，在1884年6月致叶甫盖尼娅·帕普利茨（Евгения Паприц）的信中，恩格斯谈道：“至于我们过去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现在难以找到了。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在马克思遗稿出版以后，我有了充分的空闲时间，就准备把这些文章编成文集，加上注释等等，予以出版。但这是将来的事情。”^[24]

尽管恩格斯由于忙着准备《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进行马克思全集的工作，但是，在1885年5月至8月与海耳曼·施留特尔（Hermann Schüster）的书信往来中，恩格斯还是与施留特尔讨论了出版马克思短篇著作集的具体事宜。1885年5月13日，施留特尔致信恩格斯，表示他打算把马克思的一些短篇著作和文章包括国际里的一些文献合成一个集子出版。对于施留特尔的这一想法，恩格斯并没有表示反对。他在5月15日的回信中谈道：“至于说到马克思的短篇著作，那末除我以外，其他人也应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意见，我自己则应该在这方面注意，使拟议中的全集出版工作不受任何妨碍。”恩格斯指出，关于国际的文献，如《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海牙报告等，他都没有算在内，尽管他想保留为这些著作写点引言的权利。同时，他建议施留特尔，要仔细鉴别《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确定哪些是由马克思写的。另外，恩格斯强调，尽管不反对出版马克思短篇文集的想法，但是他想在作出明确答复前，看到施留特尔提供的更为确切的计划。对于施留特尔目前的出版设想，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马克思《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同有关国际的著作放在一起出版不太合适，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前后相差了15—20年。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就可以单独编成一个册子，恩格斯愿意为之撰写一篇引言。^[25]

可以看出，对于施留特尔的马克思短篇著作集计划，恩格斯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不仅提供了相关文章的一些细节，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还愿意撰写一些引言性的文章。在1885年6月16日致施留特尔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对施留特尔的计划表达了支持之声，并表示愿意承担重要文章的序言写作工作。首先，恩格斯指出，如果施留特尔准备出版《新莱茵报》审判案和民主主义者委员会审判案，那将是非常有益的，他愿意为之撰写序言；其次，如果重印《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也是有益的，恩格斯再次表示愿意为之撰写序言；再次，如果准备把《新莱茵报》上有关1848年巴黎的六月起义的论文收集在一起，也是一件益事。恩格斯愿意在有关地方作某些补充，并从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上的那些论文中选出必要的段落。最后，《新莱茵报》上其他的文章也可以这样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其他一些短篇著作也可以采取这种做法。由于恩格斯忙于《资本论》第三卷而无暇挑选文章，因此他希望施留特尔能够提供那些文章。^[26]

实践表明，恩格斯对施留特尔的计划非常地支持。尽管忙碌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还是很快就给施留特尔寄去了第一篇他所许诺的序言。在1885年7月1日致施留特尔的信中，恩格斯写道：“随信附去《审判》一书序言。其余的将依次去做。《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和注释，我大概只有在9月初才能搞完。整个7月份我都忙极了，而在8月份我得去海滨稍事休息。在这之后，才能动手搞六月起义。”^[27]这里所谓的《审判》一书的序言，即《〈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一书序言》，《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即恩格斯后来完成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这两个小册子最终都于1885年当年在瑞士出版，而关于六月起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则最终未能实现。

此后，在19世纪80年代的后半段时光中，恩格斯都无暇顾及马克思全集的出版事宜。尽管如此，他还是考虑到了他离世之后后人阅读马克思手稿时会遇到的困难，因而决定以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作为接班人，教他们辨认马克思的手稿。在1889年1月28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28]在恩格斯看来，“归根结底，问题涉及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29]。可以看出，由于日益年迈，再加上眼睛的病患，恩格斯已经不得不在旷日持久地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同时考虑身后的事宜，这首先就涉及出版马克思全集的问题。于是，辨识马克思的手稿成了他最为关切的问题，寻找接班人的想法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在1889年7月4日致尼古拉·丹尼尔逊（Николай Даниельсон）的信中，恩格斯就提到了这件事，“我打算同两个内行的人商量一下，让他们把第四卷手稿中我的视力不允我自己口述下来的那些部分，给我转抄下来。如果这一点我能谈妥，我将同时教他们辨认那些现在除我以外（对于马克思的笔迹和缩写字我已经看惯了）对谁来说都是天书的手稿。这样一来，不管我是否在世，作者的另外一些手稿，也就可以为人所利用了”^[30]。这里所谓的“两个内行的人”自然就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们欣然接受了恩格斯的提议，学习阅读马克思的手稿。在1889年12月14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谈到，在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考茨基帮着恩格斯一起工作。考茨基先读手稿，把它抄下来，然后由恩格斯根据其他手稿进行补充。恩格斯很满意这种工作方法，而考茨基也能很好地辨认马克思的原文。^[31]恩格斯的信也证明了考茨基的进步。在1890年4月12日致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信中，恩格斯谈道：“目前我已收到考茨基寄来誊写好的第四册……的部分手稿。他已经学会很好辨认笔迹并且在空的时候继续做这一件事。”^[32]

总的来说，在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进行关于马克思全集的工作，但是在不同场合下他也表明了自己关于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想法。针对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打算出版马克思同卢格（Arnold Ruge）的1843年通信的想法，恩格斯在1890年12月18日激烈地回应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发表这些混乱的、用黑格尔语言写的、现在无法看懂的通信。你是想把凡有马克思名字的一切统统加以发表呢，还是在开始出版你同保尔·恩斯特所设想的用小册子或分册形式出版的《全集》？

我在这里对此已提出过抗议，而且今后还将提出抗议。

我乐于同意把马克思的一些个别的、现在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就可以看懂的作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而且只同意这些作品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简单地重新发表。如果你准备把你在这一向我叙述过的那个计划付诸实施，那我将立即表示反对。^[33]

同样，在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也谈到，他拒绝了“狄茨出版一卷马克思短篇著作的计划”。而这一拒绝立场还是要追溯到李卜克内西。恩格斯回顾说，李卜克内西早就打算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了，因此他特别重用保尔·恩斯特（Paul Ernst），以便让他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且还想让恩格斯协助恩斯特。但恩格斯拒绝了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因此，对于狄茨（Johann Heinrich Wilhelm Dietz）的计划，恩格斯也只能再次拒绝。他指出：“我曾经允许党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导言。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后的义务，我不能允许事先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我手里把它夺走。”^[34]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因为忙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未能实质性地展开马克思文集乃至全集的编纂活动。但是，他仍然把这一项任务看做自己未来工作的重要内容，视为只能由自己来承担的责任。当《资本论》第三卷在1894年出版的时候，恩格斯终于可以抽出身来展开实际的马克思文集出版活动了。

第三节 恩格斯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活动（1894—1895年）

1893年年底，恩格斯已经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编辑工作，只待付印。这时，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想法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于是，在1893年12月30日致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的信中，恩格斯无意中为我们描绘出了他未来工作任务的转向。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兴奋却又秘密地告诉左尔格，“我应该通知你——切勿转告他人——第三卷手稿的前三分之一昨天已用结实的油布包装好……并将在日内付印。其余三分之二还需要进行最后的，主要是技术上的校订。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将在9月出书”^[35]。在讲述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后，恩格斯笔锋一转，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原来，罗马的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教授想弄到《神圣家族》一书，供授课之用。可是他想尽办法都没有找到此书。因此，他不得不请求借用恩格斯手头的《神圣家族》，但恩格斯的考虑是，“可是我自己只有一本，如果这一本丢失，那末我今后就完全不可能在预计要出的《全集》里准备出新版了。因此这一本无论出什么代价我都不能放手”^[36]。于是，恩格斯请求左尔格把之前自己寄给左尔格的备用本寄过来，以便借用拉布里奥拉几周。尽管这里只是非常巧合地表现出了从《资本论》到马克思全集的工作转换，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在完成《资本论》之后，倍感轻松的恩格斯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准备马克思全集了。

一年之后，在《资本论》正式出版后的1894年年底，针对劳拉（Laura Lafargue）提出的“在结束第三卷开始第四卷之前应当稍稍休息一下”的建议，恩格斯详细说明了今后仍然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因而表示只能继续工作。第一，恩格斯要公布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致马克思的书信，为此，他需要加注释（其中还要引用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通信），写序言。第二，恩格斯还要加工、修订自己的著作，首先就是《德国农民战争》。第三，恩格斯还想编写马克思的政治传记，至少是主要的几章：1842—1852年和国际。第四，恩格斯准备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早期的零星作品，而这一工作的文献收集情况并不顺利。^[37]可以看出，尽管有一些零星的应急任务，如拉萨尔的书信，加工《德国农民战争》，但恩格斯仍然保留着出版马克思传记以及两人著作集的考虑。在《资本论》第三卷完成之后，这些任务都可以进入他实际的工作日程中了。

1895年1月1日，恩格斯致信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其中谈到，马克思和他本人在1851年前那段时间发表的作品具有巨大的价值，由于缺乏这些东西，恩格斯没有能够全部出版他与马克思在1842—1852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而恩格斯的想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出版这些作品。因此，他对库格曼写道：“如果你能够尽可能多地供给我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在这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还想再找到1842年的全部《莱茵报》，主要是为了马克思的文章。”^[38]在1月5日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库格曼告诉恩格斯，侨居美国的德国人海尔曼·迈耶尔（Hermann Meyer）曾收藏马克思的著作。在1875年去世之后，海尔曼·迈耶尔的一部分书籍和文件由他的侄子麦克斯·利文斯顿（Max Livingston）管理。库格曼曾在1876年询问利文斯顿能否开个书单。利文斯顿回复说：许多书籍已经损失了，但是他还保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1858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收到库格曼的回信后，恩格斯在1月9日致信库格曼，请他马上写信询问利文斯顿，是否还有迈耶尔收集的早期著作目录。在3月9日给库格曼的回信中，利文斯顿谈到，早在1877年就把迈耶尔的遗物寄到伦敦了。^[39]得到这一消息后，恩格斯在1月25日回复库格曼说：“我好像记得我这里有迈耶尔收集的《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因为迈耶尔死后不久马克思就从海外收到各种各样的材料。”同时，恩格斯向库格曼提出，“如果同时你肯专门找一找1845年至1847年间的威斯特伐里亚的文献——《汽船》和文集以及上述时期这方面的其他出版物，那就好了。”^[40]库格曼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在比雷菲尔德附近努力查找。在1895年4月18日恩格斯生前致库格曼的最后一封信中，一方面，恩格斯告诉库格曼，他也不知道如何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找到他和马克思发表的匿名文章，不过，恩格斯指出，那里即便发表了什么东西，也不大重要。另一方面，恩格斯也谈到了目前的全集出版计划，有可能只能从1843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共产党宣言》开始出版全集，但更糟糕的是，德国的政治局势尤其是防止政变法案^[41]还未出最终结果，在此之前，一切行动计划都不能进行。^[42]于是，恩格斯与库格曼商讨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不过，就在与库格曼进行讨论的同时，恩格斯与理查·费舍（Richard Fischer）的通信却促成了马克思文集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1895年1月30日，费舍致信恩格斯，谈到《前进报》出版社有意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和之后的一些事件的一组文章用一本小册子的形式出版。^[43]在2月2日给费舍的回信中，恩格斯谈道：“你

们有一套卡人脖子的办法。如果你早已计划要出版马克思的文章，你本可以早点告诉我，而不是现在，到最后时刻才告诉我。”尽管当时在为《前进报》准备拉萨尔书信的恩格斯对费舍的迟到的通知表示不满，但他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好了，首先告诉我你打算使用什么开本和铅字，以及印数和书价。因为这一次由于种种考虑我只能给你们出一版和一定印数的权利。”另外，恩格斯提出，似乎《前进报》那里有一份《新莱茵报评论》，因此费舍可以按照那一份来排印。^[44]

1895年2月12日，在收到费舍的关于印数、书价等说明后，恩格斯在复信中说：“你可以马上着手排印。我现在就动手写导言并尽可能早日送出。”^[45]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费舍的这次出版活动还是非常支持的，并且表现出了雷厉风行的高效作风。2月13日，恩格斯在致费舍的信中，附上了小册子的书名和前三章的标题。他建议，这个小册子的标题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的前三章不要沿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曾经使用的标题（《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6月13日的后果》），而是采用以下的新标题：（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同时，恩格斯建议把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五、六期（合刊）上论述法国的部分抽取出来作为第四章。^[46]另外，恩格斯对材料的安排提出了几条具体的意见，从而力求使这个小册子表现为一部完整的著作。他还谈到，将从次日即2月14日起为这个小册子写导言。^[47]一切似乎进展得很顺利，恩格斯也请尽快完成导言以促成整个单行本的出版。然而，围绕着导言却发生了一些事端。

在1895年2月26日致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谈到，回信之所以耽搁了几天，是因为“柏林有人要出版马克思论述1848—1849年法国事件的三篇文章……而不写导言就无法出版。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由于德国要实行危及我们的新法律^[48]，这点很重要”^[49]。从这封信我们可以得知，在这两周的时间里，恩格斯一直在全力撰写导言，而今，在给拉法格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马克思的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就等着小册子的出版了。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令恩格斯愤怒不已。原来，在出版导言的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要求恩格斯冲淡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过分革命的调子，从而更为谨慎地发表它。而费舍也提出，国内正逢讨论防止改变法草案是否通过、实施的紧张时刻，有必要让这部小册子不触碰政府的敏感神经。对此，恩格斯非常不满，他在1895年3月8日致费舍的信中言辞激烈地写道：“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但是考虑到国内的紧张时局，恩格斯表示，只接受一部分修改意见，“绝不会再多走一步”。^[50]

在不得不修改导言的情况下，恩格斯决定把未修改的导言交给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发表。在1895年3月25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改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51]然而，仅仅过了几天，恩格斯就在4月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谈道：“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 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52]同样，在4月3日致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所以我请您等到全篇文章发表后再作评论（文章大概将登在《新时代》上），我天天等着小册子的样书。”^[53]最终，在马克思的小册子出版之前，在恩格斯的坚持下，《新时代》第2卷第27期和第28期出版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仍然保留了恩格斯不得不做出的删节。这篇导言还是未能全文发表。^[54]

1895年4月15日，针对费舍提出的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少量著作的建议，恩格斯作了这样的回复，这是他最后一次明确地表达对全集的态度。恩格斯指出，在防止改变法草案的命运还没有决定之前，费舍最好暂时先把这个计划搁置下来。恩格斯认为：“重印历史文件以及早期著作的丛书，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55]同时，恩格斯再次说明了他对马克思全集的考虑：

我有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我已就这件事同奥古斯特通过信，我们还在继续商谈。等他回来你再同他谈谈；我还不太有把握的是，这件事对你们是否合适，还有，你们《前进报》出版部，是否是做这件事的最合适的人选，——何况还有对出版事业的各种迫害，因此，也许作为一条不得已的出路，我甚至只好考虑在德意志帝国国境之外找出版者了。

马克思永远不会赞成陆续分册出版；有一次他曾经允许迈斯纳把《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分成七大册出版，每册约七个印张，但这样的事也就是这么一次。像《神圣家族》、《福格特先生》等这样的书，分拆成两个印张左右的分册出版，是绝对不行的。这样读书不能使读者有任何收获，这种支离破碎的阅读只会使人莫名其妙。^[56]

在与费舍说明自己出版马克思全集的考虑的同时，恩格斯也对费舍谈到的汉堡有人打算出版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事情表示了关切。他在此后两个多月与费舍的书信往来中^[57]，主要讨论如何尽快出版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林木盗窃以及摩泽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几篇文章，从而避免他人抢得先机。恩格斯还打算为之写序言，作注释。然而，恩格斯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对许多未完成任务的记挂中与世长辞了。

总的来说，自完成《资本论》第三卷以后，虽然恩格斯相对来说轻松了许多，但是一如既往的繁忙使得他很难专心进行马克思全集的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项工作难以实施。第一，德国政治局势的限制，尤其是防止改变法草案的可能通过使得恩格斯不能贸然展开马克思全集的工作；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早期文章的缺失、难以搜集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因此，恩格斯只能借助党的出版社来出版一些有关他与马克思著作的小册子、单行本，但是这远远谈不上是全集计

划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在1895年4月15日致费舍的信中表明的，出版马克思全集首先要客观忠实于原著，不做一丝删改；其次是要按卷出版，而不是零散地拆成若干分册出版。分册出版绝不符合恩格斯的构想，更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无论如何，当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构想与努力，看到了他把出版马克思全集视为自己的绝对义务与责任的坚定与执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终未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生之年诞生。因此，我们必须耐心等待，等待一些恰当的人在恰当的历史机遇下创造出不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565页。

[3] 马克思写的这封未流传下来的信件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为警务顾问威廉·施梯伯（Wilhelm Stieber）所引用。参见*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and III/3,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 S.1414。

[4]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and I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 977.

[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and III/3, Berlin: Dietz Verlag, S. 719.

[6]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and I /1, Berlin: Dietz Verlag, S. 977.

[7] 参见*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and I /1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S.494-49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9页。

[10] 同上书，第261页。

[11] 同上书，第276页。

[12] 同上书，第602页。

[13] 马克思在1851年2月修改的那套《莱茵报》如今收藏在科隆大学和城市图书馆中，上面还保留着马克思当年所做的修改和删除记号。按照MEGA²第I/1卷编者的看法，这些修订和改动固然可以证明相应的文章将会收录在计划的《马克思文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些经改动的文章会被收录，其他文章也可能被收录。具体的文章名目马克思应该已经告诉了贝克尔。参见*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and I /1, S. 977-97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20页。

[15] 同上书，第27—28页。

[16] 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页。

[19] 同上书，第136页。

[20] 同上书，第17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1页。

[22] 同上书，第54页。

[23] 同上书，第102页。

[24] 同上书，第17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1—312页。

[26] 同上书，第329—33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6—33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5页。

[29] 同上书，第136页。

[30] 同上书，第236—23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9页。

[32] 同上书，第380页。

[33] 同上书，第51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3页。

[36] 同上书，第18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8—329页。

[38] 同上书，第341页。

[39] 同上书，第555页注释293。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6页。

[41] 该草案在1894年12月6日由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其中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帝国国会否决了该草案。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9—450页。

[43] 同上书，第561页注释339。

[44] 同上书，第38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6页。

[46] 同上书，第562页注释344。

[47] 同上书，第387—388页。

[48] 即防止政变法草案。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9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402页。

[51] 同上书，第425—426页。在1895年3月28日致劳拉的信中，恩格斯也提到了自己的妥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0页。

[52] 同上书，第432页。

[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6页。

[54] 1930年，恩格斯的导言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全文发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4页注释357。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6页。

[56] 同上书，第446—447页。

[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收录的恩格斯在1895年4月5日、4月15日、4月18日、5月9日、5月29日、6月29日致费舍的信以及在1895年4月底、5月9日致梅林的信。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¹的历史性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一套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问世，即便是他们的著作集、通信集都屈指可数。具有代表性的只有以下几部，即马克思的女儿女婿爱琳娜（Eleanor Marx Aveling）与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合编的《东方问题》（1897年），梅林（Franz Mehring）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以下简称“《遗著选》”，1902年）、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1913年）。虽然这几部著作在当时都具有重大的文献意义与理论价值，但是在今天看来，它们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缺陷。

首先，就《东方问题》而言，它所涉及的只是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以下简称“《论坛报》”）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些英文文章，涵盖面很窄。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许多的错误和疏漏，如收录了既非马克思又非恩格斯的的文章，漏掉了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论坛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因此，这一版本并不全面可靠。其次，就《遗著选》来说，它虽然被视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是也仅仅收录了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一直到185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它只能被看做一部文集。另外，尽管梅林在这部遗著选中收录了许多不为人知或已被人遗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莱茵报》中的文章等，并且写了导言，作了注释，但是梅林的最大问题在于，他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前三卷）同拉萨尔的著作（第四卷）合并在一起出版，因此，这套文集的题目变成了不伦不类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绝不会容忍他这么做。最后，就《通信集》来说，虽然它名义上是由倍倍尔和伯恩斯坦共同主编的，但实际上，伯恩斯坦才是它的真正负责人。尽管这套书信集收录了纵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通信，但是其内容却遭到了很大的删节和修改。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保留的一些书信根本没有被收录；另一方面，一些被收录的书信在语言、文风和措辞上遭到了修改、弱化，个别地方甚至遭到删除。因此，这套通信集其实只是一部不全面的、不忠实于原文的篡改版。^[1]

除了以上几部著作集或通信集外，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那就是由MEGA¹的创始人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年）。众所周知，梁赞诺夫毕生所从事的最伟大的事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尽管这项波澜壮阔的宏大事业真正肇始于十月革命之后，确切地讲是20世纪20年代初，但是，就梁赞诺夫本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书信等的搜集、研究、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最初原点。事实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早在20世纪之初，梁赞诺夫就已经投入宏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事业中。正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辑出版工程，如“东方问题”（其最终成果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第一国际资料卷”、《资本论》第一卷普及本等，梁赞诺夫不仅获得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继承人劳拉·拉法格夫妇、遗产保管人伯恩斯坦等直接交流、密切接触的难得机会，而且也得以一睹常人根本不可能接近的、直至当时还完全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书信的真容。由此，梁赞诺夫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专家，他甚至比梅林、伯恩斯坦等更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总体面貌乃至个别具体细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列宁才在十月革命后亲自任命梁赞诺夫担任新成立的马恩研究院院长，领导MEGA¹的出版事业。

因此，当我们在本章中着手探讨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具体诞生过程时，不妨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为引子，回溯到梁赞诺夫一生的一个至关重要时期——前MEGA¹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历史地决定了梁赞诺夫未来的个人命运，而且也客观地为之他所领导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同时，通过全面地考察梁赞诺夫本人在前MEGA¹时期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活动，我们也可以发现梁赞诺夫的前MEGA¹时期与MEGA¹时期的密切联系，进而揭示出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与梁赞诺夫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历史渊源的必然性。^[2]

第一节 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铺垫——梁赞诺夫的前MEGA¹时期

“前MEGA¹时期”是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时间概念，而是专门针对梁赞诺夫而言的。因此，它的个人色彩特别浓厚。确切地说，它完全就是充满梁赞诺夫色彩的术语。这亦如我们谈到“前批判时期”这个概念时通常只是针对康德一样。要具体地限定“前MEGA¹时期”这一历史时间段，首先需要限定“MEGA¹时期”。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真正作为一项决议而被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通过是在1924年。但是，它之所以能够为苏俄领导人尤其是列宁重视，进而由梁赞诺夫全面地领导、实施，归根结底得益于一场伟大的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这里，我们以1917年为界：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至1931年梁赞诺夫被罢黜院长之职、离开马恩研究院，可以称作梁赞诺夫的“MEGA¹时期”。相应地，从梁赞诺夫的青年时期，确切地说，从1900年他离开俄国、流亡欧洲，一直到1917年返回俄国，可以称作梁赞诺夫的“前MEGA¹时期”。在这里，1917年既是“MEGA¹时期”的逻辑起点，又是“前MEGA¹时期”的历史终点。因为正是由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梁赞诺夫才彻底放弃了尚未完成的“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出版项目，结束了自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以来长达十年的欧洲流亡生活，重新返回他的祖国参加革命，并且最终迎来了历史新纪元的曙光。

在具体论述梁赞诺夫的前MEGA¹时期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梁赞诺夫早年的生平情况。^[3]1870年3月10日，梁赞诺夫在乌克兰的敖得萨城出生。他的本名是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戈尔登达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Гольдендах），梁赞诺夫是他的笔名。在中学五年级的时候，梁赞诺夫被学校以“没有学习能力”为名开除，从此彻底离开了校园。不过，梁赞诺夫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习的信念。凭借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求，凭借着超强的自学能力，梁赞诺夫在20岁时就已经被敖得萨的革命者和进步青年公认为博学之人，他的革命战友尤里·斯切克洛夫（Juri Steklow）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尽管梁赞诺夫年纪轻轻，但他却具有很高的学养，他完全就是名副其实的‘书虫’（Büchermensch）。”^[4]1889年，19岁的梁赞诺夫第一次走出国门，游历欧洲。他想了解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俄国流亡者的各个派别。这次游历令他收获颇多，他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

会，并且初步结识了一批俄国革命者。1890年4月，梁赞诺夫重返俄国，作为敖得萨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社团工作。1891年，梁赞诺夫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欧洲之旅。通过这次旅行，他与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与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结交更深。1891年10月，梁赞诺夫在归国途中于边境线上被捕，罪名是从事“颠覆活动”。之后被转移到敖得萨监狱。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待审拘留后，他于1892年10月30日被判处单独囚禁四年，并从事强制劳动。服刑期满后，梁赞诺夫被流放到了基什尼奥夫（现名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首都）。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依然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1900年，梁赞诺夫终于可以远离沙俄警察与流放，再次游历欧洲。由此，他的前MEGA¹时期全面展开。

一“东方问题”——从译介到重编

自1900年离开俄国、流亡欧洲以来，梁赞诺夫多次往返于柏林、巴黎、慕尼黑等地，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一方面，由于身处欧洲，梁赞诺夫不仅有机会亲身了解欧洲大陆的革命斗争形势，而且同巴黎尤其是柏林的革命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展开了密切的交往；另一方面，身在异国的梁赞诺夫也一直关心着祖国革命斗争的发展。“他为在瑞士出版的俄罗斯报纸《火星报》撰稿……订阅《前进报》”。^[1]此外，随着在欧洲大陆革命活动的深入展开，梁赞诺夫也经常作一些演讲，包括“克里木战争和农民解放”、“亚历山大二世的地区改革”、“乡村自治及其意义”、“现代国民经济学中的金融学说”、“俄国财政状况”等。^[6]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梁赞诺夫马上返回俄国参加革命。遗憾的是，革命很快就失败了。1907年，梁赞诺夫再次离开俄国，重返欧洲。革命低潮的到来使得梁赞诺夫开始全面转入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之中。他所着手开展的第一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工程就是“东方问题”译介项目。

《东方问题》是爱琳娜·艾威林与爱德华·艾威林夫妇在1897年出版的一部马克思文集。这部著作是“卡尔·马克思的某些书信和文章的再版，它涉及在‘五十年代’表现出来的东方问题、导致克里木战争爆发的特定事件以及战争本身”^[7]。由于这些文章和书信最初都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因此不言而喻，《东方问题》是一部马克思的英文报刊文章集。所以，梁赞诺夫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它编译为德文著作。

历史地来看，梁赞诺夫主持“东方问题”译介项目的端倪最早显现在他所撰写的《马克思论俄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起源》（1909年）一文中。其中，梁赞诺夫在谈到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时写道：“马克思在1853—1856年《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撰写的关于东方问题和克里木战争的大量文章与他的那些论帕麦斯顿的文章密切相关，这些文章被爱琳娜·艾威林收集并以《东方问题》为题出版。”^[8]在相应的注释中，梁赞诺夫向我们透露了如下信息：“我们必须其他地方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文章——它们的德文版将会准备好。那时我们也将结合东方问题和克里木战争时英国的政策来更为详细地研究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政策所持的观点。”^[9]考虑到这篇文章是在1909年3月初发表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最晚在1909年3月，梁赞诺夫就已经开始着手《东方问题》的译介工作了。

为了更好地进行译介工作，梁赞诺夫邀请考茨基的夫人路易莎·考茨基^[10]（Luise Kautsky）担任译者。于是，考茨基也被梁赞诺夫有意无意地卷入了这一项目中。如果梁赞诺夫按照通常的译介要求来进行《东方问题》的编译工作的话，那么这项任务的完成是指日可待的。或者说，它完全可以按照预先的设想在1909年7月结稿出版。^[11]然而，梁赞诺夫的学术严谨性和研究热情却把这个项目彻底拖入漫漫无期中。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接手“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后，梁赞诺夫并没有打算直接以该书为基础进行编译。他认为，要想确保德译本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必须首先对《东方问题》收录的马克思书信和报刊文章进行全面的核查。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德语读者奉上一部来源确切、质量有保证的马克思报刊文章集。客观地讲，梁赞诺夫的这一想法绝非多余，因为就连《东方问题》的编者艾威林夫妇也多次提到，他们在文章筛选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东方问题》的“序言”中，艾威林夫妇开门见山：“关于那些著名的书信，鉴别起来当然没有什么困难。那些未署名的书信和社论就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慎重对待了。”^[12]艾威林夫妇列出了他们的几点编辑依据：首先，在文章的筛选过程中，海尔曼·迈耶尔对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所作的摘录集^[13]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这构成了《东方问题》的原初基础。其次，《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安德森·德纳（Charles Anderson Dana）致马克思的一封信提供了马克思与《纽约每日论坛报》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在这封写于1860年3月8日的信中，德纳谈道：“大约在九年前，我邀请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从那时起这种撰稿工作就没有间断。就我记忆所及，您经常为我们写稿，从没有一星期间断。”^[14]再次，一位美国友人在1853年10月下旬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经常借用马克思的文章作为社论的行为。信中写道：“你看到了，《论坛报》又盗用了一篇社论；这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如果把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印在下面，那会招来特别的关注。我也相信，如果不违反他们的规矩和习惯，他们会这么做的。毕竟，它也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坏处，因为认真的读者能够看出，它不是编辑人员写的……”^[15]这就表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中，还有大量马克思的文章需要发掘、鉴别。最后的依据则是艾威林夫妇个人对相关事实的了解，当然首先是马克思本人的说明。根据这些线索，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从1851年起便与《纽约每日论坛报》确立固定合作关系的马克思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必定为之撰写了大量文章，因此《纽约每日论坛报》必定是一座包含着马克思主要报刊文章的巨大宝库；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的许多文章被用作社论匿名发表，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象文章的筛选、鉴别工作必将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形下，《东方问题》收录的113篇文章确实会使人产生些许疑惑之情，它们百分之百是由马克思所写吗？

正是抱着同样的怀疑并且彻底予以确证的心理，1909年5月初，梁赞诺夫起程前往布鲁塞尔、巴黎以及拉法格夫妇所居住的小城德拉维伊（Draveil）。5月中旬，他抵达了伦敦大英博物馆。梁赞诺夫此行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结合原文全面地核对《东方问题》中的各篇文章。事实表明，梁赞诺夫此行不虚。首先，在德拉维伊的拉法格夫妇那里，梁赞诺夫找到了作为艾威林夫妇编辑《东方问题》最重要依据的海尔曼·迈耶尔的摘录集。通过对它的细致考察，梁赞诺夫得出结论，这个摘录集完全是“无批判地、草率地拼凑起来的”。由此，《东方问题》的可靠性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接下来，通过在大英博物馆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初步考察，梁赞诺夫更加确定：艾威林夫妇的版本“毫无价值”可言。^[16]在191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在回顾整个“东方问题”译介项目的发展历程时，阐明了他对《东方问题》一书的总体评价：“通过对这一版本批判的审阅，我确信，它有许多错误和缺漏。而且，它还收录了既非马克思又非恩格斯撰写的文章。两遍详细地检查1852年到1862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使我能够确定：首先，那一版本也漏掉了写于1853年到1855年的

几篇重要文章；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份美国报纸中发表文章的数量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所有的预期。”^[17]

通过实地的核查与研究，梁赞诺夫对《东方问题》的理论价值有了全面的认识与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译介“毫无价值”可言的《东方问题》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东方问题”译介项目何去何从，这成为梁赞诺夫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通过在大英博物馆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全方位考察，梁赞诺夫又为马克思的报刊文章所深深折服，对之赞叹不已。在到达伦敦后不久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梁赞诺夫谈道：“我必须告诉您，这些出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迄今没有出版，真是一种耻辱。这些关于萨瑟兰公爵夫人、十小时法令史、移民、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关于欧洲反动派等等的通讯，是多么漂亮的文章。我才刚刚开始！”^[18]由于在大英博物馆的文章审核工作才刚刚起步，而梁赞诺夫也明白，这项工作浩大而繁杂，可能耗时数月。因此，他决定：路易莎·考茨基暂时中止翻译，而他本人则继续待在伦敦，尽可能全面地核查《纽约每日论坛报》。

随着研究审核工作的不断深入，梁赞诺夫逐渐陷入“又忧又喜”、“喜忧参半”的境地。之所以“忧”，是因为他日益感到，审核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正如他所说的：从1853年起，马克思的文章就开始作为社论匿名出版了；从1855年起，马克思的名字甚至完全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各专栏中消失了。因此，要找出所有这些文章并考证其作者，绝非易事。另外，我们还不能忽略一个重要因素——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并不完整。^[19]之所以“喜”，是因为梁赞诺夫在学术研究上的“竭泽而渔”使得他在全面核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同时，又把研究触角伸向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期合作过的其他欧美报刊。结果是，他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重大斩获：“如果我们把1852年到186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过的杂志概括一下，那么英文的有《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普特南氏月刊》、《自由新闻》、《美国新百科全书》和《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德文的有《改革报》、《新奥得报》、《人民报》、《新闻报》。如此一来，确定无疑的出自马克思或恩格斯之手的文章共计几百篇。”^[20]

由此，一方面是业已停顿、不知何去何从的“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另一方面是大量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梁赞诺夫萌生了新的设想：不是基于艾威林夫妇编辑的《东方问题》，而是基于五六十年代《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以及梁赞诺夫本人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报刊文章，重新编译一套内容更为丰富、来源更为可靠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集。梁赞诺夫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考茨基的赞同，党的出版人狄茨也表达了认可之声。在1909年10月3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狄茨写道：“由于马克思的著作集总有一天必定会出版，而他的报刊文章、通讯亦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充分考虑戈尔登达赫（即梁赞诺夫——作者注）和您的想法是合适的。如果我能够作为出版人为这些出版物奉献绵薄之力，我将非常高兴。”^[21]于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及同各方面的协调，梁赞诺夫终于可以摆脱译介《东方问题》的束缚，以自己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方面的新发现为基础，全面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的搜集、译介、编辑和出版活动。由此，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初显雏形。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方案的首次正式提出——维也纳出版计划

就在1909年年初梁赞诺夫着手准备译介《东方问题》的时候，另外一项重要的编辑任务也悄然降临到他的身上，这就是“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

关于“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的源起，我们可以追溯到1908年4月28日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致考茨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布劳恩谈到，他和卢多·哈特曼（Ludo Hartmann）打算出版国际工人协会的记录集，希望考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出面主持这个项目。遗憾的是，事务繁多的考茨基婉言拒绝了布劳恩的邀请。不过，他向布劳恩推荐了一位人选——《新时代》的撰稿人狄奥多·罗特施坦（Theodor Rothstein）。然而，后者也没有对布劳恩抛来的橄榄枝予以肯定的答复。于是，在耽搁了近一年后，考茨基在1909年3月再次推荐了新的人选——梁赞诺夫。^[22]

1909年6月24日，考茨基致信梁赞诺夫，建议他主持这项关于“第一国际资料卷”的编辑项目。“当我初步了解您所从事的有关马克思的工作之后，我马上想到，您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马克思主义专家、工会运动专家、熟络的国际联系，没有人比您对我们的文献更熟悉。您……能够为国际完成一套关于国际的典范作品。”^[23]此时的梁赞诺夫正身处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尽管“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刚刚起步，而且头绪繁杂，但是面对这样一项富有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编辑工程，梁赞诺夫还是点头应允了。他认为，关于“第一国际”的编辑项目可以使他“再次全面地研究1864年至1878年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是，梁赞诺夫发现，“东方问题”译介项目与“第一国际”编辑项目正好在时间、内容上前后连贯、首尾相续。如此一来，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报刊文章就能够为“国际在英国的准备时期提供许多新的说明”^[24]。

随着从1909年开始主持“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和“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梁赞诺夫在日益广泛地搜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文献遗产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愿望。早在1909年5月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大量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报刊文章之后，梁赞诺夫就急切地给考茨基写信说：“人们现在就可以为未来的马克思‘全集’全面地搜集这些文章了。”^[25]另外，在1910年10月致路易莎·考茨基的信中，梁赞诺夫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通信时也谈道：“超过一半的通信可以静静地躺在那里，直至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26]一方面是梁赞诺夫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热切渴望，另一方面则是日益紧迫的客观形势。众所周知，1913年是马克思逝世30周年。按照德国的著作权法，马克思著作的版权保护将在这一年的3月彻底失效。届时，马克思的著作随时可能为形形色色的出版社、出版商任意地瓜分利用、随意地出版发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采取措施，力保马克思著作的纯洁性。于是，1910年年底，一次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在维也纳悄然举行。作为此次会议的成果——“维也纳出版计划”被正式推出。

1910年12月27日，考茨基的代理人古斯塔夫·艾克施坦（Gustav Eckstein）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我被邀请参加周五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马克思著作版权失效后出现的情况。布劳恩告诉我说，他们计划或者采取国际性行动，或者至少由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行动，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由于希法亭和我此时正好在这里，所以周五就此举行的会议将有戈尔登达赫、雷纳、马克斯·阿德勒、布劳恩、鲍威尔、希法亭和我参加。……正如布劳恩对我说的，他打算问问您，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委员会给您写一封公开信，倡议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是否合适。详情我还不清楚，这应该在周五

才会讨论。”^[27]艾克施坦这里提到的“周五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是在1910年12月30日举行的。遗憾的是，由于艾克施坦生病，他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因此，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原定的七人变成了六人，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阿道夫·布劳恩、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卡尔·雷纳（Karl Renner）以及当时住在维也纳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梁赞诺夫。在这次会议上，由梁赞诺夫执笔，草拟了一份有关马克思全集的出版方案。1911年1月1日，这份方案被上述六人联名提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维也纳出版计划”。“维也纳出版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一，出版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马克思著作的手稿和各种不同版本相对照的、带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

二，出版一部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传记，它或许也可以编入著作全集之中。

三，要斟酌，是否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个人、党史以及科学等方面的联系而把它们共同出版。在部分著作中还存在着是否把马克思或者恩格斯，或者说这二人都视为作者的疑惑。^[28]

在强调从科学层面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同时，“维也纳出版计划”也没有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它指出，要面向大众出版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这套著作集应该“表现为客观的、相互从属的各部著作的系统文集”。它尤其强调，“人们首先会渴望《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在这一版本中，所有的外文名称与引文都要进行翻译。而在注释中，马克思的论断，例如有关工人保护的论断将得到深入的阐述。这一版本应该附有索引、传记性的导言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说明”^[29]。

就这次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者会议的发起和组织来说，阿道夫·布劳恩可谓功不可没。正是由于一位出版商向他请教，在马克思著作版权保护失效后该如何采取行动，他才警觉到马克思著作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从而紧急召开这次会议的。^[30]不过，就“维也纳出版计划”的全部内容而言，梁赞诺夫无疑是这一方案真正的制定者，是它背后的灵魂人物。只要看看这份计划中提到的“绝对完整”、“系统编排”、“带有导言和……索引”等具体要求与实施细则，看看其中谈到的有关“马克思全集”的设想和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作者认定问题，等等，我们就会意识到，只有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具有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辑经验，才会提出如此细致的编辑原则和如此重大的学术课题。事实上，布劳恩之所以邀请梁赞诺夫出席此次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的会议，就是考虑到梁赞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方面所具有的广博知识以及他所享有的崇高理论声望。

尽管“维也纳出版计划”是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六位马克思主义者联名重磅推出的，然而它并没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那里得到应有的重视，更确切地说，它彻底被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不予理睬或漠视淡然的态度“冷处理”了。我们不妨先看看艾克施坦在1911年1月6日写给考茨基的信：“……这份计划……可能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在我看来，党委会是否愿意或者能够在数年的时间里为之所约束，还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也需要几位最优秀的理论能手多年致力于一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追逐装饰性目的的任务。一套科学编制的马克思著作全集一定会非常好，非常值得欢迎；但它对党而言是否就是一种如此绝对的必然性，在我看来还是有待商榷的。”^[31]

艾克施坦对“维也纳出版计划”所持的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观点。不言而喻，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将是一项既耗时耗力又耗费大量资金的工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集结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这样一项事业，确实令人怀疑。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层面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其实并没有把出版“马克思全集”看做一项迫切的、亟待解决的任务。1911年1月16日，考茨基在致梁赞诺夫的信中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就党的有限的资金和人力来说，要想实现“马克思全集”，就必须忽略当前更为重要的任务。^[32]这显然意味着，出版“马克思全集”远远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眼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对“维也纳出版计划”采取漠然态度，除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资本论》第一卷普及本的编辑出版项目已经启动。既然党已经把人力、物力投入这项工程中，相比之下，“维也纳出版计划”所倡导的“马克思全集”也就显得不很迫切了。于是，狄茨在1月12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谈道：“我们党的领导人已经在原则上决定，到1913年底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狄茨受委托进行准备工作，他聘请考茨基来担任主编，这也同样得到了党的领导人的赞同。由此您也看出，我已经有任务在身而不能与未料及的维也纳项目为伍了。”^[33]相应地，梅林在2月16日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对于随信再次附上的维也纳同志的备忘录，我之前并不清楚。但自我通过狄茨得知，党委会已经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版委托给您之后，我对这件事情比先前更加拒斥。因为最紧要的事情已经随之进行了。在我看来，维也纳同志们的其他方案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是不可实行的……”^[34]

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一致拒斥，作为“维也纳出版计划”真正制定者的梁赞诺夫并没有积极奔走、上下呼号，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事实上，早在初步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之后，梁赞诺夫就已经意识到：“维也纳出版计划”将注定不能实行。虽然梁赞诺夫不赞成考茨基所谓的“实现马克思全集将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任务”的论断，但他非常清楚，提出“维也纳出版计划”的时机并不合适。正如他在1911年1月20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到的：“我们所挑选的力图给党委会施加影响的时机不太有利，或许在大选获胜之后，如果党在国会中赢得120个席位和400万张选票……我们也许还能使凡库和、费舍以及其他真正地把这一版本看作是关乎党之声名的大事。”^[35]于是，梁赞诺夫声明，他将不再对“维也纳出版计划”进行讨论。由此，“维也纳出版计划”也就渐渐地不了了之了。

历史地来看，“维也纳出版计划”是梁赞诺夫后来所致力于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最早方案，它不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历史使命，而且也提出了后来在MEGA¹编辑过程中真正遇到的一些挑战与抉择，例如，是否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同出版，是否应独立出版马克思的传记，等等。当然，“维也纳出版计划”之为倡议书或提案的性质，也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框架、一种构想，缺乏具体的、系统的编辑说明与编辑规划。更为致命的是，“维也纳出版计划”没有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视，最终成了一纸“空想”。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在MEGA出版史上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与MEGA¹的灵魂人物梁赞诺夫的密切联系时，这份计划的价值更加显得不言而喻。

三 前MEGA¹时期的唯一硕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

经历了“维也纳出版计划”的挫折之后，梁赞诺夫重新把精力投入了“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资料卷”的编辑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梁赞诺夫得到了倍倍尔的大力支持。在1913年4月中旬写给狄茨的信中，梁赞诺夫谈到，正是由于倍倍尔的推荐，党委会才同意转交给他荣格、贝克尔和莫特勒（Julius Motteler）的所有遗作。^[36]而且，在倍倍尔的支持下，党委会不仅让梁赞诺夫自由地使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的所有资料而不写收据、不列清单，甚至还迫使伯恩斯坦提供恩格斯遗产中的其他资料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以便于梁赞诺夫使用。^[37]尽管梁赞诺夫一心希望尽快完成这两项编辑任务，从而投入其他研究工作中，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由于个人以及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两个项目一拖再拖，始终难以完成。1917年，在经过八年的坎坷编辑历程后，作为“东方问题”项目的部分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第一卷、第二卷终于出版了。

在“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提出了对整套文集的编纂设想。该文集计划出版四卷，已经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涉及1852—1856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具体来说，第一卷收录了1852—1854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英文版）中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英国、东方问题、帕麦斯顿勋爵以及1853—1854年俄土战争的书信；第二卷收录了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英文版）和《新奥得报》的文章，它涉及的内容是克里木战争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卡尔斯陷落。其中有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例如论西班牙革命、泛斯拉夫主义、罗素勋爵以及卡尔斯陷落这样的系列文章。第一卷、第二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关于尚未出版的第三卷、第四卷，梁赞诺夫也介绍了它们各自的内容。第三卷将收录1856—1858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英文版）的文章，其中有论英、法、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撒丁岛的文章，关于动产信用公司、俄英联盟史的系列文章，关于1857—1858年的英国、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及印度起义、1857年商业危机的文章。第四卷将收录《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德文版）中关于1859年欧洲危机、意大利战争的文章，还包括《福格特先生》、《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最重要的文章，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维也纳《新闻报》的论英国（1861—1862年）和北美内战的文章。^[38]

有趣的是，对于这两卷来之不易的编辑成果，梁赞诺夫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成就感。恰恰相反，他那双“批判的眼睛”始终都在寻找着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在1917年1月写给路易莎的信中，梁赞诺夫谈道：“这两卷书确实很宏伟。但我对它们远不满意。第一卷稍好些，第二卷带有过于匆促的一切痕迹，善良的叔叔^[39]像狂热的复仇女神一样拿这些匆促驱赶着我。对于当前变得愈发紧迫的全集来说，它勉强算得上是准备性的工作。”^[40]虽然梁赞诺夫那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令他没有对前两卷作出很高的评价，不过，他还是希望在未来的第三卷、第四卷中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向读者奉献质量更为精良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梁赞诺夫埋头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各卷的出版工作，但他并没有忽略作为《著作集》之并蒂花的“第一国际资料卷”。直至今时，梁赞诺夫仍然怀有出版“资料卷”的计划。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编者前言”中，当梁赞诺夫谈到《著作集》的任务是填补1852—1862年的空白时，他在脚注中又补充说：“1864—1876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些与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相联系的声明，将在我所准备的‘第一国际资料卷’中发表。它的第一卷即将出版。”^[41]

然而，就在梁赞诺夫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著作集》剩余两卷以及“第一国际资料卷”的出版准备工作时，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了：1917年2月俄国革命爆发了。于是，梁赞诺夫的工作计划被完全改变了。3月25日，梁赞诺夫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给考茨基夫妇写信说：“在这个时刻，我绝不可能写什么档案材料性的东西。在现在这一各种事件时时刻刻都在大声呼唤马克思的时候，拿出马克思的名言会十分无聊。[.....]我们迄今所获悉的一切都表明，1905—1907年所完成的工作并不是徒劳的，数十万册的《爱尔福特纲领》和《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全部留在警察那里。”^[42]不言而喻，梁赞诺夫的革命热情已经点燃，他再也无心守在书斋中从事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了。1917年5月，考茨基夫妇收到了梁赞诺夫在前MEGA¹时期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亲爱的朋友们！健康地活着！我再次踏上旅程。[.....]马克思和科学现在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变为现实。”^[43]至此，梁赞诺夫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欧洲流亡生涯，也结束了他的前MEGA¹时期，重返俄国。

梁赞诺夫的离去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和“第一国际资料卷”最终成为未竟的事业。前者只出版了两卷，截至1856年。因此，这套文集标题上的“1852—1862”就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至于“资料卷”，梁赞诺夫也仅仅完成了作为资料部分的第一卷，计划中的导言和德译文都没有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返回俄国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之后，梁赞诺夫也没有忘记这一曾经陪伴他8年的编辑项目，他仍然打算根据大量新发现的材料再次把“第一国际资料卷”的出版提上日程。在1930年6月5日致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的信中，梁赞诺夫谈道：“第一卷可能早在战前就已经排好版了，我有它的一份校样。那时我还在远为狭隘的基础上工作着。尽管主要文献依然保持原貌，但是阐释性的、相关的材料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另外，我对这一出版物提出的文本考证、编辑技术的要求也提高了。”^[4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30年年底袭来的政治风暴在吞噬了梁赞诺夫的同时，也最终使“资料卷”的出版计划成为泡影。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梁赞诺夫在《新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发表的几篇关于“第一国际”的文章以及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这部传记著作中所作的相关阐述^[45]来窥得他当年构想的“资料卷”的一斑。

历史地来看，前MEGA¹时期可谓是梁赞诺夫MEGA¹时期的重要铺垫。首先，通过主持一系列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辑出版工程，如“东方问题”、“第一国际资料卷”等，梁赞诺夫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识，增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认识与理解，而且积累了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辑经验，从而成为当时颇具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后来列宁独具慧眼、任命梁赞诺夫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的根本原因。其次，通过长年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的流亡生活，梁赞诺夫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党的出版人狄茨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也因此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任，有机会亲身接触到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以及伯恩斯坦处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另外，通过对拉法格夫妇的多次拜访，梁赞诺夫对他们手中的马克思手稿亦有了总体的把握。正因如此，梁赞诺夫才能够在MEGA¹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搜集活动中总是成竹在胸，他知道哪些文献在哪里。最后，正是在前MEGA¹时期，梁赞诺夫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构想，而这一构想在他此后的马克思学研究过程中日益得到深化与加强，最终成为他魂牵梦萦的学术理想。正因如此，梁赞诺夫才把自己毕生献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编辑和出版活动，献给了MEGA¹编辑出版工程。

第二节 十月革命胜利后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酝酿与准备

在20世纪初流亡于欧洲的日子里，梁赞诺夫曾一度寄希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实现他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愿望。然而，随着1911年“维也纳出版计划”的失败，梁赞诺夫日益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显然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政党而言，与其去关注理论问题，倒不如更多地去关注现实问题。因此，梁赞诺夫在理智地放弃了“维也纳出版计划”的同时，也开始考虑以个人力量来完成这项事业。于是，党的出版人狄茨进入他的视野之中。对于梁赞诺夫来说，狄茨无疑是与他合作进行“全集”出版工作的最佳人选。在1911年年底写给狄茨的信中，梁赞诺夫谈道：“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希望您还出版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不朽版本，这将为狄茨出版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化活动树立一座比青铜更恒久的纪念碑。”^[46]1916年夏，在忙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文章筛选以及第一卷、第二卷的收尾工作时，梁赞诺夫仍没有忘记与狄茨谈及“全集”事宜，“现在被删去的一切，我都会保留在全集中。这套全集我们一定要与您共同出版。”^[47]可以看出，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始终是梁赞诺夫最大的学术理想。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所有设想都由于个人以及历史的原因一一化为了泡影。

1917年5月，梁赞诺夫结束欧洲的流亡生活，重返俄国参加革命。这一次，他在成就了自己“革命至上主义”的同时也酿下了终身不可弥补的学术憾事：他彻底放弃了从事近十年的“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出版项目和仍有两卷待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于是，梁赞诺夫在前MEGA¹时期进行的两大主要编辑出版活动最终都成为未竟的事业。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我们为梁赞诺夫的巨大学术损失倍感惋惜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曾经似乎离梁赞诺夫日渐遥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计划又逐渐清晰地显现在他的面前。伟大的十月革命在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为梁赞诺夫的学术理想开拓了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一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立

十月革命胜利后，梁赞诺夫在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处理工会事务的同时，把大量精力投入了科学研究领域之中。1919年，他在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学院主持“马克思主义讲座”一课，向学生们集中讲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传略。很快，他的讲义就被集册出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48]，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有九讲。第一讲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同时介绍了两者的家庭背景。在第二讲中，梁赞诺夫以德国30年代的革命运动为背景，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包括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新闻出版活动。第三讲主要探讨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哲学的结合，其中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脉络的历史性梳理，着重阐释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第四讲叙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历史，说明了马克思作为其组织者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并且特别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五讲全面阐述了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直至革命的失败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第六讲至第八讲可谓是梁赞诺夫最熟悉、最拿手的部分，因为这正是他在前MEGA¹时期围绕“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资料卷”两大编辑出版项目集中精力研究的内容。因此，在这三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介绍，就马克思恩格斯对克里木战争的看法、第一国际的成立和各届代表大会、巴黎公社、马克思与巴枯宁的斗争等内容所作的阐述。第九讲是最后一讲，主要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生活。其中，梁赞诺夫特别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晚年对俄国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49]总的来说，尽管与梅林的《马克思传》（1918年）、古斯塔夫·迈耶尔的《恩格斯传》（1920年）相比，梁赞诺夫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简洁短小了许多，但是它的内容生动、资料丰富，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更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它为初学者而且不只限于初学者提供了一幅全面而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图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梁赞诺夫把自己多年以来对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及革命实践活动的研究成果运用于这部著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因此，这部以讲义形式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绝对不失为“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好阐述之一”。^[50]

梁赞诺夫不仅在社会主义学院承担着教学工作，而且也承担着组织和管理工作。作为学院的主席团成员，梁赞诺夫在1919年11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工作室。从1920年夏起，该工作室人员便着手在伦敦购买珍贵书籍和稀有资料，这为后来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奠定了最原初的基础。^[51]1920年12月8日，在列宁的主持下，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决议，“建立世界上第一座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并称此为“具有非凡国际意义的任务”。^[52]1921年1月11日，按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研究院”），梁赞诺夫被任命为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为了便于梁赞诺夫开展研究院的建设工作，中央委员会允许梁赞诺夫吸纳无党派人士来参与研究院的各项活动^[53]。于是，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组织基础初步形成。

尽管在十年之后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马克思学中心^[54]，但是在刚刚成立之初，马恩研究院却完全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首先，研究院没有像样的工作场所，梁赞诺夫只能带领他最早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一栋仅有六间小屋的房子里工作。其次，研究院基本没有什么收藏，全部的家当只有几百本书，其中一部分还是1920年夏刚刚在伦敦购得的；原始手稿更是屈指可数：只有马克思致卢格的8封书信。^[55]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研究院最初的创建工作是何等艰难。幸运的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马恩研究院的工作予以了百分之百的支持。1922年，研究院迁到了从前的多尔格鲁奇侯爵宫殿，从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同时，苏维埃政府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仍备好大量黄金供研究院购买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书籍之用。于是，借助历史赐予的天时、地利、人和，梁赞诺夫领导马恩研究院正式踏上了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征程。

二 列宁对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根本推动

在今天看来，梁赞诺夫、马恩研究院和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三位一体”似乎是一个自在的、完整的系统，MEGA¹工程正是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在马恩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齐心协力下顺利实现的。但是透过历史的镜子，我们发现，这个体系

的形成绝不是自然而然的。毋宁说，它有一个强大的外在动力，这个动力的施予者不是别人，正是党的领导人列宁。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忙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工作的同时，列宁并没有忽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理论在苏维埃俄国的出版、宣传。这里有一段逸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早在1920年8月马恩研究院尚未成立之时，列宁就邀请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y）到克里姆林宫，商谈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的出版和研究事宜。当时，列宁提出，除了科学地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之外，还必须挑选出最重要的内容让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从而使他们实实在在地读到真正的马克思。他建议，从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选出最重要的书信，从而编辑一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这卷通信集不仅要以俄文出版，而且还应该以其他欧洲文字出版，因为“西方对马克思的了解可能比俄国人还少”。随后，列宁从房间里取出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交给阿多拉茨基。几天后，他又把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所作的摘录以及评论笔记寄给了阿多拉茨基，供他编辑使用。^[56]此后，列宁一直关心着阿多拉茨基的工作进程。在1922年4月10日致阿多拉茨基的信中，列宁写道：“您对书信要多加研究，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事业。要选最重要的东西。注释要简短、明了、准确。（把马克思的意见同某些‘权威’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加以对比。）……”^[57]

这段逸事不禁让人产生一丝联想。列宁会见阿多拉茨基商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日子正是他构想成立后来的马恩研究院的时候，因此，在未来的研究院院长人选上，列宁或许也曾考虑过阿多拉茨基。因为客观地说，列宁对梁赞诺夫并不是完全认同的。早在1901年，列宁就对梁赞诺夫写给《曙光》杂志的《两种真理》一文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在《对梁赞诺夫〈两种真理〉一文的意见》中，列宁提出了近20条反对意见，其中使用了“歪曲事实”、“愚蠢的”、“枯燥无味”等激烈措辞^[58]。正是由于梁赞诺夫领导的“斗争”社的“政治错误”，列宁坚决反对“斗争”社代表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如列宁后来在1904年出版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谈到的，“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当被做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59]因此，经过激烈的争论，梁赞诺夫最终没有被允许出席1903年的代表大会。^[60]另外，梁赞诺夫的政治背景还有一个致命缺陷：直到1917年他才加入俄国共产党，此前他一直和孟什维克比较接近，或者说，他比较赞成孟什维克的观点。在1909年致考茨基的信中，梁赞诺夫谈道：“不过，我并不反对孟什维克。恰恰相反，我在1901—1905年期间——革命之前——是一名‘群众罢工主义者’，因为我在原则上反对恐怖主义和有准备的武装起义以及一切斗争组织。”^[61]显然，梁赞诺夫的这一观点与列宁是截然相反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是列宁也难免对与孟什维克关系暧昧的梁赞诺夫心存疑虑，难免会对他的任用顾虑重重。然而，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卓越领导人，列宁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在党内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他完全是做事不对人的。因此，与其说他关注梁赞诺夫的复杂过去，倒不如说他更看重梁赞诺夫的实际能力，看重他所具有的深厚马克思主义学养和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编纂经验。这无疑是列宁亲自任命梁赞诺夫而不是阿多拉茨基担任马恩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根本原因。话说回来，假定当初列宁邀请梁赞诺夫而不是阿多拉茨基去克里姆林宫，那么梁赞诺夫或许会对以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为基础来编纂一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出异议，因为没有人比梁赞诺夫更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现状，更清楚这套实际上是由伯恩斯坦独自完成的书信集的内情：伯恩斯坦对许多书信作了不同程度的删节，这套被世界无产阶级奉为经典的著作其实并没有真正展现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原貌。^[62]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尽管阿多拉茨基是俄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与梁赞诺夫相比，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学养上还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了解方面，阿多拉茨基都要逊色于梁赞诺夫。所以，结合后来梁赞诺夫率领马恩研究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不得不叹服列宁当年的独到眼光。

列宁对马恩研究院发挥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他不仅一举奠定了马恩研究院的组织基础，而且还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根本上确立了马恩研究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使命。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道：“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63]

如果说，这封信只是未来马恩研究院工作任务的最初纲领，那么在2月2日，列宁又对这条纲领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对于这个在MEGA¹历史上颇具意义的日子，《伟大的遗产》作了如下的描述：

1921年2月2日对于弗拉基米尔·列宁来说是一个辛苦的工作日。上午在人民顾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接着在政治局——主题再次是经济问题。然后同各工作领域的同志……交流讨论。最后，在下午早些时候迎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以及一批农业干部。

列宁和他们聊了很久。当他终于一个人的时候，他陷入了沉思。突然，他的思想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农民的境遇转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他拿起笔给梁赞诺夫写下了他那张很著名的纸条……^[64]

这张“著名的纸条”或者说短信看似出自列宁的突发奇想，但它却从根本上决定了马恩研究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且成为未来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直接动因。在这封短信中，列宁向梁赞诺夫询问道：“（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

（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65]

历史地来看，列宁写给梁赞诺夫的这封短信可谓是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准备工作大纲。无论是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书信，还是购买这些书信的照片、出版物，无论是寻觅马克思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还是查找、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摘录的引文，这些工作都属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一伟大编辑出版工程的范畴。如果说，列宁的这张纸条直接为马恩研究院提出了未来工作的总方向与总目标，即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手稿、著作以及相关文献资料，那么它也间接地、顺理成章地为研究院提出了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使命。可以想象，梁赞诺夫在收到列宁的这封珍贵短信后是多么欣喜与激动，因为它与梁赞诺夫怀揣多年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夙愿简直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如前所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梁赞诺夫早在前MEGA¹时期就已确立的、魂牵梦萦的学术理想。从那时起一直到马恩研究院成立的十多年里，梁赞诺夫始终都在为这一学术梦想努力奋斗。然而，由于缺乏适宜的历史机遇，缺乏适当的合作伙伴，他只能进行单枪匹马式的独立研究。如今，以马恩研究院为基础，一方面是来自列宁自上而下的理论关怀，另一方面是来自梁赞诺夫

秉持多年的学术理想。于是，在“维也纳出版计划”提出整整十年之后，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终于踏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而梁赞诺夫在做了多年的倡导者、发起人之后，终于能够以组织者、领导人的身份来全面地、系统地开展波澜壮阔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

第三节 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及相关资料的搜集活动

在接到列宁的“著名的纸条”之后，梁赞诺夫便带领马恩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展开了大规模的文献资料搜集活动。在这一搜集过程中，梁赞诺夫把工作重点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文献资料收集工作，这既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也涉及马克思恩格斯遗留下来的文献遗产，如手稿、笔记、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以及与他人之间的通信；另一方面则是相关的社会主义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等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梁赞诺夫之所以采取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与宏大历史背景资料并举、并重的搜集方针，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学’（Marxforschung）这个概念——正如梁赞诺夫所创立的——除了其较早的、较严格的意义之外还包括唯物主义和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等等。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实践和写作活动与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党的发展和影响，尤其是与19世纪各国工人运动密切联系而言，马克思学实际上也包含着革命史、一般政治史以及19世纪的工人运动。”^[66]正是基于这种全面的考虑，梁赞诺夫想尽种种办法来搜集相关的书籍、文献和资料，以充实研究院内部的各个机构。

一 梁赞诺夫对专业图书馆的收购

梁赞诺夫所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文献资料收集方法就是购买专业性的图书馆。

首先就国内来说，梁赞诺夫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接手了俄国民党人W.I.塔涅耶夫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收藏着关于社会主义史的极具价值的文献。^[67]不过，俄国国内只占梁赞诺夫搜集活动的很小比重，他的图书馆收购活动更多地集中在国外，具体来说：1921年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收藏家狄奥多·毛特内尔（Theodor Mauthner）和威廉·帕朋海姆（Wilhelm Pappenheim）的藏书2万余册的图书馆，另外还收购了藏书超过1万册的卡尔·格律恩伯格（Carl Grünberg）图书馆，该图书馆尤其富藏有关经济史和农业史、17世纪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以及珍稀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和报纸。同年还收购了著名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费希特图书馆，它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的珍贵资料共同构成了马恩研究院哲学工作室的决定性基础。1923年收购了1920年在维也纳去世的俄罗斯移民S.克里亚琴科（S. Kljatschko）的富藏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革命报纸与杂志的图书馆。1925年收购了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施蒂纳（Max Stirner）研究者约翰·亨利·麦凯（John Henry Mackay）的施蒂纳收藏室，它是这位收藏爱好者三十载的收藏成果，共有1100册图书，300份手稿。1926年收购了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阿道夫·索特贝尔（Adolf Soetbeer，关于金融业与银行业历史的4500册图书）和维也纳教授威廉·诺伊哈特（Wilhelm Neurath，1000册图书）的图书馆，同年还购买了法国革命史编纂学家查理·韦利（Charles Vellay）关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著作的著名收藏。1927年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海尔菲特收藏馆”，里面藏有海尔菲特（Joseph Alexander von Helfert）男爵在60年的时间里搜集到的有关奥地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史的资料（5000册图书，1万多份传单以及330份报纸）。^[68]

梁赞诺夫能够进行这一桩桩大手笔的图书馆购买活动，完全得益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提供的强大财力支持。我们不妨以毛特内尔/帕朋海姆图书馆和卡尔·格律恩伯格图书馆为例进行说明。1921年6月1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作出决议，下拨50000金卢布供梁赞诺夫前往欧洲为马恩研究院购买书籍之用^[69]。于是，梁赞诺夫在维也纳洽谈好了购买毛特内尔/帕朋海姆图书馆以及卡尔·格律恩伯格图书馆的事宜。但是由于经费不足，梁赞诺夫便致信列宁请求财政支援。他在信中写道：“当在组织局的会议上讨论该给我多少经费进行购买活动时，我说，我没有放弃得到这两座图书馆的希望。因此，组织局作出决议，在这件事情上将提高经费金额。因此，我请求按照这一决议，把经费增加至125000金卢布。”在请求中央政府增加经费的同时，梁赞诺夫也急切地请求政府尽快作出决定：“必须要快，因为日本人已经在维也纳了，他们为大阪研究所购买这里所有可能的图书馆（几天前他们收购了毕希纳和霍斯巴赫图书馆）。格律恩伯格和毛特内尔给了我们预售权。……必须尽快办成。”^[70]面对梁赞诺夫急切的请求，列宁马上给予批复：增拨75000金卢布。1921年9月23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将购买绿山城图书馆^[71]和毛特内尔图书馆所需的款项75000金卢布汇给斯托莫尼亚亚科夫，责成他节约使用这笔经费，并亲自负责把相应的数额直接汇给这两家图书馆馆主本人。”^[72]正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梁赞诺夫如愿以偿地收购了这两座重要的图书馆，从而为马恩研究院增添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与原始文献。^[73]

可以说，通过收购图书馆来购买关于社会主义史、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文献书籍相对而言要容易许多，因为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物质因素。只要苏维埃政权为马恩研究院提供足够多的黄金就可以保证研究院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梁赞诺夫以及他所领导的马恩研究院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搜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文献遗产，也就是二人逝世后遗留下来的原始手稿、书信和笔记，等等。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究竟身在何方？它们的境遇如何？梁赞诺夫应该怎么做呢？

二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状况

众所周知，马克思去世后把自己的文献、手稿都遗赠给了恩格斯，并允许他出版这些原始资料。正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恩格斯亲自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在恩格斯晚年忙于《资本论》编辑活动的同时，他也开始考虑身后马克思与他本人文献遗产的最终归宿。1893年7月29日，恩格斯立下遗嘱：“在我去世之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所写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他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私人信件，由我的遗嘱执行人移交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我去世以前归我所有或由我支配的全部书籍以及我的全部著作权，我遗赠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我去世以前归我所有或由我支配的全部手稿（上面指出的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手稿除外）和全部信件（卡尔·马克思的上述私人信件除外），

我遗赠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斯坦。”^[74]1895年7月26日，恩格斯又专门就书信对遗嘱作了补充：“我现在嘱咐，我生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前述卡尔·马克思所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我给他的和他给我的信件除外）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交给上述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她是前述卡尔·马克思的法定的私人代表；此外我嘱咐，我生前归我所有的我在巴门或恩格尔斯基尔亨的亲戚们，派尔希·怀·罗舍或其妻艾伦，保尔·拉法格或其妻劳拉，爱德华·艾威林博士或其妻爱琳娜·马克思，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博士或其妻路易莎以及苏黎世的博伊斯特一家写来的全部信件，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交还各有关写信人。根据这一点……我现在遗嘱把全部信件（按本补充的安排应交给上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信件以及我在本补充中另作处理的信件除外）交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斯坦。”^[75]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及其补充，爱琳娜继承了马克思的手稿和书信（除去与恩格斯的通信），倍倍尔和辛格（Paul Singer）继承了恩格斯的所有书籍以及1000英镑，倍倍尔和伯恩斯坦继承了恩格斯的手稿和书信（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至于在遗嘱补充中提到的那些由恩格斯的亲友写来的书信，全部归还给了写信者本人。在这一过程中，甚至倍倍尔也把自己写给恩格斯的书信拿了回去。^[76]

由于爱琳娜就住在伦敦，因此她很顺利地把马克思的文献遗稿安置到了自己的家中。但是，以倍倍尔、辛格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恩格斯遗产的处理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尽管当时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经被废除，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处于严酷的政治时局中，经常受到当局的搜索与查抄。同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伯恩斯坦仍是普鲁士官方年复一年的通缉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把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遗产尤其是那些未出版的手稿、通信带回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显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取一分为二的策略：恩格斯的藏书直接运回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通信则出于安全考虑依然留在伦敦，由曾经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报》负责人、当时流亡于伦敦的尤利乌斯·莫特勒保管。具体来说，莫特勒保管的恩格斯遗产就是四个箱子：一个装有马克思遗稿的大铁皮箱，这是恩格斯亲自上锁保管的；另一个被恩格斯称为“Hibernica”（拉丁语，意为伊比利亚半岛或西班牙）的箱子，里面装有恩格斯整理好的刊载马克思恩格斯通讯文章的报纸、杂志；另外还有两个装有恩格斯手稿的大木头箱子，这是在恩格斯去世后由社会民主党人打包的。^[77]在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的这四个箱子后，莫特勒把它们径直放到了住所的地下室中，之后再未触碰。于是，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完全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至于那些被运往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恩格斯藏书，境况也不是很好。梁赞诺夫就曾谈道：“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直到1900年，这些藏书还杂乱地堆放在柏林的几间屋子里。当已经逝世的凡库和指给我恩格斯的那些军事科学书籍时，他带着几分怀疑甚至不屑的口吻谈到——正如他们这些实践家经常习惯于给理论家揭示的那样——这些书是多余的、烦人的负担。”^[78]

经过这样的处理，在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就被人为地分成了三大部分：恩格斯的藏书安置于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马克思的绝大部分遗稿安放于伦敦爱琳娜的家中，恩格斯的遗产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则保管于伦敦的莫特勒处。

190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残余——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通缉令被彻底废除。于是，在流亡多年之后，身处伦敦的莫特勒终于决定在1901年重返德国，由此，尘封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也有望回到德国。当时，莫特勒与倍倍尔就遗稿的安置地点进行了反复磋商。起初，倍倍尔并不主张把遗稿直接运送至柏林，因为他担心作为遗稿继承人之一的伯恩斯坦^[79]会按照修正主义观点来阐释遗稿，所以他提出把遗稿安置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保管。莫特勒也赞成倍倍尔的考虑，不过他建议把遗稿安置在瑞士的苏黎世。尽管作过种种设想，但是在狄茨的极力反对下，倍倍尔最终还是决定，把遗稿安置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80]。1901年5月12日，莫特勒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明了运输几箱遗稿的情况：“在乡镇当局对箱子里的商务资料、手稿、书籍与印刷品、家庭用品等东西作过仔细的检查后，它们同我们的家具一起被放入了仓库，以便之后在国际行李车中直接过境。”^[81]值得一提的是，在报请海关作检查之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莫特勒没有被恩格斯上锁的那只大铁皮箱的钥匙。于是他写信询问考茨基和倍倍尔。考茨基告诉他，钥匙在前妻路易莎那里。因为在恩格斯晚年期间，正是路易莎一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的。不过，由于莫特勒与路易莎多年没有联系，因此考茨基建议莫特勒采取别的方式打开箱子，以方便海关检查。庆幸的是，恩格斯锁上的大铁皮箱并没有被莫特勒以非常手段打开，因为通过倍倍尔的转达，路易莎很快就将皮箱的小钥匙寄给了莫特勒。^[82]这样，在恩格斯逝世六年之后，身处伦敦的这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稿终于顺利地返回德国，收藏于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

与莫特勒保管的这部分遗产相比，爱琳娜保管的那部分马克思遗产回归德国的时间要晚得多。1898年爱琳娜去世，她手中的马克思手稿和书信全部转交给了她的姐姐——居住在法国德拉维伊的劳拉·拉法格。^[83]尽管拉法格夫妇保管着手稿，但他们并不排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浏览、借阅这些手稿。正如前文提到的，单单梁赞诺夫本人就曾多次拜访拉法格夫妇，查找、借阅手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1910年5月，梁赞诺夫在拉法格夫妇家工作了八天（吃住全包）。在这八天中，梁赞诺夫把拉法格夫妇拥有的全部马克思文稿彻底整理了一遍，并制作了一份书目。他在给柏林的梅林和维也纳的门格基金会各寄去一个资料包裹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下了一部分材料。在这部分材料中，除了编辑“东方问题”以及为《新时代》撰稿所需要的资料外，还有马克思写给丹尼尔逊的全部书信、马克思写给他的夫人和小女儿爱琳娜的信件。如梁赞诺夫本人所说，这些材料与龙格提供的马克思致大女儿燕妮的信件共同构成了关于马克思生平尤其是1881年和1882年生平的有趣说明。^[84]另外，正是以这部分资料中的一个抄本为基础，梁赞诺夫在《新时代》发表了著名的《马克思的自白》^[85]一文。同样，考茨基也曾多次拜访拉法格夫妇，向他们介绍自己编辑《剩余价值理论》的进展，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重要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5月考茨基在拉法格夫妇那里找出了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信以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由此，这些资料才得以在梅林的《遗著选》中首次出版。^[86]

可以说，正是由于拉法格夫妇把自己保管的大量珍贵手稿出借甚至赠送给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考茨基才会在1911年年底拉法格夫妇去世后谈道：“幸运的是，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已经不在拉法格夫妇这里了”^[87]。梁赞诺夫也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拉法格夫妇的——作者注〕遗产来说，它现在不再如此重要了。最重要的手稿在您、梅林和我这里。最重要的书信也在我和梅林这里。”^[88]一年以后，梁赞诺夫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权代表亲自前往德拉维伊，全面清理了拉法格夫妇的遗产，从而把马克思女儿名下保管的马克思手稿资料归并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

至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绝大部分文献遗产都回归德国，并在社会民主党的监管下收藏于档案馆中。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日渐缓和，从1910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把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书信安置到了柏林的伯恩斯坦家中。于是，伯恩斯坦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手稿的长期保管人。^[89]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状况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明白，要想搜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书信，梁赞诺夫就必须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打交道，更要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此时唯一的继承人伯恩斯坦打交道^[90]。回想起梁赞诺夫在前MEGA¹时期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密切联系，我们不免会信心满满地断定，梁赞诺夫去柏林搜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前景将非常乐观。

确实，在前MEGA¹时期，梁赞诺夫备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任。他与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党的出版人狄茨等人的情谊亦非比寻常。首先，正是出于对梁赞诺夫的器重与赏识，《妇女与社会主义》、“东方问题”乃至“第一国际资料卷”三大编辑出版项目才会“花落梁家”。值得一提的是，与另外两项学术项目相比，《妇女与社会主义》编辑出版项目的政治意味更为浓厚，因为它是作为倍倍尔70诞辰的献礼版出现的。社会民主党能够把这么重大且紧迫的任务委托给梁赞诺夫，足见对梁赞诺夫的信任。其次，在主持“东方问题”、“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的过程中，倍倍尔对梁赞诺夫的工作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他特别批准梁赞诺夫自由使用、借阅档案馆中仍然处于机密状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稿，就连梁赞诺夫本人都说：“在战前，我相当规律地在档案馆工作，并作为第一个人整理了那里所保存的马克思手稿。”^[91]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梁赞诺夫是非常地重视和优待。再次，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梁赞诺夫作为其全权代表前往德拉维伊，全面清理拉法格夫妇遗产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方面的深厚素养固然是社会民主党选择他的重要理由，但是能够把如此紧要的、事关党的理论遗产的大事委托给梁赞诺夫，社会民主党对他的信赖可见一斑。最后，在伯恩斯坦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委托梁赞诺夫参与其中。尽管梁赞诺夫没有直接参与通信的编辑修订，但却亲身接触到了完全不为世人所知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要知道，除了梁赞诺夫之外，当时只有五个人能够接触到这一珍贵宝库，即倍倍尔、伯恩斯坦、梅林、狄茨和劳拉·拉法格。^[92]撇开马克思的女儿劳拉不谈，梁赞诺夫作为唯一的党外人士参与到《通信集》的核心编辑圈中，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有了在前MEGA¹时期结下的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党的诸位领导人的深厚情谊，梁赞诺夫本人也对前往德国搜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他希望在与德国友人重叙旧情的友好氛围中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或购买事宜。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

1921年年初，梁赞诺夫赶赴柏林。出乎梁赞诺夫意料的是，迎接他的并不是温暖的问候与友人重逢的喜悦，而是冷漠地拒绝与隔阂。虽然仅仅过去了四年，一切已然物是人非。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一翼此时已经独立出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而在原有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反共产主义的倾向非常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来自苏维埃俄国的梁赞诺夫受到的冷遇是可想而知的，而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展开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谈判亦停滞不前、毫无成果。最后，梁赞诺夫不得不无功而返。

虽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重重阻力，但梁赞诺夫并没有气馁。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支持力量，游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工夫不负有心人，在考茨基的前妻路易莎·弗赖贝格尔（Louise Freyberger）和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献顾问保罗·卡姆普夫迈耶尔（Paul Kampfmeier）^[93]的帮助下，梁赞诺夫的努力在1923年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原则上允许他使用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伯恩斯坦也允许他照相复制自己保管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于是，1923年秋，梁赞诺夫带着沉甸甸的7000页照相复制件返回莫斯科。

三 梁赞诺夫从德国收获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

历史地来看，梁赞诺夫1923年柏林之行的收获可谓极其丰富，它构成了莫斯科马恩研究院文献宝库的首批珍品，并且为未来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奠定了主要的原始资料基础。1923年11月20日，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作了题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的演说，兴奋地介绍了他在柏林的重大斩获。

第一，梁赞诺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伯恩斯坦家中找到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如今被我们奉为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原始手稿。

首先，最令梁赞诺夫兴奋的莫过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手稿的发现。多年以来，这部被马克思豁达而不失风趣地称为“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手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是否还全部存在，是否确实遭到了老鼠牙齿的批判？梁赞诺夫的这次柏林之行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最终通过巨大的努力，成功地使《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手稿重见天日。现在，我拥有这份手稿的一套照相复制件。我希望以后能够向大家讲述，我在四周的时间里花了多大的工夫从伯恩斯坦档案馆里找出一份又一份的手稿。我以我所熟悉的所有已经刊印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起初，我想拥有‘圣麦克斯’手稿。我记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部分已经出版，因而想，我可能从伯恩斯坦那里最早得到已经出版的这部分内容的手稿。当这一点实现之后，我对伯恩斯坦说，他在某某地方曾说过，这部著作还有一个部分，他想出版它。他想不起来。因此就必须向他指出他本人曾经说过的话。经过数日的争论，他才把手稿的第二部分交给了我。”^[94]正是通过与伯恩斯坦的机智周旋，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仔细辨认、分析，梁赞诺夫成功地找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圣麦克斯、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手稿，同时也发现了关于真正社会主义的那部分手稿。梁赞诺夫认为，尽管“圣麦克斯”部分篇幅巨大，内容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鲍威尔和费尔巴哈部分。他特别指出，费尔巴哈章“出色地、具体地、清晰地”阐发了以下的观点：“出发点、基本论点并不是什么抽象物，而是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为、他们所面对的既有条件以及为人的活动所改变的条件。任何想研究人类历史的人必须首先为自己提出这样一项任务：研究人的有机体，研究人自身，研究他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环境，包围着他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条件以及其他条件。”^[95]正是基于对费尔巴哈章的极大重视，梁赞诺夫决定在出版整卷《德意志意识形态》^[96]之前，先出版费尔巴哈章。于是，在1926年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中，我们看到了梁赞诺夫编辑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论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这是“费尔巴哈部分”首次以原文出版。^[97]

除了在伯恩斯坦那里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部手稿，梁赞诺夫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发现了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写的一些重要手稿。正如梁赞诺夫所说的，他在战前其实已经看到过这些手稿，只不过由于专注于1852—1862年的“东方问题”以及1864—1876年“第一国际资料卷”的编辑工作，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对这些手稿作过全面考察。另外他也以为，梅林在编辑《遗著选》的过程中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手稿。^[98]然而，经过这一次深入的辨别研究，梁赞诺夫又找出了一部很大的手稿：“它从第五页开始。起初它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它也纯粹是由笔记构成的。马克思引用了某本书的一些段落，在上面作了批注。于是我萌生了一个猜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可能有一部试作。这个猜想实际上是正确的。我不久就将出版的这部一百页厚的手稿包含着对黑格尔法哲学逐段逐段的批判，大概从261和262节到311节。”^[99]除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梁赞诺夫还发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手稿以及马克思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片段等等。对于今天备受关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梁赞诺夫并没有给出太多说明，只是谈到这部“国民经济手稿体现了马克思著作的通常结构”。梁赞诺夫认为，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他发现的1847年之前的新手中稿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最为重要，其次就是《雇佣劳动与资本》手稿。^[100]

第二，梁赞诺夫搜集到了大量的《资本论》手稿。

梁赞诺夫柏林之行的另一重大成果就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不为人知的《资本论》手稿。首先，梁赞诺夫找到了马克思写作1861—1863年手稿的全部23个笔记本。恩格斯曾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谈到，在这23个笔记本中，笔记本I—V以及XI—XIII涉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笔记本XVI—XVIII涉及《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剩余的笔记本VI—XV涉及剩余价值理论内容。^[101]考茨基正是以笔记本VI—XV（约750页）为基础，编辑出版了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因此，除了这部分已经发表的内容，仍有超过3/5的笔记本内容尚未发表。也就是说，在所有的23个笔记本中，未发表的笔记本内容在篇幅上相当于六卷《剩余价值理论》。^[102]其次，除了第八个手稿之外，梁赞诺夫找到了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的所有手稿。再次，梁赞诺夫还找到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与《资本论》第一卷相关的大量手稿。梁赞诺夫特别谈道：“我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还找到了八本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笔记。其中一本还有马克思写的一份有趣记录：这些笔记本的目录。该手稿源于50年代中期，它实际上展现了当时还没有题目的马克思著作的第一草稿，这成为了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稿。”^[103]显然，梁赞诺夫提到的这组源于50年代的笔记正是我们今天简称为《大纲》的1857—1858年手稿。至于他谈到的那份“有趣记录”，正是著名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104]

面对如此大量的、从未出版过的《资本论》手稿，梁赞诺夫提出了自己的出版设想：首先出版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草稿，然后按照其现存样貌出版1861—1863年的23个笔记本。接下来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包括它的所有异文与草稿。然后是《资本论》第二卷，它将以两种形式出版：一种是完全依照马克思手稿的原样出版，另一种则按照恩格斯的编排方式出版。之后的第三卷也以这样的形式出版。^[105]至于“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由于考茨基已经将其独立出版，梁赞诺夫也就不再把它列入考虑之列了。

第三，梁赞诺夫在与伯恩斯坦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进行交涉的过程中，还意外地得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

历史地来看，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恩格斯就已经开始进行自然科学研究了。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向马克思讲述了他“脑子里出现了”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恩格斯认为，对不同运动形式的探讨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于是，他按照机械运动、物理学、化学以及有机体的渐进顺序概括地阐述了其中包含的辩证思想。但是，恩格斯当时只是形成了初步的构想，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写作。因此，他要求马克思“不要对别人谈论……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106]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恩格斯回顾了自己研究自然科学的历程。他谈道：“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107]另外，在1882年11月27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也谈道：“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108]尽管恩格斯多次谈到他的自然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在晚年期间主要从事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根本无暇出版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世人并不知道恩格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成果。即便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专家——考茨基、梅林和伯恩斯坦也从未提及此事。因此，梁赞诺夫才这样说道：“人们现在可以想象，在我和伯恩斯坦因为交接他所保存的手稿而发生争吵期间——这场争吵持续了约一月之久，当伯恩斯坦在某个晴好的日子里亲手交给我一份篇幅很大的恩格斯论自然辩证法的手稿时，我是多么的惊讶。从扉页就可以推断出，手稿由六章组成，其中探讨了物质、电、磁等等的运动规律。遗憾的是，第四部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不见了。我一再请求寻找这部分手稿，但收效甚微。当这一部分最终找到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启程了。”^[109]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谈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可能使他的工作成为多余^[110]，因而他的手稿也只具有历史意义。梁赞诺夫对此是表示赞同的，但他认为，没有能够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就马上出版这部手稿，仍然是对恩格斯犯下的“不可弥补的罪行”。^[111]

第四，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方面，梁赞诺夫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首先，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来说，梁赞诺夫宣称：“我们有伯恩斯坦拥有的马克思致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的所有书信的完整复制件，我们也有伯恩斯坦所没有的书信。”其次，就马克思致他人的书信来说，梁赞诺夫指出，除了致左尔格的书信之外，“我们现在几乎拥有所有书信的照相复制件”。总的来说，研究院已经拥有至少90%的马克思书信。^[112]

至于恩格斯的通信，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因为恩格斯晚年的通信范围相当广泛，所以他的书信搜集起来就相当困难。不过，梁赞诺夫认为，除了倍倍尔与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之外，与恩格斯通信最为密切的应该就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了。而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从这二人那里争取到了所有的通信。首先，梁赞诺夫征得考茨基的同意，照相复制了恩格斯致

考茨基的信件。只不过考茨基要求，1924年夏以后才能出版这些信件。其次，梁赞诺夫在伯恩施坦的许可下也拥有了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书信。需要强调的是，在关于恩格斯的信件问题上，伯恩施坦表现得格外友好。他不仅允许梁赞诺夫在一个月后按照俄文原封不动地出版恩格斯的书信^[113]，而且还答应为这一版书信集写一篇导言，介绍他与恩格斯的^[114]关系。同时，伯恩施坦也愿意解释书信中所有的首字母以及不清楚或令人费解的地方。

另外，梁赞诺夫也就搜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后续工作进行了说明。就马克思的书信来说，主要任务是搜集马克思对各种各样的信件所作的回复，不论是原件还是复制件；就恩格斯的信件来说，工作的重点是“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亚美尼亚、意大利、葡萄牙和瑞士寻找恩格斯写给他的各个通信人的书信”。^[115]

第五，梁赞诺夫也搜集到一定数量的摘录笔记。

由于忙于照相复制伯恩施坦那里保存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梁赞诺夫没有能够抽出时间再对马克思的摘录笔记进行照相复制。因此，他手头的摘录笔记数量非常有限：“现在有几本写于1840年和1841年的笔记；另外还有写于1843—1845年时期的笔记，三本写于50、60年代的笔记，几本写于70年代的笔记。三厚本包含1857年危机史的笔记需要最大的关注。”梁赞诺夫还提到了这样一组笔记，它们是“一部真正的四卷本著作，对直至17世纪中叶的世界历史进行了编年式的概括”，这显然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历史学笔记》。另外，梁赞诺夫还有马克思所写的几本数学笔记以及伯恩施坦提供的一份数学手稿。值得一提的是，梁赞诺夫手头还有一份马克思的笔记本目录以及读过的书目清单。他指出，这是我们确定马克思在特定生活时期的兴趣所向的重要资料。^[116]梁赞诺夫认为，以后也要对这些摘录笔记进行照相复制，因为它们对于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以及他的工作和研究方法的特点”具有独特意义。^[117]

总的来说，梁赞诺夫从柏林带回来的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构成了未来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原始资料主体。除了笔记部分尚待大力完善外，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述、《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等部分都已经基本完备、初具规模。于是，梁赞诺夫在迈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搜集工作一大步的同时，也奏响了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号角。

第四节 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正式启动

梁赞诺夫于1923年秋取得的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搜集成果，终于使他多年以来魂牵梦萦的学术理想——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入了历史的实施阶段。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马恩研究院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同时，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要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步调一致，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出版俄语以及其他语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18]

1924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各国代表热烈讨论了俄共（布）党代会作出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决议。大会认为：“只有一套配有历史考证性注释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与书信的完整版本，才能作为纪念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座丰碑，才能构成全面研究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基础。”^[119]7月7日，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梁赞诺夫主持俄文版以及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请您研究马克思，帮助我们完成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 und Engels）并获得有关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的所有资料。”^[120]至此，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辑史上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或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¹”）正式进入梁赞诺夫的工作日程。梁赞诺夫与MEGA¹也由此正式结缘。

一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版权问题的解决

尽管编辑出版MEGA¹的历史使命已经现实地落在了梁赞诺夫的肩头，但是他还不能够马上全身心地投入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手稿的辨识、整理、编辑工作中，因为有一个重大问题还亟待解决，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权以及版权问题。正如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结尾指出的，按照与伯恩施坦达成的协议，梁赞诺夫当时只有权利利用俄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至于用原文出版手稿的事宜，还必须进行特别协商。^[121]这一点在伯恩施坦那里也得到了证明。他在1925年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这些书信已经在1924年初夏时分由梁赞诺夫用俄文出版了，“我在此前几个月就让梁赞诺夫对这些书信以及我所保管的恩格斯论文手稿进行照相复制，并让他在晚些时候用俄文出版”^[122]。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在原则上同意马恩研究院使用和复制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双方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此，梁赞诺夫仍需再接再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作进一步的沟通与协商，彻底解决上述问题。

1924年梁赞诺夫再次赶赴柏林。这一次，在时任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长阿道夫·布劳恩以及鲁道夫·希法亭的帮助下，梁赞诺夫被准许使用、复制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更重要的是，伯恩施坦按照自己在1924年12月19日写的一份声明，把保管了十五年之久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书信都如数归还给了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并把“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的所有著作权、出版权”转让给了法兰克福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公司（简称“马恩文库出版公司”）。同时，伯恩施坦也放弃了未来“对这些著作的进一步出版活动”。^[123]作为对伯恩施坦的补偿，马恩文库出版公司支付了他4200帝国马克。可以说，马恩文库出版公司获得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著作权、出版权，也就意味着梁赞诺夫领导的马恩研究院最终获得了使用、复制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所有权利。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马恩文库出版公司其实是梁赞诺夫领导的马恩研究院与菲利克斯·威尔（Felix Weil）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按照合作协议联合创立的。1924年8月20日，梁赞诺夫与威尔代表各自机构在法兰克福签署协议。除了规定双方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如出借图书及复制件，互派人员到对方机构工作、研究之外，这一协议还特别规定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应当为马恩研究院履行的责任：首先，查明属于马恩研究院工作范围内的1914年以来用德语出版的博士论文。对于那些没有出版的文章，依据研究院的要求制作复本。其次，复制存在于德国的印刷品和手稿。首先就是《新莱茵报》和《奥得报》中的文章、科隆档

案馆里的文件以及恩格斯家族拥有的书信。最后，购买新的和古旧图书。另外这份协议规定：为了用德文出版马恩研究院的图书，应该由马恩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在法兰克福共同创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即上文提到的马恩文库出版公司）。马恩研究院拥有4/5的股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拥有1/5的股份。马恩研究院对出版社的出版活动予以全额资助。最重要的是，出版规划以及编辑活动均由梁赞诺夫决定。^[124]正是按照这个合同，两天之后即1924年8月22日，马恩文库出版公司在法兰克福成立。后来，MEGA¹的大部分卷册正是由该公司出版发行的。

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谈判进而成功地获得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使用权和出版权之后，梁赞诺夫就为MEGA¹编辑出版工程扫除了最大的障碍。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通信等等，从而尽可能保证未来MEGA¹各卷册的完整性。于是，梁赞诺夫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仍然是搜集、复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重中之重，因此，梁赞诺夫委派身在柏林的科学通讯员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Ivanovič Nikolaevskij）全权负责档案馆文献的复制工作。出于安全与经济的考虑，尼古拉耶夫斯基成功地说服布劳恩和希法亭，允许他从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借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献，直接带到马恩研究院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办的一间实验室去复印。于是，在几年的时间里，尼古拉耶夫斯基不断地往返于柏林和法兰克福之间，大批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也由此得以在法兰克福统一复制并被运往莫斯科。^[125]另一方面，梁赞诺夫通过遍布欧洲的科学通讯员^[126]把文献搜集的触角伸向了四面八方，从而获得大批珍稀的原始手稿和复制文件，这其中包括：恩格斯家族档案馆收藏的恩格斯与亲戚之间的通信、恩格斯年轻时期的文章，特利尔中学档案馆收藏的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耶拿大学哲学系办公室档案中保存的有关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的文件，纽约公立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致左尔格的书信，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致丹尼尔逊的书信。梁赞诺夫甚至通过日本的河上肇从京都大学弄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通信。^[127]

于是，从1921年开始大规模地搜集、购买关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书籍、文献和资料以来，在梁赞诺夫的组织 and 领导下，马恩研究院在短短几年内一跃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马克思学中心。它所收藏的大量极其珍贵的马克思学研究文献和原始手稿为梁赞诺夫着手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活动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 莫斯科马恩研究院的组织构成与文献收藏

在我们详细考察MEGA¹的编辑过程前，不妨先通过马恩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弗兰茨·席勒（Franz Schiller）在1930年发表的《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来了解一下MEGA¹编辑出版工程背后最为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文献基础。

马恩研究院包括六大部门，分别是科学工作室、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出版社和经济管理部。^[128]在这几个部门中，科学工作室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的学者、工作人员正是在这里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学术研究与文献编辑活动。图书馆和档案馆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它珍藏着大量极其宝贵的原始手稿或复制件。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院中，科学工作室与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马恩研究院有一条独特的规定：所有的图书不是统一安置在图书馆，而是珍藏于各个不同主题的科学工作室，以方便工作人员使用。因此，我们便把考察的重点限定于科学工作室和档案馆这两个部门。

科学工作室作为研究院的研究机构，按照不同主题划分为14个工作室，每个工作室都由负责人、助手、科学工作人员以及图书管理人员构成。最主要的两个工作室是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工作室和第一、第二国际史工作室。在马克思恩格斯工作室中，收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包括这些著作的初版、新版以及所有外文译本，同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合作过的所有期刊杂志。这里的珍稀收藏有：青年恩格斯写的两本有关谢林的小册子；恩格斯与埃德加尔·鲍威尔（Edgar Bauer）合写的“基督的英雄诗歌”^[129]；海耳曼·贝克尔主编的《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也是唯一分册（1851年）；巴塞尔和波士顿版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写的关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小册子；恩格斯的《志愿兵读物》；拉萨尔收藏的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面还有大量批注；载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美国新百科全书》，等等。珍贵的期刊有：古兹科夫主办的《德意志电讯》、《莱茵报》、《瑞士共和党人》、巴黎的《前进报》、《新道德世界》、《北极星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共产主义杂志》（伦敦，1847年9月）、《新莱茵报》，还有所有关于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杂志（1844—1848年），哈尼（G. J. Hamey）创办的《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的《人民报》（1859年）、《民主周报》、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第一、第二国际史工作室主要收藏着有关国际的记录、宣言、小册子、传单和报纸，等等，尤其汇集了关于第一、第二国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直至一战）。^[130]

除了梁赞诺夫领导的两个工作室，另外12个工作室主要分为两大部门：理论部和历史部。理论部包括5个工作室。第一，哲学工作室。这里收藏着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哲学研究时使用过的全部文献。例如：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培根、霍布斯、洛克以及英法启蒙主义者和唯物论者所写的著作或者有关他们的著作；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著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期的黑格尔派的著述；等等。第二，经济学工作室。这里收藏着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经济学著作时所使用过的全部文献。此外还有按照不同经济学主题如价值、剩余价值、利润等分门别类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文献。第三，国家学说史和法学说史工作室。这里主要收藏着关于法哲学及其历史的大量文献，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说产生与发展所必需的全部资料。第四，发生社会学工作室。这里收藏着关于史前社会形态以及关于私有制、家庭和国家之形成的文献，同时还有关于宗教、技术发展史的文献。另外，新兴的人类学、人种学杂志等也属于收藏之列。第五，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史工作室。这里收藏着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的文献，主要涉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蒲鲁东、巴枯宁等人及其拥护者的著作与文献。^[131]

历史部由不同国别的工作室组成，专门致力于研究各个国家的马克思学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室有：第一，日耳曼国家工作室。它涉及德国、曾经的奥匈帝国、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等国家和地区。这个工作室的重点研究有：德国古代文化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农民战争、法国革命对德国的影响。当然，更引人关注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莱茵省的研究、1848年革命研究以及各国工人运动研究等。相应地，它的珍稀收藏有：魏特林全集、几乎完整的费奈迭全集

以及有关布鲁诺·鲍威尔和阿尔诺德·卢格的收藏；梁赞诺夫收购的“海尔菲特收藏馆”的馆藏也全部安放在这里。珍贵的报纸有：汉堡的《北极星报》、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前进报》（1876—1878年），《柏林人民报》以及全套完整的柏林《前进报》和《维也纳工人报》。第二，法国工作室。它收藏了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直到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大量法国历史资料和文献。不论是关于马拉、丹东，还是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不论是关于七月革命史，还是二月革命史，不论是关于第二帝国史，还是第三共和国史，相关的文献一应俱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收藏超过了2000册，其中几乎囊括了公社的所有报纸。第三，盎格鲁—美国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的收藏主要是按照年代和问题进行划分的。就英国来说，涉及的内容包括14世纪的革命运动、各次起义暴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及18世纪的工业革命等。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收藏也按年代进行了划分，涉及内容包括1815—1832年的勒德主义运动（工人捣毁机器）、威廉·科伯特的鼓动工作以及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宣传、1832—1858年的反谷物法运动、宪章运动、1858—1877年的第一国际的活动，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收藏的有关欧文主义者和工会的文献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大英博物馆。就美国来说，主要包括有关美国内战史和工人运动史的文献。此外，这个工作室还收藏了一些关于“爱尔兰问题”、关于加拿大、南美、印度等地工人运动的资料。^[132]历史部的其他工作室还有“斯拉夫国家工作室”、“外政关系史工作室”，1927年成立的“南部罗曼语国家工作室”。另外，“日本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以及殖民地国家史工作室”还处于最初的创建之中。

与各个科学工作室收藏的文献、图书相比，档案馆的收藏则更为宝贵、更加珍稀。自从1923年梁赞诺夫从柏林带回第一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稿复制件后，档案馆就作为研究院的一个独立机构诞生了。与科学工作室的机构划分类似，档案馆分为五个部门：一，马克思恩格斯部；二，第一、第二国际史部；三，日耳曼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四，罗曼语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五，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133]在这些部门中，与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部了。

顾名思义，马克思恩格斯部收藏着绝大部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稿复制件，共计55000份。席勒按照MEGA¹ 的大致编排结构向我们介绍了它的主要构成：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哲学和新闻等方面发表的文章，这构成了国际版全集即MEGA¹ 的第I部分（17卷）；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宏大的经济学著述，共有9800份照相复印件。其中包括梁赞诺夫在1923年柏林之行中弄到的1861—1863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23个笔记本，以及作为《资本论》初稿的1857—1858年手稿。这部分手稿构成MEGA¹ 的第II部分（13卷）；第三部分是书信部分，它是遗稿的最大部分。其中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而且还有两人在世时（1837—1895年）收到的来自世界各国的约12000封信。遗产的最后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200本厚厚的摘录笔记（其中马克思的有174本^[134]）。它们摘引自人类知识各个不同领域——世界历史、经济学、哲学、艺术、数学、技术、化学、自然科学、地质学和欧洲国家史——的5000本书，共计12234份照相复印件。^[135]

通过对马恩研究院的机构设置与内部收藏的考察，我们不得不叹服梁赞诺夫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正是有了梁赞诺夫这一灵魂人物，马恩研究院才能迅速摆脱建院伊始的一穷二白，一举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学术中心。进一步讲，正是有了马恩研究院这一核心的科研机构，有了梁赞诺夫千方百计从柏林以及世界各地弄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才得以在坚实的组织基础和雄厚的文献基础上顺利实施。

第五节 MEGA¹ 的历史性诞生

MEGA¹ 是一项非常浩大的文献编纂工程。在深入进行文献手稿的整理、辨识、编辑和出版等方面工作的同时，特别需要其灵魂人物梁赞诺夫来明确其编辑原则与编辑构架，从而既从整体上确立MEGA¹ 的风貌，又具体地确定各卷次的编辑内容与编辑要点。因此，在考察MEGA¹ 卷册的诞生之前，我们必须对MEGA¹ 的编辑原则进行一番细致考察。

一 MEGA¹ 的编辑原则

作为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领袖，梁赞诺夫其实并没有为整个马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拟订一份周详具体的关于MEGA¹ 的编辑方案或指南。毋宁说，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之为开创性事业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在具体的编辑实践中逐步明确并完善其编辑原则。因此，在现实地展开这项工程最初的编辑活动时，梁赞诺夫所秉承的原则其实源于他在前MEGA¹ 时期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辑经验，尤其源于他多年怀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构想。

如前所述，早在1909年开始主持“东方问题”译介项目时，梁赞诺夫就产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念头，但是由于当时他只是初步形成这样的想法，还没有作深入的思考，更没有进行具体的实施，因此我们并没能看到他就全集的编辑原则所作的阐述。不过，透过他所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我们依然可以粗略了解他在编辑方面所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对文本内容完整性、全面性的强调，对导论、说明与注释的重视，等等。

1911年1月1日“维也纳出版计划”的提出，让我们初次见识了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原则的设想：“出版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马克思著作的手稿和各种不同版本相对照的、带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136]可以看出，对梁赞诺夫而言，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权威性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工作所持的基本原则。首先，科学性在更确切的意义上是指学术性、学院性，即符合一切学术规范与科学要求。这显然是强调，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全部思想面貌的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定要具有高度的学术水准、符合经典著作的指征。其次，完整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自有之意、应有之义。这里的“绝对完整”既是指总量上、总体上的著作、手稿、书信等的全面完备，又是指具体而微的一篇文章、一封书信的内容翔实与全面丰富。在梁赞诺夫看来，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书信还是手稿，既不能对其随意增删，又不能对个别内容上进行篡改、歪曲。完整性既强调数量之全面，又要求内容之完备。再次，系统性是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方法、编辑架构而言的，尽管梁赞诺夫在“维也纳出版计划”中没有阐明其具体内容，但是结合后来MEGA¹ 的编辑体系，我们还是可以想象，梁赞诺夫

在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大部分之间编排的系统性以及每一部分中各篇文章、书信或手稿编辑的系统性。最后，权威性是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其他各个不同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或文集相对照而言的，它体现的是《全集》与各个单独的著作、文集或选集的关系，更是彰显《全集》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在梁赞诺夫看来，在众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物中，《全集》理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它应该作为各部单独著作的参照标准、对照体系。当然，《全集》若能达到如此高的地位，自身必须具有至高的科学水准和学术质量。至于“导言”与“内容丰富的索引”，则是梁赞诺夫一贯的编辑要求。在他看来，“导言”有助于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而“索引”则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背景资料，它们是一套科学文献资料的必备要素。

可以说，尽管梁赞诺夫在“维也纳出版计划”中只用几行字概略地阐述了他对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持的编辑原则，但这些看似简洁的说明却蕴涵着他对《全集》编辑工作的深刻思考与科学理解。事实上，他在这里所提出的几点原则也切实地运用到了后来MEGA¹的编辑工作中。

1911年“维也纳出版计划”的无疾而终并没有使梁赞诺夫放弃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构想。他依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辑活动中表达着自己的编辑思想。在1911年1月20日梁赞诺夫致考茨基的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所述，“维也纳出版计划”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已经委派考茨基着手进行《资本论》普及本的准备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编辑活动，考茨基也邀请梁赞诺夫参与到了其中。于是，在这封信里，梁赞诺夫向考茨基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资本论》普及本的编辑设想。第一，梁赞诺夫认为，只有《资本论》第一卷适合以普及本的形式出版。至于全套《资本论》，它可以分开独立出版，或者在未来的“马克思著作集”中出版。第二，梁赞诺夫建议考茨基作一些补充性的注释——引文注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引用文献的地方作注，梁赞诺夫愿意承担这项工作。第三，梁赞诺夫提出，普及本要有一篇导论，它可以向读者指出，“如何最好地研究《资本论》”。梁赞诺夫表示，愿意凭借自己二十多年作为《资本论》教员和工人宣传员所积累的经验来承担这项工作。第四，梁赞诺夫认为，普及本也要有一篇后记，它可以是文献索引，以便于进一步的学习；也可以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内容的简要概述，或者是研究导论。第五，梁赞诺夫提出，索引对于普及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名目索引要理论与现实并重，以便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工会干部”都能够从中各取所需；另一方面，人名索引要用传记性的说明来修饰润色，从而更好地实现其普及的特性。最后，梁赞诺夫强调，考茨基一定要为这部普及本写一篇前言，从而说明“《资本论》对于科学和工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137]

由于梁赞诺夫是针对《资本论》的普及本来陈述自己的编辑构想的，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基于“普及”目的而作的考虑，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从整体上来把握梁赞诺夫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所持的基本编辑原则。显然，在梁赞诺夫看来，一部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版本除了要保证文本内容的正确性、完整性之外，还应当具备如下的科学构成：导言（或前言）、注释、索引（人名与名目），或者还有后记。尽管后来考茨基并没有全面采纳梁赞诺夫的建议，但是在1914年出版的《资本论》普及本中，我们还是看到了梁赞诺夫负责的长达68页的索引。这部分内容包括梁赞诺夫本人撰写的6页导论、引用文献的目录、附有简短生平介绍的人名索引以及一个名目索引。虽然考茨基没有按照梁赞诺夫的建议在“前言”中探讨《资本论》对于工人运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是梁赞诺夫却已经在他的导论中阐述了《资本论》对于工会的理论和实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138]

1913年，倍倍尔与伯恩斯坦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在斯图加特出版^[139]。尽管倍倍尔的名字出现在了这套文集的主编位置，但是由于身处政治活动的前沿，再加上身患重病，他其实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编辑出版活动之中，因此，这套文献实质上是由伯恩斯坦独立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梁赞诺夫本人也参与到了这一编辑项目之中，只不过他的工作仅仅局限于阅读校样，帮助确定人名和日期，辨认一些难读的地方。^[140]1914年6月，应考茨基之邀，梁赞诺夫在《新时代》发表了针对《通信集》的评介文章《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在这篇文章中，梁赞诺夫集中阐述了他对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乃至全集所持的构想和编辑原则。

首先，梁赞诺夫强调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使命之一。它以详尽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全部影响；从他们的个人气质以及他们所处历史环境——从他们最直接的环境一直到世界历史环境的各个极不相同的阶段——的影响出发向我们阐明他们的个性；它向我们描绘了他们的世界观在其所有阶段的发展过程，而这一世界观同时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遍性理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是梁赞诺夫指出：“直到最近，这样一部著作还缺乏两个主要条件：首先是一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科学版本，其次是一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通信的版本。”^[141]

显然，梁赞诺夫借此机会再次重申了曾经在“维也纳出版计划”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提出的“出版全集”和“出版传记”的两大构想，只不过此时他已经不再局限于马克思本人，而是明确地扩展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即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和传记。在梁赞诺夫看来，不仅“全集”和“传记”这两大出版项目自身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由于这篇文章主要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因此，梁赞诺夫也赋予通信以独立的地位，强调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传记所具有的重大文献意义。于是，在对传记、全集和通信这三大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此一番定位之后，梁赞诺夫便集中对实际上是由伯恩斯坦个人独立完成的《通信集》的某些编辑原则进行了评述，从而顺势表达了他本人对此所持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191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四卷本出版之时，马克思逝世才整整30年，而恩格斯逝世还不到20年。因此，他们的通信中不仅必然涉及他们个人的很多私事，而且也必然涉及其他许多仍然在世的人物。正因如此，伯恩斯坦在编辑通信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对个别地方进行删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哪些地方进行删除？删除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在《通信集》的“注释”（Anmerkungen）中，我们看到伯恩斯坦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删节原则的：“只有在尤其涉及私密情况的地方——它与普遍的兴趣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在提及完全无关紧要的人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地方，删除看起来才是合理的。有些地方对第三者表示反感的评论也被删除了，但这只涉及这样一些表述，它们不包含在前面的通信中还没有被清楚地表达过的政治的或科学的判断。”^[142]

显然，且不说伯恩斯坦的删节原则是否合理，单就他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作了删除这一行为而言，就已然违背了梁赞诺夫

一贯主张的完整性的编辑原则。但是，考虑到该评介文章的主旨是向《新时代》的读者推介这部全面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思想风貌的力作，更考虑到梁赞诺夫本人也是这一编辑项目的参与者，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甚至还在“前言”中向他表达了感谢之意^[143]，因此，梁赞诺夫并没有采取直截了当、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方式。毋宁说，他在客气地分析了伯恩施坦删除行为的某些必要理由之后，专门针对其删除原则进行了由弱到强的渐进式批判。

第一，对于《通信集》删除掉“尤其涉及私密情况”以及“对第三者表示反感的评论”的地方，梁赞诺夫暂且予以了宽容和理解。他谈到，按照旧的传统，只有在作者逝世五十周年后才能出版他与他人的通信。之所以进行这么长时间的缓冲，就是因为“人们想尽可能地保护仍然在世的名人”，因为“作者可能会在一时情绪的促动下就这些人说些粗暴的话”。不过，梁赞诺夫认为，这个传统也有一大缺陷，那就是“它使所有可能对这一或那一事件予以澄清的参与者失去了这样做的一切可能”。于是，梁赞诺夫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更倾向于，如果已然破坏了一次普遍的传统，那么不妨完全不作删节地出版通信。”^[144]在梁赞诺夫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使，他们不需要被如此美化。他们也不需要什么保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赫尔岑在其关于马志尼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句话更适用于他们：‘这些人不需要人们去保护’。他们经得起最赤裸裸的真理、最无情的批判。说出事物的本来面目，也适用于科学。”^[145]显然，梁赞诺夫认为，原原本本地、实事求是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内容，才能最本真的展现他们的思想风貌，才能使人最真实地认识和理解他们自身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对于伯恩施坦基于德国的古老传统而删掉通信中某些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仍然在世之人的私密内容，梁赞诺夫暂且作了比较客气的评述，那么对于伯恩施坦提出的“在提及完全无关紧要的人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地方”进行删除这一编辑原则，梁赞诺夫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如果在出版一份文献、一封书信时，忽略完全无关紧要的、在每份文件中都会附有的评论，就连固执的档案迷也会对此完全理解。但是，在书信中传达的事实则是另外一回事。那些对于一位研究者或读者来说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或‘完全无关紧要的人’，却会给另外一位研究者或读者提供新的线索、新的说明、新的陈述。人们能够继续探究新的线索，能够基于旧的说明来验证新的说明，能够从新的陈述出发对那些看似已经作出定论的事件获得新的启发。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没有什么比按照其本来的样子原封不动地出版一份文献更重要的了。”^[146]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时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始通信的全部内容尚不了解，因此，他并不能够参照通信本身的情况来对《通信集》作一番比较分析，阐述其优劣得失。所以，他只能凭借自己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对全集的构想来着力批判伯恩施坦的编辑原则。直到MEGA¹第Ⅲ部分第1—3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出版之后，梁赞诺夫才最终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几乎完备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对伯恩施坦的《通信集》进行了彻底的考证研究，从而不仅从总体上揭示了伯恩施坦删节原则的绝对错误，而且也具体细致地揭露了他在编辑过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歪曲、篡改乃至删除。^[147]

通过对梁赞诺夫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过程中所持的编辑原则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大体上确立他在编辑MEGA¹时秉持的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收录内容的全面完整（“全集”的应有之义）；忠实于原文，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写作语言出版文本（MEGA¹之为原文版的应有之义），展现文本的历史演变进程^[148]，另外还应附上导言、注释和索引等说明性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MEGA¹第Ⅰ部分第1卷的上册（即试编卷）的过程中，一些科学工作人员就注释的范围问题与梁赞诺夫产生了分歧。1926年10月25日，研究院工作人员瓦尔特·比哈恩（Walter Biehahn）、哥尔特鲁特·比哈恩（Gertrud Biehahn）、格奥尔格·略伯尔（Georg Roeber）、瓦尔特·鲁尔（Walter Rohr）、卡尔·施米克勒（Karl Schmückle）、汉斯·施坦（Hans Stein）和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等人联名写信给梁赞诺夫，主张在出版第一卷时附上编辑注释（Redaktionelle Erläuterung）。他们认为：“在第一卷中所提供的资料的性质要求在实践中同时出版注释（Anmerkung），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注释，该卷的内容至多能为最狭隘的专业科学家圈子提供些东西。如果没有注释，至多有几处纯理论的部分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恰恰在日常政治论著中记录下来的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却只能极为有限地表现出来。”另外，这些工作人员强调，MEGA¹的科学性质也要求它附有注释，更重要的是，这些注释的内容已经编辑完成，几乎可以付印了。^[149]

但是，梁赞诺夫并没有采纳这些工作伙伴的建议。在MEGA¹“前言”中，梁赞诺夫谈道：“各卷导言将一般性地阐明各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和形成史，阐述研究的状况，说明编辑所遵循的方法。历史和理论性的导言与研究、详尽的评论不在这一任务之列：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它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为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奠定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以科学上无可辩驳的形式和次序再现两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因此，即使是第一部分各卷所带有的注释和其他附加内容也应该从总体上局限于介绍与文本直接相关的同时代的资料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很容易获取的话，并通过丰富的资料和引文索引来减轻寻找关于人物、状况和事件的进一步说明的工作。”^[150]

梁赞诺夫之所以拒绝了工作伙伴提出的建议而坚持把MEGA¹各卷册注释的内容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由于对历史或背景资料的研究而牵扯更多的精力，力求更加集中地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个文本或手稿的整理、编辑工作，从而尽快让这些珍贵资料与世人见面。正如梁赞诺夫所说的，MEGA¹的中心任务是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全貌，从而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奠定基础。因此，相对于说明、阐述性的注释工作，梁赞诺夫更偏重于对文本自身的细致辨别、考察与校订。

于是，以梁赞诺夫在近二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辑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为基础，以他由此形成的编辑原则为主线，马恩研究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展开了实实在在的MEGA¹编辑活动。

二 MEGA¹的正式出版

当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真正进展到文献整理、编辑的环节时，它所面临的困难莫过于辨识、鉴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迹了。因为，就那些二人在世时已经发表过的著作和文章而言，研究院人员的工作相对来说轻松一些，主要是纠正个别印刷或书写错误，根据新的正字法改变某些字母的写作方式，校验引文等等。但是就大量未完成的、杂乱的原始手稿来说，单单辨

认其笔迹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伟大的遗产》一书中，马恩研究院资深的马克思恩格斯笔迹专家妮娜·伊里尼切那·尼波姆尼亚施查娅（Nina Iljitschna Nepomnjaschtschaja）回忆了自己在研究院辨识马克思恩格斯笔迹的工作。“我到研究院没多久，席勒同志就拿给我一封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让我读一读。正如在两位友人的通信中常见的那样，马克思在这封信中使用了三种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我坐在那里，看着信，心想：这根本就无法读；没人能辨认得了。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一个词先从重重迷雾中冒了出来，然后是第二个词，最后甚至整句话。后来，到了‘庸俗经济学家’这个词时，我终于被卡住了。弗兰茨·席勒帮助我继续了下去。”^[151]相较于马克思那如象形文字般难认的字迹，恩格斯的书信就好读多了。妮娜谈道：“与他的朋友相反，将军的笔迹又大又清楚。读起来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些缩写。它们看起来像速记，但并不是速记。……我辨认不了。”对于恩格斯常用的缩写，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也想出了应付的手段。凭借着在不断的辨识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保尔·韦勒（Paul Weller）编制了一份关于恩格斯常用的缩写、字母和字母组合的目录，这让包括妮娜在内的为数不多的辨识人员受益匪浅^[152]。

梁赞诺夫本人也投入了艰苦的手稿辨识的工作之中。正如卢卡奇后来回忆的，“当我1930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梁赞诺夫给我看了一部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写的手稿。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得激动：阅读这些手稿改变了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系，并且改变了我的哲学观。苏联的一位德语学者在研究这部手稿，准备出版。这部手稿遭到了老鼠的破坏，有许多地方或者单词缺了字母，或者少了个词。由于我具备哲学知识，所以我和他一起工作来决定那些缺失了的字母或单词是什么：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某个单词的首字母是‘g’，尾字母是‘s’，那么我们就得猜中间部分是什么。我认为最终编辑出来的本子是相当不错的。我之所以知道就是因为参与了编辑工作。梁赞诺夫负责这项工作，他是非常伟大的语文学家：不是理论家，而是伟大的语文学家”^[153]。

正是在以梁赞诺夫为首的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27年MEGA¹第I部分第1卷的上册正式出版。这部试编卷收录的大量珍贵文献引起了整个世界的惊叹。具体来说，上册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了1844年之前马克思的著述及笔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这部分中，不仅收录了马克思博士论文正文的两大大部分、片段以及附注，而且收录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准备材料——关于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史的七个笔记。第二部分收录的是马克思于1841年在柏林作的诗歌《狂歌》，它包括《小提琴手》和《夜恋》两部分。第三部分收录了马克思于1843年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中的文章《路德是斯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154]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四部分收录了1842—1843年间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28篇报刊文章，其中包括我们所熟悉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和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等。第五部分收录了1842年刊载于《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马克思的文章——《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第六部分收录了马克思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后的第七部分收录了1844年《德法年鉴》中刊载的马克思与卢格、卢格与巴枯宁和费尔巴哈等人的通信以及马克思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55]

在MEGA¹的这部试编卷出版之前，梅林的《遗著选》是唯一一套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遗著选》第一卷主要收录1841年3月至1844年3月马克思的文章^[156]，这与试编卷收录文章的内容和时间跨度完全一致^[157]。因此，如果我们想确切地了解MEGA¹的试编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只要与《遗著选》第一卷作一番比较就可以了。梅林《遗著选》的第一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正文及片断；第二部分收录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中刊登的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三部分收录了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5篇文章，分别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一和第三篇论文、《〈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158]、《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和《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59]；第四部分收录了《德法年鉴》中刊登的“1843年的通信”，即马克思与卢格、卢格与巴枯宁和费尔巴哈之间的通信以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160]

通过简单的对照，我们就可以看出，梁赞诺夫主编的MEGA¹试编卷在收录内容上要远远多于梅林的《遗著选》。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两份珍贵材料的首次问世——作为马克思博士论文准备材料的七个笔记本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这两份新发现的材料是梁赞诺夫1923年柏林之行的重要成果，它们占据了试编卷1/3的篇幅。可以想象，这对于全面地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深入把握马克思在哲学革命前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其次，试编卷收录了马克思青年时期在《莱茵报》发表的近三十篇文章，数量远远超出了梅林的《遗著选》。虽然这部分内容并不是新发现的材料，但是也已为绝大多数人所忘却。因此，它们的重新出版也有利于我们充分地认识当时身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另外，试编卷还比《遗著选》多收录了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文章，如马克思的诗歌作品、关于“格·鲁培的小册子”的文章，等等。^[161]正是由于这部试编卷所富含的大量新材料、新文献，国际学界对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1929年《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刊登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书讯”中谈道：“在这部39印张的书卷中，至少21印张的内容是梅林的《遗著选》所没有的。其中，15印张是手稿的初次出版，6印张是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文章的首次再版。这一试编卷展示了我们所期待的财富的图景。”^[162]

在试编卷中，梁赞诺夫不仅初步展现了马恩研究院多年以来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成果，而且还在卷首的“前言”中详细地阐明了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直接原因”以及具体构想，从而勾勒出了未来MEGA¹的整体风貌。于是，这篇著名的“前言”实质上也成为MEGA¹的实施总纲。

在细致地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的出版史并批判地分析了梅林的《遗著选》之后，梁赞诺夫在“前言”中介绍了自己出版MEGA¹的原因以及总的出版框架。梁赞诺夫谈到，在着手进行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工作的过程中，他通过伯恩斯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获取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资料。梁赞诺夫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译成俄文而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和辨识资料的庞大工作，这是不合适的”。^[163]于是，他决定，着手展开国际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梁赞诺夫为MEGA¹设定了这样一个目标：“为每一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以清晰的编排准确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遗产。^[164]”关于全集中将要收录的内容，梁赞诺夫也作了说明：“我们不仅刊载严格意义上的著作、已经发表的文章，而且刊载所有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未发表的著作，所有未发表的文章和片断。两位作者的准备材料（搜集的资料、草稿、提纲、初稿，在个别著作中未收录的片断）同样也会最大程度地得到利用。如果有必要，它们也会以附录形式给出。另外，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所写的书信外，我们也刊载所有写给他们的书信……所有的著作和书信都将按照原文所用的语言发表。”^[165]

具体来讲，MEGA¹将分为四部分出版。第I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资本论》除外。这一部分预计有17卷。关于各卷的内容，梁赞诺夫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第1—2卷收录《德法年鉴》之前（含《德法年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写或写给马克思的信件^[166]；第3卷将收录《德法年鉴》之后一直到1845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著作和文章，包括《神圣家族》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4卷收录《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卷收录1846年下半年到1848年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848年革命到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小册子将构成第5—7卷的主要内容；第8—14卷将收录1848年革命后，特别是1852—1862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大量文章、书籍和小册子；第15卷将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1876年第一国际期间所撰写的文章、宣言和决议等；最后两卷收录1876—1895年恩格斯的晚年著述。^[167]第II部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在这一部分中，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马克思的大量手稿以及《资本论》的全部准备材料也将出版，预计不少于13卷。第III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预计10卷。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其次是他们写给拉萨尔、魏德迈、库格曼、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左尔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信，另外还包括所有其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著作或某一生活阶段关系不甚密切的书信，它们可以归并到先前相应的卷册中。第IV部分是关于整部MEGA¹的详尽的名目和人名索引，共计两卷。梁赞诺夫打算把它编成一部词典，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到或论述到的对象、术语、基本概念和问题都会在其中列出。当然，只有在MEGA¹全部卷次编辑完成之后，这两卷索引才能出版。因此，此前的各个卷次都会附有简洁的说明性索引。^[168]

1927年出版的这部试编卷是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首枚硕果，它的问世使得整个世界都把目光聚焦于梁赞诺夫领导的马恩研究院。人们热切地期待着接下来MEGA¹各卷次的顺利出版，从而真正一睹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原貌。1929年，MEGA¹第I部分第1卷的下册和第III部分第1卷顺利出版，MEGA¹开始了稳定有序的发展阶段。1930年，MEGA¹第I部分第2卷和第III部分第2、3卷出版。由此，梁赞诺夫在任时主编的五卷六册MEGA¹全部问世。此后，随着1931年梁赞诺夫被罢职、开除出党，他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MEGA¹的卷次中，虽然这其中仍然凝结着他的巨大的辛苦与劳动。

在梁赞诺夫主编的这五卷六册中，除了试编卷之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III部分的第1—3卷。如“前言”所述，第III部分的书信卷要首先收录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因此，梁赞诺夫主编的这3卷通信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事实上，考虑到梁赞诺夫被罢职不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最后一卷即第4卷就出版了，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卷其实也是梁赞诺夫的编辑成果^[169]。如果说，在“前言”中，梁赞诺夫通过批判梅林的《遗著选》来说明MEGA¹试编卷的全面性，那么在书信部分，他则主要针对伯恩施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来表明MEGA¹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部分的完整以及对原文的忠实。

如前所述，伯恩施坦主编的《通信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修改。当时，梁赞诺夫在对原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主要批判了伯恩施坦的删节原则。而今，在全面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情况之后，梁赞诺夫便在通信部分的“导言”中具体地揭露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所犯的“罪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伯恩施坦在《通信集》中直接删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通信。就《通信集》第1卷来说，伯恩施坦发表了261封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而在时间段上与之完全对应的MEGA¹第III部分第1卷则出版了286封信。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施坦版还收录了一封其实并非是写给马克思的信^[170]，因此，仅仅在第1卷中，伯恩施坦其实就删除了26封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其中直接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写的书信达19封。^[171]在《通信集》第2卷中，伯恩施坦收录了362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而在相应的MEGA¹第III部分第2卷中，收录的通信数量达437封。也就是说，有75封通信完全被伯恩施坦删除，其中包括马克思写的52封信和恩格斯写的23封信。梁赞诺夫在第2卷“导言”中谈道：“虽然这其中有很多非常简短的书信或便条——属于这一范畴的马克思的信件大约有30封，而恩格斯的信件只有6封——但即使是这些被伯恩施坦完全删除的信件也都注有日期，而且包含着重要的传记或书志学的说明。然而，就连那些在出版中占有2页甚至3页篇幅的书信也在1913版中被删除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燕妮·马克思夫人写的5封信上，她几乎不间断地为马克思承担着秘书工作或直接受其委托而给他人写信。”^[172]在《通信集》第3卷中，如梁赞诺夫所说，伯恩施坦的删除活动少了很多。但是，与MEGA¹第III部分第3卷相比，它仍然少了27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包括燕妮·马克思夫人所写的1封信）。这些通信中既有一些简短的书信，也有一些篇幅达到2个印刷页的书信。^[173]

一方面，伯恩施坦大肆删除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另一方面，他也以“涉及私密情况”、“发表了对第三者表示反感的评论”为借口对所收录的书信进行大量的删节和修改。我们不妨以第1卷为例。在1845年3月1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用几乎白描的手法向朋友诉说了自己与家庭尤其是父亲的激烈冲突，然而这段充分体现青年恩格斯内心世界的文字却被伯恩施坦无情地删除了。同样，两处涉及青年马克思与其母亲的冲突的内容也被删掉了。另外，马克思在通信中描述自己与窘迫的物质生活作斗争的大量内容也遭到了伯恩施坦的剔除。值得一提的是，甚至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的某些语气过重、粗鲁失礼的表述，伯恩施坦也作了弱化或缓和。^[174]如果说，伯恩施坦能够对所有的这些删节和改动进行即时的说明或标注，那么读者的损失多少还可能得到弥补，然而致命的是，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之外，伯恩施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如果不结合通信原文进行对照，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伯恩施坦对哪些书信的哪些内容动了手脚。

正是在对伯恩施坦主编的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通信集》进行全面批判的过程中，梁赞诺夫推出了这套作为MEGA¹第III部分最初几卷的完整的、原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他指出：“除了那些谨慎进行的正字法的处理活动……我们在不作一丝删节或改动的情况下再现了书信。那些初次刊印的书信或书信段落提供的内容上的新东西也不少。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书信的完全忠实的再现——体现它的文风上的所有特征、使用它原初的‘毫无顾忌的’语言，展现所有的‘私密性’和‘反感的评论’，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事情’——才真正符合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为他们的出版物所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就

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的‘成长历程、所感所思’出发来给出‘一幅未受歪曲的图景’。”^[175]

在力求如实地、完整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本来面貌的同时，梁赞诺夫也没有忘记提醒读者注意那些曾经被伯恩斯坦删节、修改的内容。于是，我们发现，MEGA¹ 第三部分第1—4卷实际上成为了伯恩斯坦版《通信集》的“校勘卷”。例如，在第1卷第22—24页收录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6号通信，这是恩格斯在1846年7月27日写给马克思的，它并没有被伯恩斯坦收录在《通信集》中。于是，从第22—24页，每页页底都标有“Nr. 6”（第6号）字样，以表明它在《通信集》中被删除。再比如，在第1卷第26页页底标有“Z.29—41”字样，这表明该页第29—41行在伯恩斯坦版的《通信集》中遭到删除。同时，在伯恩斯坦对句子只作部分删节的地方，在标注的起止行数后面还会加括号以标明被删除字句的起始词或收尾词。可以说，类似的“某某行被删除”的标注在MEGA¹ 第三部分第1—4卷中比比皆是。另外，即便是那些被伯恩斯坦作了轻微手脚的地方，梁赞诺夫也会用脚注予以说明，如“E.（伯恩斯坦名字首字母）加了画线”，“E. 删掉了某词”，等等。于是，在《通信集》中被伯恩斯坦以隐形的形式“动了手术”的地方，在MEGA¹ 第三部分第1—4卷中被全面曝光、彻底“现形”。

从1927年MEGA¹ 试编卷的首次出版到1929年、1930年MEGA¹ 逐渐步入稳定有序的出版进程，梁赞诺夫为MEGA¹ 的诞生可谓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他希望在马恩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齐心协力下，最终顺利完成40余卷的MEGA¹ 出版计划，从而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奠定坚实、客观的文献研究基础。然而，他的这桩宏愿最终由于历史的原因化为了泡影。

[1] 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还会涉及《东方问题》、《通信集》的内容，尤其是梁赞诺夫对这些著作的评价。因此，此处不多赘述。

[2]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档案文献的解禁，有关梁赞诺夫的资料日益浮出水面。一些学者依据新资料、新情况对梁赞诺夫的生平、学术研究以及他所主持的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1。不过，多少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偏重于梁赞诺夫的“MEGA¹ 时期”，而研究梁赞诺夫“前MEGA¹ 时期”的文章寥寥无几。有鉴于此，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教授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梁赞诺夫与考茨基、狄茨等人的通信为基础，历史地重构了梁赞诺夫在“前MEGA¹ 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中提供的大量原始通信资料为我们如今确切地了解梁赞诺夫当年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编辑出版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3] 参见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10-11。

[4] Juri Steklow, “Meine ersten Begegnungen mit D. B. Rjasanow”,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198。

[5]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213。

[6] *Ibid.*, S. 213-214。

[7]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Introduction”, *The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ndon, 1897), p. v.

[8] N. Rjasanoff,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 Blands in Europa* (Ergänzungshefte zur Neuen Zeit, Nr. 5), Stuttgart: Verlag und Druck von Paul Singer, 5. März 1909, S. 8。

[9] *Ibid.*, S. 8, Anm. 2。

[10] 即考茨基的第二任夫人。

[11] Rjasanov an Dietz [Ende Mai 1909], Internation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Amsterdam (IISG), Dossier Marx-Engels-Briefwechsel. 转引自 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MEGA -Studien*, 1996/1, S. 15。

[12]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Introduction”, *The Eastern Question*, p. v.

[13]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叙述。

[14]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Introduction”, *The Eastern Question*, p. v. 此处，艾威林夫妇把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误写为3月18日。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48页。

[15]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Introduction”, *The Eastern Question*, p. vi. 这封信是美国友人阿道夫·克鲁斯（Adolf Cluß）在1853年10月23—24日写给马克思的。该信原文参见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III/7, Berlin: Dietz Verlag, 1989, S. 289-291。

[16] Rjasanov an Kautsky, vor d. 16. Mai 1909,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82. 转引自 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14。

[17] N. Rjas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1862*,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20, S. X.

[18] Rjasanov an Kautsky, vor d. 16. Mai 1909,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82. 转引自 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14。

[19] N. Rjas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1862, S. X.

[20] *Ibid.*, S. X-XI.

[21] H. Dietz an K. Kautsky, 31. Oct. 1909, IISG, Kautsky-Nachlass D VIII 436. 转引自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Jg. X X VIII, 1983, S. 115, Anm. 41。

[22] 参见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18-19.

[23] Kautsky an Rjzanov, 24. Juni 1909, Russisches Zentrum für die Aufbewahrung und Erforschung der Dokumente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Moskau (RC), 213/1/166.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19.

[24] Rjzanov an Kautsky, nach d. 24. Juni 1909,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85.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19.

[25] Rjzanov an Kautsky, vor d. 16. Mai 1909,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82.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15.

[26] Rjzanov an L. Kautsky, nach 19. Oct. 1910,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313.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29.

[27] G. Eckstein an K. Kautsky, 27. Dez. 1910.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 56. 转引自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05.

[28]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 127-128; 也可参见David Rjz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 *David Rjz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41-42.

[29]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 128. 也可参见David Rjz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 *David Rjz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42.

[30] Braun an Kautsky, 18. Jan. 1911, IISG, Kautsky-Nachlass D VI 312. 转引自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 131.

[31] Eckstein an Kautsky, 6. Jan. 1911,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 57. 转引自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29.

[32] Kautsky an Rjzanov, 16. Jan. 1911, RC, 213/1/191.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30.

[33] Dietz an Kautsky, 12. Jan. 1911, IISG, Kautsky-Nachlass D VIII 460. 转引自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30.

[34] Mehring an Kautsky, 16. Feb. 1911,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 VII 337. 转引自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38.

[35] Rjzanov an Kautsky, 20. Jan. 1911,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327. 转引自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37.

[36] Rjzanov an Dietz [Mitte April 1913] , IISG, Dossier Marx-Engels-Briefwechsel.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27.

[37] Rjzanov an Kautsky, Anfang Mai 1913,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48.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27.

[38] N. Rjz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1862, S. X V - X VI.

[39] 意指出版人狄茨。

[40] Rjzanov an L. Kautsky, Jan. 1917,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13.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56.

[41] N. Rjz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1862, S.IX.

[42] Rjzanov an L. Kautsky und K. Kautsky, 25. März 1917,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361.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57.

[43] Rjzanov an L. Kautsky und K. Kautsky, 18. Mai 1917,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360.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57.

[44] RC, 71/51/126. 转引自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zanows”, *David Rjz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34, Anm. 17.

[45] 梁赞诺夫在《新时代》中发表的关于“第一国际”的文章有：《论国际的历史》，载32卷上卷，第8—16、37—44页；《旧国际的外政及其对战争的立场》，载33卷下卷，第329—334、360—369、438—443、463—469、509—519页。此外，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德文版第1卷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第一国际史I）》一文。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这部传记著作中，梁赞诺夫在第七讲、第八讲中详细阐明了第一国际的历史。这显然应该归功于他当年所进行的“第一国际资料卷”研究工作。

[46] Rjzanov an Dietz, 29. Dez. 1911, IISG, Dossier Marx-Engels-Briefwechsel.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36.

[47] Rjzanov an Dietz, Sommer 1916, Kl. IISG, Korrespondenz.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56.

[48] 该著作的英译本为1927年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ublishers）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的生平事业介绍》（*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译为约书亚·库尼兹（Joshua Kunitz），1973年再版；德译本为1973年柏林红书出版社（Rotbuch Verlag Berlin）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只适于初学者》（*Marx und Engels nicht nur für Anfänger*），译为海那·特

劳伯 (Rainer Traub) ; 上海言行出版社在1939年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马克思与恩格斯》, 译者为苏迅。

[49] D. Rjazanov, *Marx und Engels nicht nur f Ür Anf änger*, Berlin: Rotbuch Verlag, 1973, S. 5-6.

[50]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 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5 (1930), S. 420.

[51] 参见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20;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 ße Erbe*,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S. 80.

[52]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 ße Erbe*, S.80.

[53] 参见Rolf Hecker, “Hans Stein-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und Korrespondent des Moskauer Marx-Engels-Instituts (1925-1929)”, *Beitr 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 18, Anm. 5.

[54]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16.

[55]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 ße Erbe*, S. 82.

[56] 关于这段逸事可参见W. W. Adoratski, “Achtzehn Jahre”, *Genosse Lenin*, Berlin, 1967. 转引自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 ße Erbe*, S.80-82.

[57] 《列宁全集》第52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第397—398页。

[58] 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 第365—367页。

[59] 《列宁全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 第316页注释②。

[60] 关于是否允许梁赞诺夫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 可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 第8、42、211、213、316页。

[61] Rjazanov an K. Kautsky, nach dem 19. Jan. 1914,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54. 转引自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o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12.

[62] 关于梁赞诺夫对伯恩斯坦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批判, 可参见MEGA¹ 第三部分第1—3卷的导言。另外也可参见梁赞诺夫在1914年发表的关于《通信集》的书评 (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Die Neue Zeit*, 32 (1914), Band 2, S. 564-571)。

[63] 《列宁全集》第50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第107页。

[64]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 ße Erbe*, S. 82-83.

[65] 《列宁全集》第50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第108—109页。

[66]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417.

[67]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o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22.

[68] 参见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420-421。值得注意的是, 弗兰茨·席勒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一文中指出, 毛特内尔/帕朋海姆图书馆和格律恩伯格图书馆是在1920年购买的, 这里的时间其实是有误的。根据1921年9月26日列宁对梁赞诺夫请求财政增援以购买这两座图书馆的来信所做的批复, 可以断定, 购买事宜是在1921年进行的。参见《列宁全集》第51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第367—368页。

[69] Maja Davydovna Dvorkina, “Zum Erwerb der Bibliotheken von Mauthner, Pappenheim und GrÜnberg durch Rjazanov”, *Beitr 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42. 也可参见《列宁全集》第51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第634页注释328。

[70] Maja Davydovna Dvorkina, “Zum Erwerb der Bibliotheken von Mauthner, Pappenheim und GrÜnberg durch Rjazanov”, S.42-43. 梁赞诺夫写给列宁的这封信只是被部分地收录于《列宁全集》第51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第367—368页。

[71] 即格律恩伯格图书馆。

[72] 《列宁全集》第51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第634页注释328。

[73] 毛特内尔/帕朋海姆图书馆收藏着毛特内尔与他的朋友帕朋海姆从1876—1914年间收集的超过2000本图书。这个图书馆是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丰富的收藏之一。由于毛特内尔是拉萨尔的拥护者, 因此他收集了拉萨尔所有著作的第一版以及拉萨尔写给家人的书信。格律恩伯格图书馆的所有者是梁赞诺夫的良师益友卡尔·格律恩伯格。它收藏着格律恩伯格从1886至1918年搜集的约10000册关于政治史、工人运动和政治经济学的图书。参见Maja Davydovna Dvorkina, “Zum Erwerb der Bibliotheken von Mauthner, Pappenheim und GrÜnberg durch Rjazanov”, S.44-45。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484页。

[75] 同上书, 第488—489页。

[76] 参见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21。

[77]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 ße Erbe*, S. 43-44. 也可参见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Archiv f Ür Sozialgeschichte*, Band VI/VII, 1966/1967, S. 40, 43。

[78]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 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1 (1925), S. 386.

[79] 此前, 伯恩斯坦也一直流亡于英国。在通缉令废除的当年, 他就返回了德国。

[80] 狄茨坚决反对把遗稿运到斯图加特, 他认为柏林比斯图加特更合适。倍倍尔认为, 狄茨之所以反对把遗稿安置在斯图加特, 可能担心

伯恩施坦会因此对他发起攻击，进而肃清位于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关于莫特勒与倍倍尔就遗稿安置地的考虑，可参见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40-42;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63。

[81] Motteler an Kautsky, 12. Mai 1901, IISG, Motteler-Nachlaß. 转引自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42-43。

[82] 参见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43。

[83] 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一文中曾谈道：“当我1911年在拉法格夫妇那里时，意外地发现他们那里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在爱琳娜·马克思去世后转交给他们的。”参见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86。

[84] 参见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27-28. 正如罗扬在《梁赞诺夫在1907-1917年间的研究》一文中谈到的，梁赞诺夫在1913年2月致信考茨基，请考茨基寄还马克思致丹尼尔逊的书信。梁赞诺夫在信中谈到，这些书信是劳拉给他的。他想让考茨基明白，尽管劳拉已经逝世，但这并不是劳拉的遗产，而是梁赞诺夫本人的所有物。参见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49, Anm. 205。

[85] 参见N. Rjasanoff, “Marx’ Bekenntnisse”, *Die Neue Zeit*, 31 (1912-1913), Band 1, S.854-862。

[86] 参见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21. 《伟大的遗产》对这件事的介绍略有不同。书中谈到，有一次，考茨基带着梅林一同去拜访拉法格夫妇。由于梅林知识广博，对工人运动了解丰富，又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因此劳拉对他印象极好。于是，她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资料交给了梅林。参见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 65-66。

[87] K. Kautsky an Rjasanov, 11. Dez. 1911, RC, 213/1/212.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38。

[88] Rjasanov an K. Kautsky, 14. Dez. 1911, IISG, Kautsky Nachlass D XI X 295. 转引自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s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S. 38。

[89] 直到1924年12月21日，在梁赞诺夫的干涉下，伯恩施坦才把他保管近15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归还给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参见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44;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 87。

[90] 另一位继承人倍倍尔已经在1913年离世。

[91]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1。

[92] 参见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09。

[93] 关于此人生平的基本情况，可参见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70-71。

[94]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89。

[95]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0。

[96] 尽管梁赞诺夫精心准备了八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但他最终没能亲自出版这部著作。1932年，阿多拉茨基作为主编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即MEGA¹的第I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5,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2。

[97] 参见D. Rjasanov, “Marx und Engels Über Feuerbach (Erster Teil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Marx -Engels -Archiv*, Band I, Erlangen: Politladen-Reprint, 1971, S.205-306。

[98]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1。

[99] Ibid.,S. 392。

[100]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S.392。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页。

[102]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2-393。

[103] Ibid., S. 393-394。

[10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297—312页。

[105]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4。

[10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2—86页。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页。

[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5页。

[109]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5。

[1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页。

[111]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5。

[112] Ibid., S. 397.

[113] 这里所谓的“一个月后”即梁赞诺夫作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这一演讲后的一个月。梁赞诺夫之所以高兴地强调伯恩斯坦同意他以俄文原封不动地出版恩格斯的书信，就是在伯恩斯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许多通信其实都被删节或篡改了。

[114]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7-398.

[115] 参见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7, 398.

[116] Ibid., S. 398-399.

[117]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4.

[118] *Die KPdSU in Resolutionen und Beschlüssen der Parteitage, Parteikonferenzen und Plenartagungen des ZK*, 7. Auflage, Teil II, Moskau, 1954, S. 87. 转引自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 92.

[119] *Thesen und Resolutionen des V. Welt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 Hamburg, 1924, S. 189. 转引自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 91. 也可参见Rolf Hecker, “Rjasanovs Editionsprinzipien der ersten MEGA”,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1997, S.12-13.

[120] *Thesen und Resolutionen des V. Welt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 S. 189. 转引自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o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25.

[121]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9.

[122] Eduard Bernstein, “Vorwort”, *Die Briefe von Friedrich Engels an Eduard Bernstein, mit Briefen von Karl Kautsky an ebendenselben*, Berlin: J. H. W. Dietz Nachf., 1925, S. 5.

[123] 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71-72.

[124] 参见“Vereinbarung zw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forschung e. V. Frankfurt/M. und dem Marx-Engels-Institut”,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46-49.

[125] 尼古拉耶夫斯基是马恩研究院众多优秀的科学通讯员之一，有关他的生平及其与MEGA¹相关的活动可参见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 50-73。

[126] 马恩研究院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雇用了一批优秀的科学通讯员，让他们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以及相关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的搜集工作。他们包括德国的汉斯·施坦（Hans Stein）、法国的列夫·伯恩斯坦（Lew Bernstein）和阿历克斯·吉兰（Alix Guillain）、英国的西文斯（Sivens）以及后来的马斯卡娅（Majskaja）、美国的特拉荷滕伯格（Trachtenberg），等等。

[127]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28.

[128] Ibid., S. 420.

[129] 即《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一诗，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73—529页。

[130]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21-422.

[131]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22-424.

[132]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24-426.

[133] Ibid., S. 427.

[134] 参见Wladimir Sewin, “Die Marx-Engels-Forschung im Moskauer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zur Vorbereitung und Edition der MEGA”, *IMSF Informationsbericht*, Nr. 24, S. 16。

[135]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27-428.

[136]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 127. 也可参见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41。

[137] Rjasanow an Kautsky, 20. Jan. 1911,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327. 转引自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35-136。

[138]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S.136, Anm. 91.

[139] August Bebel und Eduard Bernstei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 bis 1883*, Band 1-4, Stuttgart, 1913. 关于这套文献的出版过程以及编辑原则，梁赞诺夫在MEGA¹ 第三/1卷的“导言”中作了详细的说明与评论。

[140] David Rjasanov, “Einleitung”, *MEGA¹*, Band III/1,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29, S.XII.

[141] 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Die Neue Zeit*, 32 (1914), Band 2, S.565. 也可参见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45。

[142] Eduard Bernstein, “Anmerkung”,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 bis 1883*, Band 1, S.VI-VII.

[143] 倍倍尔和伯恩斯坦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前言”中谈道：“N·梁赞诺夫也通过他广博的专业知识给我们帮了大忙，对此我们要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参见August Bebel und Eduard Bernstein, “Vorwort”,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 bis 1883*, S.VI。

[144] 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S. 568.也可参见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49-50.

[145] 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S. 569.也可参见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50.

[146] Ibid..

[147] 梁赞诺夫对伯恩斯坦《通信集》的彻底批判可参见MEGA¹ 第III部分第1—3卷的“导言”。其中，第1卷的“导言”尤为具体、细致地阐述了《通信集》的编辑过程，并且严厉批判了伯恩斯坦的删除原则。本节第二部分将会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148] 这一点在梁赞诺夫关于MEGA¹ 第II部分（《资本论》部分）的出版设想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如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中指出的：首先出版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草稿，然后按照其现存样貌出版1861—1863年的23个笔记本。接下来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包括它的所有异文与草稿。然后是《资本论》第二卷，它将以两种形式出版：一种是完全依照马克思手稿的原样出版，另一种则按照恩格斯的编排方式出版。之后的第三卷也以这样的形式出版。参见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94.

[149] 参见Rolf Hecker, “Rjasanovs Editionsprinzipien der ersten MEGA”, S.15.

[150] David Rjas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Frankfurt a. M.: 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 b. H., 1927, S. X X VI- X X VII.

[151]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 S. 98.

[152] Ibid.,S. 99.

[153] Georg Lukács, “Interview-On his Life and Work”, *New Left Review* , Nr. 68, 1971, pp.56-57.

[154] 后来确认这篇文章并非马克思所写。

[155] David Rjasanov, MEGA¹ , Band I /1.1, S. 623-626.

[156] 《遗著选》第一卷只在卷末收录了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参见Franz Mehring,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 Band 1, Stuttgart: Verlag von Dietz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02, S.432-490.

[157] 这或许是梁赞诺夫的有意为之。在MEGA¹ “前言”中，梁赞诺夫对梅林主编《遗著选》所持的编辑原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批判，这种批判也间接地反映了梁赞诺夫对MEGA¹ 所持的编辑构想与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遗著选》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是梁赞诺夫编辑MEGA¹ 所预先设定的靶子。正是由于这两套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自身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梁赞诺夫才决定以之为鉴，编辑如实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本来面貌的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58] 该文在《遗著选》中的题目是《〈科隆日报〉第79号的社论》。参见Franz Mehring,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 Band 1, S.259-267.

[159] 在梅林的《遗著选》中，该篇文章叫做《论共产主义》（Über Kommunismus）；在梁赞诺夫主编的MEGA¹ 试编卷中，该文叫做《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在今天通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中，该文统一称为《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160] Franz Mehring,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 Band 1, S. V -VI.

[161] 其实，梅林在编辑《遗著选》时不仅删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文章，而且还对一些内容作了删节和修改，梁赞诺夫在MEGA¹ “前言”中对此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参见David Rjas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I V -XI X.

[162] Franz Borkenau, “Literaturbericht”,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 14 (1929), S. 485-486.

[163] David Rjas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 XI.

[164] Ibid., S. X XII.

[165] Ibid..

[166]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与他人的通信统一编排在MEGA¹ 的第III部分。第I部分第1—2卷中收录的书信仅仅是例外。

[167] David Rjas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 XII- X X V. 尽管梁赞诺夫在MEGA¹ “前言”中制订了较为系统的编辑计划，但是随着后来编辑工作的深入进展，除了第1—2卷之外，第I部分后续卷次所收录的内容实际上都发生了变化。正如1930年9月底或10月初梁赞诺夫在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的，“我们扩大了卷册的数目，第3卷被分成了第3卷和第4卷。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作为第5卷出版，第7、8卷构成从前的第5、6卷”。参见“Referat Rjasanovs Über die Aufgaben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1, S. 118. 后来，阿多拉茨基接替梁赞诺夫进行后续卷次的出版工作时，也秉承了梁赞诺夫的这一方针。例如，MEGA¹ 第I部分第3卷主要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本应收录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被顺延到了第4卷中。原计划收录于第4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出版于第5卷。

[168] 参见David Rjas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 X V -X X VI.

[169] 该卷导言结尾标注的日期是1931年7月12日。参见V. Adoratskij, MEGA¹ , Band III/4,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1, S. X VI. 关于该卷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170] 即《通信集》第一卷第7号信。梁赞诺夫在MEGA¹ 第III部分第1卷的“导言”中详细说明了他对这封信的鉴定意见。参见David Rjasanov, “Einleitung”, MEGA¹ , Band III/1, S. X V, Anm. 2)。

[171] 参见David Rjasanov, “Einleitung”, MEGA¹ , Band III/1, S. X V. 另外7封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委托他人写的。其中4封由马克思夫人代

写，2封由威廉·皮佩尔（Wilhelm Pieper）代写，1封由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Karl Ludwig Bernays）代写。

[\[172\]](#) David Rjazanov, “Einleitung”, *MEGA*¹, Band III/2,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m.b.H., 1930, S.IX-X.

[\[173\]](#) David Rjazanov, “Einleitung”, *MEGA*¹, Band III/3,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m.b.H., 1930, S. IX.

[\[174\]](#) David Rjazanov, “Einleitung”, *MEGA*¹, Band III/1, S. XVIII-XXII.

[\[175\]](#) David Rjazanov, “Einleitung”, *MEGA*¹, Band III/1, S. XXXIX-XL.

第三章 MEGA¹ 的重大挫折——梁赞诺夫时代的终结

自1921年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以来，梁赞诺夫率领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从研究院的机构设置到科学工作者的聘用、任务分配，从重要的专业图书馆的收购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复制和购买，从文献资料的辨识、整理、研究到最终的MEGA¹各卷次的出版发行，这其中都凝结着梁赞诺夫大量的心血与汗水。正是由于有了梁赞诺夫这一灵魂人物，MEGA¹编辑出版工程才得以高效、有序地运作起来。于是，梁赞诺夫与MEGA¹日益形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紧密联系。他所领导的马恩研究院被国际学界亲切地称为“梁赞诺夫研究院”，而他主持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时期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梁赞诺夫时期”或者“梁赞诺夫时代”。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正当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在完成了长期的资料积累与准备、全面进入稳定的编辑出版阶段的时候，1931年的政治浪潮迅猛袭来。一夜之间，梁赞诺夫被罢免职务，开除出党。继而，他所领导的马恩研究院也遭到大规模清洗，百余名科学人员被解聘、驱逐。由此，繁盛显赫的梁赞诺夫时代在瞬间灰飞烟灭，相应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亦遭遇重大的挫折。而这一系列急转直下的事件的序曲，就是1930年马恩研究院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作的终结。

第一节 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作的终止

1930年，正当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紧张有序地进行的时候，梁赞诺夫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与马恩研究院正式合作6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作出决议，不再允许马恩研究院拷贝复制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

历史地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决议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在MEGA¹“前言”中，梁赞诺夫还在结尾处提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爱德华·伯恩斯坦、路易莎·考茨基、鲁道夫·希法亭和阿道夫·布劳恩，对他们在编辑出版MEGA¹的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表达了感激之情^[1]，那么在此后的MEGA¹各卷册中，这些名字就再也没有被提及过。相反，甚至早在MEGA¹“前言”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梅林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就已然遭到梁赞诺夫的激烈批判。尽管梁赞诺夫承认，“梅林的版本对于马克思学的历史来说是真正划时代的，出色的评注首次从各种原始资料出发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2]，但是他仍然通过种种实例明确地指出，梅林的版本是“极其主观的版本”，“并没有忠实地再现原文”。^[3]1929年研究院隆重推出的MEGA¹第Ⅲ部分第1卷更是剑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已逝领导人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在该卷“导言”中，梁赞诺夫对伯恩斯坦和梅林作了严肃犀利、毫不留情的批判。不仅如此，梁赞诺夫甚至把MEGA¹第Ⅲ部分即书信部分的第1—4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完全设计成为《通信集》的“勘误版”：伯恩斯坦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隐形”删改全部现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向研究院大开方便之门，为之提供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何等的不满与恼怒。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看来，由苏维埃政权领导的马恩研究院完全是从政治立场出发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编辑活动的，因此，它总是借机将批判矛头指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正是后者为研究院的编辑出版活动提供了不竭的文献源泉。于是，曾经为梁赞诺夫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帮助的鲁道夫·希法亭同海耳曼·米勒（Hermann Müller）建议党委会，不再允许马恩研究院复制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以避免“档案馆在思想上被彻底洗劫一空”。^[4]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决定，梁赞诺夫曾试图加以阻止。1930年，他前往柏林与时任档案馆负责人威廉·狄特曼（Wilhelm Dittmann）进行磋商。在狄特曼关于此事所做的一份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内容：“虽然他们（俄国人）说，他们只是作为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发表言论的，但是莫斯科的当权者却在宣传的视角下把他们的工作看做是完全政治性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在政治层面上对之采取立场。”^[5]

事实上，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出上述决议之前，梁赞诺夫就已经同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就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版权问题发生了分歧。如前所述，伯恩斯坦于1924年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版权转让给了马恩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联合成立的马恩文库出版公司。于是，马恩研究院开始了合法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出版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决定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著作权与出版权收归己有。于是，它通过伯恩斯坦通知梁赞诺夫，马恩研究院在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出版活动时，必须首先征得党委会的同意，因为党委会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真正所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这一提法显然不能为梁赞诺夫所接受，他拿出伯恩斯坦于1924年所写的版权转让声明作为证据，以表明马恩研究院完全有权利自主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梁赞诺夫的这一“证据”让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它并不知道伯恩斯坦曾有过这样的声明。于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授意下，1929年11月16日，伯恩斯坦致信马恩文库出版公司，明确宣布收回他在1924年12月19日作出的版权转让声明。该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公司！

最近的事件促使我收回我在1924年12月19日向您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梁赞诺夫先生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援引了我的这份声明，并且据此得出他拥有这一我在那里只是转让给您的权利。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商业合同，从而使我有义务交给您我所保管的手稿等等的片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产。在这里，首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并不把这笔遗产看作是我本人的财产，而是看作受托管的财产；我的亡友、我们党的同志奥古斯特·倍倍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1893年7月29日的遗嘱和1895年7月26日的遗嘱补充中把这些文献资料遗留给了他和我——和我一致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只是被恩格斯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准备把它作为他的这一部分和另一部分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因此，在任何具体情况下，关于使用这笔遗产的权威决定都由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宣布。倍倍尔去世后，在我此前还没有与我们党委会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正如你们可能知道的，最近刚刚去世的党委会成员阿道夫·布劳恩直至最后还在作为中间人而起作用——我自然还坚持这一规定，自然不拥有任何一份遗嘱。也正是基于此前达成的这种共识，我才在那时向您发表了这份现在被梁赞诺夫援引给党委会的声明。因此，我不能再坚持这份声明了。我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份声明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事后表明，这些前提条件是完全错误的。我原以为，贵公司将被按照曾经的格律恩伯格文库所彰显的精神来领导，对于莫斯科马恩研究院的党派政治倾向采取完全独立的姿态。由于莫斯科的英才错误地对所有独立的、与布尔什维克政治相对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系统的充满敌意的怀疑和诽谤，由此持续妨碍与受之影响的团体的和谐合作，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明确地并且正式地收回我所提到的那份声明。我否认您有权通过援引这份声明而要求向您提供我所受托保管的手稿书信遗产的各部分，我只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是它们的所有者。

致应有的敬意 ^[6]

显然，按照伯恩施坦的说法，他曾经向马恩文库出版公司发表的声明只适用于该公司，它与梁赞诺夫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在伯恩施坦看来，他的这份声明并不是什么商业合同，因此，他随时都可以收回。梁赞诺夫当然不能容忍伯恩施坦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再次拿出了一份有力的证据：布劳恩在1924年12月1日写给马恩文库出版公司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布劳恩谈到，他把马恩文库出版公司请求转让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申请书以及一张4200帝国马克的支票交给了伯恩施坦。同时，布劳恩也向伯恩施坦转达了马恩文库出版公司的请求：回复公司的信件，并在保证书上签字。可以看出，这里的4200帝国马克正是我们在前文谈到的马恩文库出版公司支付给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权转让费。

梁赞诺夫提出的新证据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全力追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尽管形势并不十分有利，但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以替伯恩施坦开脱的结论否定了梁赞诺夫的证据。在一份由狄特曼签署的公文中，我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调查结果：布劳恩当初并没有把4200帝国马克直接交给伯恩施坦，而是先让人把它转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户头上，然后派出纳员博顿（Boten）亲手交给了伯恩施坦。虽然博顿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但是伯恩施坦却坚称对此毫无印象。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伯恩施坦在1925年两次患病，记忆力在一定程度上出了问题。但是，即便伯恩施坦收了这笔钱，他仍然可以得到有力的辩护。布劳恩当初只是电话告知伯恩施坦，马恩文库出版公司将以挂号的形式寄来支票，伯恩施坦根本不知道博顿交给他的那4200帝国马克正是马恩文库出版公司付给他的版权转让费，看来布劳恩并没有向他透露这笔钱的具体金额。在伯恩施坦的版权转让声明中，也从未提及转让费的事情。因此，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得出结论：4200帝国马克转让费的证据并不成立，因为伯恩施坦对此毫不知情。此外，伯恩施坦对马恩文库出版公司发表的版权转让声明也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他完全可以收回自己的声明。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出了处理方案：返还马恩文库出版公司4200帝国马克，这件事情就此了结。^[7]

显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调查结果存在许多含混不详、暧昧不清的地方，而它为伯恩施坦所作的辩护也破绽重重、难以服人。然而，正是借着这一事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结束了与马恩研究院的合作，从而对后者所谓的“怀疑和诽谤”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击。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以马恩研究院在文献出版活动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为由终止了与研究院的合作，那么反过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也是从“政治倾向”出发给研究院扣上了所谓“怀疑和诽谤”的帽子。

可以想象，德国社会民主党突然中止合作的背信弃义的行径不仅令以梁赞诺夫为首的马恩研究院全体人员深为震惊与不满，也令整个苏维埃国家愤怒不已。于是，在《伟大的遗产》中，我们看到了措辞如此激烈的表述：“阿道夫·布劳恩在1929年死了，伯恩施坦失忆了，忠诚现在也完结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担负起了趴在草料上的狗的职责：自己不吃，但也不让别人靠近。”^[8]

尽管不再能够使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此前法兰克福实验室里的复印装置一直都在昼夜不停地复制研究院从档案馆里借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因此，在1930年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止合作之时，研究院已然能够凭借它所获取的足够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复制件来独立地进行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了。

1930年9月底或10月初，在政治风暴来袭之前，梁赞诺夫还在研究院的一次集会上踌躇满志地畅想了未来一年MEGA¹编辑出版工作的安排。梁赞诺夫指出：“我们决定，明年要保持德文学术版（即MEGA¹——作者注）的速度。我们曾计划每年出版6卷，虽然别人建议我们不要少于4卷，但是我们瞄准了6卷的目标，并且认为，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今年，我们出版了5卷，并且决定，每年最多出版5卷。我坚信，我还能非常健康地活十年，因此决定，每年出版5卷。以前我非常紧张不安，我想，一套40卷的版本可能将由研究院的年轻工作者来完成了。现在我确定，即便是以更慢的速度，我们也能把这套版本推延十年。”关于1931年MEGA¹具体卷次的出版工作，梁赞诺夫也做出了如下的设想，“明年我们要准备第9卷和第10卷，出版第4、5、6、7卷和第3卷。我们扩大了卷册的数目，第3卷被分成了第3卷和第4卷。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作为第5卷出版，第7、8卷构成从前的第5、6卷”^[9]。

按照梁赞诺夫原初的构想，1930年研究院将完成6卷MEGA¹的出版任务。除了该年年初出版的第I部分第2卷和第III部分第2、3卷外，1930年冬还将出版第I部分第3、4卷和第III部分第4卷。这一点在1930年2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封底的征订启事中可以看出。按照这则征订启事，“1930年冬将出版：

“第I部分，第三卷：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4至1846年中期的著作和文章。约700页。装订价约18帝国马克。—

“第I部分，第四卷：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约700页。装订价约15帝国马克。—

“第III部分，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第四卷。1868至1883年。约600页。装订价为12帝国马克。—”^[10]

不过，根据梁赞诺夫在1930年9月底或10月初所作的报告，我们可以知道，研究院已经调整了出版计划，原定冬天出版的卷次被推延到了1931年。可以看出，此时的梁赞诺夫是信心满满的。尽管除了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之外，研究院还有诸如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普及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丛书”等大量的编辑出版任务，但是正如梁赞诺夫在上述报告的结尾处谈到的：“我们的方案、我们的计划是极其紧张的，但是我们希望，如果没有什么情况影响，能够完成绝大部分工作。一个人只有制定紧张的计划，才能够完成紧张的计划”^[11]。梁赞诺夫乐观地认为，只要没有意外事件发生，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能够顶住巨大的工作压力，顺利完成他所预想的各个目标。然而，出乎梁赞诺夫意料的是，他的工作居然真的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情况”的影响。

第二节 梁赞诺夫的政治劫难

梁赞诺夫既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又是一名政治家。开始于青年时代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几十年的俄国革命运动的洗礼中，梁赞诺夫逐渐形成了直言不讳、辛辣犀利的行事风格。他是党内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俄共

(布)内部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存在的问题,他经常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在现存的梁赞诺夫于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了他如此尖锐的表述:“所有那些想提出批评意见、出于责任感而想批评中央委员会政策的同志……陷入一种困难的境地之中。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人们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可要好得多:它不仅把一个革命斗士变成了女人,而且这些女人的数量在难以置信地不断增长。”^[12]

梁赞诺夫直言不讳、尖锐刻薄的批评得罪了党内不少要人。同时,他的政治背景、特别是他一直以来与孟什维克“不清不白”的联系也令俄共(布)高层对他“另眼相看”。事实上,梁赞诺夫对自己与孟什维克的所谓联系,是完全否认的。正如他后来在《我的供述》中谈到的:“我从来不是孟什维克,我从未参与过孟什维克的文学机关报或出版物,我是在与孟什维克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进行斗争”^[13]。但是在很多材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关他与孟什维克关系的确切说明。例如,在《伟大的遗产》这一出版于梁赞诺夫禁忌^[14]解禁之前的著作中,在这一当时绝无仅有的对梁赞诺夫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的著作中,依然指出:“梁赞诺夫曾和孟什维克走得很近;直到1917年夏他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即使在此之后,他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总是稳定不变的。”^[15]事实上,现存的一封梁赞诺夫致考茨基的信件亦为类似观点提供了佐证。在这封大约写于1909年的信中,梁赞诺夫谈道:“不过,我并不反对孟什维克。恰恰相反,我在1901—1905年期间——革命之前——是一名‘群众罢工主义者’,因为我在原则上反对恐怖主义和有准备的武装起义以及一切斗争组织。”^[16]显然,这里所谓的恐怖主义、武装斗争,正是暗指列宁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

事实上,甚至列宁与梁赞诺夫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正如《伟大的遗产》指出的,列宁对于梁赞诺夫在政治立场上的摇摆不定是心知肚明的,这就像他同样了解梁赞诺夫的某些性格弱点一样^[17]。但是,列宁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从不依据所谓的“过去”或者“曾经”来决定自己的用人策略。更确切地说,他是就事而论事的。正因如此,他才毫不犹豫地任命梁赞诺夫这位俄国乃至世界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担任马恩研究院的院长,挑起创建马恩研究院的重任。在列宁看来,要“创建一所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教学中心,不仅要延揽老的布尔什维克骨干力量的代表,而且还要延揽来自其他政治背景的专业人士、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等等”^[18]。所以,他才允许甚至鼓励梁赞诺夫为研究院不拘一格地引进人才。于是,许多曾经的孟什维克分子、国外的非共产党人都被梁赞诺夫吸纳到研究院的工作中。在这些人中,就包括后来作为梁赞诺夫政治劫难之导火索的伊萨克·伊里奇·鲁宾(Исаак Ильич Рубин)。^[19]

在整个苏维埃政府中,与梁赞诺夫关系最为恶劣的就是约瑟夫·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两人不仅在政治观点上针锋相对,而且在个人关系上也异常冷漠仇视。在苏联著名作家罗伊·梅德维杰夫(Roy Medwedew)撰写的《历史的审判》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1921年5月举行的第四届全俄工会大会上,主张工会独立性的梁赞诺夫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完全以自然物产充当工人的工资。这一建议虽然违背了俄共(布)的路线,但却由于当时货币购买力的急剧下降而得到了参会人员的广泛支持。结果,在18日的大会投票中,梁赞诺夫的提案出人意料地被通过了,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却没有被通过。当斯大林来到会场时,他试图纠正整个事态。但是他言语尖刻、激烈,讲话充满了对梁赞诺夫的个人攻击。于是,大厅里一片混乱。当梁赞诺夫回答什么时,斯大林对他厉声训斥道:“闭嘴,你这个小丑。”梁赞诺夫跳了起来,以同样的话反唇相讥。局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后来,在列宁的调停下,大会才再次取消了梁赞诺夫的提案,重新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草案。^[20]

一方面,斯大林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梁赞诺夫分外敌视;另一方面,梁赞诺夫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斯大林的轻视,对之极尽嘲讽和挖苦。在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看来,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斯大林,其文化素养和马克思主义学识实在不可恭维。古斯塔夫·迈耶尔在其《回忆录》中向我们披露了这样一段逸事。1928年,迈耶尔赶赴莫斯科马恩研究院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研究。在这里,他得到了梁赞诺夫的热情帮助。迈耶尔回忆说:“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梁赞诺夫就问我,他该给我介绍哪些俄国领导人认识。‘我只要摁一下这些键就可以了’,他指指电话对我解释道,言语间有几分得意。‘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为您效劳。只不过斯大林,我劝您还是算了吧’,他说道,‘您所精通的那些语言,他一门都不会。’”^[21]正是出于这种相互的厌恶与敌视,梁赞诺夫与斯大林这两位苏俄政府的高层,始终处于水火不容之中。1930年,梁赞诺夫在60岁寿辰之际收到了来自党中央及社会各界的祝贺,但只有一个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向他道贺,这个人就是斯大林。

梁赞诺夫与斯大林的交恶本身注定了他后来的政治悲剧。正如梅德维杰夫所说:“斯大林并不重视说服自己的对手,从而实现共同的合作。他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身上,瓦解他们的抵抗。如果没能成功,他就会把他们无情地推到一边。此外,斯大林还是一个极为记仇、报复心重的人。即便争吵的对象已经被搁置起来、必须进行友好的合作,他也仍然会把他的对手视为自己的敌人。当然,斯大林很善于掩饰他的真实情感。”^[22]因此,尽管梁赞诺夫早在20年代初就与斯大林关系恶劣,甚至在1922年,斯大林以总书记的名义禁止梁赞诺夫进行一切政治活动,但梁赞诺夫凭借其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凭借着列宁的支持依然能够我行我素、直言快语,依然能够全身心地致力于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然而,斯大林并不会永远地容忍梁赞诺夫。

1930年年底,政治乌云开始笼罩在梁赞诺夫头上。斯大林对梁赞诺夫发起了进攻的序幕。12月9日,斯大林和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些同志进行了谈话,其间,他特别谈到了梁赞诺夫,并且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展开全面的批判。打击,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全方位地予以打击,包括那些迄今从未被打击的地方。”^[23]于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1931年1月15日《真理报》发表了B.巴斯勒夫斯基(B. Basilewski)的一篇书评,其中写道:“作者忽略了列宁学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新内容。他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全新的、更高级的列宁阶段都不敢谈及。在这一方面,他步了德波林、卡里耶夫、梁赞诺夫、斯坦……之后尘,这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没有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带来任何新东西。”^[24]对于这样的公然挑衅,刚直的梁赞诺夫当然不会沉默。他在第二天写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我以为,作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非常清楚对党所担负的责任,并且会慎重待之。就这件事来说,我也必须认为,编辑部不仅轻易地允许提出针对我本人的这样一份指控,而且还对之深信不疑。如果它能告诉我,它是依据哪些材料而确立这一指控的,我将不胜感激。”接下来,梁赞诺夫用他那特有的犀利和嘲讽的口吻进行了自我辩护:“如果有人认为,‘列宁主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赋予任何内容’,那他肯定是个十足的傻瓜。问题只是在于,它涉及的是哪些学说,列宁对哪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贡献’。……如

果列宁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的、更高的阶段，如果马克思主义确实被列宁主义所接替，就像‘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接替一样——假设我们的青年哲学家确实理解他们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那么新的党代会不仅要肃清我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列宁主义观，而且也要立即停止使用斯大林同志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该书中也使用了这些术语。”^[25]在梁赞诺夫看来，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以“阶段”来区分，他指出：“从1894年到1914年，列宁的辩证法观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直到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读本之后，他才开始对辩证法进行全新的、深入的研究，然后他才得出了使他能够以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方式来阐述并完善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的那些成果，并在自己撰写的关于马克思的卓越文章中运用了这些成果。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相比，列宁主义并不是科学研究的更新的、更高级的方法，我们只能谈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恩格斯的辩证方法和列宁的辩证方法。”^[26]

梁赞诺夫写的这封信并没有被《真理报》发表。事实上，在整整一个月之后，梁赞诺夫就被一场浩大而剧烈的波澜彻底吞噬了。1931年2月15日夜，梁赞诺夫被捕，住所被查封。2月16日，梁赞诺夫被罢黜研究院院长一职，同时被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开除党籍，罪名是“知晓并支持苏联国内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活动，与苏联国内的孟什维克以及国外总部建立了联系”。^[27]2月底，梁赞诺夫被转移到苏兹达尔（Susdal）监狱，4月16日被彻底流放到萨拉托夫（Saratow）。

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令人猝不及防。所有人都想知道，从2月中旬到4月中旬，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功勋卓著的梁赞诺夫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被俄共（布）逮捕、开除出党？他与孟什维克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联系吗？

1932年2月18日，在整个变故发生一年之后，梁赞诺夫在萨拉托夫写下了《我的供述》^[28]，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1931年2月12日晚，斯大林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中央委员会。他当着摩洛托夫（Molotow）同志的面递给我一封鲁宾同志的信。在这封以我为收信人的信中，鲁宾写道，他给过我一个密封信封，里面装有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的文件。我声称从来没有收到过鲁宾的什么信封，这封信只有精神病、吓破胆的人才可能写得出来。斯大林和摩洛托夫同志回答道，他们认为有必要对马恩研究院进行一次彻查。之后，斯大林同志便叫来了孟斯基（Menshinski）和普罗科菲耶夫（Prokofjew）同志。在普罗科菲耶夫同志的带领下，当天晚上就开始了研究院的搜查；我交给了他保险柜钥匙——我是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拿到这些钥匙的，它们是由我的秘书G.苏哈诺娃（G. Suchanowa）保管的。^[29]2月15日夜，我被捕了。我被捕后，我的住所也遭到了彻查。没有人向我出示哪怕一份文件，以便要求我对之进行说明。整个这段时间就围绕着那个密封信封……

2月26日，我得到通知：从2月27日起，《真理报》和《消息报》将在一定时间内不再为我递送，审判程序在几天后将再次启动。但是早在2月28日夜，我就已经被转移到苏兹达尔，在那里直到3月15日之后我才再次收到了报纸。所以，我是在萨拉托夫才第一次知道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以及审判孟什维克的记录的，也就是在四月底我终于收到一套1931年3月1日至15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时候。我先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说起。这个决议是在我被捕之后第二天，也就是2月17日对外做出的。不论在我被捕之前还是之后，不论是在2月17日之前还是之后，根本没有人提到哪怕一句这样的话：“我知晓苏联国内的孟什维克的反革命、反苏维埃活动，并且帮助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同国外的孟什维克总部取得联系。”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掌握着哪些报告、哪些材料和哪些陈词，从而对我提出如此严重的、巨大的、野蛮的、无理的指控，这样的指控与我的整个革命生涯、与我的人格完全矛盾。^[30]

从这段所谓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梁赞诺夫遭受的这场政治劫难的导火线仅仅是一封莫须有的密信。关于这封密信，我们只知道它的作者是鲁宾，至于这封密信中装有的文件，不论是在对梁赞诺夫的住所还是在马恩研究院的搜查中，都没有被找到。正如维克多·塞格（Victor Serge）对2月12日晚梁赞诺夫和斯大林的对峙所描述的：“梁赞诺夫在这天夜里被叫到了政治局，他在那里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文件在哪儿？’总书记喊道。梁赞诺夫厉声答道，‘如果您自己不把它们带来，您哪儿都找不到！’”^[31]

这里，鲁宾成为了梁赞诺夫事件的关键人物。在前文中我们提到，鲁宾曾是孟什维克分子，梁赞诺夫出于对他学识的欣赏而把他从流放地解救了回来，并委任他为研究院政治经济学工作室主任。那么，这样一位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参与者，这样一位曾经受到梁赞诺夫知遇之恩的学者，为什么会恩将仇报，置梁赞诺夫于死地呢？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1930年年底，针对孟什维克的斗争浪潮再次掀起，鲁宾由于其曾经的历史而被卷入这次浪潮中。当时，中央命令梁赞诺夫解除鲁宾的研究院政治经济学工作室主任一职。梁赞诺夫出于保护鲁宾的心理，建议鲁宾自己递交辞呈，同时建议他留任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著作版本和“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系列的高级技术编辑。鲁宾接受了这一建议。^[32]然而，形势急转直下。12月23日，鲁宾被捕。在狱中斗争了近一个月之后，鲁宾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被捕只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引子。在《历史的审判》一书中，我们看到了鲁宾的妹妹鲁比娜（Б. Рубина）对哥哥这段不堪的历史的回忆。^[33]而我们在了解鲁宾狱中经历的同时，也顺势揭开了梁赞诺夫事件的历史真相。

按照鲁比娜的回忆，鲁宾被捕时的罪名是孟什维克苏联办事处成员。他当然对此完全否认。在进行了一次对质之后，鲁宾凭借其多年的法学素养成功地推翻了预谋好的诬陷。于是，他的指控被取消了。之后，他被转移到苏兹达尔监狱。在这里，鲁宾遭受到了各种严刑与侮辱。他被关了两次禁闭，每次长达24小时。所谓的禁闭室就是一个一人高的石头洞穴，人在里面不能活动，要么站着，要么坐在石头地板上。尽管有多年的心脏病和关节病，鲁宾还是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另外，鲁宾也受到了各种侮辱性的刁难。“人们没收了他带来的所有私人物品，甚至他的手绢。在这段时间，他感冒了，总是肿着鼻子——它脏兮兮地，而且长满了脓疮——出入。监狱长经常来查视他的囚室，只要发现哪怕一丁点违反规定的地方，就叫他去打扫厕所。为了摧毁他的意志，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人们对他，他的夫人病得很重。他回答说：‘我帮不了她，我都自身难保。’也有这样的情况，一名调查人员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伊萨克·伊里奇，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人们在半夜提审他，不让他睡一分钟，一再地叫醒他，用种种不同的问题折磨他，还把他称为‘孟什维克小耶稣’。”^[34]

当看到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济于事时，监狱看守想出了最残忍的一招。1931年1月28日夜，他们把鲁宾带到地下室。那里除了几名看守外，还有一名囚犯。看守们对这名囚犯说：“如果鲁宾不认罪，您就得替他死。”结果，就在镇定而平静的鲁宾面前，看守们果真把这名囚犯枪决了。第二天，一切又如法炮制一番。

由此，鲁宾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于是，从1931年2月2日至2月21日，他与调查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在这一过程中，鲁宾才发现，自己仅仅是个棋子，梁赞诺夫才是审判的关键人物，即使不是鲁宾，也要有别人来诬陷梁赞诺夫。结果，鲁宾同意作伪证，声称自己交给梁赞诺夫一封装有孟什维克总部文件的密信。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嫁祸于梁赞诺夫的行径，鲁宾自己亦是痛苦万分的。正如鲁比娜讲的：“我的哥哥告诉我，控告梁赞诺夫就如同陷害自己的父亲。这对他来说是最艰难的时刻。他决定，把这件事情说成仿佛他欺骗了对他无限信任的梁赞诺夫。在所有的供述中，我哥哥都毫不动摇地坚持，梁赞诺夫对他个人非常信任，他辜负了这一信任。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这一立场。”^[35]正因如此，鲁宾在后来的庭审中一再坚持，是自己欺骗了梁赞诺夫，梁赞诺夫与自己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这令企图嫁祸于梁赞诺夫的检察官恼怒不已。最后，鲁宾被判处了五年，而不是预先商谈好的三年。

有一处细节或许值得我们注意。1931年2月20日梁赞诺夫曾和鲁宾有过一次对质。关于这次对质，鲁比娜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对质是在调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苍白的、受尽折磨的鲁宾对梁赞诺夫说，‘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您还记得我是如何把信封交给您的吗？’梁赞诺夫是否回答了什么，怎么回答的，我就知道了。我哥哥很快就被带回到他的囚室。在那里，他不断地用他的脑袋撞墙。了解鲁宾的镇静与沉着的人会明白，他是处于怎样的境地之中。”^[36]相应地，梁赞诺夫也在《我的供述》中谈到了这次对质：“在狱中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同鲁宾的‘对质’。只有调查法官能够向鲁宾提问。他也记录答复。怯生生的、颤抖的、要花费不少力气才能说出一句话的鲁宾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可憎的印象，以至于我在他回答完调查法官的第一个问题之后就放弃了继续‘对质’。如果我当时知道，对我的事件的所有调查会就此结束，而这场对质——如我现在所知道的——已经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决议后举行的，那我会克服我的厌恶情绪的。”^[37]尽管梁赞诺夫声称，他在对质的过程中对鲁宾有种厌恶之情，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看到曾经的同事、自己非常欣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被折磨成如此惨状，梁赞诺夫即便对之痛恨万分，亦不免心生怜悯和不忍之心。所谓的“对质”也就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只能遗憾，这样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家，两位相互欣赏、惺惺相惜的学者，由于历史的作弄，竟然以这样一种奇特的原告与被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们的清白人生亦至此终结。

在被流放到萨拉托夫之后，梁赞诺夫并没有放弃洗掉自己冤屈的努力。1931年4月28日，梁赞诺夫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写了这样一封信：

直到在萨拉托夫，在我被捕三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于1931年2月17日作出的决议。直到现在，我所面对的只是以鲁宾的陈词为基础的指控：第一，收到了装在一个密封信封里的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的不知什么文件，对之加以保管；第二，警告过鲁宾，他将会被捕。

我不仅否认第一条指控，而且也否认第二条指控，并且予以最坚决的否认。此刻，当我从审判的速记笔录中了解到鲁宾的所有涉及我的陈述之后，我只是感到奇怪，调查法官居然对此深信不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凭借这样一个指控就将我开除出党，可是从始至终没有人向我提过半句这一指控，我是直到现在才知道它的。如果我确实有罪，确实通过为孟什维克与国外孟什维克总部牵线搭桥而帮助孟什维克，那么我就对苏维埃政权犯了最严重的罪行。^[38]

梁赞诺夫的这封信在5月份被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斯大林的追随者雅各达（Genrich Jagoda）在这份材料上写下如下批复：“保密，归档。雅各达。1931年5月21日。已决定，不对此信予以回复。”^[39]

由于这样一场劫难，1931年年初梁赞诺夫的政治生命彻底完结，而他所从事的MEGA¹编辑出版事业亦戛然而止。从此，梁赞诺夫再也没有返回到这项事业中。

第三节 马恩研究院的彻底清洗

作为梁赞诺夫一手创建起来的马克思学中心，马恩研究院一直被国际社会亲切地称为“梁赞诺夫研究院”。然而，就在梁赞诺夫被罢黜研究院院长之职、开除党籍、流放他乡的同时，马恩研究院也遭到了大规模的清洗。如前所述，在2月12日晚梁赞诺夫与斯大林会面之后，普罗科菲耶夫就率领苏联政治保安部的人员对研究院展开了全面的搜查。他们的搜查目标当然不是鲁宾交给梁赞诺夫的所谓装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文件的信封，而是搜查一切可能置梁赞诺夫于不利境地的材料。在三天的时间里，他们搜出了15卷的调查卷宗，这些卷宗主要涉及梁赞诺夫在1918—1930年间为政治上受迫害者辩护求情的材料，其中有书信、申请书以及情况报告等。另外，梁赞诺夫的许多理论文章以及公务性的通信也被查抄没收。^[40]就在这一始于2月12日晚、持续至2月16日的查抄过程中，研究院也被暂时查封了。起初，研究院大门上的告示写着：由于杀菌消毒，研究院在2月13日和14日期间关闭。14日，这一告示又被更新：由于杀菌消毒，研究院将关闭至2月20日。之后又更新至2月25日。最终，研究院一直关闭至1931年3月5日。^[41]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在紧锣密鼓地重新配置研究院的领导层。2月20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解散研究院的领导层；任命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Vladimir Viktorovič Adoratskij）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陀夫斯图卡（Tovstucha）担任马恩研究院副院长。值得说明的是，时任列宁研究院院长的阿多拉茨基并不是斯大林的心腹之人，倒是陀夫斯图卡——他从1922年至1931年一直担任斯大林书记处办公室及中央委员会秘密部门的领导——深得斯大林信任。在斯大林看来，把陀夫斯图卡安插在研究院，可以保证研究院以“反梁赞诺夫的精神”重新构建。^[42]事实表明，陀夫斯图卡确实成为摧毁梁赞诺夫所缔造的科学而学术的马恩研究院工作团队的主要人物。

起初，人们提交给陀夫斯图卡一份22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所记录的人都与梁赞诺夫过从甚密，因此研究院拟将这些人解雇。历史地来看，这份名单可谓是研究院最终解聘人员名单的第一稿。然而，考虑到梁赞诺夫所创立的马恩研究院共有约250名工作人员，仅仅解雇其中的22人显然不足以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更不用说清除梁赞诺夫的“残余势力”了。因此，陀夫斯图卡拟订了一份几乎囊括研究院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把它提交给普罗科菲耶夫，并请他立即对名单中的人进行审核。

3月4日、5日和20日，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机关组成的审查和清洗马恩研究院工作人员的委员会举行了三次会议，对研究院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审查、考核，从而决定其去留。除了这一专门委员会的五名成员罗伊岑曼

(Rojzenman)、塞尔民(Celmin)、阿格拉诺夫(Agranov)、陀夫斯图卡和普舍尼琴(Ponicyan)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新任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共产国际代表克雷普斯(Kreps)、研究院党委书记科茨洛夫(Kozlov)、马列研究院工会主席马克西摩夫斯基(Maksimovskij)^[43]、苏联共产党伏龙泽(Frunze)区委代表塞夫(Seif)、研究院院长秘书伊万诺夫(Ivanov)、研究院工作人员昂加洛夫(Angarov)和尤丁(Judin)。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委员会在此前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2月20日前后,研究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收到了一份调查问卷。这份问卷包含50个问题,它们涉及社会出身、非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党籍、直系亲属、参与过的涉及对梁赞诺夫所持立场的讨论。^[44]研究院当时的工作人员胡果·胡伯特(Hugo Huppert)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调查问卷一事。“1931年3月5日。今天,当工作人员们想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发现,甚至连花园的栅栏门都是锁着的。在俱乐部里坐着大声喊话、煞有介事的加拉宁同志,他在分发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问卷是做什么用的?’用来发放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今后谁都不能进入研究院。’这是两页纸的调查表,上面有50个问题、附带问题及选择题,所有的50个问题都极为严肃,这一刨根究底的调查表涉及出身、过去、种种关系……到了第三、第四部分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妻子的外祖父是谁?你在国外有亲戚吗?内战期间你在哪里?隶属于哪个兵团?你在白匪军中进行过斗争吗?……非常冒失无礼的问题。就这样,我的一些尊敬的同事和同志没有被发放通行证。”^[45]

在3月4日第一次的研究院工作人员审核会议上,共有200名工作人员^[46]逐一受到审核。根据现存于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会议记录(在该记录上依然可以看到“绝密”字样),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一审核的步骤。首先,简单介绍被审核人的背景。其次,参会人员对被审核人作出评价。最后,得出审核结论——保留或解雇。我们不妨看看位列第9号的研究院原档案馆馆长弗兰茨·席勒的审核记录。

被审核人 决定 9. 席勒, 弗兰茨·佩特洛维奇; 1898年生; 农民出身; 大学学历; 无党派人士; 社会主义工作室副主任。保留地方工会委员会主席; 一位苏维埃人士。不久前他被选为莫斯科苏维埃成员。早先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担任档案馆馆长, 之后转而从事科学工作。党委秘书: 一位苏维埃人士。可以保留。^[47]

按照这样的审核程序,在3月4日被审核的200名工作人员中,107人被直接解雇,87人被保留。在剩下的几人中,除了一名工作人员因年纪过大按退休处理之外^[48],其他人员去留待定,^[49]其中包括第195号提到的几名下等工作人员,他们主要是装订工人或运输工人。^[50]在3月5日的第二次审核会议中,共有44名工作人员被审核(其中包括作为第一次审核会议成员的马克西摩夫斯基)。^[51]结果是:调离19人,解雇1人,保留24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中,梁赞诺夫曾经的副手、马恩研究院原副院长恩斯特·崔贝尔也受到了审核。在审核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被审核人

决定 14. 崔贝尔, 恩斯特·伊奥西弗维奇; 1886年生; 商人之子; 匈牙利人; 大学学历; 1929年起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 1904—1919年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 德国工作室主任; 曾任马恩研究院副院长。保留比尔曼同志: 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期间,他是苏维埃政权驻国外的专员和代表。曾入狱两年。作为政治流亡者入境。长期以来不把自己视为共产党员,保持无党派人员的身份。之后于1929年被接收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为两年。一位有价值的科学工作人员。陀夫斯图卡: 与国外的一切联系都通过他来开展,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52]

3月20日举行了第三次审核会议,它可谓是整个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审核运动的尾声。在这次会议上,主要对前两次审核会议所作的个别决定进行了重新讨论与更正。^[53]例如,会议把先前对曹尔(Zauer)和拉比诺维奇(Rabinovič)两位同志的“调离”决定改为“保留”,把对爱依西高恩(Ejchgom)和特里斯卡洛娃(Treskalova)两位同志的“解雇”决定改为“再次聘用”。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不反对研究院院长在签订合同的基础上聘用一些被解雇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由他们所肇始的文献工作。”^[54]

由此,在梁赞诺夫离开马恩研究院一个月之后,他所一手组织、创立的科学的、高素质的工作团队亦全面瓦解^[55]。在250余名工作人员中,106人被解雇,17人被调离,研究院的组织、科研力量被彻底换血。可以说,从这一刻起,马恩研究院失去了梁赞诺夫的一切痕迹与色彩,“梁赞诺夫研究院”就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梁赞诺夫遭到政治罢黜,马恩研究院被全面肃清,这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震动,举世哗然。当年作为中间人游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而帮助梁赞诺夫获得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复制件的保尔·卡姆普夫迈耶尔在1931年的《社会主义月刊》发表了题为《马恩研究院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工作》一文。文章开门见山:“2月26日,社会民主派报纸的读者被这样的消息惊呆了:莫斯科马恩研究院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因为叛党而被开除俄罗斯共产党党籍。”^[56]回想起一年前刚刚举行的隆重而热烈的梁赞诺夫60岁寿辰全国性庆典,卡姆普夫迈耶尔也感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的荒唐与离奇:“梁赞诺夫一直被公认为最经得起考验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之一。共产党主席团在1930年2月他的60岁寿辰之际把他颂扬为‘几乎从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积极的斗士’,颂扬为‘为马克思列宁理论的纯洁性而战的斗士’,所谓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个庆典的日子里为他颁发了‘红旗奖章’。就在这个庆典过去整整一年之后的1931年2月,‘革命斗士’、‘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马恩研究院的孜孜不倦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却在《真理报》中像‘熏黑的油灯’一样被不屑地丢到了一边。”^[57]对于梁赞诺夫倒台后研究院工作人员的去向,卡姆普夫迈耶尔也给出了说明:“莫斯科研究院拥有庞大的科学人员机构。约230—240名工作人员在德语、法语、英语、斯拉夫语等部门以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专业领域工作。几乎在欧洲所有的首都,如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苏黎世,都有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在搜集关于工人运动理论和历史的科学资料。如今,根据可靠消息,除了20—30人之外,整个工作班子都会被解雇。”^[58]由此,卡姆普夫迈耶尔得出结论,马恩研究院的工作将出现路线性的改变,梁赞诺夫所开创的研究工作已经不可能在研究院继续得到推进。于是,他提出:“在梁赞诺夫罢职之后,没有什么再能够向我们保证马恩研究院会以客观科学的方式继续社会主义研究工作。这就使得我们肩负起大规模地扩展和深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研究工作的任务——现在确实是决定性的时刻了。”^[59]

卡姆普夫迈耶尔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梁赞诺夫事件的看法,也表明了此后国际社会与马恩研究院关系的走向。自1931年起,也就是在梁赞诺夫被罢黜、大量外籍专家遭解雇之后,马恩研究院不仅中断了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与协作,而且也彻底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没有人愿意再为失去了梁赞诺夫的马恩研究院提供帮助,更不用说参与协作了。在这种境地下,马恩研究院不得不单枪匹马、独立支撑起MEGA¹编辑出版工程。^[60]

第四节 梁赞诺夫之死

1931年4月18日，梁赞诺夫被遣送至萨拉托夫。按照苏联政治保安部的决议，他将在这里流放三年，并且长期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以1931年2月15日夜被捕之时为起点，梁赞诺夫要在萨拉托夫停留至1934年2月。然而，三年的流放期事实上被延长成了无限期流放，梁赞诺夫从此再也未能彻底返回莫斯科，而萨拉托夫这座伏尔加河畔的小城亦最终成为梁赞诺夫晚年的归宿之地。

在萨拉托夫，梁赞诺夫住在卡米申斯卡亚大街（Kamischinskaja uliza，即现在的拉霍夫大街Rachovstraße）85号，这是位于一栋二层小楼中的一所房子，里面有四个房间^[61]。在最初的几年里，妻子安娜与他相依相伴，相濡以沫。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政治劫难的冲击，梁赞诺夫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然而，更糟糕的是，陡然失去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繁杂工作，失去多年以来习惯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这种突如其来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令梁赞诺夫无所适从。正如他后来谈到的，“存放在我的马恩研究院办公室里的所有书籍和资料、所有的手稿、摘录和评注都被拿走了，至今没有归还。此外，我也失去了使用大量的书籍、小册子、文件、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可能，包括我在1907—1917年期间从劳拉和保尔·拉法格、倍倍尔、考茨基等人那里得到的、搜集的第一国际史资料——我后来把它们移交给了研究院。三年的时间里，我处于知识的饥渴状态；三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可能去研究国外的专业文献。至今我都未曾收到一卷由我所准备、修订和编辑，在1931—1933年期间以阿多拉茨基等人之名出版的俄文或德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62]。

在这种身体羸弱、精神饥渴的情况下，梁赞诺夫一方面重拾革命活动时期的斗争精神，努力调节身心，恢复健康；另一方面他积极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来充实自己的学术生活，倾注自己不竭的学术热情。1932年中期，在萨拉托夫流放一年多之后，梁赞诺夫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学术研究目标：他与国家社会经济文献出版社签订合同，译介出版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文集。从此，梁赞诺夫全身心地投入了李嘉图文集的翻译过程中，以弥补他失去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痛楚。然而，由于梁赞诺夫身份的特殊，作为其翻译成果的《李嘉图文集》在出版时并没有注明译者。于是，梁赞诺夫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卷《李嘉图文集》（1935年）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五卷《李嘉图文集》，都没有标注他的名字。^[63]1936年，梁赞诺夫再次卷入舆论的旋涡。这一年8月26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列什涅夫（I. Leshnev）的文章，声称国家社会经济文献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为“并非完全默默无闻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支付了高达11000卢布的报酬。^[64]面对这一指责，梁赞诺夫在1936年9月9日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答复道：他交给出版社100印张的译稿和6印张的评论，由此，第一版完整构想的《李嘉图文集》才能够在全世界出版。从发行的20000册书籍的盈利中就能够支付这一报酬，苏维埃国家根本不用为这个项目花一分钱。^[65]

1934年2月的最终到来并没有使梁赞诺夫的生活有所改变。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特别会议已然决定，将梁赞诺夫的流放期限再延长两年。3月5日，这一决议甚至做出如下修改：禁止梁赞诺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永久居住。我们可以想象梁赞诺夫对此决议的反应：“对于六十四岁的我来说，在当前的身体状况下，这个决议不啻为一纸死亡判决书。”^[66]1934年5月，安娜患病，梁赞诺夫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她送回了莫斯科，他本人因而得以在那场政治风暴过去三年之后重返莫斯科。在莫斯科，M. 加里宁（M. I. Kalinin）许诺帮助梁赞诺夫恢复党籍，重返研究院，但前提是他要写一份“认罪书”。梁赞诺夫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他再次被遣送回萨拉托夫。此后，除了1936年8月还返回一次莫斯科之外，梁赞诺夫再也未能离开萨拉托夫，因为他的流放已经成为无限期的了。

1934年被重新遣返回萨拉托夫之后，梁赞诺夫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他明白，自己可能要在这个小城生活很久。于是，他开始尝试寻找一份长期工作。当时，萨拉托夫大学刚刚成立历史系，梁赞诺夫便申请到该系工作，帮助充实图书馆，培训教职。梁赞诺夫的申请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于是，从1934年11月起，梁赞诺夫作为科学顾问任职于萨拉托夫大学历史系，之后又供职于校图书馆。^[67]他的渊博学识、科学组织才能终于又找到了施展之地。

安娜回到莫斯科后，她的侄女在1934年夏带着两个女儿迁到萨拉托夫，照顾梁赞诺夫的生活起居。于是，从梁赞诺夫的这两个侄孙女耶莲娜（Jelena Nikolajevna）和斯纳依达（Sinida Nikolajevna）这里，我们又了解到下面两件逸事。

1935年3月适逢梁赞诺夫的65岁生日。当时还是小学生的两个侄孙女决定送梁赞诺夫一份生日礼物。起初，她们想买一幅俄国名家所绘的骏马图，可是她们哪儿都没有找到这幅画。最后，她们买到了一幅斯大林的画像。她们把它带回家，向梁赞诺夫表示祝贺，并把这幅画像递给了梁赞诺夫。起初，梁赞诺夫略显错愕，之后就放声大笑，他的笑声是如此响亮，以至于整栋房子的人都可以听到。他表达了谢意。然后，他拿起画，把它放到了书架上。直到后来，梁赞诺夫的侄孙女才明白了梁赞诺夫大笑不止的原因。另一件事情发生在1934年12月2日吃早饭的时候，当时正在播放基洛夫（Kirov）被谋杀的消息。斯纳依达回忆道：“喇叭挂在餐厅里，在整点时会播音。我记得……我们大家一起坐着吃早餐。突然传来消息，基洛夫被谋杀了。梁赞诺夫马上起了变化。他站起来，开始紧张地在餐厅里走来走去。然后，他停在收音机旁，盯着收音机说：‘斯大林开始行动了’。”^[68]

的确，尽管被无限期流放到萨拉托夫，梁赞诺夫依然没能逃脱最终的政治宿命。1937年7月23日，梁赞诺夫再次被捕，罪名是积极参与了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坚贞不屈的梁赞诺夫一如既往，完全否定了这一“莫须有”的指控。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的审问记录：

问：请您描述一下您所知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右倾分子的反苏维埃非法组织。

答：我对这些组织的活动一无所知。除了同那些在1923年属于反对派的老党员有个人私交外，我没有任何社会联系。

问：您隐瞒了同托洛茨基主义地下组织和右倾地下组织存在的组织联系。在与这些组织成员的相处中，您以诽谤的方式谈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

答：我否认上述联系的存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进行过诽谤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谈话。^[69]

1938年1月19日，梁赞诺夫被起诉，起诉书声称梁赞诺夫是“反苏维埃的、右倾托洛茨基主义的、仇视党的组织的参与者之

一”。1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全封闭的审判。在审判记录中，我们看到了梁赞诺夫为自己所作的最后辩白：“被告声明，他一直在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他坚称没有寻找任何信奉这一主义的盟友，任何对之心怀同情的人，因此，他否认参加过右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萨拉托夫，他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因此，他坚决否认参加过反革命组织。”^[70]然而，梁赞诺夫所有的否认都是徒劳的。经过仅仅15分钟的庭审，军事委员会就对梁赞诺夫作出了最终判决结果：“按照苏联刑法第319和320条，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梁赞诺夫最高刑罚——枪决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终审判决，并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的决议基础上立即执行。”^[71]于是，1938年1月21日，时年67岁的梁赞诺夫被枪决，这位苏联马克思学的创始人、奠基人最终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这一天，正是列宁逝世14周年纪念日。

1938年4月13日，梁赞诺夫的个人财产被没收。前文提到的梁赞诺夫的两个侄孙女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十点整，门前驶来一辆载重汽车。几个人下了车，撕开了工作室的封条，把所有的家具都搬了出去——尤其是漂亮的椅子，并把它们都装到车上。然后，他们把许多书搬了出去。房间里有一个又大又圆的火炉……人们把上百本留有诸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和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以及其他等手迹的书籍、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许多卓越人士的书信、梁赞诺夫写字台里放着的所有手稿和文件以及他的相片都扔进了炉子里。其中还包括一张青年恩格斯的相片，这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写了献词后赠送给梁赞诺夫的。这张相片一直摆在梁赞诺夫的书桌上。于是，几小时后，大量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书籍和文件就被销毁了。火炉烧得如此之旺，以至于它最后从地板一直烤到了天花板。然后，工作室被贴上封条，汽车载着家具和梁赞诺夫的一部分图书扬长而去。”^[72]

在秘密枪决梁赞诺夫、查封其工作室、没收其全部财产之后，苏联当局把梁赞诺夫的消息彻底封锁起来。没有人知道梁赞诺夫在哪里，是生是死。就连他的妻子安娜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身在何方。^[73]国际社会对梁赞诺夫的下落和处境亦是毫不知情。在1954年出版的《维克多·阿德勒与倍倍尔、考茨基通信集》中，我们在一处关于梁赞诺夫的注释中就看到了这样的表述：“1930年，他（即梁赞诺夫——作者注）被罢黜院长之职，被流放到一个省，那里只有一所微不足道的市级图书馆。二战期间，他在那里辞世。”^[74]可以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社会对于梁赞诺夫的晚年境况也仅仅略晓一二，至于他何时离世，具体过程如何，则是一无所知。甚至在70年代，贝尔特·拉贝尔（Bernd Rabehl）在为柏林红书出版社译介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只适于初学者》（梁赞诺夫著）一书撰写的梁赞诺夫小传中，依然这样写道：“1931年……梁赞诺夫被捕，因为他在研究院雇佣了许多曾经的孟什维克党人担任翻译。他被流放，并且很可能在1935年或1936年去世。”^[75]拉贝尔的这篇小传可谓是国际学术界启动梁赞诺夫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即便在这样一篇开创性文章中，梁赞诺夫的晚年境遇依然影影绰绰、模糊难辨。事实上，在梁赞诺夫去世之后的整整半个世纪，他始终都是一个话语禁忌。苏联学界对此避而不谈、讳莫如深。即便是涉及马恩研究院、MEGA¹的发展史，人们通常也只是对梁赞诺夫一笔带过，不作任何深入说明。正因如此，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才会意味深长地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我记得这样一件小插曲。时任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部主任的艾里希·昆德尔（Erich Kundel）在纪念出版MEGA¹决议通过6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篇报刊文章（《新德意志》，1984年7月7—8日，第10页），这篇文章把梁赞诺夫的一幅肖像用作插图，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几名工作人员对此表达了惊讶或钦佩之情，因为那时梁赞诺夫的党籍还没有恢复。”^[76]当然，还有一处突出的例外，那就是我们在前文中多次提到的《伟大的遗产》一书。在这部由柏林狄茨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流传过程的著作中，破天荒地详细介绍了梁赞诺夫创立马恩研究院、领导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整个过程，其中出现了大量歌颂梁赞诺夫的科学热情与学术精神、赞扬他所领导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表述——尽管作者也没有忘记强调梁赞诺夫与孟什维克不清不白的联系。^[77]考虑到当时整个学术界对梁赞诺夫这一话题噤若寒蝉的大气候，我们不禁叹服该书作者的大胆直言和忠于学术的精神，而这部著作亦是我们研究梁赞诺夫与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资料。

1958年3月22日，在梁赞诺夫的妻子安娜不断地奔走呼号下，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梁赞诺夫的名誉。但是，这一决议并不意味着梁赞诺夫晚年所期许的“历史的审判”的真正完成。又过了三十一年，也就是在梁赞诺夫逝世半个世纪之后，1989年10月，苏联共产党监察委员会决定，撤销将梁赞诺夫开除出党的决议。1990年3月22日，在梁赞诺夫恢复名誉整整32年之后，他被再次宣布为苏联院士。^[78]

第五节 梁赞诺夫领导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历史贡献

MEGA¹时期是梁赞诺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不懈的努力，梁赞诺夫领导马恩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开创出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本。在实现自己多年夙愿的同时，梁赞诺夫亦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梁赞诺夫是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卓越组织者与领导者。

纵观MEGA¹编辑出版工程，我们发现，梁赞诺夫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它的绝大部分历程。可以说，正是由于梁赞诺夫杰出的领导才华和出色的组织能力，MEGA¹这一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才得以协调、有序地运转起来，并结出丰硕成果。

首先，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一举创建了莫斯科马恩研究院。正是以马恩研究院为基地，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得以顺利开展。如前所述，马恩研究院在成立初期完全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缺乏办公场所，缺乏科学工作人员，缺乏文献收藏。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依托着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梁赞诺夫领导马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仅仅十年之后，马恩研究院已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马克思学中心。可以说，没有梁赞诺夫，就没有作为俄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科研中心之一的马恩研究院，更没有MEGA¹的辉煌成就。因此，创立马恩研究院是梁赞诺夫的首要功绩，这也是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实施基础。

其次，为了加强研究院的科研实力，更为了满足未来MEGA¹工程的需要，梁赞诺夫采取种种办法延揽人才。例如，大胆

起用无党派甚至曾经属于孟什维克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大力吸收国外的学术英才、专家学者，招聘、培养苏维埃俄国自己的后备人才、研究力量。于是，一方面，研究院云集了一大批学界精英，其中包括曾经属于孟什维克的政治经济学家鲁宾、来自匈牙利的恩斯特·崔贝尔，生于俄国受教于德国的保尔·韦勒，以及乔治·卢卡奇，等等。另一方面，研究院自己培养的新生力量也稳步成长，并逐渐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研究院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辨识专家妮娜·伊里尼切那·尼波姆尼亚施查娅了。她就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研究院的招聘广告，之后通过面试进入研究院的。在弗兰茨·席勒的帮助下，她逐渐成长为马恩研究院优秀的手稿辨识员。^[79]可以说，正是在梁赞诺夫的全面组织与领导下，研究院的科学技术工作人员发展至近250名。他们精通各种不同的欧洲语言，从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从而成为马恩研究院的中坚力量。

最后，梁赞诺夫运用自己的学术联系、人际关系，积极开展与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相关的各项工作。正是在梁赞诺夫的努力下，研究院在成立初期接连购买了几座知名图书馆，从而获得大量珍贵文献，研究院的馆藏得到了有力扩充。同时，通过自己亲自选定的、分布于欧洲各地的科学通讯员，梁赞诺夫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信息与线索，进而为研究院搜集、收购到大批珍贵资料。另外，凭借自己的广泛人际联系，梁赞诺夫在历经种种挫折之后，最终成功敲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大门，从而获得了实施MEGA¹编辑出版工程最重要的文献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梁赞诺夫还与许多学术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等开展各种合作活动，交流、共享文献资料，其中就包括与研究院合作密切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

可以说，正是以马恩研究院为基地，以科学研究人员为中坚，以搜集到的珍贵文献为基础，以各种学术联系为依托，梁赞诺夫领导马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严谨、认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编辑出版工作，MEGA¹编辑出版工程才最终得以切实实施。作为这项史无前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工程的领袖和灵魂人物，梁赞诺夫可谓是身兼数职：马恩研究院的奠基人、研究院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规划者、研究院科学技术人员的精神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者与收购者、科学联系与学术合作的发起人与组织者、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辨识者与研究者、MEGA¹的编者与出版者，等等。所有这些角色集于梁赞诺夫一身且相得益彰，足以说明梁赞诺夫卓越的组织与领导能力。

第二，梁赞诺夫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搜集工作，在成功地保存与收藏马克思恩格斯的珍贵文献资料的同时，亦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众所周知，在前MEGA¹时期，梁赞诺夫就开始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工作。他从1909年起就着手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报刊发表的文章。他曾多次前往德拉维伊的拉法格夫妇家中搜集、整理马克思的文献遗产，并且多次前往大英博物馆查阅、核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当然，在前MEGA¹时期，梁赞诺夫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完全是零散的个人行为，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学术热情与爱好。而在十月革命之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所进行的文献搜集活动则发展成为了国家性的收集购买工程。这项工程之所以最终能够圆满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梁赞诺夫锲而不舍的精神与执著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19世纪20年代初，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当梁赞诺夫作为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机构的代表前往柏林商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事宜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回应。后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尤其在曾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故交路易莎与卡姆普夫迈耶尔的帮助下，梁赞诺夫才最终获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权。这可谓是梁赞诺夫在德国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梁赞诺夫攻克的第二道难关是伯恩施坦。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获得伯恩施坦所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著作权和出版权；其次，获得伯恩施坦所保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件。就第一点而言，通过布劳恩的中介作用，梁赞诺夫最终得到了伯恩施坦放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权的声明，从而能够通过马恩文库出版公司合法地出版MEGA¹各卷册。就第二点而言，通过梁赞诺夫所作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这一报告，我们可以看出，梁赞诺夫在与伯恩施坦就文献遗产的交接事宜进行交涉时可谓是斗智斗勇。在这其中，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状况的熟稔发挥了重大作用。

由此，通过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谈判、与伯恩施坦的周旋，梁赞诺夫成功地获得了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从而为他所领导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奠定了最为根本的文献基础。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发现，梁赞诺夫进行的这一文献搜集工程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此。通过考察收藏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颠沛流离的历史命运，我们就会认识到，梁赞诺夫此前全面开展的宏大而又细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工作，实质上是提前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拯救行动。正是由于这批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统一收藏于苏维埃俄国，才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离失所、佚失散落的命运。同时，由于那些原本保存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颠沛流离中受到损伤，以至于梁赞诺夫早前对之所做的复制件倒成为了更为重要的“原稿”，所以，苏俄方面珍藏的许多原稿以及复制件都具有了独一无二的价值。时至今日，除了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约2/3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之外，其余约1/3的珍贵文献都收藏在俄国，而这正是梁赞诺夫当年领导MEGA¹编辑出版工程所取得的文献搜集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梁赞诺夫所开展的MEGA¹文献资料的搜集活动本身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拯救行动。正是由于他当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才有可能通过以这些文献为基础的MEGA²编辑出版工程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貌。

第三，梁赞诺夫开创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的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梁赞诺夫组织、领导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最大成就，莫过于这项工程的最终成果——MEGA¹各卷册了。尽管梁赞诺夫没能持续地领导这套版本的编辑出版工作，但是他所开创的这一版本形式却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学、马克思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梁赞诺夫开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史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而且是第一部以历史、考证为基本原则的原文版本。

如前所述，早在马克思在世时，海耳曼·贝克尔就建议马克思出版他的文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计划中的《马克思文集》最终只出版了一册。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也有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打算，但是由于忙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一计划也搁浅了。此后，尽管梅林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倍倍尔与伯恩斯坦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梁赞诺夫本人也在前MEGA¹时期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但是这些著作文集所收录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某一小部分，根本谈不上系统与全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赞诺夫所开创的MEGA¹可谓是世界上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它不仅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章，还收录了他们的手稿、书信以及摘录笔记等。因此，就全面性、系统性而言，它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史上是开创先河的。更值得一提的是，MEGA¹还是以历史、考证为原则的原文版本，也就是说，它不仅按照写作时所用的语言文字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而且还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科学的考证原则来进行文本的辨识、编排与出版工作。梁赞诺夫此前进行的全面的文献搜集工作作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MEGA¹的科学性以及对其文本的忠实才得到了有力的保证。相比之下，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版本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点。

其次，梁赞诺夫在开创MEGA¹这一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版本形式的同时，亦开创了旨在科学地研究马克思的生平、事业、著作、思想等的马克思学。

众所周知，在组织MEGA¹各卷册的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梁赞诺夫采取的是科学的、学术的文本研究、文献分析的方法。这里，手稿的辨识、文献的研究、不同版本的考察都是极其重要的环节。由此，通过科学的组织、领导MEGA¹各卷册的编辑出版工作，梁赞诺夫亦把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发展了起来，即通过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文本分析来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著作的“马克思学”。正如崔贝尔指出的，“作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大量研究的作者，作为广泛传播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科普小传的作者，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百上千篇不为人知的、被遗忘的或遗留下手稿的文章的发现者和出版者，作为伟大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国际版（学术版）全集（Gesamtausgabe）的编者，作为马恩研究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三种致力于马克思学的科学杂志的编辑，作为数量不断增长的专家研究者的领袖，梁赞诺夫指明了马克思学的对象、道路和方法。同时，他创造了系统地、有计划地扩展马克思学的组织前提”^[80]。今天，按照梁赞诺夫所开创的“马克思学”研究方法来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趋势。

最后，梁赞诺夫所开创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对当代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方兴未艾的MEGA²编辑出版工程正是以MEGA¹为历史源头的。

客观地讲，MEGA²是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它与MEGA¹是两项没有直接关联的、各自独立的编辑出版工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把MEGA¹与MEGA²截然分割开来。因为，MEGA²与MEGA¹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一方面，MEGA²是MEGA¹这种版本形式的继续，它沿袭了后者的完整性、原语言、历史考证原则等基本要素。另一方面，MEGA²也继承了MEGA¹的根本编辑原则，如科学性、客观性、忠实于原文，等等。另外，MEGA¹的编辑出版实践也为MEGA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当然，毋庸置疑，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编辑出版形式，MEGA²也有许多新的内容与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梁赞诺夫开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的编辑形式，如今风头正劲的MEGA²才有了真正的源头活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梁赞诺夫既是MEGA¹之父，又是MEGA²之宗。

总的来说，正是由于梁赞诺夫在组织、领导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取得的伟大成就，MEGA¹的这一时期（1921—1931）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梁赞诺夫时代”。没有人比梁赞诺夫与MEGA¹的关系更密切、渊源更深远。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一繁荣上升的时代未能延续太久。在梁赞诺夫被罢免职务、开除出党之后，MEGA¹的梁赞诺夫时代便彻底终结。于是，在经历了一段由阿多拉茨基主持的短暂的后梁赞诺夫时代后，MEGA¹便全面夭折了。

[1] David Rja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 1.1, S. X X VII.

[2] *Ibid.*, S. X IV.

[3] *Ibid.*, S. X VIII.

[4] Wilhelm Dittmann an Maximilian Rubel, 26. März 1952, SPD-Archiv Bonn. 转引自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Band VI/VII, 1966/1967, S. 72.

[5] Akte Parteiarchiv, IISG. 转引自 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72.

[6] An die Marx-Engels-Archiv-Verlags-Gesellschaft, Briefentwurf mit der Jahreszahl 1929, Akte Parteiarchiv, IISG. 转引自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73-74.

[7] 关于整个事件的经过，参见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72-75.

[8]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 89.

[9] “Referat Rjazanovs Über die Aufgaben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 117-118.

[10]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Jg. 4, Wien u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30. 见封底。

[11] “Referat Rjazanovs Über die Aufgaben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 123.

[12] David Rjazanow, “Rede auf dem XI. Parteitag”, *David Rjazanow - Marx-Engels-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67.

[13] David Rjasanow, “Meine Aussage”,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158.

[14] 在1931年被罢黜马恩研究院院长之职、开除党籍之后，梁赞诺夫便日益成为某种禁忌。1938年被枪决之后，梁赞诺夫的名字更是被打入历史的冷宫，无人问津。参见本章第四节。

[15]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 S. 83.

[16] Rjasanov an K. Kautsky, nach dem 19. Jan. 1914, IISG, Kautsky-Nachlass D XI X 254. 转引自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12.

[17]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 S. 84.

[18] 同上。

[19] 鲁宾原是俄国革命前的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孟什维克党员。梁赞诺夫使他免遭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逮捕，并且帮助他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担任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工作室主任。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sanov”,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1993, S. 5。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正是梁赞诺夫拯救的这位政治经济学家鲁宾，后来成为梁赞诺夫政治悲剧的导火索。他直接指控梁赞诺夫与孟什维克有牵连，从而导致梁赞诺夫入狱、罢职、开除出党和流放他乡。具体内容参见下文。

[20] Roy Medwedew, *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 -Stalin und Stalinismus* , Band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92, S. 90-91. 也可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sanov”,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1993, S.7。

[21] Gustav Mayer, *Erinnerung . Vom Journalisten zum Historike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 Zürich und Wien: Europa Verlag, 1949, S. 355.

[22] Roy Medwedew, *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 -Stalin und Stalinismus* , Band 1, S. 90.

[23]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29.

[24] David Rjasanow, “An die Redaktion der Prawda”,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193.

[25] Ibid..

[26] David Rjasanow, “An die Redaktion der Prawda”,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194.

[27] 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sanov”,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1993, S. 10。

[28] David Rjasanow, “Meine Aussage”,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157-174. 梁赞诺夫这篇供述的开头是“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篇“供述”寄出去。

[2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大林对2月12日晚与梁赞诺夫的会面做了精心的准备。在斯大林办公室的访客登记簿中记载着如下细节：“17点10分摩洛哥托夫、卡加诺维奇和波斯托耶夫抵达，40分钟后政治保安部的头目R.P. 孟金斯基抵达。他们商讨了他们的策略。18点25分孟金斯基离开了办公室。18点50分梁赞诺夫到达。”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ie ‘Säuberung’-□bernahme des Rjasanov-Instituts durch Adoratskij”,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3,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1, S. 16。

[30] David Rjasanow, “Meine Aussage”,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157-158.

[31] Victor Serge, *Erinnerungen eines Revolutionärs 1901-1940*, Hamburg, 1977, S. 282.

[32] David Rjasanow, “Meine Aussage”,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159-160.

[33] 参见Roy Medwedew, *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 -Stalin und Stalinismus* , Band 1, S. 292-297。

[34] Roy Medwedew, *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 -Stalin und Stalinismus* , Band 1, S. 293-294.

[35] Ibid., S. 295.

[36] Roy Medwedew, *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 -Stalin und Stalinismus* , Band 1, S. 296.

[37] David Rjasanow, “Meine Aussage”,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164-165.

[38] David Rjasanow, “An das Präsidium der Zentralen Kontrollkommission”,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S. 194-195.

[39] Ibid.,S. 195, Anm. 1.

[40] 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ie ‘Säuberung’-□bernahme des Rjasanov-Instituts durch Adoratskij”,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3, S. 17. 梁赞诺夫的这些被查抄的资料后来构成了苏联共产党档案馆梁赞诺夫收藏的主要部分。遗憾的是，1941年这部分收藏中的一些文件被销毁。

[41] Jakov Rokitjanskij, “Die ‘Säuberung’-□bernahme des Rjasanov-Instituts durch Adoratskij”,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3, S. 18.

[42] Ibid..

[43] 由于马克西摩夫斯基在第一次会议中想尽量多保留一些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以方便研究院日后的工作，因而得罪了委员会中其他力图对研究院进行全面清洗的人。于是，他被剥夺了次日即3月5日出席第二次会议的权利。正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中，他也受到了委员会的审核。根据现存的会议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在对马克西摩夫斯基进行审核时，党委书记科茨洛夫发言说：“他是个有些奇怪的人。当有关研究院工作转变的主题在办公室里被通过，人们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声称：我将在党委大会中谈我的看法。不过，我对许多内容完全不赞成。”昂加洛夫发言说，他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党派间的。陀夫斯图卡发言说，他的表现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定，马克西摩夫斯基的审核结论是调离，其实也就是被研究院解雇。参见1931年3月5日的马恩研究院工作人员审核记录第13号（*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3, S. 89.）。

[44] 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ie ‘Säuberung’-□bernahme des Rjazanov-Instituts durch Adoratskij”,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19-20.

[45] Reinhard Müller, “‘Das Große Reinemachen’ 1931—Die ‘Säuberung’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im Moskauer Tagebuch Hugo Huppert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363.

[46] 这一天的会议记录共包括200条审核记录，每一条对应一名工作人员。不过，第195号有些不同。它对应的不是一名工作人员，而是几名下等雇员，他们主要是装订工人或运输工人。在该条中，这些工人被一并讨论。因此，3月4日的审核会议虽然有200条审核记录，但审核的人数其实超过了200人。此处为与审核记录对应，按200人计算。

[47] “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4.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30.

[48] 这名工作人员即位列审核记录第95号的德米特里耶娃（Dmitrieva）。她1859年出生，大学学历，无党派人士。在研究院担任国外书目编辑；研究院成立前在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工作；社会出身不明。工会委员会主席马克西摩夫斯基说，一年前就存在着她退职的问题。她其实已经退休，只不过仍在研究院工作。参见“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4.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55-56.

[49] 即审核记录第30、66、137、166号和第195号，参见“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4.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36, 47, 67, 72-73, 77.

[50] “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4.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27-78.

[51] 参见“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5.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79-99.

[52] “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5.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89.

[53] *Ibid.*, S.100-101.

[54] “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20.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101.

[55] 值得说明的是，历时一个月的大清洗虽然使梁赞诺夫一手组织创立的研究院工作团队遭受重创，但它并没有彻底摧毁这一团队。毕竟，还有一百多名科学工作人员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像恩斯特·崔贝尔、弗兰茨·席勒以及保尔·韦勒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继续为研究院所聘用，充分保证了梁赞诺夫所开创的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继续进行。就这点而言，研究院的新任院长阿多拉茨基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正是他使许多杰出的科学工作者得以保留。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ie ‘Säuberung’-□bernahme des Rjazanov-Instituts durch Adoratskij”,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20-21.

[56] Paul Kampffmey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und die Arbeit sozialistischer Forschung”,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Jg. 37, Band 73, 1931 I, S. 335.

[57] Paul Kampffmey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und die Arbeit sozialistischer Forschung”,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Jg. 37, Band 73, 1931 I, S. 335.

[58] *Ibid.*, S. 337.

[59] *Ibid.*

[60] 关于后梁赞诺夫时代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继续与终结可参见本书第四章。

[61] 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 12.

[62] Zentrales Archiv des KGB der UdSSR, Nr. OF 14408, Bl. 93-108. 转引自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2.

[63] 1935年，《李嘉图文集》第2卷出版，并未提及译者，只是附了罗森伯格的一篇前言。1941年这套文集的前两卷出版，仍然没有提及译者，只是在扉页中谈到，译文是在M.斯密特的编辑之下完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5年和1961年出版了这套文集的最后三卷。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2.

[64] 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2.

[65] *Ibid.*, S.12-13.

[66] *Ibid.*, S. 13.

[67] 同上。

[68]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o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Engels-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32.

[69] Zentrales Archiv des KGB der UdSSR, Nr. OF 14408, Bl. 17-18. 转引自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4.

[70] 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4-15.

[71] Zentrales Archiv des KGB der UdSSR, Nr. OF 14408, Bl. 199. 转引自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5.

[72] 转引自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o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Engels-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S. 33.

[73] 梁赞诺夫去世后，他的妻子安娜也被判处八年劳动营监禁。1943年4月30日安娜被释放，她重新返回萨拉托夫。可是在这里，她再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1957年7月6日她在写给胡塞耶夫（N. S. Hruščev）的信中谈道：“在萨拉托夫内务部门，有人就我的询问告诉我，我的丈夫被判处十年不能写信。他活着，并且很健康。当十六年过去他依然杳无音信的时候，我被告知，他的‘居留地不详’。”参见Zentrales Archiv des KGB der UdSSR, Nr. OF 14408, Bl. 202. 转引自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5.

[74] Victor Adler, *Briefwechsel mit August Bebel und Karl Kautsky*, Wien: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54, S. 525.

[75] Bernd Rabehl, “Über den Marxisten und Marxismusforscher Rjazanov”, *Marx und Engels nicht nur für Anhänger*, Berlin: Rotbuch Verlag, 1973, S. 190.

[76] Rolf Hecker, “Hans Stein-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und Korrespondent des Moskauer Marx-Engels-Instituts (1925-1929)”,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 17, Anm. 1.

[77] 参见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80-90。

[78] 参见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S. 15-16。

[79]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S. 98.

[80] Ernst Czóbel, “Rjazanov als Marxforscher (Zum 60. Geburtstag D. Rjazanov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Wien u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30, S. 403.

第四章 MEGA¹ 在后梁赞诺夫时代的短暂继续与最终夭折

1931年年初，梁赞诺夫的政治悲剧以及接踵而至的马恩研究院的“大清洗”给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短短两个月内，马恩研究院先失去其卓越领袖、灵魂人物梁赞诺夫，再失去百余位具有丰富MEGA¹ 卷次整理、编辑和出版经验的科学工作人员。由此，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遭受重创，迅速衰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1931年经历了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但MEGA¹ 并没有就此而彻底终结。在梁赞诺夫的继任者、新任院长阿多拉茨基的领导下，MEGA¹ 维系了一个短暂的后梁赞诺夫时代。

第一节 1931年年初MEGA¹ 的编辑现状及前景

1931年4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议，合并列宁研究院和马恩研究院。由此而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列研究院”）隶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院长为阿多拉茨基。10月10日，政治局确立了马恩列研究院的任务和使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是党的最高科学机构，它具有如下任务：1.科学地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已发表或者未发表的著作，出版他们的战友的著作；2.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生平、影响及其学说，并为这些研究提供支持；3.搜集、研究和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党历史的文献，科学地拟订党史、党建问题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问题；4.搜集、研究和科学地出版关于共产国际历史的文献。”^[1]在新成立的马恩列研究院中，原来的马恩研究院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部（Marx-Engels-Sektor，以下简称“马恩部”），梁赞诺夫曾经确立的工作室设置被取消，相关研究人员被重新划分为以下的工作小组：（1）MEGA小组；（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小组；（3）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小组；（4）《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小组；（5）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小组。^[2]显然，按照新的机构划分，MEGA¹ 的编辑任务就落在了马恩部的MEGA小组身上。于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在新院长的带领下，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重整旗鼓，继续前进。

当时，对于新上任的领导班子特别是阿多拉茨基来说，要想重新开始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重新展开各卷次的具体工作，就必须对梁赞诺夫留下来的MEGA¹ 工作摊子进行全面了解与重新定位。同时，考虑到研究院工作人员的巨大变动，也要在科学工作人员的组织安排上进行一定的调配或整合。于是，在政治风波稍稍平息的1931年3月8日，受阿多拉茨基的委托，逃过政治清洗一劫的恩斯特·崔贝尔就MEGA¹ 各卷次的编辑现状与前景拟就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珍贵文献成为了我们今天全面把握梁赞诺夫离职之前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所达到的进展程度的重要依据，同时它也极为隐晦地反映出了当时紧张的时局和马恩研究院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

具体来说，崔贝尔的这份报告分为十点：第一、二点介绍了MEGA¹ 的概况，即基本划分与已出版卷次情况，第三至第八点介绍了待编辑、待出版的卷次情况，第九点是对出版前景的预期，第十点则是一些补充说明。

一 关于MEGA¹ 的概况

崔贝尔简要说明了MEGA¹ 各部分的划分，即第Ⅰ部分：除《资本论》以外的所有著作，共17卷；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所有准备材料，共13卷；第Ⅲ部分：书信，共10卷；第Ⅳ部分：索引，共2卷。另外，崔贝尔也介绍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卷次，即第Ⅰ部分第1卷上、下册（收录至1844年年初的马克思著作）和第2卷（收录至1844年年初的恩格斯著作），第Ⅲ部分第1—3卷（收录1844—1867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共计五卷六册。^[3]

这些内容自然是关于MEGA¹ 的一般常识，因此也成为这份报告的导引部分。重头戏则是接下来的内容。

二 关于待编辑和待出版卷次的情况

首先，崔贝尔指出，第Ⅱ部分即“《资本论》部分”和第Ⅳ部分“索引部分”的各卷次的出版准备工作还没有开始进行。就“《资本论》部分”来说，马克思的大多数经济学笔记，包括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都已经辨析完毕，但尚未审校。《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卷手稿以及恩格斯的少量经济学手稿——它们显然是《资本论》第三卷的副产品——还没有辨识。马克思所做的包含《资本论》原材料和引文汇编的摘录笔记，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辨识。而第Ⅳ部分“索引部分”的工作则根本没有开始进行。^[4]

其次，待出版的卷次有五卷，分别是第Ⅰ部分第3卷（《神圣家族》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几篇小文章）、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卷（《哲学的贫困》以及1846年6月至1848年3月的所有文章）以及第Ⅲ部分第4卷（1868—1883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这些卷次基本上都已完成，也就是说，正文部分全部或者大部分已排版、校对，资料部分基本完成，有些部分已经排版。^[5]

具体来说，（1）弗兰茨·席勒负责的第Ⅲ部分第4卷：该卷进展得最好。正文已经全部校对，只需做个别的修正，而这可以由德国的出版社完成。索引已经排版。把二校、三校和最终校稿的时间考虑在内，这一卷最晚可在1931年6月1日前出版。当然，要在5月1日之前把前言或者导言寄到出版社。（2）卡尔·施米克勒（Karl Schmückle）主持的第Ⅰ部分第3卷^[6]：就该卷正文来说，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著作以及遗留下来的手稿都已排版、校对；马克思做的摘录笔记约有90%准备付印，20%已排版；资料作为手稿写在了索引卡片上，约完成了75%；导言还没有完成。崔贝尔特别指出，这一卷的结构是由梁赞诺夫在1月份确定的，但或许应当对之再加以斟酌甚至修改。（3）保尔·韦勒负责的第Ⅰ部分第4卷：该卷的正文已经排版，但还未审校，仍需进行一到两次校对；资料完成了很大部分，但还不是成熟的出版形式；导言也未完成。（4）同样由保尔·韦勒负责的第Ⅰ部分第5卷：该卷正文已经排版完毕，早在1月就已寄到出版社以便校对；资料尚未完成，但是在索引卡片上已经准备了相当部分；导言未写。崔贝尔对这一卷特别给出了两点说明：一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关于脚注的确切情况暂时未能提供；二是梁赞诺夫曾在1月突然决定，把已经寄给出版社校对的那部分文稿作为第一分册出版，之后又决定，在第二分册中补充一些第4卷的内容。崔贝尔认为，这个决定应该彻底地重新考虑一下。（5）崔贝尔负责的第Ⅰ部分第6卷：该卷正文全部排版，还差两次校对，然后还要审核和修订；资料部分还未完成，80%的内容已准备在索引卡片上；关于这一时期摘录的报告准备了约30%；导言未写。^[7]

最后，崔贝尔指出，还有个别卷次的正文已经基本完成，并且部分内容得到了批判性的审阅。它们是崔贝尔领导的德国工作室负责的第Ⅰ部分第9卷（收录1850—185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福克斯（Fox）领导的英国工作室负责的第Ⅰ部分第10卷（收录1852—1854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8]

三 关于待出版各卷的出版前景

首先，崔贝尔指出，最有把握尽快出版的是第Ⅲ部分第4卷。如果导言能够按时完成，该卷能够在1931年5月出版。席勒一人就可以完成扫尾工作，不用加派帮手。其次，就其他各卷即第Ⅰ部分第3、4、5、6卷来说，即便它们在结构上不做任何改动，仍需做大量工作。崔贝尔提出了两种人员组织模式：（1）如果现有的所有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某一卷的编辑工作，那么在1931年7月前总会完成一卷，最晚也不过是9月。这完全依赖于编辑哪一卷次，它的结构是否有改动。（2）如果现有的工作人员各自负责不同的卷次，那么势必需要更长的时间。当然，崔贝尔指出，如果压缩资料内容，争取到有能力的编辑、技术人员，那么出版的速度仍会加快。^[9]

四 几点补充性的说明

在这份报告的第十点也是最后一点中，崔贝尔做了一些补充说明。一方面，他指出，MEGA¹ 工作的正常进行有赖于一些客观的、现实的条件，例如能否获得可以取代已离开人员的优良的国外打字员，柏林的出版机构能否良好地运作，这一版本能否获得好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组织。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还有一系列未提及名字的工作人员曾经从事过这些在编卷次的工作，但他们现在或者已经不在研究院，或者不再进行相应卷次的工作了。^[10]这一切自然是研究院所遭受的“大清洗”导致的。

与关于MEGA¹ 各卷次的编辑情况和前景的报告几乎同期，崔贝尔又在一份题为《关于MEGA待出版卷次及其出版日期》的文献中就尽快出版已经准备好的各卷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首先，崔贝尔指出，就有望在1931年6月1日前出版的第Ⅲ部分第4卷（席勒负责）来说，还存在一个小障碍，即该卷的名目索引。崔贝尔认为，如果因为没有完成名目索引而推迟出版日期，不啻为犯罪。于是，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重新编写一个名目索引，其中只包含最重要的概念以及关于这些概念的表述。这样一份索引将有五六页篇幅，十天之内就能编出；二是以已经排版的人名和文献索引为基础，由那些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熟稔的同志在十天之内添加补充性的概念及其在文中的出处。在这种情况下，名目索引将包含很多不太重要的概念，它们可能只对一小部分读者有吸引力，但它却不会缺失重要的表述。崔贝尔建议，针对名目索引作出一个决议。就他个人而言，他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其次，第Ⅰ部分第3、5、6卷能够在1931年秋出版。崔贝尔建议，在率先完成第Ⅲ部分第4卷后，席勒可以转而参与第Ⅰ部分第3卷或第5卷的出版工作。同时，他指出，有必要作出决议，第5卷应当按照最初的计划只收录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无须分为两个分册。另外，崔贝尔提出，第5、6卷的资料部分应当以简化的形式出版。再次，第Ⅰ部分第10卷的正文和资料的大部分已经完成，预计可以在1932年春出版。最后，第Ⅰ部分第4卷早已处于出版制作中，但是进展不大。目前并没有专人进行该卷的工作。如果韦勒在完成第5卷后同胡波特和骚尔共同进行这一卷的出版准备工作，那么该卷有望在1932年春（4月至6月）出版。^[11]

可以说，崔贝尔的这两份报告是我们今天全面了解1931年处于转折时期的MEGA¹ 的状况与前景的重要资料，它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问题的重要线索。

第一，梁赞诺夫编辑的MEGA¹ 卷次的范围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众所周知，我们通常以1931年2月梁赞诺夫离职为限，把梁赞诺夫本人所主编的MEGA¹ 卷次限定为此前出版的那五卷六册，即第Ⅰ部分第1卷（包括上、下册）、第2卷和第Ⅲ部分第1—3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梁赞诺夫在上述几卷出版的同时及之后，一直到离职之前还在积极准备接下来的相应卷次的出版。正如他在1930年年底研究院的一次集会上谈到的，“明年我们要准备第9卷和第10卷，出版第4、5、6、7卷和第3卷。我们扩大了卷册的数目，第3卷被分成了第3卷和第4卷。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作为第5卷出版，第7、8卷构成从前的第5、6卷”^[12]。显然在此时，这些待出版的卷次已经在梁赞诺夫的主持下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状态，可以很快付印出版了。而崔贝尔在关于MEGA¹ 现状与前景的报告（梁赞诺夫离职后仅一个月）中再次重复了这些将要出版的卷次——第Ⅰ部分第3—6卷和第Ⅲ部分第4卷，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卷次其实仍是梁赞诺夫领导研究院工作人员所取得的编辑成果。尽管它们后来又经过了新的修改和变动，并以阿多拉茨基之名出版，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基础是由梁赞诺夫奠定的，梁赞诺夫是它们真正原初的编者。这也是后来梁赞诺夫对阿多拉茨基“窃取”其工作果实极其愤怒的原因所在。因此，当我们谈到后梁赞诺夫时代阿多拉茨基所主编的MEGA¹ 第Ⅰ部分第3—7卷、第Ⅲ部分第4卷以及关于恩格斯的特别卷时，一定要明确真正属于阿多拉茨基的份额到底有多大。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卷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烙上了阿多拉茨基的印迹，这尤其体现在第Ⅰ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编排上。

第二，崔贝尔的报告也反映了梁赞诺夫领导下的MEGA¹ 主要编辑人员内部存在的编辑原则和编辑理念的分歧。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关于《形态》的编排问题上。按照MEGA¹ 原初的计划，《形态》将作为第Ⅰ部分第5卷出版（梁赞诺夫在上文引入的1930年年底的研究院集会讲话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正如崔贝尔在关于MEGA¹ 现状与前景的报告中指出的，梁赞诺夫在1931年1月“突然”决定，把《形态》分两册出版，并且要在第2分册中加入第4卷的几个文本。对于梁赞诺夫的这一做法，崔贝尔显然是完全不赞同的。因此，他建议研究院的新领导重新考虑梁赞诺夫曾经作出的这一决定。在同时期的《关于MEGA待出版卷次及其出版日期》中，他再次建议，第5卷只收录整部《形态》，不包含其他文本，不分册出版。当然，《形态》只是体现崔贝尔与梁赞诺夫的编辑理念分歧的一个小方面。在关于MEGA¹ 的现状与前景的报告中，崔贝尔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他与梁赞诺夫及其他编辑人员的分歧与复杂关系。在第七点中，当谈到与出版社和国外通讯员的联系时，崔贝尔指出，关于MEGA及相关研究的书信联系都是由他本人进行的，但是不包括第Ⅰ部分第3、4、5卷和第Ⅲ部分第4卷。自1930年9月起，这些卷次的书信联系活动都是由这几卷的编者自己进行的，主要是通过施米克勒。对这种例外情况存在的原因，崔贝尔并没有避讳，他谈道：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梁赞诺夫和他本人在一系列编辑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同施米克勒、席勒、韦勒等人的“不正常的”（矛盾的个人）关系。^[13] 不可否认的是，MEGA¹ 是一项宏大的编辑工程，其编辑团队中的各个人不可能是整齐划一、完全一致的，他们必然会对不同的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对MEGA¹ 的编组出版与其说是一件坏事，倒不如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考虑到各种不同的观点、想法，才能编辑出更为全面、完善的版本。但崔贝尔在这里如此明确地强调他与梁赞诺夫、施米克勒等人的分歧与不和，未必仅仅是出于编辑理念和原则的差异。这或许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毕竟，梁赞诺夫刚刚被免职、开除出党，而研究院的许多工作人员亦因与梁赞诺夫的联系而被辞退的辞退、调离的调离。就施米克勒来说，他的妻子安妮就在“大清洗”中遭到解雇^[14]，而他本人也因为“完全支持梁赞诺夫”而被调离^[15]。因此，明确地同梁赞诺夫及与其过从甚密者划清界限、脱离关系或许也是崔贝尔求得

自保的一种策略。另外，他提到某些工作人员曾经参与个别卷次的编辑工作、如今已然离开，因此研究院急需优秀的编辑、技术人员等情况，都从侧面反映了研究院所遭受的政治清洗。因此，他的这两份报告其实也是当时紧张与危险的政治环境的间接体现。

第三，从崔贝尔的这两份报告可以看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尽快出版MEGA¹各卷次成为研究院的首要目标。因此，在以出版为第一原则的情况下，各卷次的资料部分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崔贝尔一再强调，如果因为资料部分而耽误出版，不啻为犯罪。因此，他多次提出了简化资料的想法或建议，例如，应当简化第I部分第5、6卷的资料；适当压缩资料部分，以减少编辑和出版时间；第III部分第4卷的名目索引可以简化，等等。事实上，崔贝尔在同期也写了一份关于MEGA资料部分的专门报告^[16]。其中多处提出了压缩资料部分的建议，例如只列出被引用杂志和文章的目录，标出它们在文中出现的页码，而对于引文、标题等不给予说明，不作考证性的注释；对于无关紧要的人名不必花费力气去确定其生平材料；导论要短小精悍，等等。可以说，科学资料是MEGA¹各卷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MEGA¹之为历史考证版本的重要表征具有非常重大的文献学意义。然而，为了加快出版速度，崔贝尔一再建议牺牲资料部分的内容和质量，这必然会影响到作为历史考证版本的MEGA¹各卷次的科学性。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手稿状况及新的MEGA¹总体方案

如果说，在上述的几份文献中崔贝尔针对MEGA¹的总现状与前景向新任院长进行了全面而综合的介绍，那么在1931年4月17日撰写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手稿》的报告中，则对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中尚未出版甚至尚未正式启动的II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部分的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门汇报。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MEGA¹工程中关于《资本论》部分准备情况的最早说明。

如前所述，梁赞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复制了大量的《资本论》手稿，这成为莫斯科方面所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MEGA¹第I部分第1卷在1927年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待《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的问世。然后，直至1931年，这部分内容始终没有动静，悄无声息。于是，人们不免好奇，研究院在这方面的工作到底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在近几内看到来自第II部分的卷次。崔贝尔的这份报告恰恰为我们揭开了当时《资本论》部分工作进展的神秘面纱。

在这份报告中，崔贝尔主要介绍了研究院所拥有的《资本论》手稿的构成、内容以及工作人员对之进行的辨识、整理情况。他把这些手稿分为了五部分：（1）1857—1859年的“准备材料”，10本或11本笔记；（2）1861—1863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3本笔记；（3）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第二、第三册时的文稿或试稿；（4）恩格斯就《资本论》第二、第三册所写的文稿、笔记和增补；（5）摘录笔记。

一 1857—1859年的“准备材料”（10本或11本笔记）

由于恩格斯从未提到过这部分材料，因此，崔贝尔对之作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部分准备材料包括1857—1859年马克思写的10本笔记，另外还有一本厚厚的引文笔记。因此，如果不包括引文笔记，那么这部分材料就是10本笔记；如果包括它，就是11本笔记。

具体来说，10本笔记的基本情况如表4-1所示^[17]：

表4-1 1857—1859年10本笔记的基本情况

笔记本序号	笔记本名称	篇幅	内容
1	笔记本 II	44 页	货币章
2	笔记本 B I	21 页	货币的美的属性
3	笔记本 B II 和 B I I / II	52 页	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引文笔记目录；“我自 笔记本的提要”（这个笔记其实是由两个保 完整的笔记构成的）

续表

笔记本序号	笔记本名称	篇幅	内容
4	笔记本 M	38 页	由两个笔记组成，其中有由考茨基出版的 治经济学批判》的长篇“导言”；论生产； 个笔记本的索引”
5	笔记本 II	28 页	货币章
6	笔记本 III	45 页	资本章
7	笔记本 IV	53 页	资本章
8	笔记本 V	33 页	资本章
9	笔记本 VI	59 页	资本章
10	笔记本 VII	59 页	资本章

崔贝尔指出，这些笔记主要涉及《资本论》第一册的主题，它们可谓是《资本论》第一册的第一稿。马克思正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在1858—1859年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另外，根据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书信可以推测，这些手稿的个别部分可能也涉及《资本论》第二、第三册的内容。这10本笔记再加上引文笔记共计约1000印刷页，将构成两部MEGA卷册。就目前的工作进展来说，除了笔记本VII之外，所有的笔记都已经辨识，并且有了打字机稿。考证性的修订工作只做了一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8]

二 1861—1863年的23本笔记

由于恩格斯对这23本笔记做过详细的说明，因此，崔贝尔只是简单地勾勒了一下它们的内容^[19]：

笔记本 I—V 和 XI X—X X III：恩格斯所谓的《资本论》第一册的最早文稿。考茨基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利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笔记本 VI—X V：恩格斯计划作为《资本论》第四册的“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在出版该部分的过程中作了删改、补充。

笔记本 X VI—X VIII：阐述《资本论》第三册中问题的第一稿；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册时充分利用了它。此外，考茨基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出版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这23本笔记共计约1500页，都已辨识完毕并且有了打字机稿。它们将构成五部MEGA卷册。关于《资本论》第一册、第三册的这两个稿本同最终出版版的关系仍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工作人员已经对“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同考茨基版《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对照。结果是，考茨基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对手稿的最后几个笔记做了很多删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考茨基的版本还缺了笔记本VII和笔记本IX的很多内容。这些删节的内容总共约为200印刷页。崔贝尔指出，研究这部分手稿对俄文版或英文版的《剩余价值理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版本显然不能完全照搬考茨基的版本。且不说考茨基删除、补充了很多内容，他还对很多地方进行了调整、变换了位置。^[20]

三 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二和三册写的文稿或试稿

这些手稿包括：（1）第一册的一份相当精细的手稿，约有70对开页，恩格斯没有提过它。（2）1866—1878年写下的关于《资本论》第二册的8份手稿，恩格斯正是以这些手稿为基础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他在该卷序言中曾详细介绍了这些手稿的情况^[21]。崔贝尔具体说明了这些笔记的篇幅以及恩格斯的采用情况：笔记本1（1865—1867年）：150页，未采用；笔记本2（1870年）：202

页，部分被采用；笔记本3（可能还是在1875年）：第1—12、5—12、28—78页，未采用；笔记本4（1875年）：58页，部分被采用；笔记本5（1877年3月）：60页，采用；笔记本6（1877年10月至1878年7月）：17页，采用；笔记本6a：（1847年10月26日）：1—5b，未采用；笔记本7（某年7月）^[22]：1—7页，采用；笔记本8（时间不详）：70页。^[23]（3）第三册的手稿，主要是包含575页的主手稿，还有“用方程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那一本笔记本，另外还有几个短篇手稿。恩格斯对这些内容进行过详细的说明。^[24]

崔贝尔指出，这些手稿还没有辨识，对它们的认识几乎都停留在恩格斯的论述基础上。因此，还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考察。就《资本论》第三册的手稿来说，它将构成两部MEGA¹卷册。

四 恩格斯就第二册、第三册所写的文稿、笔记和增补

这部分资料包括：（1）恩格斯编辑整理的《资本论》第二册付印稿。这份稿子主要是由恩格斯当时的秘书艾森加滕抄录的。崔贝尔指出，对于这部分文稿来说，辨识工作可能并不需要，只需要把它同最终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对照就可以了。这一对照工作还没有开始进行。（2）恩格斯拟就的大量笔记、表格和文稿，它们可能是专门为《资本论》第三册而写并且在其中得到采用甚至部分刊印的。这部分手稿也尚未辨识。^[25]

五 经济学的摘录笔记

这部分摘录笔记约有150本。其中的大部分是在50年代写的，一小部分是在1872年后写的。几乎都没有辨识。崔贝尔指出，在粗略浏览之后，除了关于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的笔记^[26]之外，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并不显眼。当然，这并不能否认这些论述的存在，因为恩格斯曾在第三卷序言中谈到，他利用了马克思摘录笔记中零星的简短评注。^[27]归根结底，一切要等到辨识工作完成后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给出说明。^[28]

在基本介绍完《资本论》相关手稿的基本情况，崔贝尔最后提出：当务之急就是至少聘请一名经济学家来负责这部分的工作，他可以在此后数月对以下问题给出说明：（1）这些资料中的哪些内容可以单独发表在杂志或者文库中？（2）俄文版的《剩余价值理论》该如何编排？（3）MEGA¹第II部分即经济学部分的计划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4）哪些手稿应当以怎样的时间顺序来辨识和修订？^[29]

通过崔贝尔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MEGA¹第II部分的总体工作进展还是比较有限的。除了1857—1858年的大部分手稿以及1861—1863年的23本笔记，其余的手稿以及摘录笔记都没有得到辨识。即使是辨识过的手稿，也都没有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比较，因此，对它们的认识依然停留在相当粗浅的层面上。另外，从崔贝尔在这份报告结尾的建议中不难发现，缺乏高素质、有能力的专业科学工作人员仍然是束缚MEGA¹工作的严重桎梏，这也是第II部分工作进展不大的原因所在。

总的来看，在研究院经历了重大变动之后，崔贝尔所提交的几份关于MEGA¹编辑现状与前景的报告以及关于MEGA¹第II部分的专门报告，成为新成立的马恩列研究院新任领导班子拟订新时期MEGA¹工作方案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在对崔贝尔的报告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后，研究院决定，在1931年出版准备得最为充分的第III部分第4卷^[30]，并在1932年出版第I部分第7、8、10卷作准备。^[31]1931年4月，马恩列研究院批准了新的MEGA¹总体方案，其中具体规定了各部分各卷次的内容^[32]：

第I部分：除《资本论》之外的所有著作和文章

第1卷：第一分册：马克思的著作，至1844年

第二分册：补遗，文献，至1844年

第2卷：恩格斯的著作，至1844年

第3卷：《神圣家族》和马克思的著作，至1845年年初

第4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其他文章，1845—1846年

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6卷：著作和文章，1846年5月至1848年3月

第7卷：《新莱茵报》等，1848年

第8卷：《新莱茵报》等，1849年

第9卷：1849年9月至1851年12月（《新莱茵报评论》等），不包括《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第10卷：著作和文章，1851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至1853年年初（不包括《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其他通讯）

第11卷：1852—1854年（《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12卷：1854—1856年（《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普特南氏月刊》）

第13卷：1856—1857年（《纽约每日论坛报》，《自由新闻》）

第14卷：1857—1858年（《纽约每日论坛报》，《自由新闻》）

第15卷：1859—1860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波河与莱茵河》，《萨伏伊、尼斯和莱茵》，《人民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16卷：1860—1864年（《福格特先生》，《新闻报》，《军事总汇报》，《纽约每日论坛报》等）

第17卷：1864—1873年（第一国际）

第18卷：《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

第19卷：1873—188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20卷：1883—1890年（恩格斯）

第21卷：1890—1895年（恩格斯）

第II部分：《资本论》和所有准备材料

第1卷：《资本论》第1卷a

第2卷：《资本论》第1卷b

第3卷：《资本论》第2卷

第4卷：《资本论》第3卷a

第5卷：《资本论》第3卷b

第6卷：小系列（即1857—1858年手稿——作者注）

第7—11卷：大系列（即1861—1863年手稿——作者注）

第12卷：马克思《资本论》第2册的手稿

第13卷：马克思《资本论》第3册的手稿

第III部分：书信

第1—4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

第5—10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给他人的书信

第IV部分：索引

第1—2卷：（人名、文献和名目索引）

总的来说，1931年的MEGA新方案基本保持了梁赞诺夫制定的MEGA原始方案的框架和风貌，它依然采用著作、《资本论》、书信和索引的四部分结构。同时，就第II、III、IV部分来说，新方案在卷次数和相应内容上也沿袭了原初的方案，没有加以改动。就第I部分来说，前7卷的内容设定同梁赞诺夫离任前的设想基本一致。变化或调整主要表现在第8卷之后。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曾经计划的包含1850—1852年著作的第9卷扩展为两卷，成为新方案中的第9、10卷，于是，崔贝尔建议尽快出版的第10卷（1852—1854年的英文文章）被顺延为第11卷；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在1873年以后的著述内容进行了扩充，从原初的2卷增加为4卷。由此，再加上梁赞诺夫在1930年的决定——把第3卷分成两卷（即新方案中的第3、4卷，分别收录《神圣家族》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新方案的第I部分就由曾经的17卷变成21卷，整个MEGA¹卷册变成了46卷。值得一提的是，新的方案接受了崔贝尔提出的有关第I部分第5卷的建议，即在该卷中只收录“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并且不分册出版。

由此，在经过1931年年初的政治风浪后，在新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开始按照新的出版方案全面开展MEGA¹的各项工作。

第三节 1931—1935年MEGA¹卷次的出版情况

按照1931年4月MEGA¹新的出版方案，马恩列研究院展开了具体的MEGA¹编辑出版工作，其重点正是崔贝尔提到的那几卷已经准备得比较完善的卷次。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几卷陆续出版，它们也成为后梁赞诺夫时代MEGA¹的仅有硕果。具体说来，从1931年至1935年，马恩列研究院共出版了7部MEGA¹卷册，它们分别是第III部分第4卷、第I部分第3、4、5、6、7卷，另外还有一部采取MEGA版式但未标记MEGA卷次的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特别卷。

一 1931年——第三部分第4卷的出版

1931年下半年，后梁赞诺夫时代的第一部MEGA¹卷册——MEGA¹第三部分第4卷出版，界分为阿多拉茨基。^[33]该卷收录了1868—188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481封信通信，它标志着MEGA¹第三部分的第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完成。阿多拉茨基在导言中谈到，这些书信以1870年为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即1868年至1870年秋。在此期间，恩格斯和马克思还没有住在同一座城市，因此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非常频繁。两人在这不足三年的时间里的通信占据了该卷2/3的篇幅（326封信）。第二部分即1870年秋至1883年。1870年9月底，恩格斯搬到伦敦。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只有偶然的旅行造成的地域分隔才会使他们的书信往来提供时机。于是，从1870年至1883年，两人之间的通信数量急剧下降，仅有一百余封，具体到每年的通信数量仅为几封至十几封。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例外，那就是1882年。这一年，马克思由于妻子去世的打击以及糟糕的身体状况辗转于不同的疗养地。于是，他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数量在此期间又有了明显上升。^[34]

同梁赞诺夫主编的第三部分第1—3卷一样，阿多拉茨基主编的第4卷依然承袭了作为倍倍尔与伯恩斯坦的《通信集》之校勘卷的理念。首先，从书信数量上看，第4卷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比《通信集》在同时间段收录的书信多了47封。它们分别是：马克思致恩格斯（23封）：1868年2月15日，1868年6月29日，1868年9月25日，1868年12月5日，1868年12月6日，1869年1月23日，1869年2月15日，1869年5月1日，1869年8月17日，1869年12月12日，1870年2月21日，1870年3月16日，1870年8月21日，1873年9月9日，1877年3月7日，1879年8月4日，1879年8月14日，1879年8月27日，1879年9月3日，1879年9月9日，1879年9月11日，1879年9月14日，1882年8月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18封）：1868年8月14日，1868年8月22日，1868年8月28日，1868年9月25日，1868年10月28日，1868年11月4日，1868年11月25日，1869年5月10日，1871年8月18日，1871年8月23日，1876年年底，1877年8月25日，1878年9月19日，1879年9月11日，1879年10月8日，1880年9月13日，1882年11月3日，1882年11月29日；马克思夫人致恩格斯（5封）：1870年1月17日，1870年7月12日，1870年8月10日，1870年8月18日，1870年9月13日；爱琳娜致恩格斯（1封）：1870年8月12日。除了个别书信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政治斗争的观点之外，绝大多数通信——如阿多拉茨基所说——主要具有传记学意义。^[35]其次，第4卷依然采用脚注的方式标出了伯恩斯坦在《通信集》中删节的内容的起止行。阿多拉茨基指出，比较多的删节涉及恩格斯为了一些《资本论》第一卷的文学和经济上的双赢而采取的小策略。其余的删节主要涉及“对第三者表示反感的评论”，特别是有关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评论。在这里，阿多拉茨基强调，不仅关于李卜克内西的一些粗暴表述遭到删除，而且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策略和原则上非常重要的批评李卜克内西的民主幻想的表述也被删除了，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使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在创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36]

由于第4卷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系列的完成，因此，与前3卷在结尾只给出人名索引不同，在这一卷中，结尾编排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前4卷中引用的著作文章、报纸杂志等内容的索引，同时还给出了范围同样涵盖前4卷的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值得强调的是，所有这些索引做得并不全面充分，只是一般性的概括说明。例如，在有关引用文章的索引中，只涉及一小部分经常被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报刊文献，并不包含前4卷中所有被引用的文章；人名索引也只给出了生卒年月、身份等一般性的说明。在涉及那些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中起过作用的人时，会给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谈到他们的具体位置，但也不是全部列出，而只是给出最重要的地方。这种简单化、明显带有仓促完成痕迹的处理方式，显然归咎于当时紧迫的出版时限的要求。正如前文提到的，在崔贝尔看来，如果因为索引而延迟出版第三部分第4卷，不啻为犯罪。因此，为了保证该卷能够在1931年及时出版，它的资料部分的内容——即各种索引——不得不受到比较严重的削弱。^[37]

总的来说，第4卷的编排、架构其实完全承袭了梁赞诺夫既有的工作成果。正如阿多拉茨基指出的，书目索引和其他索引基本上是由以前的编辑人员完成的，文本的构建也是由梁赞诺夫之前的助手、躲过“大清洗”的弗兰茨·席勒完成的^[38]，再加上文本的排版方式依然是针对《通信集》的，因此，这一卷其实可以看作梁赞诺夫精神的全面继续，只不过主编的名字换成了阿多拉茨基。

二 1932年——第 I 部分第3、4、5、6卷的出版

1932年，马恩列研究院一鼓作气，接连出版了四部MEGA¹卷册，它们分别是第 I 部分第3、4、5卷和第6卷。^[39]由于第3卷和第5卷首次原文出版了马克思的两部非常重要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它们的问世对学界以及后世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在下文中我们着重介绍这两卷次。

MEGA¹第 I /3卷主要收录了1844年年初至1845年年初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笔记。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已出版的著作以及手稿，包括发表在《前进报》的两篇文章——《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和《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以及马克思发表于《社会镜》的《珀歌论自杀》；第二部分为1844年年初至1845年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所做的摘录笔记，包括对勒瓦瑟尔（R. Levasseur）的《回忆录》的摘录以及专门的经济学研究摘录。就后者来说，第3卷依次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经济学著作的摘录：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德斯杜特·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以及布阿吉贝尔的三部著作——《法国详情》、《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和《论自然、文化、商业和万物之利益》。另外，在该卷的附录中还收录了卢格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1844年手稿》的“序言”完整版（包括手稿中所作的删改）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40]。

毋庸置疑，第3卷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首次完整出版的《1844年手稿》以及马克思在此期间所做的经济学摘录笔记，它们分别收录在该卷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正如阿多拉茨基在导言中指出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证实，‘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本卷中的资料展现了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部分带有片面性质的论述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货币等的文章——我们概括为‘*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里首次全文出版，另外还有对国民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著作的广泛摘录——我们有选择地出版了一部分，它们由于与上述文章的直接联系而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那些文章的先在阶段，它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马克思工作方式的典型范例”^[41]。可以看出，阿多拉茨基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手稿同摘录笔记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他自然赞成把手稿同摘录笔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而第3卷对这两者的同时收录也方便了这种研究。然而，问题在于，阿多拉茨基于习惯性思维把摘录笔记看做是手稿的先在阶段，因而得出，先做笔记再写文章是马克思典型的工作方式，这一结论不得不免武断。事实上，关于《1844年手稿》与马克思的巴黎摘录笔记的写作次序，特别是具体到穆勒摘要与手稿的写作次序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研究的热点。尽管在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穆勒摘要被编排在了手稿之前，但是通过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的细致考证^[42]，学界已经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穆勒摘要是在第一手稿乃至第三手稿之后才写成的。^[43]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按照我们通常以为的先摘录后写作的方式写下《1844年手稿》与摘录笔记的。毋宁说，在这里，手稿与摘录笔记的写作是交叉进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32年马恩列研究院在MEGA¹第 I /3卷中完整收录《1844年手稿》的同时，朗兹胡特·迈尔也在其编辑的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集中以“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为题收录了1844年手稿。这份手稿实际上是以MEGA¹中被编为Ⅱ、Ⅲ、Ⅳ卷的手稿所构成的，只不过它的顺序是Ⅲ—Ⅱ—Ⅳ。相较之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MEGA¹的版本更为优良，因此，除了法文一版外，之后关于《1844年手稿》的各个版本都是以MEGA¹版为基础的。^[44]可以说，正是MEGA¹第 I /3卷把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及同期的经济学笔记引介给了世人，从而引起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巨大震动。^[46]由此，《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占据了重要席位，它成为研究青年马克思的重要文本依据。所有这些都不得不说是MEGA¹的一大历史功绩。

MEGA¹第 I /5卷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卷，它首次全文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手稿。正如阿多拉茨基谈到的，“在完成86年之后，这部被我们命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按照原稿首次全文出版”。阿多拉茨基特别强调了这份手稿的重要性：“这份手稿……具有最高的理论、历史和实践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作为正在形成中的共产党的领袖、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捍卫者而出现。除了那些论战性的表述外，他们阐发了自己对一系列科学领域（认识论、逻辑学、历史学、艺术、语言学）的正面看法；在他们的其他早期著作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被如此多样地、创造性地阐释。令人遗憾地没有完成的、最终没有写就的手稿一、费尔巴哈’包含着他们对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历史—哲学观的初步系统观。所有这些都赋予本书以卓越的意义”^[47]。

就第5卷的具体内容来说，它包括正文、附录以及科学资料三大部分。正文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关于手稿的具体编排，阿多拉茨基指出：在依据原稿对个别手稿以及整部手稿进行付印的过程中，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7月出版失败之前所计划的形式来再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具体说来，这部著作应该分两卷出版。就第一卷来说，它由以下部分构成：（1）马克思的“序言”；（2）整部著作组合起来的一部分——“、费尔巴哈”手稿；（3）题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一小份手稿；（4）“二、圣布鲁诺”；（5）“三、圣麦克斯”；（6）“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这6部分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其中的第（3）—（6）部分为寄给魏德迈准备付印的内容。第二卷同样由部分构成，但是只保留下来4部分，分别是：（1）导论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2）“一、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3）“四、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4）“五、‘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48]

MEGA¹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编排方式也被后来的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采用。因此，基于俄文二版的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排方式与MEGA¹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正文，MEGA¹第 I /5卷还在附录中收录了马克思在1845年所做的几页笔记、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原理》所做的3页摘录以及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撰写并由马克思修改的《圣布鲁诺对〈神圣家族〉的作者》。具体到马克思的笔记，它们包括“马克思论他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市民社会和共产主义革命”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等。其中，所谓的“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收录的是著名的“费尔巴哈提纲”。^[49]科学资料 部分包括对马克思1844—1847年所做笔记的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页码编号图表（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页码以及编者补充的页码）、手稿的编辑准则、“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情况说明以及所有10份手稿的异文情况。另外，在出处说明和文献目录中，科学资料部分收录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引文在内容上存在偏差的原文内容，并给出文中的偏差位置。至于引文与原文完全一致的地方，则不予说明。最后是人名索引与名目索引。需要说明的是，人名索引也只是概括性地列出，不包括那些顺便提到的名字，也不包括神话人物。^[50]

长期以来，MEGA¹第 I /5卷深受学界诟病，成为众多学者批判的对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所采取的编排方式，或者具体地说，对“费尔巴哈章”所采取的拆分、合并、位置变换、调整的处理方式。正如阿多拉茨基在“一、费尔巴哈”开头的编者说明中指出的，“我们按照手稿中所包含的马克思的说明对个别部分的位置做出了调整”^[51]。在科学资料部分的“编辑准则”中，我们看到了阿多拉茨基这样的解释：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中或者对个别短融入或长的段落画了分隔线，或者把它们置于括号内，或者把它们标示为脚注，因此，实际的编辑方式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表现的类型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要把那些通过分隔线标注出来的部分融入手稿的组成部分中，之后，再根据批注及编者说明改变其形式。^[52]于是，“费尔巴哈章”中各个细碎的段落——不管它们在手稿中是用分隔线隔开，还是被置于括号内——或者通过位移或者通过插入等形式同其他段落结合起来，浑然一体。我们根本看不出其原初的样貌。由此，MEGA¹第 I /5卷所展现的“费尔巴哈章”就完全全成为了编者自身构建的产物，它根本不能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遗留下来的手稿的原貌。MEGA¹所追求的“忠实于原文”的根本原则被彻底摒弃。正因如此，英格·陶伯特才说，“编者通过对流传下来的手稿状况进行大规模的介入而构建出了一部费尔巴哈章，也就是说，他们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没有对此给出足够的证明”^[53]。如今，MEGA²第 I /5卷的编辑人员正在全力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出版工作，它将按照历史考证版本所遵循的“忠实于原文”的科学要求全面展现手稿的原始面貌。^[54]

MEGA¹第 I /4卷收录的是恩格斯在1844年8月至1846年6月期间所写的文章，它可谓是梁赞诺夫主编的第 I /2卷（收录至1844年的恩格斯的著作与文章）的直接继续。它们共同展现了青年恩格斯独立的发展道路。该卷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第二部分收录了恩格斯的一些短篇报刊文章以及在1845年夏所做的十几页摘录笔记。就短篇报刊文章来说，主要包括《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大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在爱北亚特王的演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英国的一次罢工》、《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在伦敦举行的各民族人民庆祝大会》、《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王室”之间的不和。——维克同德国资产阶级的争执。——对巴黎木工的判决》、《德国状况》、《普鲁士宪法的破坏》和《普鲁士银行问题》。阿多拉茨基指出，该卷所汇集的文章“对于研究恩格斯理论思想的发展来说是极具启发性的资料……它们具有极高的科学意义，这一评价尤其适用于青年恩格斯最伟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55]

MEGA¹第 I /6卷收录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至1848年3月所写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德国的现状》^[56]、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另外，该卷还收录了马克思在1845—1847年所做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

三 1935年——MEGA¹ 第 I 部分第7卷和关于恩格斯的特别卷的出版

自1932年大规模出版MEGA¹卷次之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MEGA¹的出版工作陷入了停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形势的恶化。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德国开始了法西斯专政，于是，MEGA¹迅速失去了在柏林的出版阵地。正如《伟大的遗产》所描述的，1933年2月，马恩列研究院工作人员加布里勒·哈尼施（Gabriele Haensch）前往德国。她的随行皮箱里装着修改好的MEGA¹校样。然而，她到达的那天，恰好爆发了国会纵火案。她再也不能见到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公司的代表了。在柏林短暂停留之后，她去了布拉格，之后从那里返回莫斯科。^[57]于是，从1933年起，MEGA¹的出版阵地不得不

转回苏联国内，它开始由国外工人出版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出版发行。1935年，MEGA¹ 出版了最后两部卷册，分别是第Ⅰ部分第7卷和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特别卷。后者虽然采用了MEGA的版式，却没有MEGA卷次编号。

第Ⅰ/7卷主要收录了1848年6月1日至12月3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正如该卷导言指出的，“1848年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活动阵地转移到德国，在这里一直活动到德国革命失败——马克思至1849年6月初，恩格斯至1849年7月中旬。他们在这—时期的著述由那些几乎全部发表在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的文章和论文所构成”^[38]。与1931年4月的MEGA总体方案一致，马恩列研究院计划分两卷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这些文章。第Ⅰ部分第7卷收录截至1848年年底的文章，第8卷收录1849年的文章。遗憾的是，第8卷并未能够出版^[39]，MEGA¹ 的正式卷册也就最终止于第Ⅰ部分第7卷了。

第7卷共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212篇文章。其中，1848年6月有44篇，7月有41篇，8月有26篇，9月有27篇，10月有14篇，11月有43篇，12月有17篇。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些文章中，有9篇是存疑文章，另有15篇文章即便从文风和内容上看不出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写的，但也可以确定是他们所编写的，这些文章被收录到了注释中。可以看出，在本卷的编排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搜集、选择、甄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导言指出：“在挑选文章时，我们自然要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即在正文中只收录那些确定无疑地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章。除了几篇编辑声明和呼吁书之外，没有一篇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署了名的。尽管如此，他们作为所收录文章之作者的身份能够以充分的把握而且首先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表述而得到确定。”^[60]于是，导言的第二部分着重说明了编者确定各篇文章的作者身份时所依据的理由或证明。大致说来，这些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61]：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说明，主要以他们的书信为准。例如，恩格斯在1885年5月15日致施留特尔的信表明，1848年6月底至7月初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几篇文章，除了6月29日发表的题为《六月革命》的那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以外，其余的都是恩格斯写的。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批注或说明。例如《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这一系列文章就是通过恩格斯藏书中恩格斯所作的一条批注证明了恩格斯的作者身份的。第三，相关的文献材料。例如，1848年7月5日的《逮捕》一文是通过《新莱茵报》1849年2月14日的报道确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者身份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遗产中保留的马克思的一小片草稿而确认马克思的作者身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一文由于引用了1845年夏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所摘录的戴韦南特经济表而确定了马克思的作者身份，等等。第四，文章内容的密切联系。例如，发表于1848年8月27日的《〈科隆日报〉论意大利》一文的开头是这样的：“昨天，我们注定要倾听柏林的文学家威廉·约丹先生从世界历史观点出发对政治论的高谈阔论。命运无情地追随着我们，今天，同样的遭遇又落到我们头上。”^[62]就在此前，恩格斯曾写了一篇批判威廉·约丹讲话的文章，因此可以推断，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人。所以，《〈科隆日报〉论意大利》的作者就是恩格斯。另外，导言也指出，在1848年6月至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有“* 科隆”的标记；在“德国”专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开头会标上“* 科隆”；在“法国”和“意大利”专栏中，他们的文章开头不给出地点，只用“*”标记。因此，在甄别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过程中，这些标记也会得到充分考虑。于是，借助以上的甄别依据和标示符号，就可以确定大量的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章，这就“为研究和利用进一步的内容上和文风上的关系创造了基础”。^[63]

总之，正是通过细致的辨别、分析、考证和研究工作，马恩列研究院的编辑人员在MEGA¹ 第Ⅰ/7卷中为我们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参加工人运动、从事政治活动的总体风貌。同时，这里所收录的文章对于研究他们在该时期的思想发展历程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第Ⅰ/7卷以外，马恩列研究院在1935年还出版了一部收录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特别卷。之所以出版这部计划外的卷册，是因为这一年适逢恩格斯逝世40周年。^[64]于是，在这部特别卷的导言中，我们看到了编者对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伟大友谊、对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和伟大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

导言指出，恩格斯的生平与活动同马克思的生平与活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就与马克思的关系来说，恩格斯总是强调，在他与马克思共同的政治工作和科学工作中，马克思扮演着“第一提琴手”的角色，而自己只扮演“第二提琴手”的角色。他的这种谦逊而又诚实的态度非常令人敬仰。不过，尽管恩格斯把自己摆在“第二提琴手”的位置，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一位思想深刻的研究者，一位在一系列科学领域中作出开拓的创新者，一位卓越的论辩家，一位无产阶级事业的伟大无畏战士”^[65]。导言指出，尽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无疑占据首席地位，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根本就不可能写作《资本论》：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忠诚帮助，马克思就不可能应对窘困生活的压力；如果没有恩格斯，就没有人能够按照马克思留下的指示承担起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册手稿以及新版《资本论》第一卷的重任。^[66]且不说，恩格斯还写了一系列的书评来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来说，不论是《反杜林论》还是《自然辩证法》，不论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表明恩格斯是“最伟大、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67]另外，恩格斯在语言学、战争学方面的造诣也令人称道。正如导言指出的，“除了完全精通的几门语言（英语、法语）——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之外，恩格斯懂的语言可能不少于20门。他研究它们的语法，并且，他对它们是如此熟练，以至于他可以用这些语言来读他所感兴趣的书籍”^[68]。恩格斯还是战争学的专家。在私密的圈子中，他和大家昵称为“将军”。1848—1849年，他在《新莱茵报》发表了大量关于战事的分析和评价文章。所有在50—70年代发生的战争他都在自己的文章和通讯中做了研究与分析。他还写了一系列关于武器发展史和战争史的文章。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战争学家，而且是一位代表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科学和文化的首领级政党首位战争理论家”^[69]可以说，同梁赞诺夫时代出版的其他MEGA卷次不同，关于恩格斯的这部特别卷的导言不同寻常地长。其中，对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就占了较大篇幅，这不能不说是^[70]对恩格斯的最好纪念。

就该卷的内容来说，它依次收录了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三版、流传下来的《反杜林论》手稿、“自然辩证法”手稿以及“自然辩证法”的笔记。最后，该卷还收录了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类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在导言中，编者特别指出，在迁居伦敦后，从1873年至1876年，恩格斯一直在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大量笔记。但是从1876年6月起，出于理论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开始写作《反杜林论》。在完成了《反杜林论》后，他又再次返回到“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中。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最终并没有完成，他只留下了手稿片断。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编排《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手稿？是按照时间顺序还是按照逻辑顺序？结果是，该卷并没有采取时间顺序，而是采用了先《反杜林论》后“自然辩证法”的编排方式。理由是：第一，《反杜林论》不仅是恩格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重要著作，而且也是他毕生的代表作之一，恩格斯在其中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杜林论》是世界知名的现代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因此，应该把这部著作置于首位。第二，“自然辩证法”的笔记一部分写于《反杜林论》之前，一部分写于《反杜林论》之后。因此，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这些材料，就会割裂笔记。另外还需考虑的是，只有一小部分笔记的产生时间能够精确地确定。因此，任何按照时间顺序把笔记分裂开来的做法都会具有武断性。第三，如果把《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置于《反杜林论》之前也是学究气的表现。尽管这些准备材料对于了解恩格斯的工作方式、了解《反杜林论》的产生过程是很重要的，但是与《反杜林论》本身相比，它们只具有次要的意义。^[71]

另外，在该卷的导言中，编者还特别介绍了《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与“自然辩证法”相关的论文、“自然辩证法”的笔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手稿的辨识以及其他未收录的相关材料等情况。在通常情形下，这些内容本应出现在卷尾的科学资料中。因此，与后梁赞诺夫时代其他卷次的十余页简短导言不同，该卷的导言长达近40页。

总的来说，从1931年至1935年，莫斯科的马恩列研究院正式出版了七卷MEGA¹ 卷次。这也是后梁赞诺夫时代MEGA¹ 的全部成果。与梁赞诺夫时代相比，这些卷次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导言大幅缩水。如果说，在梁赞诺夫时代MEGA¹ 各卷次的导言动辄40余页甚至达到70余页^[72]，那么在阿多拉茨基主编的卷次中，导言通常都仅为十余页（除了上文谈到的关于恩格斯的特别卷）。显然，这种压缩主要来自出版时间的压力。但是，也不排除主编阿多拉茨基的影响。正如崔贝尔所说的，在准备第Ⅲ部分第4卷时，阿多拉茨基就认为，该卷根本不需要导言，简短的编者说明就足够了。^[72]因此，在准备其他MEGA卷次时，阿多拉茨基可能也认为导言的内容无须太多，篇幅不宜过长。第二，意识形态性明显增强。就在1931年马恩研究院遭遇大清洗之后，新的负责人保尔·费德洛维奇^[73]对马恩研究院各工作室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它们没有科学工作的确定计划，它们只是致力于马克思研究，在那里它们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任何问题，没有一个工作室拥有一本列宁写的或者关于列宁的书籍。”^[73]事实上，这一批判也是梁赞诺夫本人所遭遇到的。因为在他的MEGA¹ 编辑出版工作中，特别是他写的各卷次导言都未曾提及列宁或列宁主义，而是单纯地就马克思恩格斯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显然，阿多拉茨基力图在这一点上向苏联中央靠拢。他所撰写的每一卷MEGA¹ 导言都会提及列宁或引用列宁的名言、思想，甚至还会引用斯大林的话^[74]，这就使得MEGA¹ 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大大加强。第三，全面消除梁赞诺夫的影响。众所周知，1931—1935年阿多拉茨基主编的绝大部分MEGA¹ 卷次是梁赞诺夫在任时就准备得比较完善的，但是在梁赞诺夫遭受政治劫难、马恩研究院也因此而遭到清洗之后，阿多拉茨基必须要肃清后续的MEGA¹ 卷次中梁赞诺夫的影响。因此，在这些卷次的导言中，梁赞诺夫前期的准备工作、他的历史功绩只字未提，甚至是梁赞诺夫早已确立的文本结构也被彻底打乱、重新编排。正如阿多拉茨基在MEGA¹ 第Ⅰ/3卷的导言中指出的：“旧的编辑人员确立的《神圣家族》和《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经过了彻底的修订。本卷这一稿本的文本确立以及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的编排是由胡果·胡波特和马恩研究院的一批工作人员完成的。”^[75]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MEGA¹ 第1/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阿多拉茨基主编的这一章显然背离了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76]中先行出版的这一章的编辑理念与具体的编排方式。

第四节 1935—1936年马恩列研究院收购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努力

毫无疑问，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根本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献遗产。当年，马恩研究院之所以能够启动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并自1927年起出版引起举世轰动的MEGA¹ 卷册，就是依赖于梁赞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从世界各地搜集的，特别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复制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因此，对于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来说，时刻探听、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信息，搜集、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在后梁赞诺夫时代，尽管MEGA¹ 的具体编辑方案出现了一些变动、编辑人员也有了重大调整，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手稿的获取依然是马恩列研究院甚至是苏联国家的大事。于是，当1935年有望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手中购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难得契机出现时，马恩列研究院便立刻采取了行动。由此，继20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展有关购买和复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艰难谈判之后，在30年代中期，马恩列研究院再一次就同一主题与流亡在布拉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展开了漫长的、拉锯式的谈判。

一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状况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自20世纪初就一直存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正因如此，梁赞诺夫当年才直接寻找德国社会民主党来商谈有关文献遗产的收购与复制事宜。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不得不面临转移搬迁甚至颠沛流离的命运。

早在1932年1月底，希特勒就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工业俱乐部宣称：“我们做出了不容置疑的决定，彻底消灭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将其连根拔起。”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正式上台。2月23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被查封。2月27日晚，国会纵火案发生，上万名共产党人被捕。5月2日，柏林的工会被占领，财产被查封，人员遭逮捕。5月10日，在柏林大学以及其他高校门口燃起熊熊烈火，大量珍贵书籍被纳粹焚烧，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人的著作。^[77]

就在李卜克内西故居被查封的消息传来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左觉人物^[78]已经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便开始谋划，把档案馆的精神财富、尤其是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迅速转移出去，以备不测。^[79]于是，在党委会主席奥托·威尔斯（Otto Wels）的联系下，1933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被匆匆转移到了威尔斯的一位柏林老友那里。这位友人在路德大街经营一家油漆和裱糊店，所有的文献资料就安置在店铺内。然而，这个地方并不是安全所在。一方面，这家店又潮又脏，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被堆放在油漆桶和裱糊纸卷筒之间，不利于保存收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很多人都知道这家店主同威尔斯私交甚好，因此，一旦纳粹得到消息，这些宝贵资料就没有时间和机会转移。^[80]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考虑寻找其他的安全地点。

就在这时，社会民主国会党团秘书处科学助理格尔多特·布莱特施特（Gerhard Breitscheid）建议，把所有的资料转移到他的同学格尔多特·所罗门（Gerhard Salomon）的父亲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家中。大卫·所罗门住在威斯特法伦大街36号，从事珍稀古旧手稿的交易。他对德国的国王、诗人、公主、作曲家等非常了解，并收藏着他们的珍贵手迹。另外，他还领导着柏林的一个基督教科学团体，同工入运动也没有任何瓜葛。这样的身份足以避免纳粹的怀疑。因此，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放置在他那里，既安全，又可以让手稿得到内行人的悉心照顾。对所罗门来说，尽管接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在当时是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他出于职业素养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重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根据布莱特施特特的回忆，在四月中旬的一天，“在路德大街，我们把手稿包裹装进了汽车……我们载着这些既珍贵又危险的货物，在柏林市区东拐西拐，因为我们担心被人跟踪。盖世太保可能早就在监视油漆店了。一个摩托车手陪伴了运输过程。在行驶到格律恩瓦尔德的一条偏僻小路并确定身后没人之后，我们才驶向大卫·所罗门家”^[81]。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被安置到了所罗门家，它们被分成了若干个薄薄文件夹，穿插在莫尔特克（Adam Wilhelm Moltke）、路易斯古本、腓特烈大帝、施泰因夫人名人的手述文献之间，掩藏得很好。

1933年5月中旬，布莱特施特逃亡到丹麦。在那里，他寄住在同学格尔多特·所罗门的阿维尔娜斯宫中。所罗门见到他后，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安置在自己的父亲家中甚为不满，因为大卫·所罗门其实是犹太人。尽管他早已皈依基督教，但是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显然还是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杀身之祸。于是，布莱特施特前往哥本哈根寻求他的朋友、丹麦社会民主党书记汉斯·汉森（Hans Hansen）的帮助。汉森欣然表示，丹麦社会民主党愿意保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于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丹麦社会政党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从柏林运出，经过

基尔、弗伦斯堡，再通过背包和小船运输，越过丹麦边境，从而为丹麦社会民主党接收。^[82]1933年11月底，格尔夫哈特通知当时已流亡到布拉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得救了。手稿被安置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工人银行的保险柜之中。^[83]

需要补充的是，转移到丹麦的档案文献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资料，德国社会民主档案馆的其他大量资料还存留在德国柏林。如何把这些资料转移到安全之所也令社会民主党人头疼不已。就在这时，法国政府伸出了援手。在教育部长阿那托勒·德·蒙兹（Anatole de Monzie）的授意下，法国驻柏林大使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把档案馆中关于第一国际的资料交由法国方面保管。于是，一批重要的资料，包括几个文件夹的第三者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1848—1849年的全套《新莱茵报》以及全套《社会民主党人报》等被打包起来。5月中旬，载着这些档案资料的两节铅封的火车车厢从柏林驶抵巴黎。^[84]

由此，在纳粹威胁日渐迫近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把档案馆的重要资料及时转移出了德国，从而使它们避免了被法西斯焚毁灭绝的命运。这些资料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保存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另一部分则保存在法国巴黎。

二 马恩列研究院同布拉格流亡党委会的第一次交涉

1935年年初，莫斯科马恩列研究院开始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动向。由于打听到德国社会民主档案馆的材料存放在巴黎，因而猜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也应该归法国保管，于是，马恩列研究院任命格尔夫曼·蒂柯米尔诺夫（German A. Tichomirnov）和亚历山大·阿罗谢夫（Alexksandr J. Arosev）为代表，前往巴黎同法国政府商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购事宜。

7月中旬，蒂柯米尔诺夫和阿罗谢夫抵达巴黎。他们为谈判准备了优厚的条件，即用关于拿破仑大军及拿破仑本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来交换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具体说来，这些关于拿破仑的珍贵文献包括：拿破仑一世同亚历山大一世以及那一时期其他政治家之间的通信，另外还有俄国保存的拿破仑时期法国政要的所有通信，俄国秘密间谍关于拿破仑的所有报告（约500份），以及1812年落入俄国手中的拿破仑大军的全部档案。显然，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为此前，法国国家图书馆仅仅为了获得拿破仑写给玛丽·路易丝的一些书信就花费了150万法郎的巨资。它们与苏联方面提供的这些文献相比，要远为逊色，其价值和意义更是无法比拟。^[85]然而，尽管苏联方面想同法国政府进行谈判以获取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手稿的这一事件引起了法国乃至世界的巨大轰动，但是它并没有实现。因为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并不在法国，而是在丹麦，它的所有权也不属于法国，而是恰恰属于自1933年5月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流亡党委会。于是，马恩列研究院的代表开始想办法同布拉格流亡党委会取得联系。他们找到了一个中间人，那就是孟什维克党员、曾经担任马恩研究院柏林通讯员的波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ij）^[86]。

1935年8月16日，尼古拉耶夫斯基在致布拉格流亡党委会成员保尔·赫尔夫茨（Paul Hertz）的信中谈道：“我必须向您讲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从昨天起，布尔什维克人就是通过各个方面试图与我取得联系。今天，我确定，这一突如其来的关注的原因是：希望得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通过可靠的来源，有人告诉我，他们乐意为之花费一笔极为可观的数目，甚至可能是几百万。”^[87]由此，尼古拉耶夫斯基询问赫尔夫茨，流亡党委会是否愿意出卖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8月28日，尼古拉耶夫斯基再次致信赫尔夫茨，向他讲述了前一天同马恩列研究院代表蒂柯米尔诺夫会面的情况。他指出，在得知流亡党委会不愿出卖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消息后，苏联方面又提出了新的提议，马恩列研究院愿意凭借无限期、无利息的贷款来保管这些文献；社会民主党可以在若干年后，在偿还这笔贷款的基础上收回文献；如果在在此期间发生战事，苏联方面会立刻把所有的文献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中立国家，这个中立国可以在就由双方协定；苏联方面愿意为所有这些文献制作复制件，留给党委会保存；苏联也愿意为党委会提供它所拥有的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复印件。^[88]

1935年9月5日，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介绍，蒂柯米尔诺夫以马恩列研究院秘书“海尔夫曼”的身份向布拉格流亡党委会主席奥托·威尔斯提交了正式提议^[89]：

尊敬的威尔斯同志！

作为马恩列研究院的代表，我请求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主席的您告诉我，党委会是否同意并且在什么条件下同意，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交由马恩列研究院保管。

我们将特别许诺，通过转交一笔由你们所决定的金额来确保档案的归还。在归还该笔金额的前提下（当然无需支付任何利息），党委会有权随时收回这些文献。

我们也愿意向党委会提供文献中所有资料的照相复制件，以及马恩列研究院所拥有的、您所没有的、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之珍贵补充的资料相片。

由于我只能在巴黎短暂逗留以及鉴于一些只能口头传达的考虑，我请求您，如果您原则上并不反感就此事进行协商，那么请尽快派您的代表前往巴黎。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可能或者你们不愿意，那么我也乐意来日内瓦。但是我认为，在巴黎进行协商更为合适。

请您以电报的方式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基告诉我的答复。

谨致崇高的敬意

马恩列研究院秘书

海尔夫曼

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优厚建议，流亡党委会考虑更多的与其说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政治因素。正如党委会成员赫尔夫茨担心的，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档案转交给马恩列研究院将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宝库、精神遗产拱手送给了布尔什维主义者，这将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因为一直以来，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人，人们期待他们能够保护好这笔财富，使之免遭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染指。同时，赫尔夫茨认为，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的保管人，但它却不应被视为这笔财富的唯一所有者。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征求第二国际以及各国社会民主党派的意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真正细致地考察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因此，在不了解其具体内容的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地将它们转让出去。^[90]类似的，鲁道夫·布莱茨希特（Rudolf Breitscheid）也表示，他对这笔大胆的交易感到担忧，因为交易一旦实现的话，共产党人就会洋洋得意，自诩他们帮助社会民主党人摆脱了经济窘境，从而使之能够继续维持。^[91]当然，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也回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同梁赞诺夫代表的苏联方面就马克思恩格斯遗产进行交易的糟糕经历。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当年他们好心允许马恩研究院复制档案馆的原始文献，以便进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特别是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不料，苏联方面却在后来出版的MEGA¹卷册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作出了明显带有倾向性的负面评论，这才最终导致德国方面同梁赞诺夫和苏联中断合作。而今，鉴于当年的沉痛教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如果再同苏联方面进行这样的谈判交易，那么马克思恩格斯遗留下来的如此大量的、不为人知的文献遗产，可能会再次遭到苏联方面的同样利用。^[92]

由此，基于以上诸种政治性的考虑包括曾经的糟糕经历，尽管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对于经济上极为窘迫的布拉格流亡党委会来说极具吸引力，但是流亡党委会还是拒绝了苏联方面的正式提议。1935年9月16日，党委会作出决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国际的政治关系使得党委会不可能同意苏联的提议。按照这一原则性决定，具体的条件也就无须再讨论了。^[93]

三 流亡党委会态度的转变以及同马恩列研究院谈判的开启

就在向苏联方面正式表明拒绝态度之前，布拉格流亡党委会向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派发去通讯，就此事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并解释了拒绝的理由。对于苏联方面要求保管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一事，大多数党派表达了赞同流亡党委会之决定的态度，一些党派尤其是荷兰工党甚至建议，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长波斯特胡姆斯（Nicolaas Wilhelmus Posthumus）负责保管社会民主档案资料的事宜。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书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指出，他赞赏荷兰社会历史图书馆力求保管档案资料的努力，但是显然，它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同时，该馆并不是党的机构，它力求实现中立。因此，社会主义对它的影响会日益减少。相反，苏联方面的建议则提供了一系列可以接受的有利条件。当然，阿德勒并不否认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在对布尔什维克人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也应承认，通过创立马恩研究院，布尔什维克人“履行了为历史研究创造前提的责任”。尽管马恩研究院某些出版物的前言令人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一个文本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篡改。因此，阿德勒认为，可以在小范围内同苏联方面展开谈判。^[94]同样，尼古拉耶夫斯基也赞成同马恩列研究院展开谈判。在10月21日致威尔斯的信中，尼古拉耶斯基谈道：“我越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越发确信，必须同马恩研究院了结此事。”在他看来，不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同苏联方面进行何种交易，都不免带上政治色彩。因此，应该引入一所中间机构，让它把党委会从一切政治责任中解放出来。于是，尼古拉耶斯基建议成立一所“社会主义史国际研究所”，由这个科学机构代表党委会同苏联方面进行谈判，由此就可消除这一谈判对党委会所直接产生的政治影响和冲击。^[95]

阿德勒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建议引起了布拉格流亡党委会的重视。毕竟，如果能够在避免政治影响的条件下同苏联方面达成协议，在保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所有权和随时回收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一笔巨额资金，这对当时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党委会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于是，党委会邀请阿德勒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前往布拉格商谈筹建科学研究机构的细节。最后，经过商议决定，由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组织委员会，筹备“社会主义文献和出版协会”（Sozialistische Archiv- und Publikationsgesellschaft）。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转让给该协会，由它按照该好的担保金额把这些文献遗产交由马恩列研究院保管。当然前提是，文献可以随时收回，而且马恩列研究院必须在六周内满足要求。另外，此次讨论还初步涉及担保金额的分配问题：第一，50%归布拉格流亡党委会自由支配，主要用于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第二，另有10%也由流亡党委会管理，不过要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意的情况下用于德国工人运动；第三，20%用于“社会主义档案和出版协会”的组织；第四，20%交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救助组织”，它将用这笔钱来资助德国的政治犯及其家庭以及德国国外的社会主义流亡者照管组织。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第二、第四点，布拉格流亡党委会并不完全赞成。首先，流亡党委会反对阿德勒提出的用基于慈善目的设立的资金去帮助共产主义右翼的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从而也包括资助不同反对团体的代表。在流亡党委会看来，尽管它对陷入困境或司法纠纷的某些团体的拥护者提供过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团体本身原则上享有被救助的权利。其次，阿德勒提出，要把流亡党委会管理的那10%的资金用于支持社会主义的流亡团体，但不考虑这些团体对流亡党委会持何种态度。这也是党委会不能接受的。^[96]于是，由于这两点的争议，这一分配方案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1935年11月底，威尔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库克摩奈尔（Sigmund Crummenel）抵达巴黎。此时，阿德勒已经组建起了“社会主义档案和出版协会”组织委员会，成员除了阿德勒之外，还包括法国人列昂·布鲁姆（Léon Blum），亚历山大·布拉克（Alexander Bracke）和让·龙格（Jean Longuet），意大利人莫迪格里亚尼（G. E. Modigliani）和孟什维克主席迪奥多·丹（Theodor Dan）。流亡党委会同组织委员会协商决定，苏联方面应提供的担保金额为500万瑞士法郎，同时，担保金分配方案中有争议的第三点也得到解决：担保金额的6%作为基金用于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流亡团体，但是在具体使用前必须征得布拉格流亡党委会的同意。^[97]

在同布拉格流亡党委会达成一致后，“社会主义档案和出版协会”的组织委员会便代表布拉格方面同莫斯科代表展开了协商。在最初的谈判中，莫斯科代表显然对500万瑞士法郎的要价不能接受。他们声称，需要一段时间来得到上级的授权。12月中旬，苏联方面不再纠缠于保证金的问题，而是希望能够看看哥本哈根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在尼古拉耶夫斯基把布拉格流亡党委会寄来的文献清单转交给莫斯科代表后，后者表示非常满意，便不再要求亲自去哥本哈根检查文献。在接下来的协商中，还涉及了付款方式的问题。起初，莫斯科代表希望分五年还清，但对方并不同意。最终，苏联方面不得不妥协：在签署协定时支付担保金的1/3，剩下的2/3在交付文献时付清，并且依照所有人的要求按当天汇率交付。12月18日，布鲁姆和阿德勒向苏联方面递交了一份临时合同文本，它对前几次协商已达成的协议做出了精确的表述，其中明确规定，合同不具有任何政治特征，它不能使缔约双方承担任何形式的政治义务。同时，合同也拟订了与第一国际史和更早时期的社会主义协会史相关的那些文献的复制件与打字机稿的交换事宜，尤其是纽约时期（左尔格）第一国际的记录及其档案，以及关于魏特林和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文件材料。另外，合同强调，组织委员会有责任采取一切手段寻找那些之前保存在柏林社会民主档案馆、之后却佚失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如果找到的话，在提高担保金额的前提下转交给苏联方面。^[98]

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布拉格方面明显采取了主动的姿态。在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档案和出版协会”而成功地摆脱了政治方面的顾虑后，它更希望尽快同苏联方面达成关于巨额贷款的协议，从而全面解决其经济问题。然而此时，苏联方面却表现出了保守拖延的倾向。毕竟，尽管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获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但是面对500万瑞士法郎的“狮子大开口”，苏联方面是不会轻易应允的。于是，苏联方面也展开了紧急的内部商讨。

四 谈判的高潮——布哈林与阿多拉茨基的出面

1936年1月，阿罗谢夫返回莫斯科。1月8日，他向斯大林汇报了在巴黎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谈判况况。他指出，巴黎要成立一所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99]，布拉格流亡党委

会将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转交给这个机构。“由此，档案资料将首先‘国际化’，党委会授权 [……] 该委员会，根据自己的考虑来支配这些档案。为了保证其原则和金库的纯洁性（威尔斯声称，我们不能公开使用布尔什维克的钱），党委会决定，隐藏在上述的委员会背后。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金钱已经激起了巨大的胃口。阿德勒受委员会的委托开价2500万法国法郎，而不再是我在巴黎逗留的第一个时期所说的500万法郎（秋天）。我援引了同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提到了500万的数额，而我当时就说太高了。作为回复，阿德勒特别是尼古拉耶夫斯基对此解释说，可以说产生了个误会：威尔斯确实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基报了500万，但这是500万**瑞士法郎**；由于1瑞士法郎等于5个法国法郎，因此就成了2500万法国法郎。”[[]^{100]}

此时，苏联方面已经意识到，为了能够得到苏联提供的巨额资金，同时又为了避免由此而生的负面影响，布拉格流亡党委会不惜躲在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之后进行幕后操作。可以说，它对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的巨大兴趣已经为谈判的进行乃至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是苏联方面乐于看到的。但是另一方面，布拉格党委会的狮子大开口，从500万法郎到2500万法郎的狡辩又令苏联方面非常不快。它是不会轻易让步的。

在阿罗谢夫的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给出的策略：“2500万的金额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500万他们不能接受。通过与他们进行的所有谈话，我得出一定的印象，档案资料可能会以1700万—1800万转让给我们。因此，我过去建议，现在再次建议，把500万说成是看起来最高的金额，允许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提高到1700万—1800万。”[[]^{101]}

1月13日和14日，阿罗谢夫把德国方面提交的临时合同文本寄给了阿多拉茨基和安德烈也夫。由于时间紧迫，苏联方面必须迅速拿出决定。于是，1月29日，阿多拉茨基再次求助于斯大林。他在针对临时合同所拟订的建议文书中写道：“档案文献的价格限定在500万法国法郎（约40万金卢布）和850万法国法郎（约68万金卢布）的界限内。”后来，在安德烈也夫的建议下，上限850万法国法郎降低为700万法郎。[[]^{102]}

当苏联内部就谈判金额的上限作出决定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谈判就进入了一个决定性阶段。1936年3月，布哈林和阿多拉茨基到达巴黎，他们作为苏联方面的谈判代表将与组织委员会的代表阿德勒重启谈判进程。可以说，这两位苏联高层人物的出现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们都乐观地估计，这场谈判很快就要走向令人满意的终点。

在同阿德勒的会面中，布哈林和阿多拉茨基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进入具体谈判细节之前，要亲自去哥本哈根考察那里所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阿德勒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看到了卡尔·拉洛夫（Karl Raloff）——他曾经负责整理那些转移到哥本哈根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如下的回忆：

1936年3月，我再次同马克思恩格斯遗产打了交道。两位声名卓著的俄国人来到哥本哈根。最著名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家、列宁的战友、《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马恩列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二人想参观这里所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遗产，因为苏联打算，用几百万马克——我不再记得确切数目了——把它们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买过来。正如两位俄国人对我讲的，此外还有100万克朗的文献复制费……任何单独一页都要被复制，以禁止伪造。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售条件之一。无论如何它都要保留复制件。

在我得到贝尔托特的许可从党档案馆取出两个箱子，并且按照党委会的委托在他们面前打开后，布哈林和阿多拉茨基便在我在场的情况下一份一份地检查文献。整整一周时间，我们每天坐在那上面……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尤其是布哈林是以怎样的激动……以何种的爱把马克思的一些文献捧在手中，研究它们。他显然很乐意把这些宝贝带回莫斯科，安放在马恩列研究院的宽广的地下室里。他跟我讲过这些。[[]^{103]}

在考察完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之后，1936年3月25日，阿多拉茨基、阿罗谢夫和布哈林代表苏联向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执行委员会”（简称“委员会”）[[]^{104]}提交了他们的“项目同意书”草稿。

草稿规定：第一，委员会把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所有草稿、书信和笔记以及他们起草的文件及文件附录交由马恩列研究院保管；保管期限为20年，在此期间，委员会没有权利对相关文献提出异议；委员会可在此期间自由支配支付给它的资金；文献的转交按照委员会交给马恩列研究院的清单执行。这里，“项目同意书”草稿特别指出，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核查，发现个别文献尤其是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23本笔记以及1857—1858年的几本笔记缺失。第二，作为保管文献的保证，马恩研究院支付委员会700万法国法郎，并转交给委员会所有保管文献的复制件。第三，在转交文献时，支付一半担保金额；一年后支付另一半；所有金额将按照法国法郎结算，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支付给相应地方的相应人士或机构。第四，委员会要采取一切措施来寻找那些曾经保存于柏林档案馆、之后却遗失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在进行相应补偿的基础上必须把这些手稿转交给马恩列研究院。最后是一条可能的补充条款：如果除了转交第一条提到的文献外，委员会还会转交第三方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第一国际的文献乃至魏德迈、贝克尔等人的档案，将把支付金额提高为800万法国法郎。[[]^{105]}

苏联方面给出的条件显然远远低于委员会的预期。700万法郎的保证金额更是只够2500万法郎的零头。在这种情况下，阿德勒认为谈判完全失败了。他拒绝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就苏联方面提出的草案进行商讨。他向莫斯科代表提出，要想再次回到谈判，必须先对三个方面做出澄清：首先，谈判的政治性，苏联方面的合同直接删除了委员会在临时合同中提出的谈判不具有政治特征、不承担政治义务的条款；其次，担保金的额度，委员会索要的金额绝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而定的，第三，付款期限的问题，苏联方面的建议同委员会方面的预想不一致。4月6日，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安排下，苏联代表又同阿德勒进行了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布哈林指出，关于第一条——谈判的非政治性的问题，苏联方面完全赞成，正是因为认为该条是理所当然、显而易见的，才没有把它写入“项目同意书”草稿；关于支付时限，苏联方面也愿意再次协商，相信能够达成一致。关键的分歧还是关于担保金额。阿罗谢夫谈到，他在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谈话中得出，或许还能打30%的折扣。阿德勒对此解释说，委员会设想，苏联方面可能只支付400万瑞士法郎，而不是它想要的500万法郎，因此，担保金额只能在此范围之内。当然，考虑到一些手稿资料丢失，委员会愿把总金额降低10%。于是，苏联方面决定，先综合考虑一下委员会的提议，复活节后再继续谈判。[[]^{106]}

五 谈判的失败

4月20日，苏联方面再次提出，担保金额为1000万法郎，文献保管期限为20年。委员会则提出，担保金额为1300万法郎，文献保管期限为10年。可以看出，双方都开始做出让步，力求尽快就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达成协议。在此期间，布哈林也多次电话联系斯大林，请他考虑提高原定的700万法郎的购买上限。然而，斯大林不为所动，坚决要求担保金额不能超过700万法郎。4月22日，苏联代表团突然撤离巴黎，返回莫斯科。原来，布哈林等人由于在担保金额上限方面“越权”而被取消了全权代表的资格，谈判形势急转直下。在莫斯科代表团全面离开巴黎后，苏联驻巴黎大使叶夫杰尼·希尔施菲尔德（Evgeny Hirschfeld）通过中间人罗林还和委员会保持着联系。双方在担保金的额度上也日益趋近。苏联方面提出最多支付750万法郎，委员会方面也最终让步到了850万法郎。文献保管期限则协商为10年。尼古拉耶夫斯基认为，委员会此时应该作出决断了。毕竟，从最初索要的2500万法郎降到如今的850万法郎，确实没有必要再为100万法郎的分歧而终止谈判。而且，现在的条件更加有利了，因为苏联方面把文献保管时间降为10年，而不是原来坚持的20年。于是，布拉格流亡党委会请求阿德勒为代表的组织委员会赞同苏联方面的建议，立即与苏联方面签署协议。1935年8月初，组织委员会接受了党委会的建议，同意与苏联方面签署合同。[[]^{107]}于是，尼古拉耶夫斯基正式向马恩列研究院发去文书，表示同意签署协议。

1936年8月19日，阿多拉茨基致信希尔施菲尔德，“结束文献购买事宜（签署合同，出差去接管文献，准备好相应资金）的问题正处于由主管机关来解决的时期。当我在8月初收到您的电报之后，我即刻把相应的建议写了下来，把它们提交上去等待决定。只要决议一作出，我就立即给您消息。但是我们仍须等待。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一直以来都慢腾腾的，现在他们也该等等了。我建议，至少在一至一个半月内把交接哥本哈根和巴黎的文献资料纳入计划。最好是在签署合同之后就日开始交接，也就是在9月1日至10月之后”[[]^{108]}。

然而，世事难料。由于1936年8月起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日趋紧张以及大公审的展开，签署协议的事情被无限期地拖延了。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8月3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司库克鲁摩奈尔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史研究所签署了存放协议，这也就意味着苏联方面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努力彻底失败。

总的来说，苏联方面在收集、购买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也正因此如此，它能够在1935—1936年试图倾举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收购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然而，由于时局以及政治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它最终没能抓住这一极为有利的契机，实现收购计划。这也成为后梁赞诺夫时代MEGA¹编辑史上的一大憾事。

第五节 MEGA¹的最终夭折

在1932—1935年全力出版梁赞诺夫在任时就已经准备好的MEGA¹卷次之后，MEGA¹的出版活动就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1935年8月，在阿多拉茨基所作的关于马恩列研究院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我们发现，MEGA¹的编辑出版活动已经完全处于研究院工作规划的边缘地带。在这份报告中，阿多拉茨基指出，今后研究院的首要任务是出版斯大林著作集；其次是在《列宁文选》中出版列宁的手稿，同时还要出版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选集，另外要考虑《列宁全集》第四版的准备工作；第三个任务是阐发马列主义史，这首先意味着要出版一部党史，它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斗争情况进行描述；第四个任务就是在接下来的三四年中完成自1928年开始出版的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8卷，36册），同时还要修订之前由梁赞诺夫主编的卷次；第五个任务是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传统。[[]^{109]}显然，在新的政治背景下，加强俄国本土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编纂工作，也就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编辑出版工作已经成为莫斯科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重心。因此，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也就不得不退居到边缘位置了。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份报告中，关于MEGA¹的说明只有两点，而且只是附带性地提及：第一，阿多拉茨基宣布，MEGA¹第Ⅰ部分第7卷和关于恩格斯的特别卷将在年内出版；第二，阿多拉茨基指出，应该拟订一份更为精确的MEGA¹出版方案。[[]^{110]}

事实上，自1935年之后，MEGA¹的出版工作就不再有任何进展，也不再有后续卷次出版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MEGA¹工作在1935年便彻底终止。至少在1936年3月，马恩列研究院按照阿多拉茨基的上述指示，还制订出了一份更为详细的MEGA¹出版方案。这也是现存的最后一份关于MEGA¹出版方案的文献。

1936年3月，拉蒂斯劳斯卡达斯（Ladislau Ruda）和列夫·卡诺诺维奇·法尔克-塞加（Lev Chanonovič Falk-Segal）提交了一份关于出版MEGA¹的说明，其中对未来MEGA¹各部分的具体结构、各卷次内容做了详细规划，同时还提出了设立第四部分——独立的摘录部分的设想。

首先，这份说明介绍了目前为止出版的12部MEGA¹卷册，即第Ⅰ部分第1—7卷（截至1848年）、第Ⅲ部分第1—4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和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特别卷（收录《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另外，声明还指出，目前研究院已经编排好了第8卷的资料，第9卷也已编辑好。

第二，这份说明提出了一个新的编辑构想——设立独立的摘录部分。它指出，“MEGA必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的**科学的**全集”并不意味着它是“严格的学术性”的版本，只能为狭隘的专家学者圈子所使用。相反，MEGA应该为那些用原文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者所通达。因此就要求个别卷次从多余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里所谓的“重负”指两个方面：（1）以在目前为止个别卷次中出现的那种方式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2）个别卷次中大量的资料。首先，该说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具有独立的意义。但是到目前為止，它们都被问题于各卷次的附录中，而且出版方式也不尽一致。例如，第Ⅰ/3卷全文出版了1844年巴黎笔记的内容，但是第Ⅰ/6卷中却只对应时期的摘录做了描述，因为如果全文出版其内容，将占去大量篇幅。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摘录并不是逐字逐句抄录原文，而是在用自己的话表述摘录著作的观点，并且在很多地方画了着重线。因此，摘录展现了马克思批判地吸收先前所有科学的特定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其次，摘录中的一大部分是关于政治经济学、不同民族和历史时期的一般的政治和经济史的资料，而通过在 不同卷次中以描述的方式分散地出版它们，不仅使它们失去了完整性，而且也不能真正为读者提供具体的、翔实的内容。因为即使在描述摘录时指出原文的页码，但是由于这些原著本身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借到，所以对摘录的描述也就只能流于一种形式，它对专家学者没有任何意义，反倒成为编辑的负担。基于这样的考虑，该说明提出，有必要在MEGA¹中设立一个新的部分——关于摘录和批注的部分，它将构成第四部分。原来的总索引顺延为第五部分。[[]^{111]}

另外，这份说明指出，个别卷次的资料同样存在编排方式不一的情况，而且也包含大量多余的材料。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淹没在大量的标记、符号、异文之中。因此，它提出，MEGA¹卷册只应包含以下内容：编者前言；正文及作为脚注的异文；附录；资料（文献目录、人名和名目索引）。[[]^{112]}

第三，这份声明详细介绍了未来待出版的MEGA¹各部分、各卷次的结构和内容。[[]^{113]}

就第Ⅰ部分著作卷来说，它已经出版了7卷。在后续的卷次中，每卷收录的正文（不包括资料）篇幅一般不超过35印张。个别情况下允许有例外。具体来说，第8、9卷将分别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发表于《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文章。这两卷每卷的篇幅可能会有45印张。但是，由于它们各自收录的内容都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不允许把它们再分为多卷出版。不过，由于最终确定的文章数可能还会有增加，可以考慮把第8卷分两册出版。第10卷是一部过渡卷，它将收录马克思恩格斯在流亡时期写下的文章，包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流亡中的大人物》、《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等。第11—20卷将收录1852—1864年与《纽约每日论坛报》合作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第21—23卷将收录1864—1872年第一国际时期的文章和材料。第24—25卷收录《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第26卷收录1872—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第27卷和第28卷收录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发表的所有著作。总的来说，MEGA第Ⅰ部分将共计28卷。

就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来说，各卷的内容依次是：第1卷收录《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加上编者导言以及资料内容，它将有15印张。尽管该卷篇幅仅为MEGA卷册平均篇幅的一半，但也不能把它同其他著作混合编排。作为《资本论》的先声，它必须编排在紧随其后的《资本论》卷册之前。第2—4卷收录《资本论》第一卷，分别为德文版、法文版和德文四版。第5卷收录《资本论》第二卷第2版。第6卷为《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分册，第7卷为《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分册。第8—9卷收录小系列（Kleine Serie），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15卷收录大系列（Große Serie），即1861—1863年手稿，以及流传下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6章手稿和第一卷德文二版第一章的修订稿。第16—20卷收录《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手稿。由此，MEGA第Ⅱ部分共计20卷。

就第Ⅲ部分通信来说，除了已经出版的4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外，预计再出版5卷他们致第三者的书信。因此，第Ⅲ部分将共计9卷。

就第Ⅳ部分摘录和批注来说，由于这是一个待设立的新部分，因此关于它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工作至少要在前三部分的出版工作结束之后才能够开始。从目前的估计来看，该部分将有1000印张的篇幅，预计出版25卷。

就第Ⅴ部分总索引来说，它将包括按照字母顺序编排的所有著作索引、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所有著作目录、引用文献目录以及人名和名目索引，预计出版3卷。

由此，按照1936年新的MEGA¹出版方案，MEGA¹卷册的数量将大为扩充，达到85卷。而截至1936年，它只出版了12卷。且不考虑拟设立的第Ⅳ部分，单就前三部分来说，仍有多达45卷的工作量需要完成。这对于马恩列研究院尤其是马恩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正如这份说明指出的，它必须在保证每年出版两卷次的前提下才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基本完成这一任务。^[114]

最后，这份声明指出了1936—1937年的工作任务，即（1）出版第Ⅰ部分第8、9卷。这两卷的资料已经编排好，还需要两名编辑说明其构成以及编辑情况。（2）出版两卷本的“小系列”，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Ⅱ部分第8、9卷）。另外，1937年将排第Ⅱ部分第10卷（“大系列”即1861—1863年手稿的第一卷）。（3）从所有未出版的资料中选出最重要的内容收录到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增补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115]

遗憾的是，1936年的MEGA¹出版方案只能作为历史文献供我们后辈学人阅读了解了。它所提出的MEGA¹出版规划、包括设定独立的摘录部分等最终都变成了一纸空想。事实上，到了1939年，除了已经编排好、准备出版的MEGA¹第Ⅱ部分的仅有硕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外，所有在编卷次的材料都已经归档。而马恩列研究院的院长——阿多拉茨基亦在这一年年初被罢免院长之职。MEGA¹彻底夭折了。

需要补充的是，就在MEGA¹终结之后，还有两部MEGA¹卷册得以出版，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待出版的《大纲》。1939年和1941年，在保尔·韦勒的努力下，《大纲》由莫斯科外语文学出版社分两卷出版。其中，第一卷为《大纲》手稿，第二卷为附录，主要收录了关于李嘉图以及巴师夏和凯里的笔记。这两卷不仅是MEGA¹第Ⅱ部分的仅有硕果，亦是MEGA¹正式出版的最后两部卷册，尽管它并没有采用MEGA¹的卷号。就在第二卷交付出版社不久，韦勒便于1941年11月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壮烈牺牲了。^[116]

总的来说，与梁赞诺夫时代相比，后梁赞诺夫时代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是在科学性、学术性的编辑理念与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国家桎梏这两者的夹缝中挣扎苟存的。进一步说，MEGA¹本身亦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首先，在梁赞诺夫离职之后，MEGA¹的编辑出版工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一压力主要就在于彻底肃清梁赞诺夫的“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中，一方面，对梁赞诺夫既往的工作、成绩绝口不提（这一点在后来出版的MEGA¹各卷导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全面清除梁赞诺夫的“残余”，例如，彻底修订梁赞诺夫主编的已出版的MEGA¹卷册以及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全面地修改与调整梁赞诺夫在任时已经准备好、只待出版的MEGA¹卷次，这尤其表现在第Ⅰ/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上。事实上，这种对梁赞诺夫既往工作的大规模“清洗”亦是研究院工作的基本方针。正如在1934年马恩列研究院向苏联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强调的，在列宁研究院同马恩研究院合并之后，“在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的出版工作中肃清梁赞诺夫分子的残余和清除研究院机构中的梁赞诺夫、鲁宾之流”的大量工作得以完成。^[117]其次，斯大林统治的加强要求马恩列研究院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转移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于是，梁赞诺夫当年设定的为马克思而马克思的纯粹的“马克思学”研究就再不能跟上时势的要求了，因此MEGA¹也就退居到了马恩列研究院工作的边缘地带。当然，阿多拉茨基也力图在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中尽量体现这种时势的新要求，例如在导言中不时引用列宁甚至斯大林的名言，借助不同时机阐发列宁的观点等等，但这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MEGA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人为中心的根本特征。它始终同苏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保持着距离。最后，就阿多拉茨基本人来说，作为一名学者，他还是想力图保证MEGA¹卷册的科学特征的，但是作为国家直属宣传机构的负责人，他又必须时刻彰显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求得自保的必然需要。于是，这两种身份的矛盾、冲突亦使他本人陷入了危机之中。1939年1月，阿多拉茨基被解除马恩列研究院院长之职，其原因就是中央委员会指责他“愚蠢的政治盲目”，指责他在八年之后仍然没有全面地审查和纠正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梁赞诺夫所主编的卷次。^[118]可以说，阿多拉茨基亦是梁赞诺夫政治劫难的后续牺牲品，这也同样适用于MEGA¹编辑出版工程。

当然，除了国内严酷、险峻的政治形势，国际局势的恶化亦是MEGA¹最终夭折的重要原因。1933年，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公司关闭、MEGA¹出版阵地回撤到苏联。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不得不倾全力保家卫国，所有这些都迫使作为学术工程的MEGA¹隐退于历史舞台之后。于是，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自1927年由梁赞诺夫一举开创的、阿多拉茨基接棒到1939年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彻底夭折。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MEGA¹未能彻底、全面地实现，但是，它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后人研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著作等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来源。同时，它也为后来的MEGA²编辑出版工程奠定了深厚的文献学、文本学、出版学方面的基础。因此，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历史上，而且在国际文献学、出版学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伟大成就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1] Rolf Hecker, “Fortsetzung und Ende der ersten MEGA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187-188.

[2] Rolf Hecker, “Fortsetzung und Ende der ersten MEGA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S. 181.

[3] Ernst Czöbel,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Herausgabe der MEGA”,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 133. 在这份报告中，可能由于疏忽，崔贝尔在已出版卷次中没有提到第Ⅰ/2卷。

[4] Ernst Czöbel,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Herausgabe der MEGA”, S.133-134.

[5] *Ibid.*, S. 134.

[6] 施米克勒主要领导三位同志进行这一卷的编辑工作，分别是他的夫人安妮·贝恩菲尔德—施米克勒（Anne Bernfeld-Schmückle）、瓦尔特·罗尔（Walter Rohr）和负责摘录的骚尔（Sauer）。后来，胡果·胡波特接手了施米克勒夫人的工作。

[7] Ernst Czöbel,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Herausgabe der MEGA”, S. 136-137.

[8] *Ibid.*, S. 134.

[9] *Ibid.*, S.137-138.

[10] Ernst Czöbel,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Herausgabe der MEGA”, S. 138.

[11] 参见Ernst Czöbel, “Über die Bände der MEGA, die sich in der Herstellung befinden und Über ihre Erscheinungstermine”,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 139-141.

[12] “Referat Rjzanovs Über die Aufgaben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 118.

[13] Ernst Czöbel,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Herausgabe der MEGA”, S. 135-136.

[14] “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Ü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4.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40.

[15] “Protokoll der Sitzung zur Überprüfung der Mitarbeiter des MEI vom 5. März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93-94.

[16] Ernst Czöbel, “ad. MEGA-Apparat”,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S. 142-143.

[17]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 272-273.

[18]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3.

[19]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3. 恩格斯关于1861—1863年手稿的说明，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页。

[20]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4.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7—9页。

[22] 崔贝尔的报告没有给出笔记本7的写作时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里应为“1878年7月2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8页。

[23]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4-275.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8—11页。

[25]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5-276.

[26] 这一笔记曾由梁赞诺夫和鲁宾刊发在1929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崔贝尔建议，如果研究院自己不尽快出版这一笔记的德文版，那么建议由《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出版它。参见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6.

[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10页。

[28]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6.

[29] Ernst Czöbel, “Über die ökonomis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17. April 1931”, S. 276-277.

[30] 该卷在1931年如期出版。参见V. Adoratskij,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II/4,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1. 该卷导言的写作日期是1931年7月12日。

[31] 事实上，除了第7卷在1935年出版之外，其余两卷最终都未能出版。

[32] “Allgemeiner Plan der MEGA, April 1931”,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S.270-271.

[33] 该卷具体的出版月份很难考证了。不过，根据其导言的写作日期——1931年7月12日——可以断定，该卷最早是在1931年7月中旬以后出版的。

[34] V. Adoratskij, *MEGA¹*, Band III/4, S.IX-X. 在该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871—1883年每年的通信数量分别是：1871年6封，1872年0封，1873年18封，1874年7封，1875年2封，1876年9封，1877年19封，1878年6封，1879年16封，1880年1封，1881年12封，1882年57封，1883年2封。

[35] V. Adoratskij, *MEGA¹*, Band III/4, S. X V - X VI.

- [97] 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116.
- [98] Ibid., S. 116-118.
- [99] 为谈判的顺利进行而引入的这所研究机构的名称在苏联和布拉格方面并不一致。苏联方面一直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而布拉格方面则称之为“社会主义档案和出版协会”。
- [100] Rolf Hecke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Marx-Engels-Nachlaß 1935/1936. Bish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Moskauer Archiven", S. 16.
- [101] Rolf Hecke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Marx-Engels-Nachlaß 1935/1936. Bish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Moskauer Archiven", S. 16.
- [102] Ibid., S. 17-18.
- [103] Rolf Hecke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Marx-Engels-Nachlaß 1935/1936. Bish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Moskauer Archiven", S. 19-20.
- [104] 即上文谈到的“社会主义档案与出版协会”的组织委员会。
- [105] 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190-191.
- [106] Ibid., S. 122-123.
- [107] 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S. 123-126。也可参见Rolf Hecke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Marx-Engels-Nachlaß 1935/1936. Bish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Moskauer Archiven", S. 23-25。迈尔和海克尔对某些细节的说明不太一致。
- [108] Rolf Hecke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Marx-Engels-Nachlaß 1935/1936. Bish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Moskauer Archiven", S. 25.
- [109] Rolf Hecker, "Fortsetzung und Ende der ersten MEGA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S. 190-191.
- [110] Ibid..
- [111] 参见Ladislav Rudač und Lev Chanonovič Falk-Segal, "Erklärung zur Herausgabe der MEGA, 25 März 1936", S. 294-295。
- [112] Ladislav Rudač und Lev Chanonovič Falk-Segal, "Erklärung zur Herausgabe der MEGA, 25 März 1936", S. 295.
- [113] Ibid., S. 296-305.
- [114] Ladislav Rudač und Lev Chanonovič Falk-Segal, "Erklärung zur Herausgabe der MEGA, 25 März 1936", S. 306.
- [115] Ladislav Rudač und Lev Chanonovič Falk-Segal, "Erklärung zur Herausgabe der MEGA, 25 März 1936", S. 306.
- [116] 有关韦勒在研究院的工作以及他编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过程可参见Rolf Hecker, "Fortsetzung und Ende der ersten MEGA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S.254-267。
- [117] Rolf Hecker, "Fortsetzung und Ende der ersten MEGA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S. 189.
- [118] Ibid., S. 191-192.

第五章 MEGA² 的历史性诞生

历史地来看，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可谓是一个夭折儿，它从启动到全面实施再到黯然终结，仅仅经历了十余年光景。从1927年引起举世轰动的第 I 部分第1卷上册到1935年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的未标明卷次的特别卷，MEGA¹ 最终在其短暂历程中奉献给世人12卷原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从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史上书写下简短却光辉的一页。尽管MEGA¹ 各卷次的出版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戛然而止，但是苏联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仍然在为之不懈努力。1939年和1941年，保尔·韦勒编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分上、下卷出版，虽然这两卷没有标注MEGA的卷次号，但却是完全按照MEGA¹ 的样式编辑出版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试图继续推进MEGA¹ 的努力。遗憾的是，就在韦勒把下卷交给出版社付印不久，他本人便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了。战争的狂澜在席卷科学研究人员的同时，自然也吞噬了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因此，它的彻底终结就可想而知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战后时局的逐渐稳定，在苏联以及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德”）的学者中再次出现了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呼声。于是，经过长达20年的协商、探讨和准备，苏联与东德的马列主义研究院终于在1975年共同出版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的第 I 部分第1卷。由此，作为MEGA¹ 之历史新形式的MEGA² 正式登上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历史舞台。如今，经过30多年的发展，MEGA²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工程，它对欧美以及亚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MEGA² 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从构想到实施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与挫折？苏东剧变的政治动荡对它造成了怎样的致命打击，而它又如何挺过这一重大危机而继续前进？我们不妨在下文中作一番历史的、细致的考察。

第一节 MEGA² 前史的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有关出版新版MEGA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逐渐成为许多民众包括科学工作者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可供阅读乃至进一步研习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版本却极为有限。人们所能依据的最为权威的版本莫过于MEGA¹ 各卷次了，然而即便这一本身并不完整的版本，数量也非常稀少，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学习要求。于是，一些学者开始萌生了重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想法。^[1]

最早关于新版MEGA的讨论发生在1954年1月的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以下简称“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恩格斯部（Marx-Engels-Abteilung，以下简称“马恩部”）。当时，考虑到苏联方面即将出版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于是柏林方面设想，自己是否也可以出版一套独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按照当时马恩部主任路德维希·阿尔诺德（Ludwig Arnold）向研究院副院长路德维希·艾尼柯（Ludwig Einicke）提交的报告，在这场讨论中，马恩部的工作人员认为，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工作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出版以即将问世的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基础的“普及版”；第二，出版以MEGA¹ 为范型的“科学考证版”；第三，出版一个规模小于MEGA¹ 的科学版本。就出版以MEGA¹ 为范型的科学考证版来说，柏林的工作人员认为，它至少应该像MEGA¹ 那样出版40卷，同时还要包含大量的科学资料，如文本描述、出处说明、名目索引等。但这在当时的东德是很难实现的。而就普及版来说，它又显得规模稍小，学术性、科学性不高。因此，大多数工作人员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即一个“介于第一和第二个建议之间的版本，也就是说，一个包括所有迄今为止被明确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科学版本。资料必须局限于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名目索引和相对较少的注释（只用在那些对理解来说绝对必需的地方）。就外文文章而言，必须把德译文收入正文中，原文收录在附录中（小号字体）”^[2]。

历史地来看，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提出的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编辑方案实际上是学术理想与现实考虑二者之间的调和物、折中物。一方面，可以看出，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非常注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所应具有的科学性、学术性，因此，它要求收录著作、文献的完整性、可靠性，同时还要辅之以一定量的科学资料。对它而言，一套基于俄文二版的普及版本显然不能满足它对科学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现实情况的局限，尤其是原始资料、科学工作人员的有限又迫使柏林方面收缩自己的构想，在满足科学性、学术性的基本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限制卷次规模，压缩资料部分的内容。然而，正如罗尔夫·德鲁贝克（Rolf Dlubek）所说，在当时的东德，出版新版MEGA还完全缺乏“人员与资料的前提条件”^[3]，最终，这一关于“简单版”新MEGA的构想为现实的出版以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基础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Engels Werke*）的计划所取代。

就在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新版MEGA的构想昙花一现后，苏联方面也出现了编辑新版MEGA的声音。时势的变化为这一声音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众所周知，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此后，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苏联展开了一系列批判斯大林、批判个人崇拜的活动，同时还为党内一些在斯大林时期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曾经不可触碰的禁忌开始得到缓和。而就苏联学界来说，梁赞诺夫当年未竟的事业、中断近20年的MEGA¹，逐渐成为可以言说的话题。

1955年，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式出版。由于当年的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与MEGA¹ 同步出版的，因此，在缓和的政治形势下，苏联的科学工作者也开始设想，重新启动曾经中断的MEGA工作，代表人物就是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分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工作的副院长斯捷帕诺娃（E. A. Stepanowa）以及中央党务档案馆马克思恩格斯部主任奥尔加·塞涅基娜（O. K. Senekina）。这二人提出，尽管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为30卷^[4]，但是同时启动的新版MEGA却应该“原文收录所有为我们所知的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章、笔记、摘录、书信等等”，它应当“为所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译本奠定基础”。^[5]与此同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为MEGA工作的重启起了推动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尤其指责其中缺少了

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而这些著作已经存在于俄文一版特别是MEGA¹之中了。^[6]于是，出版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成为学者们的深切需要。

在向苏联中央委员会正式提议出版新版MEGA之前，斯捷帕诺娃和塞涅基娜决定首先探询一下东德同人对此想法的态度，她们非常期望能够得到东德方面的支持。正如阿尔诺德在1957年4月24日马列主义研究院部门领导协商会上所作报告谈到的，“有关类似MEGA形式的学术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讨论约两年了。当我1955年在莫斯科的时候，同志们告诉我，他们甚至非正式地得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赞同。但是，在正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该问题之前，他们想知道，我们研究院如此看待此事，特别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是否同意参与并支持出版活动”^[7]。显然，在莫斯科的同志看来，像MEGA这样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绝不是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能够独立完成的，它必须在广泛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于莫斯科方面来说，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无疑是其合作伙伴的首选。

苏联同志们出版新版MEGA的提议得到了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热烈响应。不仅阿尔诺德在为之努力争取，研究院副院长艾柯也多次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尔特·哈格（Kurt Hager）讨论，支持苏联提出的编辑出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建议。1956年5月1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作出决议，“政治局同意马列主义研究院协助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计划的马克思恩格斯版本的工作。”^[8]由此，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出版新版MEGA的问题上得到了党中央的明确支持。

1957年4月，阿尔诺德与艾柯柯前往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访问。在那里，他们同斯捷帕诺娃和塞涅基娜就新版MEGA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罗尔夫·德鲁贝克撰写的《准备新版MEGA的最初倡议（1955—1958）》一文的附录中，我们看到了阿尔诺德对此次讨论所做的记录。由此，我们就了解到苏联学者关于新版MEGA的最初设想。总的来说，两位苏联专家提出了八点建议：

首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应该是类似于MEGA的科学考证版。它应该尽可能地原文收录一切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书信等。其次，这一新的版本应该是东德与苏联合作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也可以在英、法两党同意的基础上吸纳英、法工作人员参与进来。再次，德国统一社会党应该成为发起人和正式出版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德文写的，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另外，这样也可以加强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及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威信。第四，手稿的编辑工作既要在柏林也要在莫斯科进行，因为90%的资料以及原件的复制件都在莫斯科。第五，科学工作人员班子应由30人左右组成，德方和苏方各出一名人员负责领导工作。人员具体分工为：编辑3名，其中2名为德国人，1名为英国人；科学工作人员9名，其中6名为德国人，3名为英国人；负责各卷准备工作的人员包括12名较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其中9名为德国人，3名为英国人）以及4名打字员（3名为德国人，1名英国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具有很高的水平，除了掌握专业知识（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之外还要精通德语，也要擅长俄语、英语或法语。每三人为一个小组负责一卷的编辑工作，待工作完成之后再由编辑进行审校工作。第六，具体的编辑工作应该从第8卷开始，之后再修订早在MEGA¹中出版的前7卷，这里的修订工作包括改写或重写前言，删掉不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之手的存疑文章，增补新发现的文章，纠正印刷错误，可能的话重新构建资料部分等。第七，除了一些技术性问题外，首要的任务是制定这一版的全景规划，也就是列出所有为这一版所收录的文章、著作和书信等。第八，各卷次应该在莱比锡出版。^[9]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关于新版MEGA的结构划分，两位苏联学者还是沿循了MEGA¹的模式，即分为三大部分：第I部分为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除去《资本论》）；第II部分为《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第III部分为通信。^[10]

从斯捷帕诺娃与塞涅基娜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对新版MEGA作了全面的考虑。她们既想到了MEGA之为科学考证版所应具有完整性，又想到了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出版工作中各自具有的优势进而得出相应的任务分工；她们既看到了国际合作对新版MEGA的重要性，又看到了德国在整个出版活动中应当占据的主导地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学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曾经的MEGA¹框架，不论是三部分的卷册结构划分，还是从第8卷开始编辑、前7卷仅限于修订而言，新版MEGA在苏联学者这里只是MEGA¹的继续。

在与莫斯科的两位倡导者就新版MEGA进行讨论之后，1957年4月24日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部门领导协商会，阿尔诺德在会上就莫斯科之行的讨论成果作了汇报。对于斯捷帕诺娃与塞涅基娜提出的建议，研究院各部门的领导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就编辑队伍来说，一个高水平的科学工作人员队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谨慎选出参与MEGA的人员。这里，部门领导们提出了几个重要人选，他们包括在马恩部工作多年的历史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伯恩哈特·多姆（Bernhard Dohm）、任职于洪堡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瑙曼（Robert Nauman）教授以及后来担任东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奥托·莱茵霍尔德（Otto Reinhold）教授。第二，就资料部分来说，由于MEGA是一个科学版本，因此资料部分一定要保留。它基本上应以MEGA¹的资料为准，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补充。具体来说，资料部分必须包含文献和人名索引，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资料则可以排除在外。另外，资料应该以德文呈现，因为大部分文章都是德文，译成其他语言将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就发行来说，MEGA的发行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考虑到这样的科学版本通常只出版一次，因此预计发行量将是两万册至三万册。第四，就卷次顺序来说，虽然苏联学者提出，延续MEGA¹未完成的卷册，先从第8卷开始出版，之后再版已有的MEGA¹前7卷，但是东德学者认为，应该同时进行这两部分的工作，也就是说，在编辑出版第8卷的同时也要再版第1—7卷。第五，就MEGA各部分的划分来说，研究院列宁部主任艾里希·文特（Erich Wendt）提出了新的建议。他认为，尽管MEGA¹只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但是新版MEGA或许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部分，即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片段等等的第IV部分。这可谓是MEGA²历史上有关增加独立的摘录部分的最早说明，它也是部门领导协商会的诸多观点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另外，关于未来的工作方向，部门领导们也提出了设想，首先在更大规模的讨论会中商讨上述的各个问题。这里必须邀请中央委员会科学部、“卡尔·马克思”党校、社会科学研究院、德国科学院等机构的代表以及瑙曼、莱茵霍尔德、阿尔弗雷德·雷姆尼茨（Alfred Lennitz）等教授，或许也可以考虑邀请狄茨出版社以及各个高校的代表来共同进行研讨。在得出最终的结论之后，柏林方面将与苏联同人再次进行讨论协商，并在此基础上向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交有关出版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建议。^[1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东德方面在新版MEGA的合作事宜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瓦尔特·乌尔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在1957年底亲自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阐述了一系列合作建议，其中的第七点就涉及新版MEGA的合作事宜。1957年11月4日，艾尼柯在致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甘纳迪·奥彼赤金（G. D. Obitschkin）的信中谈到了乌尔布里希特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欢迎出版作为科学全集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想法，并且为适合的德国同志在实现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过程中全面负责地参与其中而创造条件。为了确定这一规划的更进一步的细节，我们推荐由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领导人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人共同组成一个咨询委员会。那时，相应的建议就可以在这一咨询委员会中得到制定，并在政治局中得到探讨。我们请您告诉我们，是否同意这一建议”^[12]。

1958年5月16日至6月4日，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弗里茨·克尼特尔（Fritz Knittel）访问莫斯科，他再次与苏联同行就MEGA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一次，苏联同行在赞成柏林方面之前提出的建议的同时，又具体地阐明了他们关于MEGA的设想。首先，新版MEGA预计约为60卷，编纂时间为十年到十五年。其次，苏联同行对柏林方面提出的设立独立的第IV部分的建议表达了赞同之声，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所有著作要全部按照时间顺序收录在第I部分中，而他们对其他作者的著作所作的全部摘录则收录在第IV部分中。不过，在发行量的问题上，苏联同行保守了很多，他们认为，新版MEGA的发行量应该只有三千到四千册。^[13]

总的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德和苏联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都产生了出版新版MEGA的构想。但是很显然，东德方面采取了更为切实有效的行动。下到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恩部，上至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东德的各个层面都在为未来参与到新版MEGA编辑出版活动中而做着准备工作。相比之下，苏联方面则显得过于保守和谨慎。虽然苏联学者很早就提出了继续出版MEGA的构想，并联系东德学者共同商讨、研究，但是在苏联国内，这一想法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支持。对苏联高层而言，正在进行的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工作已经足够满足需要了，因此，连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奥彼赤金都对新版MEGA不以为意。在这种情形下，仅有像塞涅基娜和斯捷帕诺娃这样的学者振臂呼号，力量显然过于单薄。于是，在没有争取到各方支持，尤其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明确、有力的支持的情况下，这样一项时间跨度长、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的理论工程就自然而然地被搁置了起来。

第二节 MEGA² 前史的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期筹备MEGA² 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初，一度停滞的新版MEGA计划又出现了复苏之势。这一次，东德方面再次成为积极倡导新版MEGA的主要阵地。

1961年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关于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任务的草案中提出，在完成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后，研究院要同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准备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同年11月18日于柏林举行的一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议上，艾尼柯指出，研究院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长期计划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首先为编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其次为之后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考证全集创造科学前提。1962年3月，政治局正式作出决议，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在完成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著作卷和书信卷后，着手进行出版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准备工作。^[14]

1962年9月，接替意外去世的阿尔诺德的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新任领导霍尔斯特·梅尔巴哈（Horst Merbach）拟订了马恩部未来的工作计划，其中专门对新版MEGA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说明：

旧版MEGA……虽然缺乏统一性，并且有其他的不足，但它在原则上符合科学考证版本的要求。它可以继续作为塑造新版本的范型。这套全集必须用原始语言收录所有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书籍、小册子、宣言以及所有现存的手稿、摘录、计划、草稿、书信等。它要尽可能严格地遵循时间顺序。在这里，我们提出全集的下列划分以供讨论：

第I部分：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除了为第II部分所计划的著作）、历史的和政治的著作（作为例外，这一部分也将收录那些具有重要通告性质的书信或者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书信）；第II部分：《资本论》的所有准备材料以及《资本论》本身；第III部分：通信，一方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另一方面是他们写给第三方的书信（虽然第三方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科学考证的全集相联系，但是出版一部或两部关于这些第三方的重要书信的补充卷册看起来是合适的。）；第IV部分：摘录、提纲、草稿、片断和初稿（除了为第II部分所计划的文稿）。^[15]

可以看出，在关于新版MEGA的设想上，新上任的梅尔巴哈依然承袭了50年代柏林研究院学者的观点，强调MEGA的四部分结构，特别是摘录部分的独立性。当然，他此时的构想依然没有超越旧版MEGA，没有设想完全摆脱旧版MEGA，因而依然把旧版MEGA视为新版MEGA的范型。

总的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只有柏林方面在独力进行着关于新版MEGA的设想与努力。它希望能够与莫斯科方面展开合作，却没有得到后者的任何积极回应。事实上，1962年夏，莫斯科方面甚至正式回绝了柏林提出的关于共同出版新版MEGA的建议^[16]，这再次使得新版MEGA的前景渺茫万分。幸运的是，这种情形很快由于莫斯科方面的转变而得到了改观。

1962年10月4日，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领导亚历山大·马里施（Aleksandr Malysch）致信即将来莫斯科进行学术考察的柏林马恩部主任梅尔巴哈。信中有道：“与准备关于我部未来工作前景的正式决议相联系，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现在就要了解贵研究院对原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GA）——概括地来说——有哪些设想。先限定于下列的说明就足够了，即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这一版本有了决议；您打算在1965年（或早些）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您建议我们，就两所研究院在这一重要事宜上的合作达成一致，并且也打算吸收其他科学机构（如费尔特里奈里研究院）。如果您能把贵研究院院长的这样一封信带给我们的院长，或者通过别的途径让我们能够在十月份收到它，那就太好了。”^[17] 马里施的来信是一个绝佳的信号，它表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恩部并没有放弃关于新版MEGA的构想，只不过出于同50年代的斯捷帕诺娃和塞涅基娜等学者相同的考虑，苏联方面希望通过借助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一外力来促使苏联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新版MEGA的相应决策。梅尔巴哈直接在马里施的来信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最初想和苏联同志共同出版MEGA。6月得到的消息，即

苏联同志不想做MEGA，动摇了我们的设想。我们重新提出了问题，并且想通过国际合作来做MEGA，却还没找到……机会与党的领导人讨论此事。”^[18]苏联方面曾经的拒绝合作令柏林方面一时难以同党的领导人再就出版MEGA的其他途径——如国际合作——进行协商。但令人欣慰的是，形势峰回路转，苏联方面很快又回到了合作的轨道，并且准备把出版MEGA纳入其远景规划中。如此一来，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可以按照政治局的指示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展开合作了。

1963年12月4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正式通过了准备出版新版MEGA的决议。这一决议指出，第一，全权委托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取得联系，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国际合作下，或许也在其他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和研究院的参与下，阐明出版MEGA的建议。委托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同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就此举行初步的谈判与协商。同莫斯科研究院的同志进行的初步的协商和谈判所适用的准则是，我们认为，MEGA应该包括所有能够得到的原稿本或原文形式的著作、著作的异文、准备材料、草稿、摘要、摘录、笔记、片段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信，包括所有由他们作的修改、评论和删除。这一任务的负责人为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期限为1964年3月。第二，由于对MEGA工作来说，有必要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建立一个广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因此，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宝库，以供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照相复制或制作缩微胶卷。第三，委托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得到莫斯科研究院原则上的同意之后，制定关于MEGA方案的初稿，并同莫斯科的同志就初稿进行讨论。讨论之后，向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或政治局提交关于出版MEGA的草案。这两项工作的负责人是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期限是1964年年底。^[19]

可以说，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议是对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进行新版MEGA工作的再次正式确认，它对后来研究院着手进行新版MEGA的准备工作起到了根本的推动作用。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党的总书记乌尔布里希特也再次表现出对新版MEGA的大力支持。1964年1月18日，乌尔布里希特致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信中谈道，在马克思逝世80周年、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后，是时候让公众通达“德意志民族之子”的遗产了。因此，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受全权委托，开始准备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乌尔布里希特请求赫鲁晓夫允许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也参与到这项事业中，并且提供其所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遗产供柏林方面复制。^[20]这一次，乌尔布里希特得到了苏联政府明确且积极的回复。在1964年7月3日的回信中，赫鲁晓夫写道：

亲爱的乌尔布里希特同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成您提出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参与由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准备的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出版工作的建议。

为了帮助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进行前面提到的出版工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以照相复制件或缩微胶卷的形式提供在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未出版的文献，任命其代表进行共同的编辑活动，并在同等的基础上任命工作人员进行每一卷要完成的准备工作。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制订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组织工作的建议，然后由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对之进行审核。

致共产主义的问候！^[21]

由此，经过长达十年的等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终于对新版MEGA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从此，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科学人员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同行们共同展开了新版MEGA的出版准备事宜。MEGA²编辑出版工程正式启动。

在MEGA²编辑出版工程启动前后，也就是在1964年6月底，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主任亚历山大·马里施同到访的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主任梅尔巴哈就新版MEGA进行了交流，并就相关准备工作的最初举措达成了五点共识。首先就MEGA²的性质、规模、结构来说，MEGA²应该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著作及其准备材料、书信、摘录，等等。它大致有50—55卷，包括三个部分：历史的、哲学的著作及相关材料，各个文本将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书信。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将在1966年年底之前制订出整部MEGA的全景规划，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基于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要求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所缺少的文献将在1966年后以复制件或缩微胶卷的形式由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交给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第二，就MEGA²的组织工作来说，为了保证对MEGA²的同等领导，应当成立一个由4—6人组成的联合编辑委员会，两所研究院分别派2—3名同志参与其中。这个编辑委员会将由两个具有同等权力的主任和两个副主任来领导（这两个职务均由两所研究院各出一名人员担任）。除了负责整个版本的编辑委员会外，每一卷也要成立工作小组，这些小组也要在同等的基础上组建并开展工作。第三，就工作以及人员安排来说，编辑委员会决定分工。按照已经达成的意向，文本及其资料的初校由双方共同承担，二校（排版前）则由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全权负责。另外，双方研究院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完善工作人员队伍，这些人员要精通英语和法语。第四，就各卷次科学资料部分的编辑而言，要充分利用俄文版以及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时，资料部分一定要包括前言、注释和人名索引，并用德文出版。另外，整部全集应该制订名目索引。最后，各卷次的印刷工作在东德进行。^[22]

总的来看，1964年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MEGA²的具体举措基本沿袭了1957年4月苏联学者提出的方案，然而不只如此。柏林研究院一直以来坚持的MEGA四部分结构原则亦倒退回1957年方案的水平，也就是旧版MEGA的水平。可以想象，在这次交流会中，苏联方面占据了主动，而柏林方面做出了让步。另外，如果说赫鲁晓夫在给乌尔布里希特的回信中强调莫斯科方面对柏林方面的支持、帮助和配合作用，那么在这一交流结果中，苏联方面俨然成为了新版MEGA的主要承担者，它将全面负责新版MEGA的全景规划，即各卷次内容的制订，而柏林方面却处于从属地位，成为了配角。

显然，对于这一讨论结果，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新任院长洛塔·贝尔托尔特（Lothar Bertold）并不满意。他试图为柏林研究院争取到制订MEGA全景规划的平等地位。在1964年8月13日致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佩约托·波斯波洛夫（Pjotr Pospelow）的信中，贝尔托尔特提出，把制订MEGA全景规划的任务交由未来的由两所研究院人员共同组成的MEGA编辑委员会执行，同时建议尽快在年内召开编委会成立大会。^[23]

事实上，早在1964年夏，柏林方面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MEGA编辑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终审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新版MEGA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伯恩哈特·多姆，另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人员，如马丁·洪特（Martin Hundt）、海因茨·胡琴斯基（Heinz Ruschinski）等。为了更好地准备未来的新版MEGA，柏林的MEGA编委会在6月展开了一场关于“你如何设想MEGA”的问卷调查，其中的问题包括：“1.你建议在主要部分中做哪些划分？2.应该如何看待时间顺序原则？3.对于文本的构造你有什么建议？4.MEGA应该包括具有何种特征的何种资料？5.你认为对于MEGA工作来说哪些准备是必要的？6.你对计划中的MEGA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和想法？”^[24]

可以说，柏林的MEGA编辑委员会这次是打开大门、诚招良策。它不再像过去一样局限于领导圈子、束缚于某些政治目的来讨论MEGA，而是完全出于更好地、更高质量地完成历史的、考证的MEGA而全面吸纳研究院人员的建议和良方。事实证明，这次调查的成效非常显著，对于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未来进行MEGA的准备工作起了巨大的提升和促进作用。

按照柏林MEGA编辑委员会就此次调查所作的总结报告，我们可以把这次讨论的成果归纳如下：第一，就MEGA收录的内容来说，应该设立独立的摘录部分。经济部指出，可以考虑确立独立的第IV部分——摘录部分。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遗留下來的摘录笔记有200本之多，其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纯粹的摘录，其余的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丰富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习惯于时隔不久就摘录不同人的著作，而这些摘录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又经常难以明确地反映出来，因此，如果把这些摘录强行拆开、穿插于文中，将影响它们的整体性。因此，摘录部分的独立性就成为了一种必需。另外，研究院大部分工作人员还主张收录第三方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第二，新版MEGA或者MEGA²要比MEGA¹更加严格地执行时间顺序原则。第三，新版MEGA要完全忠实于原文。在书写形式上，不论是正字法、语言、缩写等方面，都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书写的原文展现，要尽可能地以原初手稿为准。第四，新版MEGA的著作、文章的底本应以第一版为准，以后各版的异文要在资料部分中予以说明。第五，资料部分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资料考证与编辑史、著作史、异文对照和索引。其中，人名索引不包含评价性内容，以此来保证历史考证版本的客观性。第六，新版MEGA要以第二版《歌德全集》考证版为准，充分地吸收后者的编辑原则与方法，从而更好地运用于新版MEGA的编纂工作。^[25]在作出以上关于新版MEGA的基本考虑的同时，柏林MEGA编辑委员会也认为，有必要在真正展开编辑工作之前准备一部试编卷，它要包含三个主要部分的不同著作和书信，同时还有异文、摘录和编辑所作的文本考证性的注释。这部试编卷要寄给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让他们进行鉴定、评估。^[26]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的建议、意见的基础上，正式展开MEGA各卷次的出版工作。八年之后，也就是1972年，这部构想中的试编卷成为了现实。

尽管柏林方面一直在精心准备着未来的MEGA²，但是它与苏联方面的合作却没有大的进展。因为苏方一直没有确定未来的MEGA编辑委员会的成员。直到大半年之后，MEGA²才有了新的进展。1965年4月，苏方确定了其编委会成员，分别是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波斯波洛夫、副院长奥彼赤金、马恩部主任马里施以及中央党务档案馆马恩部主任塞涅基娜。德方的编委会成员则是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洛塔·贝尔托尔特、分管马恩部的副院长海因里希·甘姆库（Heinrich Gemkow）、接替梅尔巴哈的新任马恩部主任罗尔夫·德鲁贝克以及研究院图书馆馆长布鲁诺·凯泽（Bruno Kaiser）博士。在双方成员确定之后，召开MEGA编辑委员会成立大会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三节 MEGA² 的历史性诞生

1965年10月6日，在MEGA编辑委员会成立大会也就是第一次MEGA编委会大会召开之前，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洛塔·贝尔托尔特致信库尔特·哈格，向他说明了MEGA编委会德方成员的基本立场。^[27]

第一，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德方编委认为，尽管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负责MEGA的主要工作，但是作为出版方，应该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与所有专家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这里既要同兄弟政党下属的研究院、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进行合作，也要与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进行合作。MEGA个别卷次的编辑工作也可以交由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进行，即使他们不是党员。当然，每一卷最终都要由MEGA编委会进行审核。另外，要加强同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米兰的费尔特里奈里研究院档案馆等学术机构的合作，要尽可能地把这些机构所独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收录在MEGA中。

第二，MEGA收录的内容要全面完整。德方编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历史考证版应该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这就是说，在MEGA各卷次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和书信都按照原初稿本和原初语言来展现，包括所有由他们所作的修正、注释和删节。另外，历史考证版还要收录内容广泛的各种异文、草稿、摘要、摘录、笔记和片段等。显然，德方编委在这里再次表明了对独立的摘录笔记部分的坚持。

第三，MEGA的资料部分将包含前言、注释和索引。与俄文或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前言不同，MEGA各卷的前言要关注于该卷所收录的文章或书信的历史，致力于对它的资料考证。注释也要服务于文本考证，那些用于对文本内容进行解释的注释则弃之不用。每一卷的索引要包括人名索引和文献索引。另外，在MEGA全部完成之后，要制订一部总索引。

第四，就MEGA的构想工作来说，主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

首先，拟订MEGA方案。这一方案要详细地说明MEGA的内容和划分，列出各部分所收录的全部著作、文章，并对特定部分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内容进行说明。另外，要确定最为重要的编辑原则，德方编委预计，这套方案大概在1970年完成。其次，两所研究院共同编辑一部收录不同形式的著作和书信的MEGA试编卷，交由国内外专家评议、鉴定，从而检验编委会为MEGA制订的编辑原则与方法。德方编委估计，这部试编卷应该在1972年完成。最后，建议苏联方面尽快交给东德方面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复制件或胶片。同时，作为必要的资料基础，德方编委认为应当建立一座收藏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的所有图书、报纸、杂志以及尽可能丰富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二手文献的图书馆。另外，要建立共同的文献和信息中心，为MEGA的出版开发现代化的技术。

第五，就MEGA的组织工作来说，各个卷次要由最合适的人员来编辑，它可以由两所研究院的人员共同完成，也可以由某

一研究院或某些专家单独完成，但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共同的、统一的编辑原则。每一卷次在出版之前都要经过编辑委员会的审核。另外，德方编委建议，苏德双方各推荐一名秘书（德方秘书为罗尔夫·德鲁贝克），他们要在专家或小的工作组的协助下协商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制订编辑原则、制订编委会的规章等，并提交编辑委员会进行讨论和决定。德方编委还提议，在1966年4月或5月举行第二次编委大会，商讨制订MEGA方案的工作计划、两所研究院之间的分工和合作等问题。

可以看出，柏林方面为第一次MEGA编委会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它对未来MEGA的考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对独立于政治因素开展国际合作的强调不仅有助于未来的MEGA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下编辑出版，更有助于MEGA版本的全面性和完整性。MEGA将不仅成为一项群策群力的集体工程，而且将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支持与尊重的学术工程。其次，对MEGA收录内容的全面完整、对资料部分的历史考证特征的强调，表明了德方编委对MEGA之为历史考证版本这种文献形式的明确坚持。这也是MEGA与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尤其是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根本不同的地方。再次，对MEGA试编卷的再次强调表明了柏林编委对于MEGA编辑出版工作的严谨与认真。对于一项在新的历史时期展开的历史考证版学术工程，MEGA编委需要尽可能全面、周详地考虑具体的编辑方案与编辑准则，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的中肯建议和意见，这是实现MEGA卷次的高水平、高质量的重要保证。最后，对第二次编委大会议题的设想表明了德方编委对MEGA编辑出版工作的长期性的考虑，更表明了德方在MEGA²编辑出版工程上的积极态度。

1965年10月14—16日，MEGA²编辑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柏林方面代表有：洛塔·贝尔托尔特（主席）、海因里希·甘姆库、布鲁诺·凯泽、罗尔夫·德鲁贝克（秘书）；莫斯科方面的代表有佩约托·波斯波洛夫（主席）、甘纳迪·奥彼赤金、奥尔加·塞涅基娜和亚历山大·马里施（秘书）。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对MEGA²的版本性质产生了分歧。柏林方面按照之前的立场说明，认为新版MEGA应该是一套“历史考证性”的版本，尽管他们当时还没有对日耳曼文学最新的历史考证性编辑成果如《歌德全集》等进行彻底、全面的研究，从而确切把握历史、考证的版本学意义，但是在他们看来，历史考证版将是新版MEGA的根本特征。莫斯科方面则反对把历史考证作为新版MEGA的特征，在他们看来，MEGA就是“原语言的完整版本”，所谓历史、考证不应该出现在经典作家的著作标题中。不过，尽管存在版本性质上的分歧，双方编委还是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新版MEGA必须包括一个关于摘录、笔记和批注的第四部分”。根据苏联中央档案馆代表给出的有关马克思摘录和笔记本的信息，编委们认为，仅这一部分就需要30—40卷。因此，整部MEGA将约为100卷。考虑到苏联方面已经完成了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手头有大量空闲的科学工作人员，同时，它还掌握着大量未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笔记、摘录等方面的信息，于是，会议决定，由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马恩部负责制订MEGA²的全景规划，即各个部分的划分以及各个卷次的具体内容。另外，由于未来的MEGA卷册将主要以德文在东德出版，因此会议决定，由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负责制订具体的编辑准则。^[28]

然而，对于第一次编辑大会的讨论结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予以支持，它对新版MEGA采取了压缩的计划。根据1966年6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新版MEGA要在10年之内完成，并且先只批准三个部分、50卷次，至于新增的摘录、笔记、批注部分以及相关卷次，要依赖于一个额外的草案。^[29]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波斯波洛夫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于是，在没有同德方编委商量的情况下，新版MEGA的出版规划就被苏方擅自更改了。显然，柏林方面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因为编辑时间、编辑规模的压缩意味着MEGA本身的历史考证特征的完全丧失，所谓历史考证版的MEGA也就无从谈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在1967年2月于柏林召开的第二次编委大会上，德方编委严厉谴责了苏方的擅自行动，要求返回到第一次大会关于MEGA²的历史考证性质的决议。面对德方的指责，苏方编委奥彼赤金也在会上提交了一个声明，努力平息德方编委的不满情绪。当然，这次会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苏方马恩部提交了关于MEGA²全景规划的原则，即至少要力保MEGA²前两部分的完整性。德方则提交了一般的编辑准则的初稿，它以历史考证的原则提出：按照以前的稿本来展现文本，全面展现出自所有经授权的稿本、手稿以及印刷稿的异文，按照原稿进行文本修订等。^[30]

1967年6月24—27日，第三次编委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再次取得了积极成果。大会通过了东德起草的、并按照苏方建议再次做了修改的MEGA编辑准则，它成为后来MEGA²具体编辑活动的原初指导。另外，大会批准了苏方提出的关于新版MEGA第I、II部分的规划，即这两部分的划分及各卷次的具体内容。按照这一规划，第I部分将有31卷，第II部分将有8卷21册。由此，第I、II部分的完整性得到了保证。^[31]在1968年12月4—10日于柏林召开的第四次编辑会议上，双方编委确定了第III部分的卷次规划，同时也确定了它的详细的编辑准则。大会规定，柏林方面负责MEGA²第I部分，莫斯科方面负责第III部分，第II、IV部分由双方共同承担。另外，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同柏林的狄茨出版社签订协议，委托该出版社负责MEGA²的出版及发行工作。^[32]此后，经过多次协商与研究，MEGA²逐渐确定为包括133卷^[33]、将耗时数十年的宏大的编辑出版工程。

除了构想MEGA²的全景规划以及编辑准则，MEGA²编辑委员会还需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即争取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支持。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绝大部分文献遗产最初保留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纳粹的洗劫破坏，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批重要文献运到了国外。后来，为了筹措经费，社会民主党把它卖给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34]因此，尽管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拥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但它仅占全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1/3，另外的2/3恰恰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出版全面、完整的MEGA²卷册，必须掌握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资料。事实上，柏林方面早就意识到了加强国际联系特别是同荷兰方面联系的重要性。早在1964年9月，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的副主任理查·施佩尔（Richard Sperl）就强调：“为了真正确保计划中的MEGA的全集特征，必须首先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其他收藏着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寻求科学合作的不同形式。首先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来说，必须尝试一切办法，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就这一计划实现合作。”^[35]之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齐格弗里德·巴纳（Siegfried Bahne）分别在1964年10月和1965年2月到柏林访问，从而揭开了柏林与荷兰方面的密切联系。在苏德MEGA编辑委员会成立后，与荷兰方面就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变得刻不容缓。于是，为了争取荷兰方面的支持，1969年11月，MEGA²编辑委员会秘书德鲁贝克和马里施同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以及德语部主任进行了一系列谈判，最终达成协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为MEGA²的编辑出版提供它所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允许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使用它们拥有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以及所有关于19世纪工人运动史的资料；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可以基于自己的愿望考察1900—1917年的资料。^[36]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同苏联和东德的两所马列主义研究院签订了这样的框架合作协议，但它本身仅仅是资料的提供者，并不参与具体的编辑出版活动，更不对MEGA²各卷次负责。

在不断地解决MEGA²准备工作中遇到的诸如全景规划、编辑准则、资料来源乃至合作分工^[37]等问题的同时，MEGA²编辑委员会也进入了试编卷的具体编辑活动中。1972年7月，MEGA²试编卷正式出版。^[38]它包括一篇阐述MEGA²的任务和编辑原则的导言，一篇关于详细的编辑准则的草稿，出自四个组成部分（Abteilung）以及不同时期的14个试编片断，包括与之相关的资料部分。试编卷在出版之后就被寄给了苏联、东德、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科学机构以及科学家，以征求各方意见。到1972年年底，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20份意见书，其中既对MEGA²表示了总体的肯定，又提出了各种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39]以各国研究机构以及学者的建议为基础，在1973年6月于柏林召开的第五次编辑会议上，两所马列主义研究院最终确定了具体的编辑准则^[40]，并着手展开MEGA²正式卷册的编辑出版事宜。^[41]

1975年秋，由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担任总负责人的MEGA²第I部分第1卷由柏林狄茨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前言”的开头，我们看到了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对MEGA²的基本定位。“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全集（MEGA）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各项决议基础上出版的。它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开展的一项工作。MEGA以原文形式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他们的著作和文章，草稿和未完成的手稿、由他们起草的工人运动文件，他们的书信以及他们的摘录、摘要、笔记本和在书中所作的批注。这样一个版本符合现时代科学与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越来越令人信服地显现了出来”^[42]。可以说，随着MEGA²第I部分第1卷的正式出版，MEGA²终于历史性地诞生了。

第四节 苏东剧变后MEGA²的继续前进

在1975年秋MEGA²第I部分第1卷出版的同时，第III部分第1卷也问世了。1976年，第II部分和第IV部分的第1卷也正式出版。由此，MEGA²各部分各卷次进入规范有序的编辑出版活动中。

按照MEGA²编辑委员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总体规划，在MEGA²的四个部分中，著作部分将有32卷（33册），《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部分将有16卷（24册），通信部分将有45卷，新增的摘录、笔记部分将有40卷。如果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在书籍中所作的预计达30卷的批注部分，MEGA²的总规模将达到163卷（172册）。起初，编辑人员是按照拟订的卷次顺序开展编辑活动的。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他们开始打破卷次顺序，按照主题与时间段进行不同卷次的编辑，甚至同时负责不同部分的相同主题或时间段的编辑活动。于是，经过15年的努力，到1990年MEGA²共出版了43卷册，它们的具体情况是：第I部分出版了14卷，分别是I/1（1975年）、I/2（1982年）、I/3（1985年）、I/10（1977年）、I/11（1985年）、I/12（1984年）、I/13（1985年）、I/18（1984年）、I/22（1978年）、I/24（1984年）、I/25（1985年）、I/26（1985年）、I/27（1988年）、I/29（1990年）；第II部分出版了15卷册，分别是II/1.1（1976年）、II/1.2（1981年）、II/2（1980年）、II/3.1（1976年）、II/3.2（1977年）、II/3.3（1978年）、II/3.4（1979年）、II/3.5（1980年）、II/3.6（1982年）、II/4.1（1988年）、II/5（1983年）、II/6（1987年）、II/7（1989年）、II/8（1989年）、II/9（1990年）；第III部分出版了8卷，分别是III/1（1975年）、III/2（1979年）、III/3（1981年）、III/4（1984年）、III/5（1987年）、III/6（1987年）、III/7（1989年）、III/8（1990年）；第IV部分出版了6卷，分别是IV/1（1976年）、IV/2（1981年）、IV/4（1988年）、IV/6（1983年）、IV/7（1983年）、IV/8（1986年）。在所有这些卷次中，东德完成了2/3的工作量。其中，除了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之外，分布在各个高校如柏林洪堡大学、哈勒大学、莱比锡大学、耶拿大学、爱尔福特/米尔豪森高等教育学院以及柏林科学院的编辑小组完成了1/3的卷册编辑任务。^[43]

然而，MEGA²的编辑出版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1989年东德国内局势的日渐动荡，统一社会党乃至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于是，与政治联系密切的MEGA²也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它会不会也像MEGA¹一样夭折？会不会注定成为失败一场？面对MEGA²险恶难测的前景，苏联和东德学者展开了一场拯救MEGA²的行动。^[44]

1989年12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到了来自东德的最早的求援信号。之后不久，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正式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以及联邦德国埃尔伯特基金会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发出请求，希望能够想办法继续推进MEGA²编辑出版工程，防止它由于国际形势的动荡而被迫中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立即予以积极回应。1990年1月，第一轮谈判在阿姆斯特丹正式举行。

经过一系列的协商、谈判，东德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接受了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提出的两个原则条件：第一，MEGA²应该作为纯粹学术性的版本得到推进。这就意味着，编辑出版工作不应受到任何政治党派的利益和需要的影响，更不能服从于这些政治利益和需要。第二，MEGA²应该在更广大的国际框架下继续进行。这就是说，MEGA²的编辑出版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苏联和东德，而是应当尽可能地以国际协作的方式进行。^[45]客观来讲，这两个条件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就第一点来说，保证学术性、科学性以及去政治性或非意识形态性，本身就是历史考证版的应有之义，是它的基本原则。就第二点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大部分收藏于荷兰，小部分收藏于苏联，而他们二人又生于德国，大部分文章用德文完成。因此，仅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MEGA²编辑出版工作的国际性。如果再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居住于多个国家，所从事的研究涉及众多科学领域，国际性的合作研究更是必不可少。

1990年5月22日，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柏林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共同签署协议，

决定成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以下简称“国际马恩基金会”），共同推进MEGA²的编辑出版事业。1990年10月2日，时任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长的费舍（Eric J. Fischer）在阿姆斯特丹公证员法博（E. O. Faber）面前签署文件，国际马恩基金会正式成立。相应地，MEGA²各卷的版权转到了国际马恩基金会的名下。

在成立之初，国际马恩基金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完善自身的组织结构。1990年11月2日，国际马恩基金会理事会成立，其成员分别来自四个组成机构，他们是：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费舍（主席）、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米哈伊尔·P·米切德洛夫（Michail P. M'cedlov，副主席）、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的汉斯·佩尔格（Hans Pelger，秘书）和柏林科学院的瓦尔特·施密特（Walter Schmidt，司库）。理事会委托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领导设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国际马恩基金会秘书处，厄苏拉·巴尔泽（Ursula Balzer）担任罗扬的助手。与此同时，国际马恩基金会理事会决定，组建编辑委员会的核心小组，它所包括的四名成员分别来自四个组成机构，即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格奥尔奇·巴加图利亚（Georgij Bagaturija）、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的雅克·格朗荣（Jacques Grandjonn）、柏林科学院的马丁·洪特（Martin Hundt）以及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尤根·罗扬。1990年12月21—22日，核心小组的成员在莫斯科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核心小组成员是编辑委员会的主要代表，但并非全部。后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到了1992年，它又增加了8位成员，其中包括我国学者韦建桦。

在1991年3月于特利尔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之后，国际马恩基金会又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它不仅包括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学者，还包括与MEGA相关的各学科领域的杰出人士。他们包括：什洛莫·阿维内里（Shlomo Avineri，耶路撒冷）、哥尔德·加列森（Gerd Callesen，哥本哈根）、罗伯特·E·加茨登（Robert E. Cazden，莱克星顿）、伊林·费彻尔（Iring Fetscher，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帕特里克·弗里登森（Patrick Fridenson，巴黎）、弗兰西斯卡·高里（Francesca Gori，米兰）、安德雷泽·F·格拉布斯基（Andrzej F. Grabski，罗兹）、卡洛斯·B·古蒂埃雷兹（Carlos B. Gutiérrez，波哥大）、汉斯—彼得·哈施蒂克（Hans-Peter Harstick，不伦瑞克）、艾里克·J·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伦敦）、尤基尼·卡曼卡（Eugene Kamenka，堪培拉）、赫尔曼·克雷纳（Hermann Klenner，柏林）、尤根·库卡（Jürgen Kocka，柏林）、尼古拉·I·拉宾（Nikolaj I. Lapin，莫斯科）、海尔曼·吕柏（Hermann Lübbe，苏黎世）、狄奥多·I·奥伊则尔曼（Teodor I. Ojzerman，莫斯科）、大内力（Tsutomu Ouchi，东京）、佩德罗·里巴斯（Pedro Ribas，马德里）、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巴黎）、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 Schieder，科隆）、让·斯丹尔斯（Jean Stengers，布鲁塞尔）、杉本俊朗（Toshiro Sugimoto，神奈）、弗兰克·土开（Ferenc Tökei，布达佩斯）、伊曼努尔·瓦勒施坦（Immanuel Wallerstein，巴黎/纽约）和周亮勋（北京）。1991年10月5日，科学咨询委员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一次会议，汉斯—彼得·哈施蒂克被选举为委员会主席。

由此，经过一年多的组织建设，国际马恩基金会拥有了自己的理事会、秘书处、编辑委员会和科学咨询委员会。^[46]它终于可以依托这些机构来开展实际的工作了。根据基金会成立的背景包括它的章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基金会的主要使命是推进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有文献遗产之历史考证版本的MEGA²的继续。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国际马恩基金会虽然在名义上称为“基金会”，但它实际上并不拥有任何财力、物力。因为按照荷兰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成立基金会，只要他去公证，并遵守荷兰的法律法规。因此，尽管国际马恩基金会致力于推进MEGA²的继续，但它并不是以财团的形式直接对这一项目提供财力支持与保障，毋宁说，它是作为一个国际联系网络，采取种种方式和手段来争取各国政府以及学术促进机构对MEGA²予以支持与援助。

如果说，在1989年年底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还依然存在并能主动寻求荷兰和西德方面的帮助，那么在1990—1991年，苏联和东德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都遭到解体的命运，东德各高校的MEGA编辑小组成员也面临着解雇、失业的威胁。具体来说，1990年年初，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更名为工人运动史研究院，它的马克思恩格斯部本来要被柏林科学院的MEGA工作室取代，但是这个工作室并没有能够成立。于是，马恩部的一部分建立了独立的“柏林MEGA基金会”。基金会在成立时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党（即原来的统一社会党）捐赠的2750万马克。然而在两德统一后的1991年2月，这笔赠款被冻结。1991年年底，更名为“柏林MEGA促进会”的柏林MEGA基金会被迫关闭它的MEGA工作室。与此同时，东德各高校的MEGA工作小组也遭到清理，科学工作人员将在1991年6月底或9月底乃至晚些时候被解聘。^[47]就苏联方面来说，1991年8月，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它实际上分成了三个机构：原来的研究院改建为俄罗斯社会和民族独立研究所；从前的中央党务档案馆改组成为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受俄联邦国家档案管理处领导；图书馆则成为受俄联邦文化部领导的独立机构。

苏联和东德的一系列糟糕的情况表明，MEGA²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它很可能会重蹈MEGA¹的覆辙，彻底夭折。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丹麦、俄国、日本、美国等多国的学者、科学家挺身而出，为MEGA²的存在与继续奔走呼号。1991年12月，1521名日本学者在题为“我们主张继续进行MEGA工作”的呼吁书上签名，声援MEGA²编辑出版工程。它成为这场规模空前的国际呼吁浪潮中的最强音。

在得到国际声援的同时，国际马恩基金会也紧锣密鼓地与德国政府沟通，谋求MEGA²的出路。1991年1月，德国科学理事会建议，把MEGA²纳入德国科学院负责的长期规划中。这无疑是保留与继续MEGA²的重要契机。7月31日，德国科学院会议负责人君特·布雷纳（Günther Brenner）致信国际马恩基金会，询问MEGA²的相关情况。在这封信中，布雷纳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个涉及迄今出版的各卷次情况，第二个涉及对已出版卷次可能做的改动，第三个涉及在编各卷次的情况，第四个涉及其他卷次的出版计划，第五个涉及人员问题，第六个涉及科学责任问题。^[48]

1991年10月，国际马恩基金会向布雷纳提交了关于MEGA²出版工作现状以及打算进行的推进工作的报告。这一报告分六个部分对布雷纳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第一部分关于直至1991年MEGA的历史。其中介绍了作为MEGA²之前史的MEGA¹的历史、MEGA²的出版方案、四大部分中已经出版的卷次以及国际马恩基金会的成立情况。第二部分关于迄今已出版卷次的修改问题。国际马恩基金会表示，尽管已经出版的卷次有基于党派联系的政治影响，但这并不能够改变这些卷次自身的科学性。另外，考虑到未来资金投入的有限，决定暂时不考虑修改这些卷次。第三部分关于在编卷次的情况。报告介绍了各编辑小组成员或被解聘、或只有短期工作合同或前景难测的现状，并说明了各编辑小组负责的卷次及预计完成时间。第四部分关于进一步的出版方案。其中介绍了国际马恩基金会的各个组成机构，说明了初步的措施以及未来在保证质量和水平的前提下加快出版进程所采取的手段。第五部分关于工作人员。报告指出，未来的编者将继续在专业人士中寻找，但不放弃扩大编者范围、增加编

辑小组的可能性。第六部分关于科学责任。国际马恩基金会强调，在出版者变更之后，它将是MEGA²各卷次的科学责任承担者。^[49]

在布雷纳收到这份报告的同时，负责教育规划和研究资助的联邦—州—会议“学术规划”委员会也收到了这份报告。该委员会决定，暂时把MEGA²纳入“学术规划”之中。1992年2月，在对MEGA²已出版卷次进行了全面评估之后，德国科学院会议同国际马恩基金会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德国科学院会议负责完成已经处于编辑后期的MEGA²卷次，汉斯—彼得·哈施蒂克担任项目领导人。这一协议的期限为两年，之后将由新成立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来承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一学术规划。由此，MEGA²的编辑出版活动在德国出现了根本转机。与此同时，1992年初，普罗旺斯的德意志文明研究小组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联合组成了德法MEGA工作组，领导人是雅克·格朗荣与汉斯·佩尔格。另外，莫斯科的形势也有了好转：一小部分MEGA工作组成员在爱莲娜·阿扎诺娃（Elena Aržanova）的领导下留在了原来的研究院，即俄罗斯独立研究所；另外一大部分成员则在巴加图利亚的领导下转到了曾经的中央党务档案馆，即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50]于是，这两个机构的20名工作人员也可以在国际马恩基金会的支持下继续进行MEGA²的编辑工作了。由此，在国际马恩基金会的努力下，在世界各国学者的鼎力支持下，MEGA²终于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震荡，继续扬帆前进。

在确保各个MEGA工作小组能够继续开展工作之后，国际马恩基金会便着手制订MEGA²新的出版方案和编辑准则。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方面，在苏东解体之后的新形势下，MEGA²已经不再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由党的研究机构全面负责的项目，而是由独立的科学机构国际马恩基金会领导的学术项目，因此，去除MEGA²的政治色彩是国际马恩基金会关注的首要问题。而且，这一点也是在国际马恩基金会成立之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同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达成协议的前提之一。其次，由于MEGA²不再是党的项目，不再有国家政府的全力支持，因此它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困境。另外，从已经出版的卷次来看，尽管其质量与水平都比较高，但是编辑时间却显得太长，平均每卷需要花费25人年，即五名编辑人员工作五年的时间。^[51]在这种情况下，MEGA²必须缩减出版规模，加快编辑速度，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保持甚至提高其学术水平。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1992年3月23—28日，MEGA²编辑准则修订会议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举行，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国际马恩基金会各机构成员、MEGA²各部分的编者，还有从事其他经典作家如歌德、黑格尔全集编纂工作的资深编者，共计28人。在几天的热烈讨论中，与会学者对MEGA²的去意识形态性达成一致意见，并就其编排、缩减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52]之后，经过一系列修改，1993年，《MEGA编辑准则》（*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由狄茨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收录了新修订的编辑准则，而且还收录了1976年MEGA²的编辑准则及1982—1984年所做的25个增补。^[53]1995年，经过多次讨论与意见征集，国际马恩基金会就MEGA²各部分的规模及各卷次的具体内容制定了最终的出版方案：第I部分由33卷（33册）减少为32卷（原来计划分两册出版的第21卷用一卷出版）；第II部分由16卷（24册）缩减为15卷（23册）；第III部分由45卷缩减为35卷；第IV部分由40卷缩减为31卷；另外，第IV部分还增加了第32卷，它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批注的。新的出版方案用这一卷取代了曾经预计达30卷的批注部分。由此，MEGA²由原计划的163卷（172册）缩减为114卷（122册）。^[54]

从1991年至今，除了原来的柏林和莫斯科的编辑小组之外，MEGA²又增加了十余个编辑小组，其中包括德意小组（由马堡和威尼斯学者组成）、丹俄小组（由哥本哈根和莫斯科学者组成）、德荷小组（由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学者组成）、法国小组（由巴黎学者组成）、俄法小组（由莫斯科和图卢兹学者组成）、日本北海道小组、日本仙台小组、日本东京小组、西日本小组、美俄荷小组（由纽约、莫斯科、阿姆斯特丹学者组成）、不来梅小组等。这些小组采取独立或相互组合的形式从事MEGA²剩余卷次的编辑活动。当然，在所有这些小组中，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小组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从1991年到2012年9月，MEGA²共出版了24卷册。其中，第I部分出版了6卷，分别是I/14、I/20、I/21、I/30、I/31、I/32；第II部分出版了8卷册，分别是II/4.2、II/4.3、II/10、II/11、II/12、II/13、II/14、II/15；第III部分出版了4卷，分别是III/9、III/10、III/11、III/13；第IV部分出版了6卷，分别是IV/3、IV/9、IV/12、IV/26、IV/31、IV/32。其中，仅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小组就独力完成了11卷。^[55]

在未来的日子里，MEGA²仍有55卷有待出版。毫无疑问，世界各国的MEGA工作小组仍然任重而道远。

[1] 关于MEGA²诞生过程的历史描述主要参考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43-55; Martin Hundt, “Gedanken zur bisherigen Geschichte der MEGA”,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56-66;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41-63;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MEGA-Studien*, 1994/1, S. 60-106.

[2]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S. 44.

[3] *Ibid.*, S. 43.

[4] 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初计划出版30卷，后来扩展为39卷，另有11卷增补卷。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以这一版为基础的。

[5]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S. 45.

[6] 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初并未收录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七个笔记本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这些文献早已收录在MEGA¹第I/1.1卷和第I/3卷中了。

[7]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S. 45.

- [8]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S. 47.
- [9]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S. 53-54.
- [10] Ibid., S. 55.
- [11]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S. 54-55.
- [12]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S. 49-50.
- [13] Ibid., S. 50.
- [14]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42-43.
- [15]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43, Anm. 10.
- [16] 参见下文中梅尔巴哈在马里施的来信上所写的话。
- [17]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44,
- [18] 参见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44, Anm. 12。
- [19]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57.
- [20] 参见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S. 65-66.
- [21]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58.
- [22]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59-60.
- [23] Ibid.,S. 48.
- [24]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49.
- [25] Abschlussbericht der MEGA-Kommission Über die ersten Diskussionen zum Thema: Vorstellungen Über die MEGA vom Oktober 1964, Kopies in Ds. MEGA². 参见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49-51.
- [26]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52.
- [27] 参见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61-63。
- [28] 参见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S. 67-69。
- [29]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S. 69.
- [30] Ibid.,S. 70-71.
- [31]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S. 71.
- [32] Ibid.,S. 72, 75.
- [33] 按照MEGA编委会的估计, 第 I 部分将包括32卷, 第 II 部分为16卷, 第 III 部分为45卷, 第 IV 部分为40卷。1990年后这一出版计划有了变动, 参见本章第四节。
- [34]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 [35]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52.
- [36]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S. 73.
- [37] 就东德方面来说, 马列主义研究院同东德科学院、哈勒大学、莱比锡大学、耶拿大学、爱尔福特/米尔豪森高等教育学院等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进行MEGA² 的编辑出版活动。由此, MEGA² 编辑队伍的专业水平大大加强。
- [38]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Proband . Editionsgrunds ätze und Probest Ück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 [39]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S. 87-88.
- [40] 这些出版方针后来又根据具体的编辑实践几经增补, 其具体内容可参见Die 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Amsterdam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23-239。
- [41] 关于此次会议的详情, 可参见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S. 94-95。

[42]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VI/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 19* .

[43] 总的来说, 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完成了14卷册, 包括: II/1.1、II/1.2、II/2、II/4.1、III/1、III/2、III/3、III/4、III/5、III/6、III/7、III/8、IV/2、IV/4; 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完成了14卷册, 包括: I/1、I/2、I/3、I/10、I/11、I/12、I/22、I/24、I/27、II/3.1、II/3.2、II/3.5、II/3.6、II/6; 东德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完成了15卷册, 具体为: 莱比锡大学1卷 (I/13), 哈勒大学5卷册 (I/18、II/3.3、II/3.4、IV/7、IV/8), 耶拿大学1卷 (I/25), 柏林洪堡大学2卷 (I/26、II/9), 爱尔福特/米尔豪森高等教育学院2卷 (II/5、II/8), 柏林科学院4卷 (I/29、II/7、IV/1、IV/6)。

[44] 以下关于1990年后MEGA²在国际马恩基金会领导下继续前进的历史过程描述, 主要参考下列文献: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MEGA -Studien*, 1994/1, S. 5-31; Jürgen Rojahn,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Stand der Arbeit und geplante Fortführung”,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7 (1991), S. 470-482; Jürgen Rojahn, “Publishing Marx and Engels after 1989—the fate of the MEGA”, *Critique*, No. 30-31, 1998, pp. 196-207; 周亮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的产生、特点和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 韦建桦: 《“我们要肩负起出版MEGA的历史重任!”——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1年第6辑; 周亮勋: 《MEGA: 前景见好, 困难不少——“MEGA编辑准则修订会议”纪实》,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第9辑。

[45] 参见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S. 12-13; 周亮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的产生、特点和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

[46] 有关国际马恩基金会成立过程以及下设各机构成员的资料, 参见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S. 13-14; 周亮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的产生、特点和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 第66—68页; 韦建桦: 《“我们要肩负起出版MEGA的历史重任!”——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第9辑, 第291—294页。

[47] 参见Jürgen Rojahn,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Stand der Arbeit und geplante Fortführung”, S.476-477。

[48] *Ibid.*, S. 470, Anm. 1.

[49] 尤根·罗扬后来对这一报告略加修改, 发表在《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科学通讯》上。参见Jürgen Rojahn,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Stand der Arbeit und geplante Fortführung”,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7 (1991), S. 470-482。

[50]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S. 18-19.

[51] *Ibid.*, S. 20.

[52] 我国学者周亮勋作为国际马恩基金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了1992年的MEGA²编辑准则修订会议, 并撰写了《MEGA: 前景见好, 困难不少——“MEGA编辑准则修订会议”纪实》一文, 有关此次会议的内容可参见此文。另外也可参见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S. 22-24。

[53]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23-233.

[54] 关于四个部分的规模及各卷次内容的新方案, 参见Jacques Grandjone und Jürgen Rojahn, “Der revidierter Pla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Studien*, 1995/2, S. 62-89。周亮勋根据这篇文章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修改后的计划》一文, 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

[55] 分别是 I/14、I/21、I/30、I/31、I/32、II/4.3、II/14、II/15、IV/12、IV/26、IV/32。另外, 柏林—勃兰登堡MEGA小组还与其他小组合作完成了2卷。

第六章 MEGA² 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

作为一项规模庞大的编辑出版工程，MEGA²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全景规划的制定和编辑准则的确立。尤其后者，对于整套MEGA的性质、各部分各卷次未来的编辑出版工作都影响深远、至关重要。因此，在关于MEGA²的研究中，对编辑准则的考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本章中，我们就以MEGA²的编辑准则为主题，先对其创立史进行简单的勾勒，进而对其内容进行全面、详细的介绍。

第一节 MEGA² 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的确立简史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讨重新出版MEGA的可能性以来，关于未来MEGA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的讨论，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如何编辑新版MEGA，如何使之具有更高的学术质量与科学水准，始终是苏联以及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关心的问题。于是，正如我们在关于MEGA²诞生史的第五章中谈到的，不论是苏联、东德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内部的探讨，还是苏联与东德双方联合召开的编委会会议，都对MEGA²收录内容的完整性、是否构建独立的第IV部分——即收录笔记、摘录和批注的部分、是否遵循与日耳曼文学发展相适应的历史考证原则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热烈的讨论，其中不乏激烈的争吵甚至严重的分歧与对峙。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关于编辑理念与编辑准则的讨论关乎整个MEGA²版本的科学性质，关乎这一版本的未来走向与根本定位。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苏联和东德学者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绝对完整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避免带有倾向性的选择；第二，完整地再现文本的所有阶段（计划的提纲、草稿、初版以及之后经授权的各个版本），从而把著作本身理解为一个过程，其中的各个阶段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第三，按照付印稿所使用的语言来出版文本，保留当时的正字法和标点符号；第四，对文本进行广泛的阐释，包括描述文本的形成、流传和现状，说明它的历史与理论背景，提供书目学方面的注释，等等。^[1]这些内容都属于科学资料部分。

1972年，MEGA²试编卷出版，它包含着关于未来MEGA各部分之编辑原则的初步稿本以及运用这些原则的试作^[2]。在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120多份意见书后，MEGA²编辑委员会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又对编辑准则进行了修订，并在1973年6月于柏林召开的第五次编委会大会上通过了修订后的编辑准则。之后，随着MEGA²正式卷次的初步出版，这套准则又得到了一些修正和补充。1976年，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推出了《MEGA编辑准则》^[3]，对MEGA²整体的编辑准则进行了全面的说明，其内容涉及以下五点：MEGA的性质、内容与划分；各卷次的文本部分；各卷导论；各部著作的科学资料；索引。与此同时，该编辑准则还对文本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资料部分中书目的说明、人名索引、名目索引以及手稿的布局结构等具体内容的编辑准则进行了细致说明。这可谓MEGA²第一阶段也就是苏东解体前MEGA²编辑出版工程的根本准则。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这套编辑准则并不是一份公开出版物，而是作为苏联和东德两所马列主义研究院以及东德各高校MEGA编辑小组的内部资料来使用。随着编辑工作的日益推进和新的问题的不断出现，在1982—1984年，MEGA²的编辑准则又增加了25条补充规定。^[4]

苏东解体后，MEGA²在经历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之后终于得以继续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马恩基金会决定重新审核编辑准则，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之进行修改。此时，它的首要考虑是，基于MEGA²的历史考证原则而取消曾经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规定。同时，减少卷次的编辑时间，在不影响其科学性的前提下简化资料部分。^[5]

1992年3月23—28日，按照国际马恩基金会的决定，MEGA²编辑准则修订会议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举行，与会代表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当时已被任命或即将被任命的国际马恩基金会各委员会成员，包括格奥尔奇·巴加图利亚（莫斯科）、加里娜·格洛维娜（Galina Golovina，莫斯科）、雅克·格朗荣（普罗旺斯的艾克斯）、汉斯—彼得·哈施蒂克（不伦瑞克）、马丁·洪特（柏林）、曼弗雷德·诺伊豪斯（Manfred Neuhaus，莱比锡）、大谷祯之介（Teinosuke Otani，东京）、汉斯·佩尔格（特利尔）、尤根·罗扬（阿姆斯特丹）、瓦尔特·施密特（柏林）、弗雷德·施拉德（Fred Schrader，巴黎）、维塔利·维戈茨基（Vitalij Vygotskij，莫斯科）、周亮勋（北京）；第二，长期进行MEGA编辑工作的专家，包括罗尔夫·德鲁贝克（柏林）、阿尼利莎·格里沙（Anneliese Griese，柏林）、曼弗雷德·米勒（Manfred Müller，柏林）、理查·施佩尔（柏林）、英格·陶伯特（柏林）、君特·魏灵（Günter Willing，哈勒）；第三，其他经典作家著作的编辑专家，包括卡尔弗里德·格律恩德（Karlfrid Grönder，柏林）、瓦尔特·耶什克（Walter Jaeschke，柏林）、格奥尔格·拉比卡（Georges Labica，巴黎），齐格弗里德·帅伯（Siegfried Scheibe，柏林）、迈克尔·威尔纳（Michael Werner，巴黎）、文弗雷德·威斯勒（Winfried Woessler，奥斯纳布吕克）、汉斯·采勒（Hans Zeller，弗里堡）；第四，国际马恩基金会秘书处的五名人员，如厄苏拉·巴尔泽（阿姆斯特丹）等。^[6]

在这次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对MEGA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反省、总结与畅想。格朗荣在开幕式发言中提出，必须以对MEGA历史的批判为出发点。罗尔夫·德鲁贝克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苏东解体前MEGA²的编辑出版过程，谈到了MEGA作为科学版本同政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冲突。曼弗雷德·诺伊豪斯介绍了东德大学MEGA小组的工作情况。之后，MEGA²编者介绍了各部分中出现的特殊的编辑问题，其中，格奥尔奇·巴加图利亚和汉斯·佩尔格涉及的是第I部分，维戈茨基和弗雷德·施拉德涉及的是第II部分，加里娜·格洛维娜和雅克·格朗荣涉及的是第III部分，理查·施佩尔和汉斯—彼得·哈施蒂克涉及的是第IV部分。另外，我国中央编译局代表周亮勋和日本学者大谷祯之介介绍了中国和日本就MEGA所进行的讨论。^[7]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由专门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未来MEGA编辑原则的修订稿草稿——它包括编辑准则和具体的使用说明两个部分——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主要对象。在讨论中，专家们一致达成了MEGA²“去意识形态化”的共识，并且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第一，要考虑或者收录那些未经授权的著作和刊印本，严格限制存疑文章、第三方的记录以及译本。第二，第Ⅲ部分应当按照时间顺序收录所有的通信（写给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信用较小的字体，第三方写给第三方的信——如果涉及未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或写给他们的信件——以摘录的形式刊发）；另外，在这一部分中也可以收录题词。第三，在第Ⅳ部分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和批注应当“在考虑现代出版技术处理方法的情况下以适当的形式（版本或描述）”出版。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写于相同时期的摘录等应该在以后分开出版，原则上按照时间顺序。第四，关于多次重印的规定应当更为严格地表述。第五，对事实的错误说明以后不应在正文中，而应在注释中予以纠正或探讨。第六，频繁出现的异文以后应当能够概括性地表现出来。同样，在展现内在于手稿的文本发展过程时也应该能够减少对异文的记录。第七，应该放弃迄今为止这种类型的各卷导言。导言要说明每一卷的构成、内在的划分、文本考证工作以及编辑的决定，它应当划归到资料部分中。^[8]

经过这次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举行的编辑准则修订会议，1992年7月，新的MEGA²编辑准则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由国际马恩基金会的编辑委员会正式通过，并且决定自1993年起正式实施。同年11月底，在特利尔举行的编辑会议上，编辑准则的使用说明也被通过。1993年，新版的《MEGA编辑准则》由柏林狄茨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份编辑准则中，不仅收录了新时期MEGA²的新的编辑准则及其应用说明，同时也收录了苏东剧变前MEGA²的编辑准则与25条补充规定。由此，MEGA²编辑出版工程从传统的MEGA编委们自己的事务、内部的事务变成了向公众开放的、公开的事务。关注MEGA²的研究者、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这套透明的编辑准则更深刻地认识、把握MEGA²各卷次的内容。

第二节 MEGA² 的编辑准则

如前所述，1993年，新版《MEGA编辑准则》（以下简称“《编辑准则》”）正式出版，在经历了苏东剧变之后，MEGA²编辑出版工程又有了新的指导原则与纲领。1994年，《MEGA研究》第一期原文刊发了新版MEGA²编辑准则（不包括应用说明）。总的来说，MEGA²的新版编辑准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MEGA²的性质、内容和划分；第二，MEGA²的文本；第三，MEGA²的资料；第四，MEGA²的索引；第五，MEGA²的表格。接下来，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这些具体的规定。

一 MEGA² 的性质、内容和划分

《编辑准则》的第一部分是对MEGA²总体情况的规定与说明。

第一，就MEGA²这一版本的性质来说，《编辑准则》开门见山，在第一条规定中便作了精要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是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版物、手稿和通信的完整的、历史考证的版本。”^[9]这一规定具有两层内涵：首先，MEGA²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它将收录我们能够找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其次，MEGA²的版本性质是历史考证版，即它要对收录的文献进行细致的历史的考证，并且按照历史考证版的最新原则与要求进行编辑和出版。可以说，关于MEGA²版本性质的第一条规定是整个《编辑准则》的总纲。

第二，就MEGA²的内容来说，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0]：

首先，MEGA²收录可以证明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之手的以手稿或出版物形式流传下来的文本以及其他人的特定文本。它们包括：所有由马克思恩格斯亲笔写下的文稿，包括他们在手稿或刊印本中所作的标记（修正，旁注等）；并非由马克思恩格斯亲笔所写但却可以证明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或促动下产生的所有文稿、手稿或刊印本中的标记（口授稿，通过家庭成员、同事或誊写员所写的文稿；修订内容）以及事后为他们批准的记录；所有经授权的出版物，也就是在期刊中发表和再版的独立文章，马克思恩格斯事先都提交了付印稿，并在排印期间做了修正，或者说他们的作者身份可以被间接证明；他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即使它们在形式上是写给某个机构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题词或者致他们的题词。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收录以下内容，例如，一些未经授权的文稿或刊印本，但它们溯源于那些未流传下来或不能获得的经授权的文本实例（Textzeug）。

其次，MEGA²的附录以全文或摘录的形式收入以下内容：未经马克思恩格斯同意和授权、被第三方做了大量改动或修订的但同时又没有流传下来授权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未经马克思恩格斯授权但同时又没有流传下来授权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讲话、聊天和采访；未能充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之作者身份的文本（存疑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单独签署或者共同签署的文件，而且不能证明他们是这些文件的作者；他人完成的、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手稿或校样作了审核或者同意出版的方式而得到授权的他们的文稿的译本；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的他人的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参与或修订的情况下产生的他人写的文章。

最后，这一版本可以附加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证明资料。

第三，就收录材料的划分和编排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1]：

首先，就整套MEGA²来说，它分为四个部分：第Ⅰ部分是著作、文章和草稿（除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它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文章和讲话以及流传下来的初稿和后来的修改稿（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完成的译稿），不论这些文本是否完成或者是否完整地流传了下来。在该部分的附录中可以按照适当的形式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讲话、采访、签署的文件以及存疑文章等。第Ⅱ部分是《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它收录经马克思授权的《资本论》的各个版本（包括经授权的译本）以及所有直接属于《资本论》前期阶段的准备材料（自《1857—1858年手稿》起）。第Ⅲ部分是通信，它按照时间顺序收录所有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或委托他人代写的书信，以及他们所写或献给他们的题词。在该部分的附录中，个别卷次

可以出版相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资料，具体形式由编辑决定。第IV部分是摘录、笔记和批注，它要在考虑现代出版技术处理方法的情况下，用恰当的形式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本和个别摘录、笔记本和个别笔记以及他们在刊印本和手稿中所作的旁注和涂鸦。在第IV部分的某一卷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以及其中包含的阅读痕迹将得到说明。^[12]

其次，就那些可以证明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素描和速写来说，如果它们属于某部手稿、某封书信或某一摘录，那么就与之共同发表。否则作为独立的文献收录在第I部分中。

再次，就那些未流传下来的文本来讲，第I、II、IV部分各卷的资料中都会收录一份有关那些在该卷时间段内产生却没有流传下来的文本的目录，并给出证据说明其确实存在过。这份目录不考虑那些从未动笔或者不能被证明的计划或项目。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经授权的文本实例，如果在各卷次中已有了替代性的文本实例，也不予考虑。第III部分的资料卷将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一份有关没有流传下来的、但可以推断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或者写给他们的书信的目录，另外还要收录一份在相关书信中提及的关于未实施的项目或未流传下来的文本的目录。

最后，就各部分各卷次的划分来说，每一部分划分为不同的卷次，这些卷次采用连续的编号。由此，在每一部分中，卷次编号都从1开始，然后延续下去。每一卷都分为正文卷和资料卷（Apparatteil）两部分，它们各自独立成册装订，但页码却是统一连续的，都从正文卷开始计页，一直延续到资料卷。正文卷收录主要的著作、文章，有时候还包括附录、存疑文章以及插图。资料卷包括导论、缩写符号和标记表、相关文本群的文本史等。就单个文本的资料来说，一般包括题头（Kopfleiste）、形成与流传史、文本的构成、异文对照表、校勘表、注释。资料卷的结尾收录索引，包括文献索引、人名索引、名目索引以及其他必要的索引。在资料卷中，编辑所写的文本都采用德语，引文、书目等则按原始语言发表。

另外，各卷次的插图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们或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或著作的某一页复制件，或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资料的复制件，通常出现在正文卷中。

二 文本（Text）

文本是MEGA²的主体，它是正文卷的根本内容。就文本来说，《编辑准则》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说明，主要涉及文本基础、文本编排和文本的展现。^[13]

第一，所谓文本基础（Textgrundlage）就是文本底本，是指在编辑MEGA²的正文卷时，面对具有多个文本实例的著作或文章时最终收录的那个唯一的文本实例。一般来说，在正文卷中，每部著作只全文收录一个文本实例（文本基础），其他经授权的文本实例将以异文对照表的对比形式出现在资料卷中。不过，如果某部著作经授权的各个文本实例在内容上有重大差异，那么这些文本实例就会收录在正文中。

不同著作的情况不同，其收录底本的原则也不同。就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未能出版的著作来说，将以最终授权的手稿作为文本基础。如果这里涉及多层次的文本实例，那么将通过对其产生情况的考证分析来决定收录哪些文本层。对于那些流传下来多个经授权的文本实例（手稿或刊印本）的著作，将对文本的考证分析来决定选择哪一文本实例作为文本基础。对于那些流传下来多个经授权的刊印本的著作来说，只要其初版不是节选版或者先行版，就以初版作为文本基础。对于那些既查不出授权手稿也查不出授权刊印本的著作来说，将以某个未经授权的手稿或者某个未经授权的刊印本作为文本基础。

另外，《编辑准则》明确要求，不能把不同的文本实例或文本层混合起来。这一点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就文本编排来说，在每一部分中，正文都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时间指的是文本的写作时间，而不是准备或者出版时间。不过，在个别情况下，MEGA²允许偏离时间顺序而按照特定主题来编排不同的文本。

就那些写作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著作来说，其编排次序将以其形成史为基础。那些未标明日期的手稿、书信等，将按照调查研究出的写作时间进行编排。如果难以确定写作时间，则以形成史为依据进行编排。那些在期刊中没有经过太大的中断而连续发表的系列文章，将以第一篇文章的诞生时间为准进行编排。

一部著作后来的各个稿本——由于它已经在先前稿本刊发时被涉及并且展现在异文对照表中，因此，它在正文中只出版题头，资料卷会介绍它的形成与流传史，并且指出它的正式文本在MEGA中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为其著作后来的稿本所写的前言、后记、导论等内容，包括著作的译本，都按照写作时间进行编排，并收录在资料卷中。

在第I部分中作为附录刊发的资料按照其流传情况以及数量分成不同资料群进行概括，在这些组群内部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个别情况下也可以按照主题进行概括。生平资料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摘录和笔记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一时期所写的摘录和笔记将分别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他们为其摘录和笔记编订的顺序，即便不符合写作时间顺序，也要予以保留。资料卷的“形成史”和“文本构成”会介绍调查得出的具体的时间顺序。

第三，就文本展现来说，《编辑准则》就四个方面作了规定，分别关于一般原则、手稿的展现、刊印本的展现和MEGA各部分的特点。

首先，《编辑准则》对一般原则给出了14条规定，这里概括地介绍一下。正文严格地忠实于确定的文本基础，只修正那些出现明显错误的地方，并在校勘表中予以说明。不确定的字母用较小的字体表现，而不可辨认的字母则用大写X或小写x表示。纸张受损或被弄污的地方，只要确定，就以作者的名义在方括号补齐缺失的文本，或者用三个围在方括号里的点（[...]）表示。在资料卷中对受损情况以及文本补足依据进行说明。编辑为了帮助理解而作的必要补充以编者的名义刊印并置于方括号内。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时使用的缩写要保留，其他缩写包括人名缩写要以编者的名义补充完整。存疑情况在校勘表中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时所用的货币、长度、重量等符号要予以保留，必要时在资料卷中进行说明。书目说明

中的所有缩写也予以保留。陈述事实时出现的错误或混淆要在注释中纠正或说明。

每篇正文都由编辑给出统一格式的题头。第 I、II、IV 部分包括：作者和标题（如果文本底本没有标题，则由编辑拟订一个标题）；第 III 部分包括：寄信人、收信人、目的地以及写信的地点、星期几和日期。就期刊文章来说，如果以期刊本身作为文本基础，那么在题头与正文开头之间，由编者在页面右方给出期刊的名称、期号以及日期。出版地一般不作说明，但是如果出现刊物重名的情况，则在刊物名称后面附上地点。附录中的文本展现与主文本（Haupttext）一致，只不过使用较小的字体。另外，每页内侧都有以 5 为基数的行数，便于标志和说明。

在这部分规定中，还就诸如引号的使用、标题的排版等非常细节性的内容作了说明，此处便不再赘述。

其次，就手稿的展现来说，《编辑准则》给出了 11 条规定，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就手稿的文本基础来说，一般选择最终的稿本。如果个别著作的较早稿本结构清晰、连贯，也可作为文本基础。异文对照表展现文本的内在发展过程。手稿中出现的与作者笔迹相符的标记、删除、缩写等字母将不加说明，直接以作者的名义收录在正文中，并在文本实例的描述中进行概括说明。如果存有异议，则以编者的名义呈现，并在校勘表中加以探讨。写在手稿中各行的上面、下面或者边缘的内容直接编排在正文中，如果能够证明这符合作者的意愿。如果不能插入行文中，则原样编排在它们的既有位置，或者其他合适的位置。异文对照表中的考证性注释能够提供关于这些内容在手稿中的次序的确切说明。未完成手稿将按照其实际达到的写作程度来展现，因为没有人能够完成作者本人未能完成的著作^[14]。就那些内容丰富、分段较少的手稿来说，编辑可以通过细分段落（在校勘表中说明）甚至添加小标题（置于方括号内）的方式来方便读者理解文本。

手稿每一页的开头和结尾分别用竖线 | 标出。当两种情况重合时，就用两条竖线 || 标出。作者为每页或每印张作的编号置于两条竖线之间，如页面编号 | 11 | 或印张编号 | XI |。如果页面编号是由他人或者编辑后来加上去的，则把页面编号置于方括号内，即 | [11] |。作者所作的脚注作为文本片段编入手稿的相应页面。作者本人未完成的修订由编辑完成，并在校勘表中说明。在正文中由于疏忽而没有删除的词不会刊发在正文中，作者已删除但显然还想先保留不动的字词仍收录在正文中。这些都将在校勘表中得到相应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用完成符号（通常是垂线）标示的将继续用于其他文章的较长文本片段，收录在正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付印稿中为之后或者最终的出版形式所作的说明在异文对照表中介绍。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的附注与各个文本都没有关系，那么就在文本实例描述中以作者的名义刊发。

再次，就刊印本的展现来说，情况要比手稿的展现简单了许多，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不模仿各个文本基础即底本的印刷方式，如字体、字号等；底本中页面的转换也用竖线表示，如果在底本之前或之后还有其他文本（如期刊中的文章）存在；如果页码（如在一篇文章或一章的开头）缺失，在补充时不使用方括号；刊印本中的页面转换标记只与行文有关；脚注编入刊印本的正文页中；频繁出现的错误在校勘表中进行一般性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改的长条校样或印张也应被视为独立的文本实例，并在异文对照表中加以考虑。

最后，就各个部分文本展现的特点来说，《编辑准则》把第 I、II、IV 部分作为一类，第 III 部分作为另一类进行了说明。

就第 I、II、IV 部分来说，如果在底本中包含有单个的、独立的、更大篇幅的关于不同主题、写于不同时间的手稿群或者摘录群，那么它可以破例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在各个部分中进而出版。如果这些文本群尽管写作时间不同，但是在内容上相互联系，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笔记中后来添加的文字将原样刊发在它出现的地方。如果这些内容被挪到了别的地方，就要在“文本构成”部分进行说明并给出理由。如果在摘录中有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注释，或者说，摘录在内容上与原始资料有大的出入，那么要在资料部分中加以说明。如果摘录中个别出处的页码缺失，就由编辑用方括号补充完整。马克思和恩格斯调整文本位置的考虑不会刊印在正文中，但会在异文对照表中加以介绍。

就第 III 部分来说，其他文本中包含的对没有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逐字逐句的摘录，按照其写作日期作为书信片断出版，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上所做的与书信文本相关的标记，通常会在书信后面刊印。第三方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用小号字体出版。

总的来说，忠实于原文是 MEGA² 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因此，在文本的展现上，《编辑准则》也力图通过其具体、细致的规定全面呈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通信的本来面目，尽量避免人为的“介入”和“干预”（不可避免的干预也必须在资料中明确说明），从而实现 MEGA² 之为历史考证版本的特征。

三 资料 (Apparat)

资料是 MEGA²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 MEGA² 与 MEGA¹ 相比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不可否认，MEGA¹ 也有资料部分，但它只是依附在各卷次正文之后，信息量也不是很大。而在 MEGA² 中，资料部分扩展成与正文卷同等重要的独立卷册，其中涵盖的信息量特别巨大。因此，在关于 MEGA² 的研究中，资料卷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长点。在《编辑准则》中，主要对资料部分的六个组成，即各卷的导言、题头、形成流传和文本构成、异文对照表、校勘表、注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15]

(一) 各卷的导言 (Einführung)

只要有必要，MEGA² 各卷次都会有一篇介绍性的导言，它或者针对某一卷，或者针对某个卷册群。导言的内容主要涉及本卷次的构成、与其他卷次的界限和联系、本卷次内在的划分、收录或不收录文献的依据、资料的编排次序、对资料进行的考证分析以及编者相应作出的编辑决定等。此外，各卷都有一个“缩写、符号和标记表” (Verzeichnis der Abkürzungen, Siglen und Zeichen)，它对正文中使用的各种编辑、图书、资料、文献等缩写或符号进行解释说明。在必要的情况下，该表也会收录关于长度、货币、重量等的缩写或标记。在“缩写、符号和标记表”之后便是对卷次所收录的各个文本的资料说明，包括形成流传和文本构成、异文对照表、校勘表和注释等内容。

（二）题头

关于题头，上文在介绍有关文本的编辑准则时就已经涉及了。题头也属于资料部分，它包括作者（姓名）、文章标题、写作时间、正文的页数等内容。第Ⅲ部分与其他部分的题头内容不尽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本的形成(Entstehung)、流传(Überlieferung)和构成(Textkonstitution)

文本的形成、流传和构成是资料部分中相当有分量的内容，它可谓是编者所作的考证研究的成果汇总。《编辑准则》从六个方面对之作了规定：

1.就一般原则来说，这一部分资料就各个文本的形成、作者对之所作的进一步修改、流传下来的各个文本实例及其相互关系、作者在世时文本的传播史与影响史等内容介绍国际研究成果以及编者所调查出的事实。最后，对根据上述研究而得出的文本编辑方式进行说明、论证。对于那些在形成史上具有紧密联系的文本，可以给出总的、一般性的文本史的介绍。另外，要对撰写上述关于文本的形成、流传和构成时所使用的资料予以全面的介绍。

2.就文本的形成而言，要依次介绍以下内容：文本的形成（从产生到中间阶段到完成），包括说明确定其诞生时间的依据，从而说明其时间编排顺序；作者及其得以确定的理由，相关作者及其所做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动机、原因，写作目标，文本的内在逻辑，与之前之后文本的直接联系；工作的进展情况，主要的工作阶段，中断，计划的改变等及其原因；与出版商或编辑部进行的谈判、签订的合同，在个别情况下说明未能出版的原因。

就经授权的译本来说，应当概括地指出其在内容上与原著的偏差，必要时可用专门的表格进行说明；就摘录和批注来说，还要额外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资料及其作者的特点，另外还应说明摘录或批注的篇幅、类型、特点和重点。

3.就文本的流传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内容：手稿直至付印前的流传过程；首版的诞生，它的印刷量、广告、销售情况、印刷错误的校正、作者对这一版本的评价；进一步以原文或者其他语言出版的计划和工作；其他经授权的版本的特点。

那些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出版的著作，要介绍其首版的具体情况；如果是译著的话，还要介绍其原文首版的情况；那些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未经授权的著作或节选本，如果它对该文本的传播史与影响史具有重要意义，也要予以介绍；关于经授权各版本所产生的反响，要考虑到同时代人的重要判断、书评以及宣传的尝试，等等。另外，那些未经授权的手稿或版本，即使它们对经授权文本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它们对文本史、对经授权文本所产生的反响具有意义，也要提及并作简单介绍。

在《编辑准则》对文本的流传所作的规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关各种文本实例的符号标志，这里简要说明一下。首先，就手稿性的文本实例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亲笔撰写的文稿用H表示；经授权的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撰写的文稿，如果知道书写者，就用标记H^e表示，如果不知道书写者，则用H^r表示；非授权的文稿用h表示。对于出版的文本实例来说，经授权的独立著作作用D表示，未经授权的独立著作作用d表示，经授权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用J表示，未经授权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用j表示。长条校样或校对印张以及修改过的著作样书或报刊样本用K表示，由他人编辑的长条印张用k表示。未流传下来的经授权的文本实例，如果其先前的存在可以被证明，则用X表示；既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经授权的文本实例，则用x表示。由于大部分文本自身有着连续的发展过程，因此，通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在这些文本实例符号上方标上连续的数字，就可以清楚地展现这一过程，如H¹，K²，D³，J⁴或X¹，x²，X³。这里的上标1，2，3，4只是表示时间上的先后，没有特殊意义。在资料卷中，在关于文本的流传部分经常直接使用上述符号来表示文本的流传过程，因此，必须对这些符号非常熟悉。

4.描述文本实例亦是资料部分的重要内容。《编辑准则》按照手稿和刊印本这两种情况对文本实例的描述范围及内容作了规定。

就手稿而言，文本实例的描述涉及：文本实例的符号，即上文列出的不同类型的符号标记；文本实例的类型，如摘录笔记、笔记本、草稿、誊清稿、复本、付印稿等；原件收藏地，其档案编号及所有者；照相复制件；总体状况、篇幅、书写材料（即纸张的类型、规格、颜色、印章、水印、邮戳等）；执笔者、写字材料（即用什么墨水或材料写字）、标记的类型、页码及他人做的标记；手稿的内在情况（文本层、文本的缺损、字词缩写、位置调整）；该文本在时间上和谱系上所占据的位置。

就刊印本来说，文本实例的描述涉及：文本实例的符号；文本实例的类型，如首版、试编版、节选本等；作为正文基础的样书的收藏地；刊印本的特点、采用照相工艺进行的翻印；如果是报刊文章，要说明相关报纸的情况以及文章在报纸中的位置；印刷的特点；在时间上和谱系上所占据的位置；印刷史。

5.文本的构造。这部分资料主要就正文中文本实例的选择、正文在时间上的编排次序、标题的选择（如果文本基础并没有给出标题的话）等进行解释说明。同时，它也说明，在异文对照表中考虑了哪些文本实例，哪些没有考虑，以何种方式展现异文。另外还会说明，MEGA中出版的文本是否是首次出版或者首次以原文出版（有些文本可能最早是以俄文或其他外文出版的），如果不是，要说明该文本何时何处首次以原文或外文出版。个别情况下要说明，MEGA所收录的版本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先前的版本，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关于文本次序和文本展现的特殊的编辑处理方式，也在这部分资料中予以说明。

6.第三部分的特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或收到的书信部分中，资料卷将首先描述文本实例。之后介绍相关书信的形成、流传和文本构成。内容包括：没有留下日期或者日期出现错误的那些书信的真正日期得到确定的依据；文本基础的选择；写作书信的动机、对书信的回复及收信人的反应；书信首次以原文或外文出版的情况。

（四）异文对照表(Variantenverzeichnis) [116](#)

《编辑准则》对异文对照表的一般原则以及展现方式进行了说明。

1. 就一般原则而言, 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异文对照表通过展现不同的异文来记录文本的整个发展过程(由于正字法而产生的异文除外); 某些多次出现的异文在异文对照表的开头进行概括性的说明; 异文的表示方式是发散性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 完整再现不同文本实例的异文。在展现手稿内在的发展过程时, 异文可以按照各种标准选择出来, 而在书信、摘录和文献中则放弃展现异文; 在摘录中, 要展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加入的那些说明的文本发展过程; 他人所做的未经授权的文本改动, 如果对于文本的展现是必要的, 则收录在资料中。

2. 异文展现是比较复杂的内容, 它主要展现不同文本实例中某一处的不同异文。由于在不同情况下它都有不同的编辑安排, 因此下面只给出基本的异文对照表情况。

异文对照表收录在资料卷中, 它首先给出异文在正文中的页码和行数。然后根据不同的异文情况, 用不同标记或符号来展现。例如:

流传: J¹, J², K³, K⁴, K⁵, D⁶, 正文依照J¹。

这表明, 这一文本实例前后两次出版在报纸杂志中, 然后经过三次长条印张的修订, 最后独立出版。正文是以最早的报刊版作为文本基础的。

167.38 fÜR Juni 1848.] D⁶ fÜR 1848.

这里, 167表示页数, 38表示行数, fÜR Juni 1848.表示正文中该页该行的出现异文的位置。“]”是分隔符号, 表示对正文中的内容重复至此。D⁶ fÜR 1848.表示在最终出版的文本中, “fÜR Juni 1848.”变成了“fÜR 1848.”。

当然, 在表示异文时还会使用一些符号, 我们不妨参看《编辑准则》给出的例子:

294.27 Endfremdung) Entäußerung 这里表示, 第294页第27行最初写的是Endfremdung, 后来改成了Entäußerung。符号“)”表示变成、改变为。

295.12 |natürliche| 这里表示, 第295页第12行增加“natürliche”这个词。符号“|:|”表示增加、补充。

296.3 sich (jetzt) gegen 这里表示, 第296页第3行删除“jetzt”一词。符号“()”表示删除。

当然, 有时候还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 例如:

流传: H¹, H², J³。正文依照H¹。它表明, 文本实例经历了作者的两次手稿写作, 最终刊发在报纸杂志中。正文以作者最早的手稿作为文本基础。

165.5 disgraceful] H² J³ cowardly 这里表明, 正文第165页第5行的disgraceful在第二次写的手稿以及最终的报刊文章中改为cowardly一词。

165.7 every French member] H¹ the Paris members) every French member J³ all members. 这里表明, 正文第165页第7行的every French member在最早的手稿中经历了从the Paris members到every French member的修改过程; 当最终发表在报刊中时, 改成了all members。

上述的这些符号标记在MEGA²的每一卷中都有专门说明。在个别情况下, 也会增加一些特殊的标记, 例如在第II/12卷(恩格斯为《资本论》第2卷所作的编辑稿)的异文对照表中, 凡是恩格斯所作的增补、删除等都会在相应内容的左右上方标记符号^e, 以区别马克思本人所做的改动。

(五) 校勘表 (Korrekturenverzeichnis)

校勘表主要收录编辑在正文中所作的各种修正, 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给出修正的依据。同异文对照表的表现模式类似, 校勘表也先给出正文中的页码、行数、修正内容, 再用分隔号]隔开, 然后给出修正之前不同的文本实例中的内容。

如15.27 Mächte] H¹ Macht 这里表示, 第15页第27行的Mächte在最初的手稿中写作Macht; 或者倒过来说, 编者把原初手稿中的Macht改成了Mächte。

在校勘表中, 关于文本的考证性说明以编者的名义用小号字体给出。它主要包含下列信息: 手稿中个别地方的情况, 例如文本破损的原因和篇幅; 难以辨认的地方和难以破解的缩写词的可能意义; 可能由他人实施的文本介入; 现有的能够为修正提供依据的资料, 如作者的校勘表, 印刷错误表等; 与当前的修正有关的其他资料部分的说明。

总的来说, 校勘表也是资料卷的重要内容, 它是体现编辑的编辑成果的一个重要指征。

(六) 注释 (Erläuterungen)

注释是资料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文本的理解提供了大量信息。注释的内容包括: 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或吸收的资料; 关于其他相关文本处的说明; 对客观错误的纠正以及对其他错误的说明; 关于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的生平介绍; 关于不太为人所知的报纸杂志的介绍; 关于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科学史、政治等方面人物的情况说明。

注释采取的形式是, 先给出页码与行数, 再给出注释的具体内容。在必要的情况下, 用分隔符]把被解释条目与解释内容

分隔开来。

总的来说，由于作为MEGA²之一大特色的资料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关资料部分各个组成的规定在《编辑准则》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得到了细致的说明。它们构成了资料卷的总纲。

四 索引（Register）

在MEGA²的每一卷次或分册中，都有索引部分，它主要包括文献索引（Literaturregister）、人名索引（Namenregister）和名目索引（Sachregister）三部分^[17]。文献索引主要按照字母顺序列在正文（包括附录和异文）中直接或者间接引用、直接或者间接提到的文献，同时给出必要的书目说明。人名索引主要按照字母顺序收录所有在正文（包括附录和异文）中直接或者间接提到的人名以及文学作品、神话中的人物。名目索引是关键词索引，它主要关注作者及其所处时代所使用的术语。另外，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特殊的索引。

五 表格（Verzeichnisse）

关于不同主题的表格也是MEGA²不可或缺的内容^[18]。首先，每一部分的每一卷次（包括资料卷）都以目录（Inhaltsverzeichnis）这一特殊的表格开始；其次，在各部分的资料卷中，都包含缩写符号和标记表、异文对照表、校勘表、在附录中所使用的资料和文献表；再次，在第I、II、IV部分的资料卷中有未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一览表，而在第III部分的资料卷中有未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或收到的书信的一览表以及有关在书信中提到的、未能实现的计划或未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一览表。最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特殊的表格。

总的来看，MEGA²的编辑准则体现了三大编辑理念，即完整性、忠实于原文、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在关于MEGA²的性质说明中，《编辑准则》就明确提出了完整性原则，而在关于文本展现的具体规定中，忠实于原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等原则更是一再被强调。另外，全面的、几乎穷尽一切的资料内容亦是MEGA²的一大特色。在《编辑准则》中，有关资料部分的规定是最广泛、最复杂的。而在实际出版的某些MEGA²卷次中，资料卷在某种程度上比正文卷还具价值，许多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²编者耗数十年之功得出的研究成果都在其中得到了展现。因此，在MEGA²这里，我们可以突出地感受到历史考证版的显著特征。可以说，作为MEGA²各卷次的总纲，《编辑准则》正是通过其种种规定确保了MEGA²的版本特征，确保了它的高水准和高质量。

第三节 从编辑准则看MEGA¹与MEGA²的关系

客观地讲，MEGA¹与MEGA²是不同历史时期之下的两个独立的编辑出版项目。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MEGA¹是在苏俄建国初期、在列宁的倡导下由梁赞诺夫启动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程。MEGA²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由苏联和东德联合发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编辑出版事业。这两个出版工程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并由不同的人物领导实施。但是，恰恰由于这两大编辑出版工程都牵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恰恰它们都是一种历史考证版本，一个被学界称为MEGA¹，另一个被学界称为MEGA²，因此，MEGA¹与MEGA²便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我们就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MEGA¹与MEGA²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联系究竟是什么？

一 MEGA¹是MEGA²的源头活水

其实，尽管MEGA¹与MEGA²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编辑出版工程，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学术渊源，这种渊源关系就体现在对一个版本而言至关重要的编辑理念上。我们在上文中谈到，MEGA²的编辑理念是完整性、忠实于原文、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事实上，这三个特点亦是MEGA¹的特点。就此而言，MEGA¹可谓是MEGA²的源头活水。

（一）MEGA²继承了MEGA¹的“完整性”编辑理念

就MEGA¹的灵魂人物梁赞诺夫来说，他在毕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都努力追求资料文献的完整性。早在前MEGA¹时期，梁赞诺夫就在自己主持的“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资料卷”这两大编辑出版项目中表现出了他在学术上“竭泽而渔”的严肃态度。为了尽可能地实现这两大重要编著的完整性，他多次前往伦敦、布鲁塞尔等地收集、考察、核对各种资料，力求全面完整地收录相关文献，甚至不惜为此拖延出版时间。在投入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之后，“完整性”更是成为他为MEGA¹设定的首要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在作为编辑出版工程第一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收集环节，他就已经倾注全力，调集各方面力量进行文献资料的收集、找寻和购买事宜。在正式的编辑活动中，梁赞诺夫更是明确地把完整性作为MEGA¹的根本原则。正如他在MEGA¹的前言中指出的，“我们这个版本将首先为每一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以清晰的编排准确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遗产”。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不仅刊载严格意义上的著作、已经发表的文章，而且刊载所有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未发表的著作，所有未发表的文章和片断。两位作者的准备材料（搜集的资料、草稿、提纲、初稿，在个别著作中未收录的片断）同样也会最大程度地得到利用。如果有必要，它们也会以附录形式给出。另外，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所写的书信外，我们也刊载所有写给他们的书信……”^[19]

可以说，完整性是MEGA¹的首要编辑原则。几十年后，这一精神也被彻底贯彻到了重新启动的MEGA²中。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MEGA²的酝酿期，苏联和东德学者就一再强调新版MEGA要全面完整。在1957年4月苏联学者斯捷帕诺娃与塞涅基娜

提出的八点建议中，第一条就是：“新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应该是类似于MEGA的科学考证版。它应该尽可能地原文收录一切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书信等。”^[20]1963年12月底，在批准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联合进行新版MEGA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决议中，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也强调：“我们认为，MEGA应该包括所有能够得到的原稿本或原文形式的著作、著作的异文、准备材料、草稿、摘要、摘录、笔记、片断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信，包括所有由他们做的修改、评论和删除。”^[21]1976年，在MEGA²编辑委员会最终制定的《MEGA编辑准则》中，第一条“版本的性质”就明确指出：“MEGA完整地、忠实于原文地……按照其发展过程来保存和记录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毕生的文献著作。”^[22]于是，我们看到，在保留MEGA¹的三个组成部分，即著作部分、《资本论》部分以及书信部分的基础上，MEGA²又增加了有关摘录、笔记和批注的部分。其中，摘录与笔记将达到40卷，批注也将达到30卷。可以说，这一规模宏大的出版方案就是以“完整性”为出发点的。

苏东剧变后，在国际形势以及MEGA²的领导机构、组织形式、财政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新的《编辑准则》在1993年正式出炉。尽管新的编辑准则作了很大的调整，但是对完整性的要求却依然坚决。第一条“版本的特征”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是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版物、手稿和通信的完整的、历史考证的版本。”接下来，《编辑准则》对具体收录的内容进行了说明。“MEGA²将收录可以证明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之手的以手稿或出版物形式流传下来的文本以及其他人的特定文本。”这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亲笔所写的文章、著作、笔记、摘录、批注等，也包括并非他们所写但却可以证明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或者由他们所促成的他人所写的文稿信件；既有他们向报纸杂志提交的付印稿以及排印期间的修改稿，也有他人写给他们的书信以及与他们相关的题词等。另外，MEGA在附录中还以全文或摘录的形式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签署的文件、他们所译介的文章、有关他们的演讲和采访的记录以及不能够非常确切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作者身份的存疑文章（Dubiosa），等等。^[23]

可以说，尽管MEGA²的编辑准则经过了反复的修改，但是完整性作为这个版本的根本特征却从未被改变。虽然在具体的部分划分以及内容收录上出现过一些重大调整——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是MEGA²的编者始终力求秉承MEGA¹的根本编辑理念，尽可能实现MEGA²各卷次收录内容的全面完整。

（二）MEGA²继承了MEGA¹“忠实于原文”的编辑理念

“忠实于原文”是梁赞诺夫主编MEGA¹时所坚持的第二条原则。众所周知，梁赞诺夫在毕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工作中都严格坚守这一条原则，而这也是他后来严厉批判梅林主编的《遗著选》、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主编的《通信集》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MEGA¹的前言中，梁赞诺夫在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史时就对梅林与伯恩斯坦的著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关于梅林，梁赞诺夫指出了他的三点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梅林在《遗著选》中“毫无充分地删掉了”许多重要的著作、文章，包括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已经得到确证的一些文章。其次，梅林对《遗著选》中收录的文章也进行了改动和删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莱茵报》以及40年代其他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遭到了这种侵犯。第三，梅林还对收录的文章进行了修改。梁赞诺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更是如此——特别喜欢用疏排、引号、斜体字和粗体字。梅林决定消除这种印刷排版上的‘不工整性’。他不是把所有的引号和着重号、粗体字和疏排等等都再现出来，而是仅仅在他认为不多余的地方才这么做。”于是，梁赞诺夫得出结论，所有这些都使得梅林的《遗著选》成为“极其主观的版本，它迫使人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求助于原稿”。一言以蔽之，梅林的版本“并没有忠实地再现原文”。^[24]

与梅林相比，梁赞诺夫在MEGA¹前言中对伯恩斯坦的批判篇幅少了很多，力度上也稍弱了一些。或许是因为在后文中还要感谢伯恩斯坦对MEGA¹给予的帮助，梁赞诺夫仅仅是用寥寥数语指出，伯恩斯坦的版本“被大量毫无根据的、甚至不予标明的省略和删节严重损害”，“几乎没有一封信不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遭到删节”。^[25]但是，到了MEGA¹第Ⅲ部分即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前3卷导言中，梁赞诺夫就再也没有给伯恩斯坦留丝毫情面了。在这里，他集中笔锋对伯恩斯坦版的《通信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不仅确切地指出了伯恩斯坦在《通信集》中完全删掉的书信，而且还在第Ⅲ部分各卷次中以脚注形式具体地说明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所作的修改和删节。哪怕是一个词、一条下划线，他都不会放过。梁赞诺夫指出：“除了那些谨慎进行的正字法的处理活动……，我们在不作一丝删节或改动的情况下再现了书信。那些初次刊印的书信或书信段落提供的内容上的新东西也不少。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书信的完全忠实的再现——体现它的文风上的所有特征、使用它原初的‘毫无顾忌的’语言，展现所有的‘私密性’和‘反感的评论’，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事情’——才真正符合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为他们的出版物所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的‘成长历程、所感所思’出发来给出‘一幅未受歪曲的图景’。”^[26]

梁赞诺夫在MEGA¹中坚持的“忠实于原文”的编辑理念也为MEGA²的编者所承袭。早在MEGA²的准备过程中，苏联和东德的编者就意识到，要想保证它作为历史考证版的学术质量，就必须“原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这里所谓的“原文”并不仅仅是指原语言，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初写作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而且还指依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书信、笔记、摘录的本来面貌进行编辑活动。梁赞诺夫当年在编辑出版MEGA¹时就是依托于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复制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因此，在MEGA²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也必须以原始资料、原始手稿为依据。这也正是1969年苏联和东德方面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进行谈判并签署合作协议的原因所在。尽管苏联当时拥有约1/3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但其中的2/3是复制件。只有全面地考察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才能保证MEGA²各卷次内容的准确可靠，才能保证“忠实于原文”。事实上，1975年出版的MEGA²前言也强调了这一点，它指出：“对于一系列研究和出版任务来说，MEGA之所以是唯一可资利用的资料基础，就是在MEGA中，文本的再现忠实于原始手稿以及经作者授权的原文刊印本……尽可能地与原文相符合的原则包括去除明显的印刷和书写错误的考证性的文本审查。这种审查是在参考所有经马克思和恩格斯授权的他们的著作稿本的情况下进行的……按照原文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要受到特别的重视。未完成的手稿和初稿按照作者留下的、它们所处的修改阶段来展现。通常只在作者本人打算改动的地方进行调整、变动等等。

在个别情况下，有必要把中断行文的说明、增补等等放在与其内容和特征更为符合的其他地方。每次这种对文本次序的改动都要予以说明并阐述其依据。”^[27]

1990年后，在MEGA²新的发展历程中，“忠实于原文”仍然是其根本的特征。在2009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发表的介绍MEGA²编辑出版项目的基本情况、进展现状的小册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中，再次明确指出，“高度的忠实性”是MEGA²的指导性原则。“MEGA中出版的所有文本都按照它们原初写作时所用的语言出版。各部著作要完全依照作者的原始手稿来再现，所有的复制件都按照手稿——只要能够通达——或者按照作者同意的刊印版来核对。未完成的手稿按照作者留下它们时它们所处的阶段来展现。这种方法涉及消除明显错误的对文本的考证修订；但是对作者文本的介入要总是极其小心地进行，并且向读者确切地指明。”^[28]可以看出，新时期MEGA²对“忠实于原文”这一原则的坚持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它依然继承了MEGA¹的根本编辑理念。

（三）MEGA²“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的原则也可以追溯到MEGA¹

1976年的MEGA编辑准则明确规定：“MEGA完整地、忠实于原文地、在对流传情况进行文本考证的审查基础之上按照其发展过程来保存和记录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毕生的文献著作。”^[29]可以看出，除了完整性、忠实于原文之外，MEGA²的第三个编辑原则或理念就是按照历史发展过程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正如MEGA²前言指出的，“同完整性原则和用原语言再现所有文本紧密联系的是MEGA的另一个特征：它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从而记录所有著作从最初提纲到最终稿本的成熟过程——只要是流传了下来。因此，我们就能够首次为每部著作考虑到所有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或者经他们授权的稿本以及译本，还可以概览文本的总体发展过程。由此，MEGA就不仅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已经出版的著作得到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使那些首次为我们所获得的著作被编排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总体创作过程中。它们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作方法提供了我们迄今尚未获取的洞见，并且尽可能广博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以及形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30]。

MEGA²所坚持的“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在第II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中。众所周知，《资本论》既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又是他的未竟著作。马克思在世时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是恩格斯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中有选择地编辑出版的。因此，在准备MEGA²第II部分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各个版本的《资本论》第一卷，又要考虑到他的亲密战友编辑的第二卷、第三卷，另外还要考虑到不为世人所知的大量手稿。显然，对于这个庞大的资料群来说，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编排是最佳的展现方式，而最近刚刚出齐的MEGA²第II部分^[31]正是按照“历史发展”原则进行卷次规划的。具体来说，MEGA²第II部分第1卷包括的两个分册收录了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即我们通常说的《大纲》；第2卷收录了1858—1861年的经济学手稿和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3卷包括的六个分册收录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4卷包括的三个分册收录了1863—1868年的经济学手稿；第5—10卷收录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不同版本，依次为德文一版（1867年）、德文二版（1872年）、法文版（1872—1875年）、德文三版（1883年）、英文版（1887年）、德文四版（1890年）；第11卷收录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1868—1881年）；第12卷收录了《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的编辑稿（1884—1885年）；第13卷收录了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第14卷收录了《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和编辑文本（1871—1895年）；第15卷收录了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按照这样的历史发展顺序，我们既可以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各个创作阶段的思想侧重，又可以把握不同阶段他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创新，进而在整体上更为全面地把握他的资本论哲学。

这里，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难题。众所周知，MEGA¹是一套未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它只出版了第I部分的第1—7卷和第III部分的第1—4卷，另外还有一部没有卷号的特别卷。就第II部分的《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来说，尽管MEGA¹的编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编辑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II部分最终没有卷册问世。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在MEGA¹中探寻“历史发展”的编排理念呢？

确实，就MEGA¹来说，它并不像MEGA²那样拥有体现“历史发展”原则的既定的编辑方案和现成的出版卷册。但是，作为一种编辑原则、编辑理念，“按照历史发展过程来展现文本”其实早已存在于梁赞诺夫对MEGA¹的出版构想之中。在1923年11月作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的报告中，梁赞诺夫就对他所寻找到的大量《资本论》手稿提出了如下设想：首先出版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草稿，然后按照其现存样貌出版1861—1863年的23个笔记本。接下来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包括它的所有异文与草稿。然后是《资本论》第二卷，它将以两种形式出版：一种是完全依照马克思手稿的原样出版，另一种则按照恩格斯的编排方式出版。之后的第三卷也以这样的形式出版。^[32]我们发现，梁赞诺夫正是准备按照历史发展过程来展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他对《资本论》部分出版方案的设想与MEGA²的卷次编排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可以说，MEGA²的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展现文本的编辑理念归根结底可以溯源于MEGA¹，溯源于MEGA¹的开创者梁赞诺夫的伟大出版构想。

从上述的“完整性”、“忠实于原文”以及“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的三条原则可以看出，MEGA²在编辑理念上完全秉承了MEGA¹。尽管MEGA¹过早地夭折，既没能实现它的宏大出版计划，也没有实现预想的科学影响（当然，它在国际学界已然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它的开创者——梁赞诺夫所坚持的编辑理念却被后人继承了下来。事实上，时至今日，MEGA¹的编辑方法与原则、它的出版成果仍然影响着它的后继者MEGA²。

顺便一提的是，除了编辑理念，在组织形式上，MEGA²也力图学习MEGA¹的模式——工作人员的专业化与国际化。卡姆普夫迈耶尔就曾赞扬了MEGA¹的国际性，“莫斯科研究院拥有庞大的科学人员机构。约230—240名工作人员在德语、法语、英语、斯拉夫语等部门以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专业领域工作。几乎在欧洲所有的首都，如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苏黎世，都有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在搜集关于工人运动理论和历史的科学资料”^[33]。如果说，1990年前MEGA²的编辑出版活

动主要是在苏联和东德进行，那么在1990年之后，MEGA²的编辑活动则日趋国际化，国际马恩基金会也把“国际性”列为新时期MEGA²的重要特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来自德、俄、荷、法、意、丹、美、日等国的十余个MEGA小组在负责相关卷次的编辑工作。

二 MEGA²对MEGA¹的继承发展

虽然MEGA²承袭了MEGA¹的“完整性”、“忠实于原文”以及“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三大编辑理念，但这还不足以说明MEGA²的全部特点。毕竟，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历史考证版本，MEGA²也在MEGA¹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创新，从而表现出不同于MEGA¹的新内容、新特点。

（一）在编辑理念上，MEGA²注重学术性、去意识形态性

MEGA²应当具有学术性、去意识形态性，这一理念在MEGA²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1990年之后开始成为编者的共识。众所周知，在1975—1990年这15年间，MEGA²编辑出版项目是由苏共中央和统一社会党中央下属的马列主义研究院直接领导的，它的具体编辑活动是由两所党的研究机构人员进行的，而且，MEGA²各卷次的出版机构也是党的出版社——狄茨出版社。在这种情况下，MEGA²的政治色彩自然非常浓厚。正如作为早期MEGA编委会东德方面秘书的德鲁贝克承认的，MEGA²被政治工具化，它负载着意识形态的内容。^[34]

于是，当1990年国际马恩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它提出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MEGA²应该作为纯粹学术性的版本得到推进，编辑出版工作不应受到任何政治党派的利益和需要的影响，更不能服从于这些政治利益和需要。1992年MEGA²召开编辑准则会议时，关于MEGA的“去意识形态性”更是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可。^[35]由此，去除意识形态性，强调MEGA²的学术性，成为了MEGA²编者的一个基本理念。在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小册子中，对MEGA²的任务作了以下说明：“这套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历史考证版的任务是，为各个学科的学者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所有其他语言的版本提供全面的、可靠的基本资料来源。”^[36]显然，学者、学术研究是MEGA²服务的对象，学术性是MEGA²的基本原则。事实上，正是为了保证MEGA²各卷次的学术性，去除意识形态性，从1998年起，学院出版社（Akademie Verlag）接替曾经的党的出版社——狄茨出版社开始正式出版MEGA²后续卷次。在当年10月7日的《法兰克福总汇报》上，乌尔里希·浩尔夫（Ulrich Raulff）对MEGA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归纳出MEGA²的三个新特点：去政治化、国际化和高的学术水准。^[37]

值得一提的是，梁赞诺夫在主持MEGA¹的时候，也非常强调MEGA¹的学术性、科学性。他为MEGA¹设定的目标就是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基础。在MEGA¹前言中，他多次强调了“科学性”这一目标和要求。首先，“科学性”的意义体现在，MEGA¹自身是科学的，它能够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奠定科学的基础。正如梁赞诺夫多次强调的，“我们这个版本将首先为每一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以清晰的编排准确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遗产”^[38]。在谈到导言时，梁赞诺夫也指出，导言最主要的使命是“为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奠定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以科学上无可辩驳的形式和次序再现两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39]。其次，“科学性”的意义体现在，MEGA¹服务于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早在前言开头，梁赞诺夫就指出：“时至今日，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宣告者和指路人的著作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本，这在一切旨在理解他们的世界观、掌握他们的学说的科学研究中越来越能感受到。只有将他们的全部思想遗产再现并汇集在一部考证性的全集之中，才有可能对他们毕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40]在“前言”的结尾部分，梁赞诺夫再次提到，“我们这个版本的主要目的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思想体系以其完整面貌供科学研究使用”。^[41]

虽然梁赞诺夫对MEGA¹明确提出了学术性、科学性的要求，但这是否完全等同于非意识形态性，仍需进一步的探讨。毕竟，MEGA²的非意识形态性的出版原则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的。

（二）在出版方案上，MEGA²增加了第IV部分——摘录、笔记和批注部分

客观地讲，MEGA¹中也收录了摘录和笔记，它们集中在第I部分之中。例如，第1卷上册收录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七个笔记本；第1卷下册收录了马克思的柏林笔记（1840—1841年）、波恩笔记（1842年）和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第3卷收录了巴黎笔记（1844—1845年）；第4卷收录了马克思在1845年夏写的三个笔记本；第6卷收录了马克思在1845—1847年在布鲁塞尔—曼彻斯特—布鲁塞尔期间所作的笔记。可以看出，尽管MEGA¹收录了摘录、笔记等，但它们只是按照所处的时间段被归并到同期的相应著作之列。因此，它们是不规则地出现在不同的卷次中的，而且基本编排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之后。这样一来，在MEGA¹之中，摘录和笔记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

在MEGA²中，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摘录、笔记以及批注的丰富庞杂，编委们决定把这一部分单独列出，作为MEGA²的第IV部分。在MEGA²前言中这样写道：“MEGA的第IV部分首次出版所有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摘录、摘要、笔记本和批注。”^[42]摘录和摘要构成了第IV部分的主要内容，它们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也非常丰富；马克思在1844—1881年所作的17本笔记，则反映了他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的活动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书时所做的批注将在第IV部分中分开出版，它们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可以说，MEGA的第IV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他们的思想源泉的重要资料。^[43]由此，根据MEGA²的初期计划，第IV部分预计出版70卷，其中摘录和笔记为40卷，批注为30卷。它成为了MEGA²最为庞大的组成部分。1995年，按照新时期最终确定的出版方案，第IV部分的摘录、笔记和批注减至32卷。虽然出版规模遭到了极大的压缩，但是摘录笔记部分仍然是MEGA²中极其重要并且独立的部分。

（三）在编排原则上，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文本

在MEGA¹中，梁赞诺夫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文本。正如他指出的，“即使在第I部分中……个别卷次内部的时间顺序也不得不得打破。有时我们必须将某些由于内容或发表条件的一致而相互存在密切联系的著作和文章收归为一组，尽管因此扰乱了时间顺序”^[44]。另外，就第III部分通信来说，它也不是严格遵守时间顺序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1843年前的通信，被收录到了第I部分的前两卷中。正如梁赞诺夫谈到的，“为了用两个卷次完全结束这一时期，我们在这里也收录了许多文献以及所有从时间上看属于这两卷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所写或写给马克思的书信”^[45]。其次，为了让读者更早地了解到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内容，梁赞诺夫在第III部分的前4卷率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当然，虽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但是梁赞诺夫也多次强调，“发展史”的观点在MEGA¹中仍然起“主导作用”，并且是“决定性的原则”。^[46]

在MEGA²中，“严格的时间顺序”成为编排的基本原则。正如前言指出的，“在MEGA的四个部分内，文本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初是各自独立地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因此，他们在1844年8月会面之前撰写的著作和书信分开呈现；但是从他们开始共同创作起，他们的著作就按照时间顺序出版。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各个文本时，起决定性的是写作的日期，而不是发表的日期，因为MEGA首先是记录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和发展史的。卷次的划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一般分期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最重要的各个阶段”^[47]。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以前的所有全集版本，MEGA²的书信部分第一次按照统一的时间顺序来编排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写给第三方的信。

（四）就卷次内容而言，MEGA²增加了独立成册的科学资料部分

在MEGA¹的编辑过程中，梁赞诺夫一直持这样的观点，MEGA¹的主要任务是完整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全貌，因此，“各卷导言将一般性地阐明各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和形成史，阐述研究的状况，说明编辑所遵循的方法。历史和理论性的导言与研究、详尽的评论不在这一任务之列：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它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为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奠定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以科学上无可辩驳的形式和次序再现两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因此，即使是第一部分各卷所带有的注释和其他附加内容也应该从总体上满足于介绍与文本直接相关的同时代的资料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很容易获取的话，并通过丰富的资料和引文索引来减轻寻找关于人物、状况和事件的进一步说明的工作”^[48]。在梁赞诺夫看来，忠实于原文、原原本本地展现文本是MEGA¹最根本的任务，因此，主观的插入与解释在他看来都是不适宜的。^[49]

在MEGA²中，科学资料部分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它甚至作为单独卷册出版，从而与正文卷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每一卷都包括正文卷和资料卷，从而方便读者在阅读正文的同时，了解它的相关资料。资料卷通常包含以下内容：文本的形成与流传史、异文对照表、注释、文献索引、人名索引、名目索引等。这些资料既以国际上马克思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又结合了编者在编辑过程中综合各方面研究所取得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五）MEGA²的编辑出版活动更为透明，它有正式出版的编辑准则

就MEGA¹来说，它并没有现成的、正式的编辑准则。尽管我们可以从它的前言中，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卷次中分析出其编辑原则以及更为具体的细则，但是它并没有为读者提供说明性的、可供参考的编辑准则。相反，就MEGA²来说，不论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初的准备过程中，还是在被国际马恩基金会接手之后，都进行过多次细致的编辑准则讨论。而且，这一讨论的成果最终以公开的出版物形式与读者见了面。

在1993年出版的《MEGA编辑准则》中，我们看到了关于未来MEGA卷次的极为细致的编辑准则和应用说明。在第一部分MEGA编辑准则中，涉及五项内容：第一，MEGA版本的性质、内容以及材料的划分和编排；第二，文本的基础、编排与展现；第三，资料部分所涉及的导言、文本的形成流传和构成、异文对照表、校勘表以及注释；第四，文献、人名、名目等各种索引；第五，各种一览表。在第二部分中，逐条说明编辑准则在标题形式、卷次划分、作者身份确认、文本再现、资料部分、异文、注释、索引等内容中的具体应用。可以说，这部编辑准则是各个MEGA小组的编辑人员必须全面掌握的编辑宝典。

在《MEGA编辑准则》的前言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表述：“正是由于它们（编辑准则与说明——作者注）不仅仅是国际马恩基金会和MEGA工作小组内部的事情，而且作为版本自身的组成部分，它们也应该为其使用者所了解，所以它们在这里出版了。”^[50]显然，MEGA²的编者想以公开透明的工作方式让广大读者全面地了解MEGA²各卷次的编辑细则，这既有利于对MEGA²编辑理念的具体把握，也有助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深刻理解。

总的来说，由于处于新的历史时期，MEGA²较之于MEGA¹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特点、新内容，因而与MEGA¹相比实现了新的历史飞跃。这也使得MEGA²比MEGA¹具有更强的科学性、更高的学术性和更广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宏大的编辑出版工程，MEGA²至今仍有55卷尚待出版，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对之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其具体的功过得失。不过，在对MEGA²的初步分析中，我们仍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MEGA²的历史是具有阶段性的。1990年，国际马恩基金会接管这一项目后，基于对当时国际环境变化的本能反应，MEGA²编者制定了诸如国际化、学术化甚至非意识形态化的原则。对于其中的个别原则，我们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第二，就已有的一些卷次来说，MEGA²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尤其是重要手稿的编排存在自然主义的倾向。一些学者甚至据此提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并非一部著作，不存在费尔巴哈“章”的论断。对于这些新的观点、判断，我们还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分析，不盲从，不跟风。第三，MEGA²本身是有其特定服务对象的，那就是学者的科学研究。因此，作为学术出版物的MEGA²只适用于学术上的研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宣传普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它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我们要分清它的用途，明确它的价值所在。

无论如何，MEGA²在今天已经发展成国际马克思学研究极具影响力的版本，任何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都不能对之视而不见。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对MEGA²的引介、分析，努力汲取其巨大的文献资源以及重要的考证结果，进而得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建设大业不断向前发展。

-
- [1]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S. 8.
- [2] 参见IMES,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Probekband . Editionsgrundsätze und Probestück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 [3] 参见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23-216。
- [4] *Ibid.*,S. 217-234.
- [5]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12.
- [6] *Ibid.*, S.12, Anm. 10.
- [7]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S. 22.
- [8] *Ibid.*,S. 23-24.
- [9]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17.
- [10] *Ibid.*,S.17-18.
- [11]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18-21.
- [12] 参见MEGA² , Band IV/3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 [13]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 22-29.
- [14] 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编排。
- [15]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30-39.
- [16]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 36-38.
- [17] 参见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40。
- [18] *Ibid.*,S. 41.
- [19] David Rj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XII.
- [20]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 S. 55.
- [21]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S. 57.
- [22]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 125.
- [23]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 17-18.
- [24] David Rj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IV- XVIII.
- [25] David Rj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XI.
- [26] David Rjzanov, “Einleitung”, *MEGA¹* , Band III/1, S. XXXIX-XL.
- [27]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²* , Band I /1, S. 46* -47* .
- [28] Manfred Neuhaus und Gerald Hubman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2009, S. 7.
- [29]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S. 125.
- [30]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²* , Band I /1, S. 35* -36* .
- [31] 长期为学界千呼万唤的MEGA² 第II/4.3卷在2012年9月终于问世，它标志着MEGA² 第II部分的彻底完成。
- [32]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 11 (1925), S. 394.
- [33] Paul Kampffmey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und die Arbeit sozialistischer Forschung”,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 Jg. 37, 1931 I,S. 337.
- [34]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MEGA -Studien* , 1994/1, S. 60.
- [35]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S. 22.
- [36] Manfred Neuhaus und Gerald Hubman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S. 7.
- [37] *Ibid.*,S. 1.
- [38] David Rj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 Band I /1.1, S. XXII.

- [39] David Rja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1.1, S. X X VI.
- [40] Ibid., S. IX.
- [41] Ibid., S. X X VII.
- [42]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 /1, S. 44* .
- [43]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 /1, S. 44* -46* .
- [44] David Rja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1.1, S. X X III.
- [45] Ibid., S. X X III-X X IV.
- [46] Ibid., S. X X II, X X III.
- [47]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 /1, S. 37* .
- [48] David Rjazanov, “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1.1, S. X X VI-X X VII.
- [49] 马恩研究院内部曾为此产生过争论，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
- [50] Jacques Grandjonc, “Vorwort”,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S. 13.

第七章 MEGA² 的出版情况及第Ⅲ、Ⅳ部分已出版卷次的内容

根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版计划，MEGA²第Ⅰ部分（著作、文章和草稿）将出版32卷（33册），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将出版16卷（24册），第Ⅲ部分（通信）将出版45卷，第Ⅳ部分（摘录、笔记、批注）将出版40卷，另外，批注出版30卷。经过1990年的政治动荡，MEGA²的出版方案做了根本的调整。通过在1995年进行的多方讨论，MEGA²由原来的163卷压缩为114卷。其中，第Ⅰ部分为32卷，第Ⅱ部分为15卷（23册），第Ⅲ部分为35卷，第Ⅳ部分为32卷（其中，第Ⅳ/32卷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批注的，它取代了原来30卷规模的批注部分）。截至2012年底，MEGA²共出版了59卷。其中，第Ⅰ部分20卷，第Ⅱ部分15卷（23册），第Ⅲ部分12卷，第Ⅳ部分12卷。

第一节 MEGA² 各部分各卷次的内容划分及出版情况

关于MEGA²各部分各卷次的内容划分及出版情况，我们在下文中按照不同部分来分别进行说明。^[1]这里，我们用加粗字体表示已出版卷次，斜体表示在编卷次，普通正体表示待编卷次。

第Ⅰ部分 著作、文章和草稿

第Ⅰ/1卷 马克思：著作、文章、文学试作。至1843年3月。

1975年出版，88*，1337页。^[2]

第Ⅰ/2卷 马克思：著作、文章、草稿。1843年3月至1844年8月。

1982年出版，2009年再版，64*，1018页。

第Ⅰ/3卷 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至1844年8月。

1985年出版，62*，1372页。

第Ⅰ/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44年8月至1845年12月。

第Ⅰ/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现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小组（以下简称“BBAW”）编辑。

第Ⅰ/6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46年1月至1848年2月。

第Ⅰ/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48年2月至9月。

现由BBAW编辑。

第Ⅰ/8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48年10月至1849年2月。现由BBAW编辑。

第Ⅰ/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49年3月至7月。

现由BBAW编辑。

第Ⅰ/1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49年7月至1851年6月。

1977年出版，50*，1216页。

第Ⅰ/1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1年7月至1852年12月。

1985年出版，42*，1233页。

第Ⅰ/1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3年1月至12月。

1984年出版，48*，1290页。

第Ⅰ/1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4年1月至12月。

1985年出版，48*，1199页。

第Ⅰ/1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5年1月至12月。

2001年出版，XVI，1695页。

第Ⅰ/1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6年1月至1857年10月。

现由BBAW编辑。

第Ⅰ/16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7年10月至1858年12月。

现由BBAW编辑。

第Ⅰ/1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9年1月至10月。

第 I /18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59年10月至1860年12月。

1984年出版，38*，1155页。

第 I /1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61年1月至1864年9月。

第 I /2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64年9月至1867年9月。

1992年出版，2004年再版，57*，2024页。

第 I /2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67年9月至1871年3月。

2009年出版，XX，2432页。

第 I /2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71年3月至11月。

1978年出版，58*，1541页。

第 I /2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71年11月至1872年12月。

第 I /2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72年12月至1875年5月。

1984年出版，48*，1375页。

第 I /2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75年5月至1883年5月。

1985年出版，56*，1332页。

第 I /26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

1985年出版，72*，1111页。

第 I /27卷 恩格斯：反杜林论。

1988年出版，75*，1444页。

第 I /28卷 马克思：数学手稿（1878—1881）。

现由俄法小组编辑。

第 I /29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990年出版，49*，898页。

第 I /3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83年3月至1886年9月。

2011年出版，X，1154页。

第 I /31卷 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86年10月至1891年2月。

2002年出版，XII，1440页。

第 I /32卷 恩格斯：著作、文章、草稿。1891年3月至1895年8月。

2010年出版，XIV，1590页。

第 II 部分 《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

第 II /1.1卷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一分册。

1976年出版，2006年再版，30*，465页。

第 II /1.2卷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二分册。

1981年出版，2006年再版，6*，872页。

第 II /2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与著作（1858—1861）。

1980年出版，32*，507页。

第 II /3.1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一分册。

1976年出版，26*，499页。

第 II /3.2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二分册。

1977年出版，38*，472页。

第 II /3.3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分册。

1978年出版，12*，684页。

第 II /3.4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四分册。

1979年出版, 12*, 471页。

第II/3.5卷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五分册。

1980年出版, 38*, 476页。

第II/3.6卷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六分册。

1982年出版, 12*, 1331页。

第II/4.1卷 马克思: 1863—1868年经济学手稿。第一分册。

1988年出版, 40*, 770页。

第II/4.2卷 马克思: 1863—1868年经济学手稿。第二分册。

1993年出版, 17*, 1471页。

第II/4.3卷 马克思: 1863—1868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分册。

2012年出版, XII, 1065页。

第II/5卷 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版。

1983年出版, 60*, 1092页。

第II/6卷 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72年汉堡版。

1987年出版, 51*, 1741页。

第II/7卷 马克思: 资本论。1872—1875年巴黎版。

1989年出版, 37*, 1441页。

第II/8卷 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83年汉堡版。

1989年出版, 46*, 1519页。

第II/9卷 马克思: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1887年伦敦版。

1990年出版, 28*, 1183页。

第II/10卷 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90年汉堡版。

1991年出版, 40*, 1288页。

第II/11卷 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册手稿, 1868—1881年。

2008年出版, XIII, 1850页。

第II/12卷 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册。1884—188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编辑稿。

2005年出版, IX, 1329页。

第II/13卷 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主编, 1885年汉堡版。

2008年出版, IX, 800页。

第II/1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资本论》第三册的手稿和编辑稿, 1871至1895年。

2003年出版, XI, 1183页。

第II/15卷 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主编, 1894年汉堡版。

2004年出版, XI, 1420页。

第III部分 通信

第III/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至1846年4月。1975年出版, 34*, 964页。

第III/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1846年5月至1848年12月。1979年出版, 54*, 1209页。

第III/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1849年1月至1850年12月。1981年出版, 52*, 1535页。

第III/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1851年1月至12月。1984年出版, 40*, 1108页。

第III/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1852年1月至8月。1987年出版, 40*, 1190页。

第III/6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1852年9月至1853年8月。1987年出版, 47*, 1299页。

第III/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1853年9月至1856年3月。1989年出版, 50*, 1249页。

第III/8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信。1856年4月至1857年12月。1990年出版, 44*, 1119页。

第Ⅲ/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58年1月至1859年8月。2003年出版，XI，1299页。

第Ⅲ/1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59年9月至1860年5月。2000年出版，XVIII，1269页。

第Ⅲ/1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60年6月至1861年12月。2005年出版，XXI，1467页。

第Ⅲ/1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62年1月至1864年9月。

现由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小组（以下简称“RGASPI”）编辑。

第Ⅲ/1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64年10月至1865年12月。2002年出版，XX，1443页。

第Ⅲ/1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66年1月至1867年12月。

现由RGASPI编辑。

第Ⅲ/1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68年1月至1869年2月。

第Ⅲ/16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69年3月至1870年5月。

第Ⅲ/1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0年6月至1871年6月。

第Ⅲ/18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1年7—11月。

第Ⅲ/1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1年12月至1872年5月。

第Ⅲ/2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2年6月至1873年1月。

第Ⅲ/2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3年2月至1874年8月。

第Ⅲ/2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4年9月至1876年12月。

第Ⅲ/2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7年1月至1879年5月。

第Ⅲ/2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79年6月至1881年9月。

第Ⅲ/2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1881年10月至1883年3月。

第Ⅲ/26卷 恩格斯：通信。1883年4月至1884年12月。

第Ⅲ/27卷 恩格斯：通信。1885年1月至1886年8月。

第Ⅲ/28卷 恩格斯：通信。1886年9月至1888年3月。

第Ⅲ/29卷 恩格斯：通信。1888年4月至1889年9月。

现由德意小组编辑。

第Ⅲ/30卷 恩格斯：通信。1889年10月至1890年11月。

现由丹俄小组编辑。

第Ⅲ/31卷 恩格斯：通信。1890年12月至1891年10月。

第Ⅲ/32卷 恩格斯：通信。1891年11月至1892年8月。

第Ⅲ/33卷 恩格斯：通信。1892年9月至1893年6月。

第Ⅲ/34卷 恩格斯：通信。1893年7月至1894年8月。

现由不来梅小组编辑。

第Ⅲ/35卷 恩格斯：通信。1894年9月至1895年7月。

现由不来梅小组编辑。

第Ⅳ部分 摘录、笔记、批注

第Ⅳ/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至1842年。1976年出版，32*，1047页。

第Ⅳ/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43年至1845年1月。1981年出版，52*，911页。

第Ⅳ/3卷 马克思：摘录和笔记。1844年夏至1847年初。1998年出版，IX，866页。

第Ⅳ/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45年7—8月。1988年出版，54*，939页。

第Ⅳ/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45年8月至1850年12月。

现由RGASPI编辑。

第Ⅳ/6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46年9月至1847年12月。1983年出版，54*，1241页。

第Ⅳ/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49年9月至1851年2月。1983年出版，46*，916页。

第Ⅳ/8卷 马克思：摘录和笔记。1851年3—6月。1986年出版，47*，1118页。

第IV/9卷 马克思：摘录和笔记。1851年7—9月。1991年出版，54*，808页。

第IV/1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51年9月至1852年6月。

（伦敦笔记XV—XVIII），现由BBAW编辑。

第IV/1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52年7月至1853年8月。

〔伦敦笔记XIX—XXIV（马克思）〕，现由BBAW编辑。

第IV/1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53年9月至1855年1月。2007年出版，XVII，1745页。

第IV/1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54年11月至1857年10月。

第IV/1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57年10月至1858年2月。现由日本仙台小组编辑。

第IV/1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58年1月至1860年2月。

第IV/16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60年2月至1863年12月。

现由BBAW编辑。

第IV/1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63年5—6月。

现由BBAW编辑。

第IV/18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64年2月至1868年8月。

现由日本东京小组（JT）与BBAW编辑。

第IV/1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68年9月至1869年9月。

现由西日本小组（JW）与BBAW编辑。

第IV/2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68年4月至1870年12月。

第IV/2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69年9月至1874年12月。

现由法国小组（FR）编辑。

第IV/2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75年1月至1876年2月。

现由RGASPI编辑。

第IV/2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76年3—6月。

第IV/2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76年5—12月。

第IV/2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77年1月至1879年3月。现由BBAW编辑。

第IV/26卷 马克思：关于地质学、矿物学和农业化学的摘录和笔记。1878年3—9月。

2011年出版，XII，1104页。

第IV/2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79年至1881年。

现由美俄荷小组编辑。

第IV/28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79年至1882年。

现由RGASPI编辑。

第IV/2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和笔记。1881年底至1882年底。

现由FR编辑。

第IV/30卷 马克思：1863年、1878年和1881年的数学摘录。

第IV/3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科学摘录和笔记。1877年中期至1883年年初。

1999年出版，XV，1055页。

第IV/3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被考察的藏书的说明性目录（先行版）。

1999年出版，738页。

总的来说，截至2012年底，MEGA²共出版了59卷（67册），编辑工作已经完成过半。就已出版卷次来说，第I、II部分完成的比例较高，尤其是第II部分已经全部出齐。第III和第IV部分的进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分别只完成了既定计划的1/3强。按照MEGA²编辑小组的规划，未来几年将全力完成第I部分，然后再集中精力编辑出版第III和第IV部分。可以说，MEGA²的出版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3]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主要介绍MEGA²第III和第IV部分已出版卷次所收录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只介绍第III、IV部分而不涉及第I、II部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下简

称“中文二版《全集》”)正是以MEGA²为基础、底本,出版其第I部分即著作、文章和草稿的几乎全部内容。因此可以说,MEGA²的第I部分将会在中文二版《全集》中得到全面完整的展现,所以我们就无须在这里对第I部分内容做过多的介绍。其次,MEGA²第II部分是专门的《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部分,就这部分内容而言,我们与其需要去了解其基本的内容、框架,倒不如更需要去直接面向原文,进行细致的文本研读和全面的资料把握。因此,我们对这一部分也不做多余的说明。再次,就MEGA²第III部分来说,尽管其中收录了一些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他人的书信,但是它们的数量极少,远远低于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些书信的绝大部分都是在MEGA²中首次出版的,而在目前的中文二版《全集》中还尚未被收录。因此,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对这部分书信的情况进行全面介绍。最后,就作为第IV部分的摘录笔记来说,尽管中文二版《全集》也将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笔记,但由于目前为止相关的卷次仍未出版,因此,我们也有必要用一些篇幅对这些笔记的基本内容进行介绍。

第二节 MEGA² 第III部分已出版卷次内容

MEGA²收录的书信一般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二是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委托他人写的书信或者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书信摘录。在1990年前出版的第III部分各卷次(第III部分第1—8卷)中,第一类书信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均收入正文中,而第二、三类即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则收录在附录中。1990年以后,新出版的各卷次(第III部分第9、10、11、13卷)打破了这三类书信条块分割的局面,取消了正文与附录的划分,统一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从而不仅在时间上而且也在书信内容的逻辑性上取得了前后连贯的效果,在更大程度上便利了读者对书信的阅读与理解。

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的中文译介来说,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收录了绝大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中文二版《全集》则以MEGA²为文本依据又收录了一些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因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来说,未来的中文版将同MEGA²一样完整、全面。不过,由于中文二版《全集》尚未收录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部分书信在MEGA²中分量极大,且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以及他人写的涉及这两位导师的书信,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MEGA²书信部分中这两类书信的情况。另外,由于目前为止中文二版《全集》的书信部分仅仅出版了两卷(第47卷和第48卷),因此,本节将仍然以中文一版《全集》为准,列出MEGA²中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给他人的信件(如果这些书信已经在中文二版《全集》中出版,将特别注明)。由此,在对MEGA²第III部分各卷次书信的介绍中,我们将统一分成三个部分:(1)与中文一版《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2)他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书信摘录。如此一来,较之于中文一版和二版《全集》,MEGA²新收录的书信就可以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在下文中,首次收录于MEGA²的书信将用星号“*”表示,首次以原文收录的书信用双星号“**”表示,首次全文收录的书信用“#”表示,首次以原文完整地出版的书信用“*#”表示。

第III部分第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至1846年4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致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沙培尔(1842年11月12日和17日之间)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846年3月7日)

(上述两封信均已收录在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5年11月8日)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致马克思(1835年11月18—29日)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致马克思(1836年2—3月初)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6年3月19日)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6年5—6月)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6年7月1日)#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6年11月9日)

亨利希·马克思、罕丽达·马克思和索菲娅·马克思致马克思(1836年12月28日)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7年2月3日)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7年3月2日）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1837年8月12—14日）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7年8月20日前后）

亨利希·马克思和罕丽达·马克思致马克思（1837年9月16日）

亨利希·马克思和索菲娅·马克思致马克思（1837年11月17日）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7年12月9日）

亨利希·马克思、罕丽达·马克思和索菲娅·马克思致马克思（1838年2月10日）

罕丽达·马克思和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1838年2月15—16日）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马克思（1838年5月10日后）*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马克思（1838年6月24日）*

罕丽达·马克思致马克思（1838年10月22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39年12月11日）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马克思（1839—1840年）**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0年3月1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0年3月30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0年4月5日）

罕丽达·马克思致马克思（1840年5月29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0年7月25日）

索菲娅·马克思致马克思（1841年3月前）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1年3月28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1年3月31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1年4月初）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1年4月12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致马克思（1841年6月3日）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马克思（1841年8月10日前后）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马克思（1841年9月13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2年1月26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2年2月25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2年3月16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2年3月26日）

格奥尔格·荣克致马克思（1842年5月12日前后）

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致马克思（1842年7月4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2年7月9日前）

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里德尔致马克思（1842年8月7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2年10月21日）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致《莱茵报》编辑部（1842年11月22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2年12月4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2年12月6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2年12月10日）

布鲁诺·鲍威尔致马克思（1842年12月13日）

亨利希·约瑟夫·克莱森致马克思（1842年12月21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2月1日）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致马克思（1843年2月17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2月18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2月26日）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马克思（1843年3月初）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3月8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3月19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3月）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6月4—7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7月17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8月11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8月）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9月22日）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致马克思（1843年10月6—25日之间，一稿）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致马克思（1843年10月6—25日之间，二稿）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致马克思（1843年10月25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马克思（1843年12月1日）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尔曼·莫伊勒（1843年12月28日）

卡尔·海因岑致马克思（1844年2月16日）

亨利希·约瑟夫·克莱森致马克思（1844年3月13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44年6月21日前后）

格奥尔格·荣克致马克思（1844年6月26日）*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1844年7月3日）

格奥尔格·荣克致马克思（1844年7月31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44年8月4—7日之间）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44年8月11—18日之间）

亨利希·海涅致马克思（1844年9月21日）

威廉·魏特林致马克思（1844年10月18日）

约瑟夫·吕滕和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致马克思（1844年12月3日）

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致马克思（1844年12月27日）

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致马克思（1845年1月15日）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17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45年2月10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0日）#

格奥尔格·荣克致马克思（1845年3月18日）#

格奥尔格·荣克致马克思（1845年4月7日）*

威廉·魏特林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5月6日后）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5年5月14日）*

莫泽斯·赫斯致恩格斯（1845年5月底或6月初）

海尔曼·克利盖致马克思（1845年6月6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5年6月7日）*

海尔曼·克利盖致马克思（1845年6月9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45年6月25日）

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不早于1845年6月）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5年8月18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45年8月24日后）*

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5年8月31日）#

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1845年9月22日）

威廉·魏特林致马克思、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1845年9月22—27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1845年10月23日前后）

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5年10月31日）

格奥尔格·韦伯致马克思（1845年11月22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5年12月6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5年12月18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5年12月25日）

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1845年12月28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1846年1月21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1月30日）#

伊格纳茨·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2月10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2月23日）#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2月底）*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3月2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3月7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3月7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6年3月16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46年3月24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3月26日）*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托尔斯泰致马克思（1846年3月29日前）**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46年3月30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6年3月31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4月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4月30日）#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表述的书信摘录

卡尔·德·哈斯致阿道夫·舒尔茨（1840年7月19日）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致埃玛·齐格蒙德（1843年1月30日或31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3年3月8日）

阿尔诺德·卢格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3年11月11日）*

第Ⅲ部分第2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46年5月至1848年12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恩格斯、菲利浦·沙尔·日果和威廉·沃尔弗致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1846年6月15日）

马克思致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1846年8月）*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和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1月2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1847年9月14日前）

马克思致韦尔纳·冯·韦尔特海姆（1847年9月29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1848年3月24日前后）

马克思致《黎明报》编辑部（1848年5月底）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胡贝尔特·冯·屈尔韦特（1848年8月23日）

恩格斯致伯尔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1848年11月15日）

（前5封信已收入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其中，第3封信中贝尔奈斯写给马克思的内容未收录。后4封信已收入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6年5月3日）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1846年5月6日）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致马克思（1846年5月8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6年5月9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和菲利浦·沙尔·日果（1846年5月13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5月14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5月14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5月14日后）*

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5月15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6年5月15日）#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致马克思（1846年5月17日）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1846年5月20日）

威廉·魏特林致马克思（1846年5月24日）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1846年5月29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5月底和6月中旬之间）#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致马克思（1846年6月2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6月2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6年6月5日前后）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1846年6月5日）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致马克思（1846年6月6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致恩格斯（1846年6月10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6月11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6月13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6月14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6月19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6月24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6月28日）#

亨利希·楚劳夫致恩格斯（1846年6月28日）

鲁道夫·雷姆佩尔致马克思（1846年6月29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6年6月30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7月初）#

格奥尔格·韦伯致马克思（1846年7月3日）

尤利乌斯·迈耶尔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7月9日）*

鲁道夫·雷姆佩尔致马克思（1846年7月11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7月17日）#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7月17日）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7月17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7月19—20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7月20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6年7月22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6年7月27日）

莫泽斯·赫斯致马克思（1846年7月28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6年7月29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7月29日）

格奥尔格·韦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8月1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8月11日）#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和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8月11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6年8月14日）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1846年8月15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恩格斯（1846年8月15日后）*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6年8月19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6年8月20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8月）*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8月底至9月）#

卡尔·沙佩尔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初）

格奥尔格·韦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5—6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6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9日）*

索菲娅·施马尔豪森致马克思（1846年9月25日）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致马克思（1846年9月30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7日）#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致马克思（1846年11月1日）#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1月11日）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致马克思（1847年1月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7年1月8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恩格斯（1847年1月13日）*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1月20日）

维克多·特德斯科致马克思（1847年1月22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7年2月2日）*

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致恩格斯（1847年3月11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7年3月26日）

康斯坦茨的别列坞出版社致恩格斯（1847年4月3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马克思（1847年4月11日后）*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1847年4月19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1847年5月20日后）*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7年6月27日前后）#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7年6月2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7年7月7日）#

亨利希·奥托·吕宁致马克思（1847年7月1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7年7月22日）#

弗兰茨·施罗特曼致恩格斯和马克思（1847年8月6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7年8月25日）*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1847年8月30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7年9月1日）*

亨利希·奥托·吕宁致马克思（1847年9月7日）*

威廉·克吕威尔致马克思（1847年9月10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7年9月21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致马克思（1847年9月28日）*

亨利希·奥托·吕宁致马克思（1847年10月5日）#

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致马克思（1847年10月12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区部（1847年10月18日）

路易·勃朗致马克思（1847年10月26日前后）*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致马克思（1847年11月1日）

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致马克思（1847年11月5日）

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致马克思（1847年11月13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7年11月20日）*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致马克思（1847年12月8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47年12月1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8年1月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8年1月17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1848年1月25日）

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致马克思（1848年1月26日）#

菲利浦·沙尔·日果致马克思（1848年1月28日）

维克多·特德斯科致马克思（1848年2月16日和26日之间）

吕西安·莱奥波德·若特兰致马克思（1848年2月25日）*

斐迪南·弗洛孔致马克思（1848年3月1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8年3月7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48年3月7日和11日之间）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8日）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15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8年3月15日）*

维克多·特德斯科致马克思（1848年3月15日前后）*

卡尔·普芬德致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17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48年3月21日）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22日）#

布鲁塞尔领导区部致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22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8年3月2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和（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48年3月25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马克思（1848年3月25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8年3月25—27日）

卡尔·沙佩尔致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28日）

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致马克思和恩斯特·德朗克（1848年3月31日）*

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卡尔·伯恩施太因、W.福尔克、迈尔和威廉·冯·勒文菲尔斯致马克思（1848年4月1日）**

约翰·席克尔致马克思（1848年4月14日）

威廉·沃尔弗致美因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4月18日）

F.A.贝格曼致美因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4月21日）

美因茨区致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4月23—24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8年4月24日）*

卡尔·沙佩尔致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4月26日）

威廉·布兰克致恩格斯（1848年4月2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48年4月29日）#

巴黎区部致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4月30日）#

海尔曼·皮特曼致恩格斯（1848年4月3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5月5日）

斯蒂凡·波尔恩致马克思（1848年5月11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5月12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48年5月15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48年5月17日）

吕西安·莱奥波德·若特兰致马克思（1848年5月19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8年5月21日）#

W.冯·布鲁赫豪森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6月和1849年5月之间）*

A.卡特纳致马克思（1848年6月和1849年5月之间）*

A.韦伦施太因致马克思（1848年6月和1849年5月之间）*

哈姆工人协会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6月11日）

斯蒂凡·波尔恩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6月17日）

伦敦区部致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6月18日）

L.阿里那里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6月20日）

卡尔·格奥尔格·福格勒致马克思（1848年6月25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48年7月3日和6日之间）

乔治·桑德致马克思（1848年7月20日）

斐迪南·奥古斯特·艾伯林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8月26日）*

列奥·罗里克致马克思（1848年8月31日）*

艾米尔·奥托卡·韦勒致马克思（1848年9月7日）*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胡贝尔特·冯·屈尔韦特致马克思（1848年9月12日）

爱德华·蒙蒂尼致马克思（1848年9月12日后）*

麦克斯·科恩海姆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9月20日）*

海尔曼·吕宁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9月2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8年10月4日后）

N.费舍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10日）*

A.韦伯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13日）*

J.H.致马克思（1848年10月18日）

W.B.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19日）

菲利浦·沙尔·日果致马克思（1848年10月19日）*

P.J.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19日）

C.Sch.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20日）

A.韦伯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22日）*

菲利普·罕普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23日）*

奈里希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23日）*

海尔曼·泽米希致马克思（1848年10月2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8年10月25日）

大卫·列维·埃尔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27日）*

H.致马克思（1848年10月27日）

弗兰茨·贝肯塔尔致马克思（1848年10月29日）*

保尔·多恩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29日）

J.P.B.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0月3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8年10月30日）

几名订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1日）

奥古斯特·施内致马克思（1848年11月1日）*

路德维希·布兰克尔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6日）*

克里斯蒂安·哥特弗里德·安德烈亚斯·雷菲尔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6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48年11月7日）*

尤利乌斯·迈耶尔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12日）*

格尔哈德·朗恩致马克思（1848年11月15日）*

格里普科芬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16日）*

B.致马克思（1848年11月18日）*

爱德华·赫勒致马克思（1848年11月18日）*

齐格弗里德·魏斯致马克思（1848年11月1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48年11月20日）*

克里斯蒂安·毕尔格尔斯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21日）#

艾曼纽埃尔·费恩巴赫致马克思（1848年11月2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8年11月23日）*

R.哈尔曼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23日）*

卡尔·奥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2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8年11月27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27日）*

路德维希·施蒂林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27日）*

卡亨卡·泽茨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27日）*

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致恩格斯（1848年11月30日前后）*

泰奥多尔·维尔特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1月30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和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48年12月3日前后）#

沃伊切赫（阿达尔伯特）·冯·利普斯基致马克思（1848年12月3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48年12月5日前后）*

A.里德尔致马克思（1848年12月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8年12月5—6日）

洛桑工人协会致恩格斯（1848年12月8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万德尔致马克思（1848年12月8日）*

奥古斯特·海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8年12月12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8年12月12日）*

约翰·亨利希·居姆佩尔致马克思（1848年12月14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8年12月15日）*

莱因·卢卡斯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2月16日）*

阿尔伯特·列菲尔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2月18日）*

塞尔巴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2月19日）*

弗兰茨·约里森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2月20日）*

奥古斯特·格贝尔特致恩格斯（1848年12月21日）

弗里德里希·卡普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1日）*

M.杜亨弗特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12月23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4日）*

B.海尔布特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5日）*

威廉·施梯伯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6日）

格列夫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7日）*

A.里德尔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7日）#

塔德尔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7日）*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致马克思（1848年12月28日）

弗里德里希·施罗特尔贝肯致恩格斯（1848年12月29日）

彼得·丢伊斯致马克思（1848年12月30日）*

一位无名氏致马克思（1848年12月或1849年1月）*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书信摘录；马克思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吕西安·莱奥波德·若特兰致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1847年10月20日）*

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7年10月27日）*

燕妮·马克思致卡罗琳·舍勒尔（1848年1月30日）*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8年3月16日或1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1848年4月1日）*

亨利希·楚劳夫致莫泽斯·赫斯（1848年4月4日）

威廉·沃尔弗致沙特（1848年12月30日）*

第Ⅲ部分第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49年1月至1850年12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1849年5月6日）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1849年5月6日）

马克思致安德烈亚斯·施蒂夫特（1849年5月6日）

马克思致《法兰克福报》编辑部（1849年5月31日）

燕妮·马克思和马克思致琳娜·舍勒尔（1849年7月14日）*

康拉德·施拉姆和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1月8日）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1850年2月5日）**

马克思致雅科布·乌尔（1850年2月19日）

恩格斯、马克思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致《旁观者》编辑部（1850年6月14日）**

马克思致亨利希·毕尔格尔斯（1850年6月25日）

恩格斯、马克思和乔治·朱利安·哈尼致亚当·艾曼纽埃尔·巴泰勒米和茹尔·维迪尔（1850年10月9日）

（上述书信均已收录到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威廉·施瓦茨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1日）#

格奥尔格·荣克致马克思（1849年1月4日）*

阿道夫·弗兰克尔致马克思（1849年1月5日）*

弗兰茨·威尔海米致马克思（1849年1月7—9日）*

格劳曼夫人致马克思（1849年1月8日）*

罗伯特·罗伊施纳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9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10日）*

亨利希·施泰因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10日）*

海尔曼·科尔夫致马克思（1849年1月11日）*

海尔曼·罗兰特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11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12日）*

约翰·沙特致马克思（1849年1月12日）*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致马克思（1849年1月13日）

罗伯特·温霍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1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1月14日）*

鲁道夫·罗鲍威尔致马克思（1849年1月15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15日）*

哥尼希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16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17日）*

拉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17日）*

格劳曼夫人致马克思（1849年1月18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19日）*

托斐尔·亚当斯基致马克思（1849年1月20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20日）*

尼古拉斯·施米特致马克思（1849年1月20日）*

古斯塔夫·施特里格尼茨致马克思（1849年1月20日）*

J.费舍致马克思（1849年1月21日）*

泰奥多尔·伯丁致马克思（1849年1月22日）*

阿道夫·塞舍致马克思（1849年1月2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9年1月22日）

恩斯特·沃斯温克尔致马克思（1849年1月22日和2月初之间）*

卡尔·毕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23日）*

弗兰茨·赖辛格尔致马克思（1849年1月23日）*

尤利乌斯·施莱歇尔致马克思（1849年1月23日）*

亨利希·布略默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4日）*

恩格斯上校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4日）

维克多·贝尔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5日）*

K.巴泰勒米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5日）*

G.布兰特霍斯特致马克思（1849年1月2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1月25日）*

A.H.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5日）*

弗里德里希·威廉·施米茨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5日）*

A.凯泽致马克思（1849年1月26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26日）*

泰德林致马克思（1849年1月26日）*

安东·格莱德巴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7日）*

格雷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7日）

鲁道夫·芬特致马克思（1849年1月27日—2月1日）*

A.奥朋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8日）*

卡尔·德斯特尔致马克思（1849年1月29日）*

菲利浦·奥弗莱克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29日）*

J.F.德林豪斯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30日）*

Ph.弥勒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30日）*

Th.尤根斯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31日）*

鲁道夫·施拉姆致马克思（1849年1月31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49年1月31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49年1月31日—2月1日）*

一位无名氏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1月和5月之间）*

塞尔尼克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1日）*

阿尔弗雷德·魏斯纳尔致恩格斯（1849年2月1日）*

阿尔弗雷德·魏斯纳尔致恩格斯（1849年2月1日后）*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49年2月2日）*

I.施米茨致马克思（1849年2月2日）*

亨利希·海登塔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3日）*

O.亨利希·施维希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3日）*

亨利希·施文霍夫致马克思（1849年2月5日）*

威廉·许伦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5日）*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马克思（1849年2月5日和8日之间）*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2月6日）*

海尔曼·艾茨韦勒致马克思（1849年2月8日）*

胡果·马克西米利安·文森东克致马克思（1849年2月8日）

爱德华·格里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10日）*

弗里德里希·威廉·许纳拜恩致马克思（1849年2月10日）*

卡尔·卡普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10日）*

爱德华·库亨贝克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10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2月1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49年2月11日后）*

卡尔·德斯特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12日）*

弥勒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12日）*

古斯塔夫·拉瓦尔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12日）*

古斯塔夫·布莱伯特罗伊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13日）

弗里德里希·威廉·许纳拜恩致马克思（1849年2月13日）*

W.布兰科致马克思（1849年2月14日）*

安东·格莱德巴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14日）*

阿玛莉·克劳斯致马克思（1849年2月14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2月14日）*

古斯塔夫·阿尔诺德·瓦尔特致马克思（1849年2月14日）*

奥古斯特·亨利希·胡尔曼致马克思（1849年2月15日）*

W.菲尔科特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15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2月15日后）*

W.亨特致马克思（1849年2月16日）*

奈斯托·金德曼致马克思（1849年2月16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2月17日）*

约翰娜·金克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18日）

奥托·德·拉·舍瓦勒里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20日）*

海尔维茨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20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2月20日）*

弗里德里希·威廉·荷伊施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20日）*

一位无名氏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20日）*

阿尔伯特·列菲尔德致马克思（1849年2月21日）*

M.罗曼致马克思（1849年2月21日）*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马克思（1849年2月21日）*

弗里德里希·科赫致马克思（1849年2月22日）*

I.P.施米茨致马克思（1849年2月22日）*

路德维希·西蒙致恩格斯（1849年2月22日）*

约德科斯·多纳特斯·胡伯特斯·泰默致马克思（1849年2月22日）*

约阿希姆·列列韦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23日）**

弗里德里希·迈尔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23日）*

卡尔·毛里特致马克思（1849年2月24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恩格斯（1849年2月24日）*

路易·福格尔致恩格斯（1849年2月24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49年2月24日后）#

爱德华·库亨贝克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25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49年2月26日）#

查恩致马克思（1849年2月26日）*

康斯坦丁·泽勒尔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26日）*

M.罗曼致马克思（1849年2月27日）*

尤利乌斯·乌尔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2月27日和4月27日之间）*

一位无名氏致马克思（1849年2月28日前）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49年2月28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恩格斯（1849年3月1日）*

L.F.施特里伯致马克思（1849年3月1日）*

弗里德里希·菲尔哈特致马克思（1849年3月1日）*

丹尼尔·芬讷尔·冯·芬讷贝格致恩格斯（1849年3月1日后）*

W.冯·布鲁赫豪森致马克思（1849年3月3日）*

A.杜斯特曼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3日）*

恩格斯上校致马克思（1849年3月4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3月4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3月4日前后）*

奥托·卡斯托蒂斯致马克思（1849年3月7日）*

卡尔·瑙威尔克致马克思（1849年3月7日）

恩格斯上校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8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3月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3月9日）*

胡果·马克西米利安·文森东克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9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49年3月9日前后）*

普鲁士省民主党人区部委员会致马克思（1849年3月10日）*

弗兰茨·施米特致马克思（1849年3月10日）*

亨利希·哥尔致马克思（1849年3月11日）*

H.施弗尔致马克思（1849年3月11日）

B.赫尔茨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2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施勒弗尔致马克思（1849年3月12日）

柯能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4日）*

列奥·罗里克致马克思（1849年3月14日）*

B.赫尔茨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5日）*

狄茨勒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6日）*

施蒂勒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7日）*

泰森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7日）*

胡果·马克西米利安·文森东克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7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3月17日后）*

《新莱茵报》克罗茨纳赫订户致马克思（1849年3月17—18日）*

海尔曼博士和卡尔·舒斯基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18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49年3月19日）

荣克致马克思（1849年3月23日）*

J.雷德尔致马克思（1849年3月23日）*

奥古斯特·西伯施泰因致马克思（1849年3月23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3月23日后）*

福斯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25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49年3月26日）

路德维希·魏尔致马克思（1849年3月27日）**#

安东·格莱德巴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28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49年3月28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49年3月28日）

海尔曼·皮特曼致马克思（1849年3月30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施勒弗尔致马克思（1849年3月30日）

尤利乌斯·乌尔夫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30日）*

亨利希·林登伯格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3月31日）*

文泽尔·考斯致马克思（1849年4月1日）*

古斯塔夫·哈施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3日）*

埃诺·桑德尔致马克思（1849年4月3日）*

阿达尔伯特·冯·伯恩施太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4日）*

J.H.耶森致马克思（1849年4月4日）*

B.J.萨纳尔致马克思（1849年4月4日）*

M.罗曼致马克思（1849年4月5日）*

卢里克致马克思（1849年4月5日）*

爱德华·赖辛巴赫致马克思（1849年4月5日）*

E.施拉德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6日）*

布拉赫特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7日）*

阿伯拉·赖辛格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7日）*

W.古德致马克思（1849年4月8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4月8日）*

古斯塔夫·拉什致马克思（1849年4月9日）*

米斯特里茨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10日）*

一位无名氏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11日）*

E.H.林德曼致马克思（1849年4月14日）*

一位无名氏致《新莱茵报》编辑部（1849年4月20日）

古斯塔夫·尤利乌斯致马克思（1849年4月27日前）**#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49年5月1—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恩格斯（1849年5月4日和6日之间）

克里斯蒂安·埃瑟伦致恩格斯（1849年5月6日）*

威尔·施泰因韦德尔致马克思（1849年5月19日后）*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5月29日）*

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致恩格斯（1849年6月4日和18日之间）*

尤利乌斯·亨策致马克思（1849年6月2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49年6月22日）

J.格吕贝尔致马克思（1849年7月2日）#

奥古斯特·施内和菲利浦·沙尔·日果致马克思（1849年7月20日）*

J.格吕贝尔致马克思（1849年7月2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49年7月29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49年7月30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49年8月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49年8月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8月13日）

彼得·伊曼特和古斯塔夫·奥伯姆致恩格斯（1849年8月1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8月2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49年8月28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49年8月2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8月30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恩格斯（1849年8月3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9月3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9月27日）*

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致马克思（1849年9月28日）*

弗里德里希·威廉·许纳拜恩致马克思（1849年10月3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49年10月13—14日）*

G.多恩布施致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1849年10月15日）#

G.多恩布施致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1849年10月17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49年10月24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49年10月28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和卡尔·格林格尔（1849年11月1—5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49年11月2日）#

泰奥多尔·哈根致马克思（1849年11月20日）*

艾米尔·奥托卡·韦勒致马克思（1849年11月2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49年12月2日）#

约翰·格施文特致马克思（1849年12月3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49年12月6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宗诺夫致马克思（1849年12月6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49年12月25日）#

古斯塔夫·奥伯姆致恩格斯（1849年12月26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49年12月27—29日前后）#

爱德华·罗森布鲁姆和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致恩格斯（1849年12月27日）*

阿曼特·戈克致马克思（1849年12月28日）**#

威廉·阿森海默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49年12月31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贝尔根罗特致马克思（1849年12月底）*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0年1月1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50年1月2日）#

鲁道夫·施拉姆致马克思（1850年1月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1月2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50年1月4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50年1月4日）*

A.海德曼致马克思（1850年1月6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马克思（1850年1月7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1月13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1月16日）#

J.C.沙贝利茨的书店致恩格斯（1850年1月21日）*

奥古斯特·海耳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50年1月25日）#

泰奥多尔·哈根致马克思（1850年1月2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月26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2月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0年2月2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恩格斯（1850年2月5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马克思（1850年2月5日）*

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致恩格斯（1850年2月8日前后）*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恩格斯（1850年2月8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贝尔根罗特致马克思（1850年2月10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0年2月1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0年2月12日）

鲁道夫·施拉姆致马克思（1850年2月13日）*

布鲁诺·布赫尔致马克思（1850年2月14日）*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马克思（1850年2月2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0年2月21日）*

格奥尔格·荣克致恩格斯（1850年3月4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贝尔根罗特致恩格斯（1850年3月5日）*

约·艾·姆·克勒尔致马克思（1850年3月8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0年3月9日）*

泰奥多尔·哈根致恩格斯（1850年3月9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恩格斯（1850年3月10日）*

泰奥多尔·哈根致恩格斯（1850年3月13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3月16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3月24日）*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1850年3月27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0年3月28日）*

齐格弗里德·魏斯致马克思（1850年4月2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马克思（1850年4月4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4月6日）*

W.克莱纳、格纳姆、拜尔勒和其他人致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4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0年4月11日）#

斐迪南·拉萨尔和索菲娅·哈茨费尔特致马克思（1850年4月16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4月16日）*

P.林道致马克思（1850年4月17日）*

海尔曼·奥斯特瓦尔特致马克思（1850年4月23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0年4月25日）*

P.林道致马克思（1850年4月25日）*

奥古斯特·维利希致马克思（1850年4月29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宗诺夫致马克思（1850年5月2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0年5月2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0年5月3日）*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马克思（1850年5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5月5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5月5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大约在1850年5月7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0年5月9—14日）**#

弗·瓦尔特致马克思（1850年5月1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0年5月1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5月24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0年5月28日）*

A.阿布里德里斯致马克思（1850年5月31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5月31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0年6月2日）

威廉·约瑟夫·莱夫致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6月5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0年6月8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区致马克思（1850年6月15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6月15日）*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致马克思（1850年6月18日）

威廉·普拉特致马克思（1850年6月19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可能不晚于1850年6月22日）*

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致恩格斯（1850年6月2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6月25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50年6月28日）#

泰奥多尔·哈根致马克思（1850年6月2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0年7月3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7月3日）#

朗道夫致马克思（1850年7月3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7月3日）*

爱德华·斯威夫特致马克思或恩格斯（1850年7月4日）*

科隆领导区部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7月10日前后）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0年7月12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0年7月15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0年7月15日）**#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0年夏）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0年7月18日）**#

阿曼特·戈克致马克思（1850年7月18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50年7月19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7月20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0年7月23日）*

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致恩格斯（1850年7月28日）*

威廉·罗特哈克尔致马克思（大约在1850年7月至8月上半月）*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0年7月底或8月初）**#

约瑟夫·雅科布·吕滕致马克思（1850年8月2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8月2日后）**#

泰奥多尔·格茨致马克思（1850年8月7日）*

J.克文特致马克思（1850年8月15日）*

威廉·罗特哈克尔致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8月17日）*

玛丽亚·布兰克致恩格斯（1850年8月17日后）*

格布吕德·莫洛施致马克思和卡尔·布林德（1850年8月26日）*

奥古斯特·维利希致马克思（1850年8月27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0年8月）*

奥古斯特·维利希致马克思（1850年9月1日）*

奥古斯特·维利希致马克思（1850年9月2日）*

约翰·伯格致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5日）#

奥古斯特·维利希致马克思（1850年9月5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0年9月5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马克思（1850年9月7日前后）*

奥古斯特·维利希致马克思（1850年9月7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马克思（1850年9月9日）*

格·克洛泽致马克思（1850年9月11日）#

布莱曼致马克思（1850年9月12日）*

卡尔·普芬德致马克思（1850年9月14日）**#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致马克思（1850年9月14日）*

奥古斯特·维利希致马克思（1850年9月14日）**

亨利克·路德维克·米斯科夫斯基致马克思（1850年9月15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0年9月16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0年9月17日）*

卡尔·沙佩尔致马克思（1850年9月19日）*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致马克思（1850年9月25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0年9月2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0年9月29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0年10月1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0年10月3日）*

艾曼纽埃尔·巴特勒米、亚当和茹尔·维迪尔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0月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10月13日）**#

威廉·罗特哈克尔致马克思（1850年10月14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0年10月23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50年10月26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0年10月31日）**#

阿曼特·戈克致马克思（1850年11月1日）*

亨利希·G.拉可夫致马克思（1850年11月2日）*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致马克思（1850年11月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11月10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0年11月13日）*

斯蒂凡·图尔致马克思（1850年11月14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0年11月中旬前）

格劳曼夫人致马克思（1850年11月16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0年11月17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恩格斯（1850年11月18日）*
路易·班贝格致马克思（1850年12月初和1855年4月初之间）*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50年12月1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0年12月3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12月3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50年12月7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0年12月9日）
马格努斯·格罗斯和弗兰茨·威尔海米致恩格斯（1850年12月15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0年12月16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0年12月16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0年12月17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2月19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0年12月23日后）*
泰奥多尔·格茨致马克思（1850年12月2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0年12月28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50年12月29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马克思（1850年12月31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0年12月底）*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摘录或其他文献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恩斯特·德朗克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6月）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1849年6月18—19日）*
燕妮·马克思致琳娜·舍勒尔（1849年6月29日）*
卡尔·埃梅尔曼致奥古斯特·维利希（1849年7月6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7月19日和7月底之间）
恩斯特·德朗克致约瑟夫·魏德迈（1849年8月24日和9月中旬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威廉·沃尔弗（1849年10月22日）
G.克勒尔致约瑟夫·韦伯（1849年10月2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1849年12月24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4月28日）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5月20日）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6月15日和25日之间）
关于一封未流传下来的马克思致昂利·沙尔·约瑟夫·萨瓦的信（1850年6月21日前后）的报告*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致彼得·诺特荣克（1850年12月27日）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的陈述

第三部分第4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51年1—12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威廉·皮佩尔和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26日）（其中，皮佩尔写给马克思的信是MEGA²新收录的）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1851年3月20日）*

威廉·皮佩尔和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3月22日）（其中，皮佩尔写给马克思的信是MEGA²新收录的）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27日）

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1851年10月4日）

（上述5封信中，第2、4、5封信已收入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1年1月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1月10日）*

约翰·M·卡梅伦致恩格斯（1851年1月11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1年1月12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1年1月1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1月22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22日和27日之间）

亨利克·路德维克·米斯科夫斯基致马克思（1851年1月24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1年1月25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51年1月25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1月27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1年1月29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2月3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1年2月3日）#

皮埃尔·弗朗索瓦·朗道夫致马克思（1851年2月3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51年2月7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8日）**#

约翰奈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1年2月10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2月13日）*

斐迪南·沃尔弗致恩格斯（1851年2月25日）*

爱德华·伊格纳茨·科赫致马克思（1851年2月26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恩格斯（1851年2月26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28日）**

乔治·约瑟夫·曼特尔致恩格斯（1851年2月）*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3月1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51年3月2日）*

费舍致恩格斯（1851年3月2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3月3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3月3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3月3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1年3月3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3月16日）

罗兰特·丹尼尔致马克思（1851年3月25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3月28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4月5日）

罗兰特·丹尼尔致马克思（1851年4月5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1年4月5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51年4月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4月10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12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1年4月12日）

罗兰特·丹尼尔致马克思（1851年4月12—13日）**#

S.贝尔格尔致马克思（1851年4月15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51年4月16日）

罗兰特·丹尼尔致马克思（1851年4月24日）

罗兰特·丹尼尔致马克思（1851年4月26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1年4月28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4月2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5月1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1年5月4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51年5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5月1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1年5月12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1年5月1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5月20日）

海尔曼·威廉·豪普特致马克思（1851年5月22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23日）

罗兰特·丹尼尔致马克思（1851年5月25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2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5月28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30日）

罗兰特·丹尼尔致马克思（1851年6月1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6月9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1年6月1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6月21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1年6月21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1年6月24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1年6月2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6月2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6月27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7月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1年7月3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1年7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7月7日）
威廉·施特龙致马克思（1851年7月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7月8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1年7月10日前后）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7月12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1851年7月23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1年7月23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1年7月27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7月29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8月1日）
奥古斯特·海恩致恩格斯（1851年8月5日前）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1年8月5日）
爱德华·品得致马克思（1851年8月11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1年8月18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8月18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1年8月18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1年8月19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8月2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8月26日）
霍夫曼和康培致马克思（1851年8月26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8月26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2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51年8月30日前）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1年8月30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1年8月30日—9月1日）
约翰奈斯·米凯尔致马克思（不早于1851年8月）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9月7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宗诺夫致马克思（1851年9月1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9月19日）

韦尔纳·冯·韦尔特海姆致马克思（1851年9月2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9月26日）

G.C.劳伦茨·迈耶尔致马克思（1851年9月26日）

费舍致恩格斯（1851年9月2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1年9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10月2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1年10月2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51年10月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10月8日）

奥古斯特·海耳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51年10月9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1年10月11日）

让-阿姆布雷瓦斯·利亚茨致马克思（1851年10月15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10月15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10月20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1年10月22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10月23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1年10月2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10月29日）

海耳曼·埃布讷致马克思（1851年10月30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1年11月6日或7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1年11月11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1年11月17日）

海耳曼·埃布讷致马克思（1851年11月18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11月24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11月26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1年11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11月3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1年12月1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1年12月4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12月4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1年12月6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1年12月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0日或13日）
斐迪南·拉萨尔和索菲娅·哈茨费尔特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2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1年12月1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1年12月13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1年12月16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2月17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2月1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约在1851年12月20日）
约翰·佩蒂致马克思（1851年12月26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马克思（1851年12月29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1年12月3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1年12月31日）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书信的书信摘录；马克思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康拉德·施拉姆致亨利克·路德维克·米斯科夫斯基（1851年1月24日后）
关于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的书信（1851年5月2日）的说明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1851年11月6日）
关于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的书信（1851年11月28日）的说明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12月20日）

第Ⅲ部分第5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52年1—8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7日）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23日）^[4]
马克思致哥特弗里德·金克尔（1852年7月24日）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8月30日，摘录）**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月2日前后）*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月5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2年1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1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月9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2年1月1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1月12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2年1月1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15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恩格斯（1852年1月16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月16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月16日和22日之间）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月17日和23日之间）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恩格斯（1852年1月20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恩格斯（1852年1月2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1月25日，片段）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2年1月26日）*

爱德华·品得致恩格斯（1852年1月2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1月28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52年2月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2月3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恩格斯（1852年2月5日）*

爱德华·品得致马克思（1852年2月5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2年2月6日）#

约瑟夫·魏德迈和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2月6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马克思（1852年2月6—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2月9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2月12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2年2月1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2月1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2月1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2月2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2月20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2年2月23日后）

让-茹尔·克雷达致马克思（1852年2月24日）*

路易·班贝格尔致恩格斯（1852年2月2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和威廉·沃尔弗（1852年2月28日—3月1日）*

一位无名氏致马克思（1852年2月29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3月1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马克思（1852年3月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2年3月10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3月10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3月11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3月11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2年3月12日，摘录）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3月1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和威廉·沃尔弗（1852年3月18日）*

奥托·维干德致马克思（1852年3月20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3月22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4月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4月6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7日和5月5日之间）*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2年4月9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4月1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4月1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1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19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2年4月20日）*

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致马克思（1852年4月21日）*

约瑟夫·魏德迈和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4月21日，24—25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4月2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4月27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2年5月3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5月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5月4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5月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5月7日和21日之间）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5月11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13日）*

米克洛斯·赛雷尔梅伊致马克思（1852年5月13日）*

安德鲁·约翰逊致马克思（1852年5月1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2年5月1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5月19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22日和24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2年5月2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5月24日，片段）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5月2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5月27日）*

爱德华·费泽致马克思（1852年5月27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5月27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2年5月29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2年5月30日和6月1—2日）**

斯蒂凡·波尔恩致马克思（1852年5月31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2年6月3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2年6月4日，片段）**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6月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2年6月6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6月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2年6月8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2年6月8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2年6月8日和11日之间，片段）**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2年6月9日和11日之间，片段）**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6月13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2年6月14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6月中旬）*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6月1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6月18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2年6月19日前后）**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6月20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2年6月21日和25日之间）**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6月24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2年6月24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6月2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6月3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7月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7月4—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7月8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2年7月9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恩格斯（1852年7月9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7月14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2年7月19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7月1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不晚于1852年7月1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7月20—21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7月2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7月24日）*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致马克思（1852年7月24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马克思（1852年或1853年7月24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马克思（1852年或1853年7月2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7月25日）

玛丽-亚历山大·马索耳致马克思（1852年7月25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马克思（1852年或1853年7月2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8月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8月5日，片段）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2年8月6日和10日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8月8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8月1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2年8月13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8月25日）#

亨利希·布罗克豪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27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2年8月27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8月30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2年8月3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8月底至9月1日）*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的通信或通信摘录的书信；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2日）#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9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14日）*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4月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威廉·沃尔弗（1852年4月4—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4月6日）*

威廉·沃尔弗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4月1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威廉·沃尔弗（1852年5月2—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5月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5月2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5月3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5月31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6月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威廉·沃尔弗（1852年6月6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燕妮·马克思（1852年6月21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7月1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7月1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8月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8月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8月1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9月1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9月21—2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9月2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0月15日）*

第Ⅲ部分第6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52年9月至1853年8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致J.G.迈尔（1853年2月3日后，提纲）**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853年3月10日）

马克思致《晨报》编辑（1853年8月31日）*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9月5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2年9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9月7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2年9月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9月9日）

爱德华·品得致恩格斯（1852年9月9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马克思（1852年9月1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9月11日）*

斯蒂凡·阿道夫·瑙特致马克思（1852年9月14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9月1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16日和18日）*

爱德华·品得致恩格斯（1852年9月19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2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9月22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2年9月2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2年9月23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2年9月23日后）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9月23日或24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2年9月24日）

爱德华·品得致恩格斯（1852年9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很可能在1852年9月29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3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2年10月1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0月1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日和4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2年10月6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0月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10月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0月8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0月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0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10月11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1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3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5日前后）*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19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2年10月19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0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0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1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1日）*

埃曼努尔·普雷耶尔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2日）*

《科隆日报》编辑部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3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6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0月27—28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恩格斯（1852年10月29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2年10月3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1月1日）*

卡尔·施奈德尔第二致马克思（1852年11月1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1月3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2年11月7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2年11月16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1月1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1月21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1月2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11月2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1月2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1月30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2年12月1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马克思（1852年12月1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2年12月1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2月3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2月3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2月7日）*

鲁道夫·奥古斯特·冯·布吕宁克致马克思（1852年12月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12月9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马克思（1852年12月11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2年12月13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2月14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2年12月22日）*

亚诺什·班迪亚致马克思（1852年12月23日）*

海尔曼·埃布讷致恩格斯（1852年12月23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2年12月25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2年12月2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2年12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2年12月28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2年12月30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2年12月30日）*

一位无名氏致马克思（不晚于1852年12月）*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2年下半年至1853年上半年，摘录）*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3年1月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1月6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马克思（1853年1月10日）*

鲁道夫·奥古斯特·冯·布吕宁克致马克思（1853年1月11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3年1月1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1月13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3年1月14日和2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53年1月19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1月20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1月2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1月31日和2月6—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2月1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3年2月1日）

J.G.迈尔致马克思（1853年2月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2月11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3年2月12日）*

古斯塔夫·泽尔菲致马克思（1853年2月1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2月13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3年2月2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2月2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3月2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3月4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3年3月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6日和8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马克思（1853年3月7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53年3月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3月1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3月10日后）*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3月14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马克思（1853年3月1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3月1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3月2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2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3月31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3月31日）*

威廉·施特龙致恩格斯（1853年4月2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和威廉·皮佩尔（1853年4月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4月10日）*

威廉·施特龙致马克思（1853年4月1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4月17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4月17日和26日之间）*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3年4月18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3年4月18日）*

昂利·德·拉斯佩致马克思（1853年4月2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4月24日）*

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致马克思（1853年4月25日和27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4月28日和5月1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3年5月2日和6日）#

劳拉·马克思致马克思（1853年5月3日，草稿）**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马克思（约在1853年5月3日，草稿）*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马克思（1853年5月5日）**

劳拉·马克思致马克思（1853年5月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3年5月9日）#

《新英格兰报》编辑部致恩格斯（1853年5月10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3年5月11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5月1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2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3年5月2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29—30日）*

阿道夫·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1853年5月31日和约6月21日之间）#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5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6月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9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6月9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12—1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6月13日）

埃·卢普夫致马克思（1853年6月13日前后）*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6月16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不晚于1853年6月1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26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6月2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7月3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3年7月5日）*

弗里德里希·海尔曼·阿姆贝格尔致马克思（1853年7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和爱利莎·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7月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7月10日）*

埃米尔·布兰克致恩格斯（1853年7月1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7月1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7月2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7月2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7月2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可能在1853年7月23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7月3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8月1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8月5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3年8月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8月12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3年8月1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8月1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8月1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8月19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8月20日）*
阿伯拉罕·雅科比致马克思（1853年8月23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3年8月25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8月27日）*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的通信或通信摘录的书信；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9月28日）*
关于马克思致卡尔·施奈德尔第二的书信（1852年10月14日）的说明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15日）
卡尔·施奈德尔第二致恩斯特·德朗克（1852年10月2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0月28日）*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2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1月2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月6—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2月17日）*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3月10日，摘录）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3月2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燕妮·马克思（1853年3月2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3月29—3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5月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5月1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5月2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6月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6月10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燕妮·马克思（1853年6月1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6月14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燕妮·马克思（1853年6月19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燕妮·马克思（1853年6月2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6月2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7月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燕妮·马克思（1853年8月3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燕妮·马克思（1853年8月28日和9月3日）

第Ⅲ部分第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53年9月至1856年3月）

-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5日）
恩格斯致R.哈金（1854年1月26日，草稿）*
马克思致工人议会（1854年3月9日）
（第3封信已收录在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3年9月2日和6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3年9月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9月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9月5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9月7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9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3年9月10日前后）*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9月1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9月1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9月1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致马克思（1853年9月20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9月24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3年9月25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3年10月4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3年10月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3年10月10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3年10月17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3年10月21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10月23—2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11月13日）*

卡尔·布林德致马克思（1853年11月20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3年11月22日或23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1月24日）

戴维·乌尔卡尔特致马克思（1853年12月9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3年12月13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3年12月1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12月2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3年12月21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3年12月2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3年12月30日）*

玛丽亚·布兰克致恩格斯（1853年12月底或1854年1月初，片段）*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1月9日）*

弗里德里希·克拉林格致恩格斯（1854年1月9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恩格斯（1854年1月13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1月14—15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恩格斯（1854年1月19日）*

R.哈金致恩格斯（1854年1月25日）*

R.哈金致恩格斯（1854年1月28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2月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4年2月10日）

弗里德里希·克拉林格致恩格斯（1854年2月27日）*

亨利希·海泽致恩格斯（1854年2月28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恩格斯（1854年3月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4年3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3月10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3月10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恩格斯（1854年3月10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恩格斯（1854年3月12日或1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4年3月1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4年3月2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4年3月27日）*

J.J.H.施姆茨致马克思（1854年3月27日）*

约翰·瓦茨致恩格斯（1854年3月27日）*

H.J.林肯致恩格斯（1854年4月1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恩格斯（1854年4月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4月6日前后）
阿道夫·迈耶尔致马克思（1854年4月8日）*
H.J.林肯致恩格斯（1854年4月11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4年4月1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13日）*
H.J.林肯致恩格斯（1854年4月1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8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30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5月4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4年5月8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13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5月1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54年5月1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4年5月2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4年5月23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2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马克思（1854年5月2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5月27日）*
玛丽亚·布兰克致恩格斯（1854年5月30日前，片段）*
贝尔塔·勒维致马克思（1854年5月底或6月初）*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4年6月5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6月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4年6月30日）*
威廉·科内利乌斯致马克思（1854年7月18日）*
E.塔克尔致马克思（1854年7月21日）#
亨利希·海泽致恩格斯（1854年8月2日）*
亨利希·海泽致恩格斯（1854年8月4日和7日）*
亨利希·海泽致恩格斯（1854年8月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4年8月12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4年8月21日）*
亨利希·海泽致恩格斯（1854年9月3日）*
亨利希·海泽致恩格斯（1854年9月8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4年9月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4年10月1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4年10月27日或11月3日）*

(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4年10月28日) *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4年10月30日) *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 (1854年11月1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4年11月6日) *

(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4年11月6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4年11月8日或15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4年11月29日) *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4年12月5日) *

(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4年12月9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4年12月18日前)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4年12月18日) *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 (1854年12月26日) *

(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4年12月28日) *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 (1855年1月7日)

罗兰特·丹尼尔斯致马克思 (1855年1月16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5年1月17日) *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 (1855年1月27日, 片段)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5年2月4日或11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5年2月4日或11—16日之间) *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5年2月8日) *

彼得·欧门致恩格斯 (1855年2月8日) *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P.布莱、理查·查普曼、阿尔弗雷德·塔伦迪耶致马克思 (1855年2月9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5年2月16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5年2月26日) *

亚历山大·威尔曼致恩格斯 (1855年2月26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5年3月1日) *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 (1855年3月2日) *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 (1855年3月23日) *

泰奥多尔·德利乌斯致恩格斯 (1855年3月28日) *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 (1855年3月31日) *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5年4月17日) *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5年4月19日) *

路易·班贝格尔致马克思 (不晚于1855年4月) *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 (1855年6月1日) *

(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5年6月3日) *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 (1855年6月14日) *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55年6月19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5年7月15日前）

J.赛雷迪致马克思（1855年7月15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5年7月19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7月24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7月25日）*

威·威美尔曼致马克思（1855年8月1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5年8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8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8月15日）*

格奥尔格·维尔特致恩格斯（1855年8月24日）

莫里茨·埃尔斯纳致马克思（1855年9月4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5年9月6日前）*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5年9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9月12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5年9月13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5年9月17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5年9月18日）*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恩格斯（1855年9月23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5年9月24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5年9月25日）*

阿马利亚·丹尼尔斯致马克思（1855年9月27日）*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马克思（1855年9月28日）**#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恩格斯（1855年9月2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0月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0月2日）*

莫里茨·埃尔斯纳致马克思（1855年10月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5年10月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5年10月6日）

莫里茨·埃尔斯纳致马克思（1855年10月7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5年10月7日）*

亨利希·马格努斯·科希林致马克思（1855年10月8日）*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马克思（1855年10月12日）**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恩格斯（1855年10月13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5年10月15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5年10月16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5年10月17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不晚于1855年10月）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恩格斯（1855年11月11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5年11月15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1月16日）*

彼得·伊曼特致恩格斯（1855年11月18日前后）*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5年11月20日）*

E.塔克尔致马克思（1855年11月21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5年11月25日）*

卡尔·克里斯蒂安·奥托·雷芬特洛夫致马克思（1855年11月2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2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2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2月15日）*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1855年12月1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2月20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5年12月2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5年12月29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1月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约在1856年1月5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1月21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1月2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2月2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6年2月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2月6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6年2月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2月21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1856年3月2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3月28日）

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致马克思（1856年3月28日）*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通信或其摘录的书信；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的书信；马克思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威廉·皮佩尔致阿伯拉罕·雅科比（1853年9月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0月3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1月2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1月4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1月15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1月1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2月7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2月12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燕妮·马克思（1853年12月1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2月26日）*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和哥特利勃·泰奥多尔·克尔纳（1854年2月初）*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1854年6月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麦克斯·弗里德兰德（1854年12月13日）*

第Ⅲ部分第8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56年4月至1857年12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致《自由新闻》编辑（1856年4月26日）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57年2月26日前）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1857年6月5—10日，草稿）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1857年6月10日后，草稿）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6年4月1日）*
塞巴斯蒂安·载勒尔致马克思（1856年4月1日）*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6年4月6日）
古斯塔夫·勒维致马克思（1856年4月9日前）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6年4月14日前）*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4月20日）*
阿道夫·哈马赫致马克思（1856年4月25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6年5月5日）*
威廉·赛普尔斯致马克思（1856年5月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5月13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6年5月18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6年5月18日后）*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6年5月29日或6月5日）
艾萨克·埃恩赛德致马克思（1856年6月3日）*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恩格斯（1856年6月3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6月5日）*
艾萨克·埃恩赛德致马克思（1856年6月14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6年6月1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6月21日）*
艾萨克·埃恩赛德致马克思（1856年6月23日）*
威廉·赛普尔斯致马克思（1856年6月24日）*

泰奥多尔·德利乌斯致恩格斯（1856年6月25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6年6月25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6年6月25日和28日之间）*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6年6月26日）**#

威廉·赛普尔斯致马克思（1856年6月28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6年7月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6年7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6年7月8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6年7月9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11日）*

威廉·赛普尔斯致马克思（1856年7月14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14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14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6年7月14日）*

卡尔·埃米尔·布兰克致恩格斯（1856年7月15日）*

威廉·赛普尔斯致马克思（1856年7月15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15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16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18日）*

奥托·冯·米尔巴赫致马克思（1856年7月18日）*

威廉·赛普尔斯致马克思（1856年7月19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21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6年7月22日）*

卡尔·埃米尔·布兰克致恩格斯（1856年7月23日）*

爱德华·马迪耶·德·蒙蒂奥致恩格斯（1856年7月26日）*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6年7月28日前）*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7月30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7月30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6年8月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8月8日）*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6年8月15日）

爱德华·齐施克致马克思（1856年8月22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6年8月2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6年8月2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6年8月26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56年8月28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6年8月29日）*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6年秋）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6年9月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9月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6年9月19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9月24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6年9月25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6年9月27日）*

威廉·威斯特致马克思（1856年9月29日）*

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和（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10月3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6年10月3日）*

爱德华·齐施克致马克思（1856年10月7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10月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6年10月13日）

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致恩格斯（1856年10月21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6年10月2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12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6年12月24日）*

维克多·席利致燕妮·马克思和马克思（1856年12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1月5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1月1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1月29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7年1月30日）*

弗里德里克·罗·奥姆斯特德致马克思（1857年1月3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2月4日）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7年2月5日前）

约翰·福克斯·特纳致恩格斯（1857年2月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2月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2月1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2月11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7年2月22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3月5日）*

胡果·冯·塞尔姆尼茨致恩格斯（1857年3月9日）

胡果·冯·塞尔姆尼茨致恩格斯（1857年3月9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3月10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3月1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3月1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3月1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3月17日）
鲁道夫·佩茨特致恩格斯（1857年3月18日）*
胡果·冯·塞尔姆尼茨致恩格斯（1857年3月1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3月25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4月6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4月12日前后）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4月16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7年4月25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7年4月26日）
鲁道夫·佩茨特致恩格斯（1857年4月）*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5月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5月4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7年5月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5月7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5月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57年5月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5月15日）*
鲁道夫·佩茨特致恩格斯（1857年5月20日）*
约翰奈斯·冯·米凯尔致马克思（1857年5月22日前）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7年5月2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5月2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5月29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6月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6月6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7年6月10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6月11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6月13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恩格斯（1857年6月中）*
奥斯瓦尔德·莱曼致恩格斯（1857年7月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7月4日）*
威廉·卡尔·施特芬致马克思（1857年7月5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7年7月9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7年7月1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7月14日）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57年7月17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7月2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7月21日）
鲁道夫·佩茨特致恩格斯（1857年7月21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7年7月2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7月24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7月2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7月30日）*
马丁·黑克舍尔致恩格斯（1857年7月30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7月3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7年7月31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7月31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7月31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8月1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8月3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8月4日）*
威廉·沃尔弗致恩格斯（1857年8月4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8月5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恩格斯（1857年8月7日）*
弗里德里希·佩尔泽致恩格斯（1857年8月7日）*
L.E.施特劳伯致恩格斯（1857年8月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8月10日）*
马丁·黑克舍尔致恩格斯（1857年8月11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8月11日和14日之间）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7年8月18日）*
马丁·黑克舍尔致恩格斯（1857年8月20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恩格斯（1857年8月2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8月22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8月25日）*
阿道夫·迈耶尔致马克思（1857年8月29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9月2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9月9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9月11日和12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7年9月12日）*
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857年9月14日）*
I.施勒哈特致马克思（1857年9月14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恩格斯（1857年9月15日）*
马丁·黑克舍尔致恩格斯（1857年9月17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9月19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恩格斯（1857年9月20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马克思（1857年9月21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马克思（1857年9月23日）*
理查·莱茵哈特致恩格斯（1857年9月23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
康拉德·施拉姆致恩格斯（1857年9月27日）*
马丁·黑克舍尔致恩格斯（1857年9月28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7年10月8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10月9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10月10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7年10月11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7年10月1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10月12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7年10月1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7年10月22日）
马丁·黑克舍尔致恩格斯（1857年10月23日）*
马丁·黑克舍尔致恩格斯（1857年10月24日）*
哥特弗里德·欧门致恩格斯（1857年10月25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7年10月27日）*
格里高利乌斯·希尔致恩格斯（1857年10月3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11月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11月23日）*
彼得·米夏埃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7年11月24日）*
A.莱奥波德致马克思（1857年12月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12月9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7年12月1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8日）*
弗里德里希·康姆致马克思（1857年12月19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7年12月30日）*

3.马克思委托他人写的书信；他人写的涉及恩格斯书信内容的书信

威廉·皮佩尔致威廉·赛普尔斯（1856年7月17日，草稿）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卡尔·维尔特（1857年2月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卡尔·维尔特（1857年2月2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威廉·沃尔弗（1857年8月1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卡尔·维尔特（1857年9月27日，摘录）

康拉德·施拉姆致乔治·朱利安·哈尼（1857年9月27日）

第Ⅲ部分第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58年1月至1859年8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可能在1858年7月15日）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1859年3月4日）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859年5月30日）**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康拉德·施拉姆致恩格斯（1858年1月1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8年1月8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月9日和13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月13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8年1月15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8年1月16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8年1月17日）

鲁道夫·施拉姆致马克思（1858年1月18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8年1月19日）

查理·勒兹根致恩格斯（1858年1月2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月23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8年1月24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8年1月25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8年1月30日）*

马蒂亚斯·维纳尔·林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2月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2月10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8年2月10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2月1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2月1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2月2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2月28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8年2月28日）

卡尔·伊曼特致马克思（1858年3月1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8年3月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8年3月3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3月1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3月12—13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马克思（1858年3月24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8年3月24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8年3月26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9日）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马克思（很可能在1858年5月2日）**

鲁道夫·施拉姆致恩格斯（1858年5月3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5月5日）*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恩格斯（1858年5月5日）

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5月11日和12日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8年5月17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8年6月4日）

伊丽莎·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6月8日）*

阿尔布雷希特·康普致马克思（1858年6月15日）

海尔曼·布克致恩格斯（1858年6月29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1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1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13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1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8年7月1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19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8年7月2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2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2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7月29日）

伊丽莎·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8月1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8月30日）*

伊丽莎·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0月1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0月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8年10月1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8年10月21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8年10月2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8年10月2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10月25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8年11月2日）*

哥特弗里德·欧门致恩格斯（1858年11月3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1月8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8年11月11日）*

亨利希·安德斯致马克思（1858年11月1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1月18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8年11月18日）*

亨利希·安德斯致马克思（1858年11月21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8年12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8年12月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2月11日）*

卡尔·沙佩尔致马克思（1858年12月1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和（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8年12月2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1月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月5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月5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1月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月12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1月2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9年1月25日前）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9年1月27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1月3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2月5日）

弗兰茨·敦克尔致马克思（1859年2月7日）

威廉·皮佩尔致马克思（1859年2月7日）*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马克思（1859年2月8日）*

卡尔·普芬德致马克思（1859年2月8日）*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马克思（1859年2月14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2月28日或3月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3月6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3月7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9年3月15日）*

路易莎·尤塔和卡瑞尔·尤塔致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1859年3月1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3月17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3月17日）*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恩格斯（1859年3月2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3月2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恩格斯（1859年3月2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3月21日和23日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3月26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59年3月2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4月8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4月8日）

麦克斯·弗里德兰德致马克思（1859年4月1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4月1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4月1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4月22日）

阿尔布雷希特·康普致马克思（1859年4月24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4月30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很可能在1859年5月8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59年5月9日）*

威廉·施特龙致恩格斯（1859年5月9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很可能在1859年5月14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59年5月17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5月20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59年5月2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5月2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5月25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5月27日至6月初）

弗兰茨·敦克尔致马克思（1859年5月31日）

威廉·施特龙致恩格斯（1859年6月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6月14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59年6月16日）

弗兰茨·敦克尔致马克思（1859年6月2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7月1日）*

约翰·理查·希尔和尤利乌斯·布罗姆致恩格斯（1859年7月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7月3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7月8日）*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致马克思（1859年7月1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7月15日）

古斯塔夫·施奈德尔致恩格斯（1859年7月19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7月20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9年7月30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7月31日）*

弗兰茨·敦克尔致恩格斯（1859年8月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8月8日）*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致马克思（1859年8月11日）*

路易·博尔夏特致马克思（1859年8月2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8月21日）*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致马克思（1859年8月22日）*

埃拉尔德·比斯康普致马克思（很可能在1859年8月26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8月2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8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8月3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8月31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8月31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8月31日）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恩格斯通信或其情况的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乔治·朱利安·哈尼致燕妮·马克思（1858年1月17日）*

燕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4月9日）

斯蒂凡·波尔恩致燕妮·马克思（1859年6月23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燕妮·马克思（很可能在1859年6月25日）

燕妮·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859年6月28日）

第Ⅲ部分第10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59年9月至1860年5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恩格斯致E.乔治·福尔克纳，附致丹尼尔的书信草稿（1859年11月2日）

马克思致《新普鲁士报》（1860年1月底至2月初）*

恩格斯致恩格斯家族（最晚在1860年5月10日）*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1860年5月10日，电报草稿）*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致马克思（1859年9月5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59年9月6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9年9月18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9月23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最早在1859年9月2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9月26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可能在1859年9月2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9月30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9年10月2日）*

埃米尔·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0月5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0月5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10月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10月8日和24日之间）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0月1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10月14日）

海尔曼·奥尔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0月16日）

海尔曼·奥尔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0月16日）

埃米尔·克鲁恩致恩格斯（1859年10月18日）*

路德维希·施托夫雷根致马克思（1859年10月18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59年10月21日和28日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10月24日）

G.加尔特致马克思（1859年10月31日）*

埃拉尔德·比斯康普致马克思（约在1859年11月初）*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11月2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1月3日或4日）

E.乔治·福尔克纳致恩格斯（1859年11月5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11月11日）

埃拉尔德·比斯康普致马克思（1859年11月11日和19日之间）*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11月1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11月16日和19日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11月17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11月20日）

马蒂亚斯·维纳尔·林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1月20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1月23日）*

G.加尔特致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59年11月28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1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1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2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8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2月23日或2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59年12月25日）*

查理·莫尔致恩格斯（1859年1月25日和12月25日之间）*

C.弗里德里希·施米特致恩格斯（1859年12月29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59年12月29日）

马蒂亚斯·维纳尔·林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月2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月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1月11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60年1月11日）*

威廉·约瑟夫·赖夫致马克思（1860年1月11日后）

哥特弗里德·欧门致恩格斯（1860年1月12日或1865年1月12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1月15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1月1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月18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1月26日）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月28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2月1日和5日之间）

爱德华·费舍致马克思（1860年2月2日）*

卡尔·沙佩尔致马克思（1860年2月2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60年2月2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0年2月3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60年2月5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2月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2月6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0年2月7日）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致马克思（1860年2月7日）*

《每日电讯》编辑部致马克思（1860年2月8日）*

《晨星报和晚星报》编辑部致马克思（1860年2月8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2月9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0年2月9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2月9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0年2月10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2月10日）*

约阿希姆·列列韦尔致马克思（1860年2月10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0年2月11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2月12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0年2月12日）*

弗兰茨·敦克尔致恩格斯（1860年2月13日）

《每日电讯》编辑部致马克思（1860年2月13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2月14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2月15日）*

卡尔·沙佩尔致马克思（1860年2月15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60年2月19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2月19日）

尤利乌斯·韦伯致马克思（1860年2月22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0年2月2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年2月26日、27日和29日）

弗兰茨·敦克尔致恩格斯（1860年2月27日）

彼得·诺特荣克致马克思（1860年2月27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0年2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2月28日）

爱德华·费舍致恩格斯（1860年2月29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

路易·博尔夏特致马克思（1860年3月初）*

爱德华·费舍致恩格斯（1860年3月1日）*

《自由射手》报编辑部致马克思（1860年3月6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3月6日）*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致马克思（1860年3月7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60年3月8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0年3月9日）*

列奥波特·海弗纳尔致马克思（1860年3月1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3月11日）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致马克思（1860年3月14日）*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60年3月15日或16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3月16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3月1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60年3月17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3月18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3月19日）*

卡尔·路特贝克致恩格斯（1860年3月19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恩格斯（最早在1860年3月19日）

埃米尔·布兰克和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3月20日）*

埃米尔·克鲁恩致恩格斯（1860年3月21日）*

彼得·欧门致恩格斯（1860年3月22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年3月22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0年3月22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3月22日和26日之间）*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3月22日和26日之间）*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3月23日）*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致马克思（1860年3月23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3月26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0年3月26日和4月初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3月28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0年3月28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马克思（1860年3月30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3月30日）

弗兰茨·提姆致恩格斯（1860年3月底）*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4月2日）*

爱德华·龚佩尔特致马克思（1860年4月3日）*

爱德华·龚佩尔特致马克思（1860年4月3日）*

彼得·欧门致恩格斯（1860年4月5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0年4月8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4月9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0年4月1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13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1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14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1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15日）*

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和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1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16日）*

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致恩格斯（1860年4月16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0年4月16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马克思（最晚在1860年4月17日）*

古斯塔夫·泰霍夫致马克思（1860年4月17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马克思（1860年4月18日）*

埃米尔·布兰克致恩格斯（1860年4月19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19日）*

莫里茨·佩尔采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19日）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20日）*

尤利乌斯·韦伯致马克思（1860年4月2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最晚在1860年4月21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21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4月2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22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22日）*

安德烈亚斯·谢尔策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22日）

埃米尔·布兰克致恩格斯（1860年4月24日）*

埃米尔·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25日，电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25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60年4月25日）*

埃米尔·布兰克致恩格斯（1860年4月26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4月26日和29日）*

鲁道夫·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2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4月28日）*

维克多·席利致卡尔·济贝耳和马克思（1860年4月29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和路易莎·魏德迈致燕妮·马克思（1860年4月29日）#

埃米尔·克鲁恩致恩格斯（1860年5月1日）*

爱德华·费舍致马克思（1860年5月2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5月3日）*

贝尔塔兰·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5月5日）

威廉·约瑟夫·赖夫致恩格斯（最早在1860年5月6日，片段）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5月7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5月8日）*

阿尔伯特·佩奇公司致马克思（1860年5月9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宗诺夫致马克思（1860年5月10日）

阿尔伯特·佩奇公司致马克思（1860年5月11日）*

卡尔·沙佩尔致马克思（1860年5月11日）

尤利乌斯·韦伯致马克思（1860年5月12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最早在1860年5月12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60年5月1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5月24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5月28日）*

爱德华·费舍致马克思（1860年5月30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5月31日）*

第Ⅲ部分第11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60年6月至1861年12月）

1.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1860年6月1日）*

马克思致《改革报》编辑部（1860年11月24日，附信）*

马克思致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1861年3月19日）

马克思致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1861年3月25日）

马克思致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1861年4月6日）

马克思致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1861年4月11日）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6月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6月1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6月1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6月2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0年6月3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6月4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6月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6月6日）*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致马克思（1860年6月8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6月12日）*

埃拉尔德·比斯康普致马克思（1860年6月14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6月14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6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6月18日）*

雅克·迪那致恩格斯（1860年6月19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6月19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6月20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6月21日）*

尤利乌斯·韦伯致马克思（1860年6月22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和马克思（1860年6月23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0年6月23日和8月2日之间）*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6月24日）*

贝尔塔兰·冯·瑟美列致马克思（1860年6月2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6月26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6月27日）

格奥尔格·洛默尔致马克思（1860年7月1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60年7月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0年7月1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7月19日）*

尤利乌斯·韦伯致马克思（1860年7月21日，草稿）*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0年7月24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很可能在1860年8月初）*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0年8月2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8月5日）*

埃米尔·克鲁恩致恩格斯（1860年8月7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8月8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0年8月11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60年8月11日）*

伊萨克·哈尔致恩格斯（最早在1860年8月11日，最晚在1860年8月13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8月1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8月27日）*

卡尔·沙佩尔致马克思（1860年8月27日）

尤利乌斯·韦伯致马克思（1860年8月27日，草稿）*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最早在1860年8月29日）*

爱德华·龚佩尔特致恩格斯（1860年9月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9月3日）

恩斯特·冯·艾纳恩致恩格斯（1860年9月4日）*

爱德华·威美尔曼致马克思（1860年9月4日）*

查理·安德森·德纳致马克思（1860年9月8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马克思（1860年9月10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9月11日）

鲁道夫·希尔什菲尔德和阿尔伯特·佩奇致马克思（1860年9月1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9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9月1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9月17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9月18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最晚在1860年9月20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0年9月20日）*

伊萨克·哈尔致恩格斯（1860年9月21日后）*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9月22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9月24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0年9月25日，片段）*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9月27日）*

哥特弗里德·欧门致恩格斯（1860年9月27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9月27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0年9月27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10月1日）*

阿尔弗雷德·瓦尔姆斯利致恩格斯（很可能在1860年10月2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0月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最早在1860年10月5日）

《军事总汇报》编辑部致恩格斯（1860年10月1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10月12日）

H.C.施泰歇致马克思（1860年10月14日前）*

H.C.施泰歇致马克思（1860年10月14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10月15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0月18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10月22日）*

尤利乌斯·韦伯致马克思（1860年10月22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10月30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1月1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60年11月3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1月9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60年11月17日）

贝尔塔兰·冯·瑟美列致马克思（最早在1860年11月18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0年11月19日）*

贝尔塔兰·冯·瑟美列致马克思（最早在1860年11月21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11月22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60年11月22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0年11月2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11月28日）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马克思（1860年11月底或12月初）**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12月3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12月5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0年12月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2月8日）*

亨利希·安德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9日）*

亨利希·安德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9日后）*

亨利希·安德斯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很可能在1860年12月13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12月17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

哥特弗里德·海尔韦格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9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0年12月20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0年12月21日）*

哥特弗里德·海尔韦格致恩格斯（1860年12月21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60年12月27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恩格斯（1860年12月27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60年12月27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1月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1月2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1年1月8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马克思（1861年1月10日）*

亨利希·安德斯致马克思（1861年1月11日）*

阿尔伯特·佩奇致恩格斯（1861年1月11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61年1月13日）*

亨利希·安德斯致马克思（不晚于1861年1月中）*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致马克思（1861年1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1年1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1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1年1月15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1月15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1年1月1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1年1月19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1月23日后）*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1年1月25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1年1月2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1年1月31日）

C.J.夏奈里致恩格斯（1861年2月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2月2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1年2月6日前）*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2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2月9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2月1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2月12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1年2月12日）*

威廉·艾希霍夫致马克思（1861年2月1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2月16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2月18日前）*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2月18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2月18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61年2月18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19日）**

卡尔·沙佩尔致马克思（1861年2月19日）*

洛塔尔·布赫尔致马克思（1861年2月2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61年2月23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2月26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61年2月26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3月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3月2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61年3月2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最晚在1861年3月7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3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3月7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8日和23日之间）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恩格斯（1861年3月11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3月12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3月14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3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3月18日）*

南尼达·菲力浦斯致马克思（1861年3月18日）

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致马克思（1861年3月21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最早在1861年3月23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3月25日）*

伊萨克·哈尔致恩格斯（1861年3月25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1年3月26日）*

H.C.潘泽尔致恩格斯（1861年3月26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致马克思（1861年3月27日）

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致马克思（1861年3月30日）*

约翰·霍华德·诺达尔致恩格斯（1861年4月2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4月3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最早在1861年4月4日）

海尔曼·里姆致马克思（1861年4月5日）*

卡尔·路特贝克致恩格斯（1861年4月9日）*

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致马克思（1861年4月10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4月11日）*

W.H.克劳斯致恩格斯（1861年4月11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4月15日）*

W.H.克劳斯致恩格斯（1861年4月1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4月18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4月19日）*

古斯塔夫·阿尔特斯塔特致恩格斯（1861年4月25日）*

康斯坦丁·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致马克思（1861年4月25日）*

阿尔伯特·明斯特和卡尔·沙佩尔致恩格斯（1861年4月2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4月29日和30日）*

V.施多塞尔致恩格斯（1861年5月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5月4日）*

W.H.克劳斯致恩格斯（1861年5月8日）*

西蒙·贝尔纳致马克思（1861年5月13日，马克思的抄本）*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5月18日）*

詹姆斯·埃克斯利致恩格斯（1861年5月29日）*

皇家警察总局执行处致马克思（1861年6月3日）*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致马克思（1861年6月3日）*

尤利乌斯·弗里德兰德致马克思（1861年6月7日）*

路易·瓦托致马克思（1861年6月8日，马克思的抄本）*

伊萨克·哈尔致恩格斯（1861年6月12日）*

索菲娅·冯·哈茨费尔特致马克思（1861年6月14日）*

尤利乌斯·特鲁斯特致恩格斯（1861年6月15日）*

尤利乌斯·弗里德兰德致马克思（1861年6月22日）*

约瑟夫·瓦伦亭·韦伯致马克思（1861年6月22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6月24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1年7月1日）

路易·瓦托致马克思（1861年7月2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1年7月3日）*

C.J.夏奈里致恩格斯（1861年7月1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和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7月11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1年7月26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1年7月28日）

路易·瓦托致马克思（1861年7月28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很可能在1861年8月11日）*

索菲娅·冯·哈茨费尔特致马克思（1861年8月25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1年8月25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9月4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1年9月1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9月17日）*

恩斯特·奥斯瓦尔德致马克思（1861年9月27日）*

路易·瓦托致马克思（1861年9月27日）*

阿道夫·N·戴维森致恩格斯（1861年9月28日）*

威廉·沃尔弗致马克思（1861年10月3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最早在1861年10月3日）*

卡尔·罗德致马克思（1861年10月8日）*

恩斯特·奥斯瓦尔德致马克思（1861年10月9日）*

卡尔·罗德致马克思（1861年10月13日）*

麦克斯·弗里德兰德致马克思（1861年10月2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1年11月5日）*

卡尔·罗德致马克思（1861年11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11月12日）*

路易·瓦托致马克思（1861年11月14日）*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致马克思（1861年11月1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1年11月21日）*

斐迪南·拉萨尔致马克思（1861年11月22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1年11月23日）*

彼得·伊曼特致马克思（1861年12月4日）*

约瑟夫·瓦伦亭·韦伯致马克思（1861年12月9日前）*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1年12月9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1年12月9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61年12月10日）*

约瑟夫·瓦伦亭·韦伯致马克思（1861年12月1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61年12月11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61年12月13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61年12月2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1年12月20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1年12月20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马克思（1861年12月22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61年12月22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61年12月23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1年12月23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1年12月23日）*
威廉·艾希霍夫致马克思（1861年12月30日）*

第Ⅲ部分第13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1864年10月至1865年12月）

1.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新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信

马克思致索菲娅·冯·哈茨费尔特（1864年11月24日）

马克思致《观察家报》编辑（1864年11月28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3月4日）[\[5\]](#)#

马克思致卡尔·冯·布龙（1865年3月28日）

（第一封信已收录在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2.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索菲娅·冯·哈茨费尔特致马克思（1864年10月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0月4日和16日之间）*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马克思（1864年10月12日）

威廉·施特龙致马克思（1864年10月12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4年10月15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4年10月17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4年10月17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64年10月19日）*

W.P.惠特菲尔德致恩格斯（1864年10月22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4年10月24日）**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致马克思（1864年10月26日）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致马克思（1864年10月27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64年10月）#

威廉·施特龙致马克思（1864年11月3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

卡尔·考布致马克思（1864年11月1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1月11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恩格斯（1864年11月11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4年11月1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4年11月19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4年11月19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1月19日）

索菲娅·冯·哈茨费尔特致马克思（1864年11月21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4年11月25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4年11月28日）

马蒂尔德·博尔夏特致马克思（1864年11月30日和12月2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4年12月1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4年12月1日）*

维克多·勒吕贝致马克思（1864年12月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2月2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4年12月3日）*

彼得·福克斯·安德烈致马克思（1864年12月3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4年12月4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4年12月5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2月5日）*

莱昂·菲力浦斯致马克思（1864年12月5日）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致马克思（1864年12月7日）*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4年12月9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2月15日）*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致马克思（1864年12月16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4年12月19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2月20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4年12月25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霍夫施泰滕致恩格斯（1864年12月28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霍夫施泰滕致马克思（1864年12月28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4年12月28日）*

路德维希·奥托致马克思（1864年12月29日）*

彼得·福克斯·安德烈致马克思（1864年12月29日和1865年1月3日之间）*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4年12月30日）*

彼得·福克斯·安德烈致马克思（可能在1864年12月和1865年2月之间）*

约瑟夫·魏德迈致马克思（1865年1月2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1月3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5年1月4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5日和7日之间）**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1月7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恩格斯（1865年1月10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1月11日）*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5年1月11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5年1月14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5年1月18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1月18日和21日之间）*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5年1月19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1月19日和20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65年1月20日和22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1月21日）

卡·罗德致马克思（1865年1月22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1月25日前）*

卡·罗德致马克思（1865年1月27日）*

威廉·施特龙致马克思（1865年1月30日）*

夏洛特·克里默致马克思（1865年1月底和5月底之间）*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5年2月1日）

威廉·施特龙致马克思（1865年2月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约在1865年2月4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5年2月4日）

莱昂·封丹致马克思（1865年2月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2月5日）*

维克多·勒吕贝致马克思（1865年2月7日前）*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致马克思（1865年2月7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2月7日）

威廉·施特龙致马克思（1865年2月9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2月10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5年2月1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2月12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2月13日）

爱琳娜·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3日）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致马克思（1865年2月15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恩格斯（1865年2月16日）*

朱泽培·方塔纳致马克思（1865年2月16日）*

爱琳娜·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6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2月16日和17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2月17日）

奥托·迈斯纳致恩格斯（1865年2月17日）*

路易莎·库格曼致马克思（1865年2月19日）*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波克罕致马克思（1865年2月2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2月22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2月25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2月2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2月25日和28日）*

卡尔·冯·布龙致马克思（1865年2月27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2月27日）*

卡尔·济贝耳致马克思（1865年2月28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5年3月1日）*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致恩格斯（1865年3月2日和4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恩格斯（1865年3月3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3月3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5年3月3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5年3月3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5年3月4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5年3月6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3月7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3月7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3月10日）**

卡尔·济贝耳致恩格斯（1865年3月10日）*

约翰·雅科布·克莱因致恩格斯（1865年3月11日和17日之间）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5年3月12日）*

亨利·本德尔致马克思（1865年3月14日）*

恩斯特·尤赫致马克思（1865年3月14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恩格斯（1865年3月15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3月16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3月18日前）*

恩斯特·尤赫致马克思（1865年3月18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3月20日）*

阿什尔公司致马克思（1865年3月21日）*

奥托·迈斯纳致马克思（1865年3月21日）*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5年3月22日）*

卡尔·克林斯致恩格斯（1865年3月22日）*

阿道夫·戴维森致恩格斯（1865年3月23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5年3月24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3月25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3月27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3月29日和4月1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3月30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3月31日和1865年4月1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恩格斯（1865年4月1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4月1日）

威尔弗里德·约瑟夫·克里普斯致恩格斯（1865年4月3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4月4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4月8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4月8日）*

卡尔·冯·布龙致马克思（1865年4月9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4月10日）*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马克思（1865年4月13日）*

柏林印刷工人救助协会委员会致马克思（1865年4月15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4月15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4月16日）*

安娜·冯·博伊斯特致恩格斯（1865年4月18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4月18日）*

莱昂·封丹致马克思（1865年4月18日和24日之间）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4月19日和29日之间）*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5年4月20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4月22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4月24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4月24日）*

约瑟夫·魏德迈致恩格斯（1865年4月24日和30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4月27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4月29日）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5年5月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5月3日）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致马克思（1865年5月4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5月6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5月8日）**

恩斯特·德朗克致恩格斯（1865年5月10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5月10日）**

E.雪恩曼致马克思（1865年5月10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和保尔·施土姆普弗致马克思（1865年5月13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5月16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5月17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5月18日和25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5月20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5月22日）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22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5月27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5月27日后）*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致马克思（1865年6月1日）*

卡罗琳·施马尔豪森致马克思（1865年6月7日）

安娜·冯·博伊斯特致恩格斯（1865年6月22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6月24日后）*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6月25日）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5年6月29日）*

保尔·施土姆普弗致马克思（1865年6月29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7月3日）*

F.林克致恩格斯（1865年7月9日）*

弗雷德里克·巴拿比致马克思（1865年7月11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7月15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7月22日）*

莱昂·封丹致马克思（1865年7月28日）

莱昂·菲利浦斯致马克思（1865年7月30日）

威廉·艾希霍夫致马克思（1865年8月3日）*

彼得·弗里德里希·济博耳德致马克思（1865年8月4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8月7日）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马克思（1865年8月1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8月16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8月21日）*

威廉·纳索·莫尔斯沃斯致马克思（1865年8月23日）*

威廉·纳索·莫尔斯沃斯致马克思（1865年8月25日）*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5年8月29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8月30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9月2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5年9月6日）#

维克多·席利致马克思（1865年9月10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9月15日前后）*

阿尔丰斯·万丹胡亭致马克思（1865年9月16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9月23日）*

康斯坦丁·鲍伯岑斯基致马克思（1865年9月26日）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9月28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马克思（1865年9月29日）*

卡·罗德致马克思（1865年9月29日）*

彼得·福克斯·安德烈致马克思（1865年9月30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1865年10月4日）

卡尔·考布致马克思（1865年10月6日）*

洛塔尔·布赫尔致马克思（1865年10月8日）

保尔·施土姆普弗致马克思（1865年10月9日）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致马克思（1865年10月9日和15日之间）*

查理·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10月16日）*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5年10月21日）*

卡尔·考布致马克思（1865年10月22日）*

劳拉·马克思致马克思（1865年10月31日）**

约翰·康拉迪致马克思（1865年11月3日）#

西吉斯蒙德·波克罕致恩格斯（1865年11月7日）*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5年11月7日）

伊丽莎白·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11月10日和11日）*

海尔曼·恩格斯致恩格斯（1865年11月11日）*

泰奥多尔·梅茨内尔、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致马克思（1865年11月13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11月14日）*

海尔曼·荣克致马克思（1865年11月15日）*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致马克思（1865年12月4日）*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致马克思（1865年12月18日）

路易莎·库格曼致马克思（1865年12月20日）*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年12月26日前）*

厄内斯特·琼斯致马克思（1865年12月29日）*

C.弗里德里希·施米特致恩格斯（1865年12月29日）*

彼得·福克斯·安德烈致马克思（1865年和1867年之间）*

3.他人写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委托他人写的书信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燕妮·马克思（可能在1865年1月15日前）*

维克多·席利致燕妮·马克思（1865年9月11日）*

第三节 MEGA² 第IV部分已出版卷次内容

如前所述, MEGA² 第IV部分预计出版32卷, 目前已经出版了12卷。关于这12卷的内容, 我们依次进行简要的介绍。

在第IV/1卷中, 主要收录了截至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摘录和笔记。

就马克思所做的摘录来说, 主要包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七个笔记本、关于伊壁鸠鲁研究的片段、对经典哲学家所做的摘录(柏林笔记)以及对艺术史和宗教史所做的摘录(波恩笔记)四个部分。首先, 就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七个摘录笔记来说, 它们已经被收录在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此处不再赘述。^[6]其次, 就关于伊壁鸠鲁研究的片段来说, 该卷主要收录了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七个笔记本中第一、第二和第四本笔记中的相关片段, 另外还有一份根据笔记三而写就的草稿片段。再次, 就柏林笔记来说, 其中包括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莱布尼茨著作集》、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保罗斯编辑的贝奈狄克特·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和《通信集》、卡尔·罗森克朗兹的《康德哲学史》的摘录。最后, 波恩笔记主要包括马克思对卡尔·路德维希·冯·鲁摩尔的《意大利研究》、约翰·雅科布·格伦特的《希腊绘画》、沙尔·德·布罗瑟斯的《论拜物神仪式》、伯蒂格勒的《艺术神话学思想》、克里斯托夫·迈纳斯的《宗教批判通史》、本杰明·贡斯当的《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让·巴贝拉克的《教会神父道德契约》等著作所做的摘录。另外, 该笔记中还有一份罗马作家名录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索引。

恩格斯所做的摘录笔记主要是对新约著作的批判研究, 包括对布鲁诺·鲍威尔的《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E.C. 吕策尔贝格的《论使徒约翰及其著作》的摘录, 另外还有一份对斐迪南·贝纳瑞关于《约翰启示录》的课程的记录。

在第IV/2卷中, 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至1845年1月所做的摘录和笔记。其中, 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占了绝大多数篇幅, 分别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

首先, 就克罗茨纳赫笔记来说, 它共有五本。笔记本I是关于法国史的笔记, 马克思在其中研习了克里斯托夫·哥特洛布·亨利希的《法国史》第1卷。笔记本II是关于法国、威尼斯和波兰史的笔记以及对有关国家理论的著作的摘录。马克思考察的著作有克里斯托夫·哥特洛布·亨利希的《法国史》第1卷(续)和第2卷、卡尔·弗里德里希·恩斯特·路德维希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第2卷、皮埃尔·达鲁的《威尼斯共和国史》、查理·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第3卷、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雅克-查理·拜卢尔的《关于斯塔夫男爵夫人遗稿的批判分析》第1卷和第2卷、亨利·布鲁姆的《波兰》、沙尔·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笔记本III是关于英国史的笔记。马克思在其中考察的著作有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和宪法史》、约翰·马丁·拉彭伯格的《英国史》第1卷。笔记本IV是关于法国、德国、英国和瑞典历史的笔记, 马克思在其中考察了以下著作: 恩斯特·亚历山大·施米特的《法国史》第1卷、弗朗索瓦·勒奈·德·夏多里昂的《论1830年7月以来的法兰西》和《与卡尔斯十世及其家庭的驱逐相关的新建议》、卡尔·威廉·冯·兰齐措勒的《论七月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后果》、威廉·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期的法国史》第1卷和第2卷、莱奥波德·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第2卷、《历史政治杂志》第1卷、约翰·林加特的《罗马人第一次入侵以来的英国史》第1—7卷、艾里克·盖耶尔的《瑞典史》第1卷和第3卷。另外, 笔记本IV还有一份关于该笔记的索引。笔记本V是关于德国史和美国史的笔记以及对关于国家史和宪法史的一些著作的摘录, 其中涉及的著作有约翰·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的《德意志史》第1—5卷、尤斯图斯·默泽的《爱国主义的幻想》第1—4卷、卡尔·乔治·朱弗罗伊的《继承权的原则和法国与英国的贵族》、托马斯·汉密尔顿的《美国人和美国习惯风俗》第1卷和第2卷以及尼古洛·马基雅弗利的《论国家》。

其次, 就巴黎笔记来说, 它包括马克思所做的关于国民公会史的准备材料、关于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 回忆录》第1—4卷的笔记以及对以下著作的摘录: 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第1卷和第2卷、弗里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第1卷、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3卷、雅典的色诺芬的《著作集》第9—11卷、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卷和第2卷、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吉约姆·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第4卷和第5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卡尔·沃尔夫冈·克里斯托弗·许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和《论民族的商业交往》第1卷、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2卷以及欧仁·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就恩格斯所作的摘录笔记来说, 第IV/2卷收录了恩格斯对阿奇博尔德·艾利生的《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所做的提纲片段。

在第IV/3卷中, 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在1844—1845年所做的巴黎笔记以及在1845年所做的布鲁塞尔笔记。

在巴黎笔记中, 该卷接续上一卷, 继续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 即皮埃尔·德·布阿吉尔贝尔的三部著作《法国详情》、《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和《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让·罗的《论货币和贸易》、詹姆斯·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 另外还有关于《罗马史》的摘录。

布鲁塞尔笔记共有六本。笔记本I收录的是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 路易·萨伊的《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C.G.德·尚勃朗的《论贫困》、阿尔班·德·维兰诺夫·巴格蒙特的《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本II收录的是马克思对欧仁·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纳索·威廉·西尼耳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所做的摘录。笔记本III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 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费里埃的《论政府同贸易的相互关系》、亚历山大·德拉博尔德的《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拉蒙·德·拉萨格拉的《论卡塔罗涅的棉纺工业及工人》、泰奥多尔·菲克斯的《论政治经济学中的进步与保守精神》、亚历山大·莫雷·德·若耐的《从四世纪到本世纪罗马的城邦生活和国内经济的统计》、亨利·施托尔希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卷至第3卷和路易·弗朗索瓦·贝尔纳德·特里奥恩的《论滥用公债的投机之风》。

笔记本IV收录的是马克思对亨利·施托尔希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第3、5卷和第4卷、尼古拉斯·弗朗索瓦·杜佩雷·德·圣·毛尔的《论货币》、伊萨克·德·平托的《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乔赛亚·柴尔德的《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和本杰明·贝尔的《论匮乏》所做的摘录。笔记本V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奥古斯特·德·加斯帕林的《论机器》、查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伊萨克·贝列拉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和佩莱格里诺·罗西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笔记本VI收录了马克思对下列著作的摘录：约瑟夫·佩基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沙尔·加尼耳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阿道夫·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史》、弗朗索瓦·维尔加德尔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思想史》和约翰·瓦茨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历史和臆想》。

在第IV/4卷中，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所做的曼彻斯特笔记。

首先，马克思所做的曼彻斯特笔记共有五本。其中，笔记本I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论文集》、查理·戴韦南特的《论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和《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的方法》、爱德华·米塞耳登的《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女王陛下的礼节和对英国海上的统治》、查理·戴韦南特的《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和《论战争补给的方式方法》、詹姆斯·安德森的《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和乔治·布朗宁的《大不列颠的国内状况和财政状况》。笔记本II收录了马克思对托马斯·库珀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托马斯·萨德勒的《人口的规律》、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托马斯·罗韦·埃德蒙兹的《实践道德与政治经济学》（片段）的摘录，另外还有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节录以及对地租的计算。笔记本III收录了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的摘录。笔记本IV收录了马克思对威廉·科贝特的《纸币对黄金》、纳索·威廉·西尼耳的《政治经济学》、威廉·汤普森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等的摘录。笔记本V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威廉·阿特金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托马斯·卡莱尔的《宪章运动》、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弗雷德里克·莫顿·伊登的《贫民的状况》、《论工会》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恩格斯所做的曼彻斯特笔记共有三本。笔记本I收录了恩格斯对弗雷德里克·莫顿·伊登的《贫民的状况》的摘录，另外还有一份文献目录。笔记本II收录了恩格斯对伊登的《贫民的状况》的结尾部分、约翰·艾金的《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詹姆斯·巴特沃思的《曼彻斯特的城市古迹和贸易史》、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的摘录，对迈克尔·托马斯·萨德勒的《人口的规律》的节录以及一些关于曼彻斯特的老卡片。笔记本III收录了恩格斯对托马斯·库珀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一书的节录，对乔治·理查森·波特的《国家的进步》、威廉·葛德文的《英联邦历史》、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的摘录，另外还有一些书目笔记。

第IV/6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对古斯塔夫·冯·居利希的《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和马利·奥日埃的《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的摘录。

第IV/7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在1850—1853年所做的伦敦笔记的第I至VI本。

笔记本I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富拉顿的《论通货的调整》、戴维·莫里埃·伊文思的《1847—1848年商业危机》、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亚历山大·安德森的《近来商业的困境》、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托·路德维希·雷登男爵的《欧洲各大国领土和人口关系的比较文化统计学》等著作所做的摘录。

笔记本II收录了马克思对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续）、罗伯特·托伦斯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法案的原则和实施》、阿什伯顿勋爵的《金融和商业危机》、阿奇博尔德·艾利生的《自由贸易和被缚的货币》、威廉·布莱克的《论调节交换过程的原理》和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银行实用业务概论》等著作所做的摘录。

笔记本III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或报刊的摘录：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银行实用业务概论》（续）、《吉米尼书简》的《我们当前货币体系的真正特征和特定结果》和《货币问题》、阿奇博尔德·艾利生的《1815年和1845年的英国》、詹姆斯·泰勒的《论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和《致威灵顿公爵的信》、理查·摩尔的《论货币》、亚历山大·蒙德尔的《金银币的原则与操作》、《对通货问题的考察》、爱德华·索利的《目前的困难及其同货币理论的关系》、纳索·威廉·西尼耳的《关于取得货币的费用以及私人纸币和国家纸币的某些影响的三篇演讲》、罗杰斯·鲁丁的《货币年鉴》、热尔曼·加尔涅的《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威廉·杰科布的《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和约翰·弗里德里希·赖特迈埃尔的《古代民族采矿和冶金的历史》。另外还有对1850年8月31日至10月12日的《经济学家》的摘录。

笔记本IV收录了马克思对奥古斯特·伯克的《雅典人的国家经济》、威廉·杰科布的《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续）、1850年11月30日的《经济学家》、约翰·格奥尔格·毕希的《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和《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850年11月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约翰·格奥尔格·毕希的《关于银行与铸币业的著作全集》所做的摘录。另外，还有对威廉·杰科布的三篇文章《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论农业困难的原因》和《论保护关税》的摘录。

笔记本V收录了马克思对1850年12月的《经济学家》、约翰·格奥尔格·毕希的《关于银行与铸币业的著作全集》（续）、威廉·杰科布的《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续）、约翰·泰勒的《驳通货谬论》、斯科特斯的《对秘密委员会所用的证据的责难》、查理·安德比的《货币之为价值的表现》和《金属货币》、阿尔弗勒德的《写给秘密委员会的一封信》、赛米尔·贝利的《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托马斯·乔普林的《对股份银行委员会报告的考察》、赛米尔·琼斯·劳埃德的《读霍斯利·帕尔默先生的小册子所引发的思考》、托马斯·乔普林的《论罗伯特·皮尔男爵的货币法案》、威廉·克雷的《威廉·克雷的演讲》、威廉·汉姆普森·莫里森的《论金属货币体系》、赛米尔·琼斯·劳埃德的《对通货状况的进一步反思》、大卫·所罗门的《货币困难》、乔治·沃德·诺曼的《评一些流行的错误》、亨利·查理·凯里的《法国、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信贷制度》以及对1847年5月和1851年1月的《经济学家》所做的摘录。另外还有对温德克斯的《致威廉·克雷的信》所做的笔记。

笔记本VI收录了马克思对1847年度和1844年度的《经济学家》、大卫·休谟的《对若干问题的论述》、约翰·洛克的《洛克著作集》、亨利·桑顿的《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托马斯·莫迪默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经纪人》、罗伯特·汉密尔顿的《关于大不列颠国债的产生和发展、偿还和现状以及管理的调查》、科贝特的《曼彻斯特演讲录》、约翰·弗兰西斯的《英格兰银行史》、托马斯·乔普林的《通货改革》、《通货问题》、约翰·格雷的《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帕特里克·詹姆斯·斯特林的《贸易的哲学》、加文·麦森·贝尔的《股份银行业哲学》和《通货问题》、约翰·金尼耳的《危机和通货》、加文·麦森·贝尔的《国家银行与通货》、戴维·莫里埃·伊文思的《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赛米尔·斯普雷尔的《储蓄之谜阐释》、亨利·德拉蒙德的《导致银行紧缩法案的原因》和1851年2月的《经济学家》等所做的摘录。另外，还有马克思对《老妇人的生活和冒险》和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论1839年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所做的笔记。

第IV/8卷主要收录了伦敦笔记的笔记本VII、VIII、IX和X。

笔记本VII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论1839年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爱德华·桑顿的《论报告》、阿尔伯特·加拉廷的《论美国的货币流通和银行制度》、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美国银行业史》和《爱尔兰银行业史》、《为股份银行辩护》、康迪·拉格特的《论通货和银行业》、特拉弗斯·特威斯特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进步》、《通货论》、詹姆斯·惠特曼·博赞克特的《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报告及1810年的证词记录》、查理·博赞克特的《具体意见》、大卫·李嘉图的《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和《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条委员会报告的具体意见》、托马斯·图克的《通货原理研究》、罗伯特·托伦斯的《论1844年银行法的实施对商业信贷的影响》、约翰·盖利布兰德·哈伯德的《通货和国家》、威廉·利瑟姆的《关于通货问题致伍德的书信》、《1847—1848年委员会的报告》、《亚当·斯密关于货币的学说》。另外，该笔记本中还有马克思对《1797年上院秘密委员会报告》所做的笔记。

笔记本VIII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或报刊的摘录：亚当·斯密的《亚当·斯密关于货币的学说》（续）、赫罗尼莫·德·乌斯塔里斯的《商业和航海事务理论和实践》、1845年3—6月和1846年8—10月的《经济学家》、约翰·摩尔顿的《论土壤的本质和属性》、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安东尼奥·沙拉的《简论》、1845年4—5月的《经济学家》、杰米尼亚诺·蒙塔纳里的《货币论》和《简论》、罗伯特·托伦斯的《论货币和纸币》、威廉·M·高吉的《美国纸币和银行业简史》、威廉·库克·泰勒的《社会的自然史》。

笔记本IX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或报刊的摘录：威廉·亚历山大·麦金农的《文明史》、约翰·德·塔克特的《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约翰·巴顿的《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26年《威斯敏斯特评论》、大卫·布坎南的《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罗伯特·托伦斯的《论财富的生产》、皮尔西·莱文斯顿的《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理查·琼斯的《政治经济学绪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托马斯·查默斯的《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7年《爱丁堡评论》、乔治·波利特·斯科罗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威廉·布莱克的《论限制兑现期间政府支出的影响》、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31年的《爱丁堡评论》、理查·琼斯的《论财富的分配》、《社会经济学概论》、托马斯·沙培·斯密的《论各国的经济》、乔治·拉姆赛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理查·惠特利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讲座》。另外，该笔记本中还有马克思对马修·凯瑞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所做的笔记。

笔记本X主要包括马克思对乔治·拉姆赛的《论财富的分配》（续）、托马斯·德·昆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亨利·查理·凯里的三部著作《论工资率》、《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过去、现在和将来》、1824年的《伦敦杂志》、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著作所做的摘录。

第IV/9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的笔记本XI至笔记本XIV。

在笔记本XI中，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或报刊的摘录：托马斯·霍吉斯金的《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罗伯特·欧文的《评工业体系的影响》、《被压迫的工人》、威廉·科普兰的《写给布雷斯顿的信》、纳索·威廉·西尼耳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詹姆斯·H·雷尼的《关于工资的说明》、罗伯特·托伦斯的《论工资和联合》、纳索·威廉·西尼耳的《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查理·大卫·布雷斯顿的《对雇佣的数量和方式的实践考察》、爱德华·卡里顿·塔夫内尔的《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托马斯·亨利·斯特林的《提出的问题》、詹姆斯·霍华德的《英格兰的罪恶》、威廉·洛根的《从个人观察出发对卖淫女的揭示》、约翰·菲尔登的《工厂制度的祸害》、（小）赛米尔·兰格的《国家的贫困》、1838年第67卷《爱丁堡评论》、1842年第37卷和第38卷《威斯敏斯特评论》、托马斯·霍普金斯的《近四十年来的大不列颠》、杰林格·库克森·西蒙斯的《通俗经济学概论》和《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查理·文的《工厂制度的罪恶》、（老）赛米尔·兰格的《一个旅行者的札记》和彼得·加斯克尔的《手工业工人和机器》。

笔记本XII中，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对以下著作的摘录：彼得·加斯克尔的《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续）、詹姆斯·安德森的《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和《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克里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马蒂约·德·东巴尔的《罗维尔的农业年鉴》、《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赛米尔·特纳的《关于农业的思考》、约翰·斯塔基·莱诺兹的《关于李嘉图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践考察》、托马斯·霍普金斯的《关于调节地租、利润、工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的经济学研究》、托马斯·佩罗内特·汤普森的《真正的地租理论》和《谷物法的错误》、爱德华·威斯顿的《谷物价格和工资》、托马斯·霍普金斯的《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 and 人口的影响》、大卫·李嘉图的《论谷物的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和《论农业的保护关税》、查理·温特沃思·迪尔克的《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罗伯特·萨默斯的《苏格兰高地来信》和李比希·尤斯图斯的《有机化学》。

在笔记本XIII中，马克思摘录了以下著作或报刊：李比希·尤斯图斯的《有机化学》（续）、约翰·克劳狄乌斯·劳顿的《农业百科全书》、约瑟夫·唐森的三部著作《论济贫法》、《1786年和1787年西班牙游记》和《论贫民法》、罗伯特·威利斯的《论人口数量》、大卫·休谟的《政治论文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乔治·普尔维斯的《格雷对马尔萨斯》、威廉·托马斯·桑顿的《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罗伯特·沃干的《伟大城市的时代》、托马斯·道布尔迪的《严格的人口规律表明同人民的食物有关》、威廉·普尔特尼·艾利生的《关于苏格兰贫民的管理及其对大城市卫生状况的影响的考察》、阿奇博尔德·艾利生的《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詹姆斯·芬利·韦尔·约翰斯顿的《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

说》、1851年6月和7月的《经济学家》。

在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以下著作或报刊：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杜罗·德拉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阿尔诺德·海尔曼·路德维希·黑伦的《论古代世界最主要民族的政治、交通和贸易》、詹姆斯·芬利·韦尔·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讲义》、威廉·约翰斯顿的《英格兰自身，它的政治、社会和工业》、1851年6月至8月的《经济学家》、1851年8月的《时代》、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和《秘鲁征服史》、赫尔曼·梅里韦尔的《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菲利克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地调查》、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略论殖民艺术》、托马斯·霍吉金的《论美国殖民协会的功绩》和《论英国的非洲殖民协会》、托马斯·巴克斯顿的《非洲奴隶贸易》和《补救办法·非洲奴隶贸易续》、阿尔诺德·海尔曼·路德维希·黑伦的《历史手册》、威廉·豪伊特的《殖民和基督教》、尤安·桑佩里·加里诺斯的《论西班牙君主制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以及亨利·布鲁姆的《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

第IV/12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的外交史笔记和西班牙史笔记。另外还有恩格斯写的一些摘录和笔记。

首先，马克思的四本外交史笔记。

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摘录了《俄军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亨利希·冯·布兰特的《俄国近年来的政策和军队》、《希腊正教和东正教》、约翰·马森·尼尔的《圣东正教历史导论》、瓦勒瑞安·克拉辛斯基的《斯拉夫国家宗教史讲演录》、奥古斯丁·泰纳尔的《1839年俄国的国教》、查理·德·马尔滕斯和斐迪南·德·库西的《当今世界各主权国家据以确立相互关系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第1卷、戴维·乌尔卡尔特的《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第2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马尔滕斯的《十五世纪末至亚眠和约时期欧洲国家贸易和缔结和约的外交史概论》、乔治·亨利·弗兰西斯的《尊贵的帕麦斯顿子爵的主张和政策》、约翰·麦克尼尔的《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关于黎凡特事件的函件》第1—3卷、《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等。

笔记本II是对英国报纸的摘录。

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摘录的著作是：《关于黎凡特事件的函件》（续）、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马尔滕斯的《欧洲国家贸易和缔结和约的外交史概论》（续）、《公文集》第II卷、弗兰茨·舒泽尔卡的《东方问题是俄罗斯问题》。

在笔记本IV中，马克思摘录了以下著作：《要求调查指控帕麦斯顿勋爵的理由》、威廉·卡吉尔的《对南盾商会的演说》、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危机》和《反对派系的呼吁书》、《公文集》（续）、塞扎尔·法曼的《基督教会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尤尔·德·布雷瓦尔的《马志尼本人及其同胞对他的评价》、《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的协定》（草稿）、威廉·巴恩斯的《建立在英语之上并在对六十多种语言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语文学语法》。

其次，马克思的五本西班牙史摘录笔记。

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摘录了以下著作：亨利·海德利·帕里什的《自1830年以来希腊君主制的外交史》、《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和趋向的札记》、《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西班牙危机》第2版、特伦斯·麦克马洪·休斯的《1845年西班牙真相》、塞巴斯蒂安·德·米纳诺的《西班牙革命评论》、曼努埃尔·德·马尔利安尼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奥古斯丁·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第2版。另外，马克思还对何塞·塞贡多·德·弗洛雷斯的《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和约翰·伊赛伊亚斯·瓦伦的《一位专员1850年在西班牙写的札记》做了笔记。

在笔记本II中，马克思摘录了《西班牙君主国政治宪法》、罗伯特·骚塞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约瑟夫·波拿巴的《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立法议会颁布的宪法·1791年9月3日》、约翰·比格兰的《从古代到1809年的西班牙历史》、威廉·沃尔顿的《1808—1836年底的西班牙革命》、曼努埃尔·德·马尔利安尼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续）、何塞·马里亚·德·托雷诺的《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等。另外，马克思对查理·罗美的《西班牙史》做了笔记。

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摘录了《中央洪达》（草稿）、多米尼克·德·普拉特的《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亨利希·冯·布兰特的《两个迈纳斯和西班牙战争》、何塞·马里亚·德·托雷诺的《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续）、迪奥多鲁斯·西科勒斯的《历史文献》、多米尼克·德·普拉特的《现代西班牙革命及其后果》、何塞·马里亚·德·托雷诺的《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结束）和加斯帕尔·霍韦利亚诺斯的《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卡斯蒂利亚最高王政会议的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

在笔记本IV中，马克思摘录了以下著作：加斯帕尔·霍韦利亚诺斯的《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卡斯蒂利亚最高王政会议的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续）、亨利·温特·戴维斯的《19世纪奥尔穆兹德和阿里曼的战争》、埃瓦里斯托·圣米格尔的《关于在第一部指挥将领拉斐尔·德尔·列戈命令下的国民动员军的事件的简讯》、约瑟夫·布兰科·怀特的《西班牙来信》、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西班牙国内状况考察》、约翰·布拉姆森的《关于西班牙北部的评论》、《西班牙最后的日子》、佩德罗·德·乌尔基纳纳的《罗马教廷统治下的西班牙》、圣地亚哥·佩雷斯的《谁是西班牙的解放者？》、《反西班牙的神圣同盟》、弗朗索瓦·勒奈·德·夏多勃里昂的《维也纳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第1卷、塞巴斯蒂安·德·米纳诺的《西班牙革命·评论》（续）、威廉·沃尔顿的《1808—1836年底的西班牙革命》（续）、维克多·杜阿梅尔的《西班牙君主国的宪法史》、《写给西班牙制宪会议成员的信》、曼努埃尔·马尔利安尼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续）和迈克尔·约瑟夫·奎因的《西班牙访问记》。

在笔记本V中，马克思摘录了以下著作或报刊：维克多·杜阿梅尔的《西班牙君主国的宪法史》（续）、多米尼克·德·普拉特的《西班牙需求的保障》、埃瓦里斯托·圣米格尔的《西班牙内战》、理查·福特的《关于西班牙战争的不变性质的历史研究》、文森特·普的《当前危机中的西班牙》、曼努埃尔·马尔利安尼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续）、迈克尔·约瑟夫·奎因的《西班牙访问记》（结束）、曼努埃尔·德·米拉弗洛雷斯的《关于伊萨伯拉女王二世政府前七年历史的回忆》、1823年2月至1824年1月的《爱丁堡评论》和1855年1月6日的《经济学家》、《英国的商业危机》（草稿）。另外，马克思还对《西班牙编年史或自1932年10月以来的内战纪念日》做了笔记。

第IV/26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在1878年3—9月期间所作的地质学、矿物学和农业化学方面的摘录和笔记。这里涉及的著作和文献有：约翰·亿茨的《商业原材料的自然史》、弗里德里希·雪德勒的《自然之书》、詹姆斯·芬利·韦尔·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原理》、《1877年俄亥俄州劳动统计局首份年度报告》、约翰·哥特利布·科普的《农耕和畜牧教程》、马蒂亚斯·雅科布·施莱登和恩斯特·埃尔哈德·施米德的《理论自然科学百科全书》和约瑟夫·比特·尤克斯的《地质学学生手册》。

第IV/31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7年中期至1883年所做的自然科学摘录笔记。其中，马克思主要摘录了洛塔·迈耶尔、亨利·恩菲尔德·罗斯科、卡尔·肖莱马、本杰明·维茨舍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库纳、路迪马·海尔曼、约翰奈斯·兰克和约瑟夫·比特·尤克斯的著作。恩格斯主要摘录了威廉·汤姆森和彼得·古特里·泰特的《论自然哲学》、卡尔·弗拉斯的《时间中的气候和植物世界》、海尔曼·赫尔姆霍尔茨的《论力的保持》、让·巴蒂斯特·勒·龙·达累姆伯特的《论动力学》和古斯塔夫·韦德曼的《关于电学与电磁学的学说》。另外，恩格斯还对热以及电的计量单位等做了笔记。

第IV/32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目录。书中按照作者音序顺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450部藏书进行了介绍，内容涉及这些藏书的现藏址、书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批注的页码、归马克思所有还是恩格斯所有，等等。此处不再一一介绍。

[1] 关于MEGA²各卷次出版的即时情况，可参见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项目官方网址
<http://www.bbaw.de/bbaw/Forschung/Forschungsprojekte/mega/de/Startseite>。

[2] 在MEGA²中，正文之前的扉页、目录、导论等内容的页码在1990年前出版的卷次中用阿拉伯数字加星号（“*”）的形式表示，在1990年后用罗马数字表示。正文页码则始终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因此，这里的88*表示正文前的导论性内容共计88页，1337页则表示正文内容（包括文本与资料两大部分）共计1337页。

[3] 关于MEGA²出版历程及前景展望的情况，参见朱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完成过半：回顾与展望——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格拉尔德·胡布曼访问记》，《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

[4] 马克思在1852年1月23日给魏德迈写了两封信，其中第二封信未收录于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参见MEGA²第III/5卷，第20页。

[5] 参见*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III/1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2, S. 301.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75页。

结语

通过对MEGA¹、MEGA²的诞生和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部历史考证版本的产生和推进，是极其艰难的。它的背后凝结着大量学者、科学工作人员乃至学术之外的有识之士的心血与努力。

就MEGA¹来说，尽管它是在列宁的倡议下发起的，在梁赞诺夫的全面领导下实施的——尤其后者是谈及MEGA¹时不可规避的人物，但是这两位精神领袖的光辉并不能掩盖MEGA¹之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集体劳动成果这一事实。在这些科学人员中，固然有像弗兰茨·席勒、恩斯特·崔贝尔、保尔·韦勒等我们多次提及的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亦有像胡果·胡波特、卡尔·施米克勒、汉斯·施坦等不很知名、但却在MEGA¹各卷次的编辑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献编纂家，更有大量默默无闻的学者、科学工作者，包括梁赞诺夫在国外聘请的不为人知的科学通讯员。所有这些人共同创造出了MEGA¹这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著作版本。

如果说，MEGA¹同其精神领袖梁赞诺夫“一而二”、“二而一”的深厚渊源（一方面，梁赞诺夫领导了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启动和实施；另一方面，梁赞诺夫的政治悲剧亦导致了MEGA¹的天折）使得人们很少注意到MEGA¹背后200余人的科学工作团队，很少意识到MEGA¹之为集体劳动成果的根本性质，那么在MEGA²那里，这种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则是不存在的。毋宁说，是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通过合力促成了MEGA²的诞生和发展。这里，不论是苏方的斯捷帕诺娃和塞涅基娜，还是德方的阿尔诺德、艾尼柯、梅尔巴哈等，任何一人都不是MEGA²的中流砥柱、灵魂人物，都不能通过其一举一动根本影响MEGA²的启动和实施。相较于MEGA¹之为苏联独立实施的工程，因而拥有独立的精神领袖而言，MEGA²作为苏联和东德协同合作的项目，很难产生独一无二的、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领袖。于是，苏联和东德双方的科学工作者用联合的方式推动了MEGA²的诞生。之后产生的各个卷次更是苏德双方多所科学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

除了上述的相似之处，即同为诸多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劳动成果，MEGA¹与MEGA²还有几点相似之处，如，都是关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全集，都是历史考证版本，都以“完整性”、“忠实于原文”、“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展现文本”作为编辑理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版本自身所具有的共通之处外，MEGA¹与MEGA²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即都同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MEGA¹与MEGA²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都是基于对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思想的特别关注而启动实施的。因此，它们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可以说，正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MEGA¹与MEGA²应运而生。但同时，还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它们都遭受了巨大挫折。就MEGA¹而言，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列宁的倡导使得它很快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并得到举国襄助。但是，在列宁去世之后，当梁赞诺夫陷入政治劫难以自保时，MEGA¹亦身受牵连，难以幸免。整个马恩研究院遭受彻底清洗，众多科学工作人员被解雇、驱逐，MEGA¹遭受重创。这也成为MEGA¹最终夭折的序幕。所谓“成也梁赞诺夫，败也梁赞诺夫”，对MEGA¹来说是再贴切不过的。就MEGA²来说，尽管苏德双方的专家学者一直都在积极主张新版MEGA的启动事宜，但是最终使这项事业得以可能的却是政治上层人物（乌尔布里希特和赫鲁晓夫）的首肯。相应地，当1990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政治动荡时，MEGA²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注定了MEGA¹与MEGA²先天固有的脆弱。不过，在挺过1990年的政治动荡后，由国家“大事”转为民间“合资”项目的MEGA²具有了根本的独立性，因而也具有了一定的抵抗力，其生命力也日渐旺盛。来自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数十位学者共同致力于这一宏大项目，MEGA²的影响日益深远。

就MEGA²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来说，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随着MEGA²卷次的陆续出版，我国理论界也开始关注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1978年，《中国出版》杂志第2期刊登了书讯《苏联和东德合作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极为简要地介绍了MEGA²的四个组成部分、文献收录的特点、正副卷划分等基本情况。同年的《世界哲学》第2期刊登了L.格爾曼和R.斯培尔合写的《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的出版》。该文对MEGA²四个组成部分的基本情况以及1975年出版的MEGA²第I/1卷和第III/1卷的内容作了极为详细的介绍，从而成为我国有关MEGA²的介绍和说明的最早的学术译文之一。此后，MEGA²逐步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1986年7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出版工作列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规划。之所以启动这一宏大项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实际上并不全，它“没有能包括后来发现的著作和文献，也收了一些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笔的著作。目前苏联等国有关研究机构正在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版……这个版本将收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有的书面著述，其中笔记部分大多是首次公之于世。这些珍贵文献有一部分应补编入中文版《全集》”^[1]。可以看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MEGA²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质量已经引起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译专家的关注，进而被推许为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底本。需要强调的是，中文二版《全集》并不是关于MEGA²的编译工程，它并不是要把整套MEGA²卷次全部译介过来，而是只译介其中的“一部分”。与MEGA²的划分相同，中文二版《全集》也分为四部分，依次为：（1）著作（《资本论》除外）；（2）《资本论》及其手稿；（3）书信；（4）笔记。就第I、II部分来说，中文二版《全集》基本依照MEGA²的相应部分进行文本的收录和编译，但是就第III、IV部分来说，中文二版《全集》只收录MEGA²中的一部分内容，远不会达到MEGA²相应部分的卷次规模。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MEGA²中以独立卷册出现的各卷次的资料卷不在中文二版《全集》的译介范围之列。因此，目前看来，中国学者很难获得有关MEGA²资料卷的权威译本，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虽然MEGA²成为中文二版《全集》的编译底本，但是我国学界对MEGA²的接受乃至研究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不可否认，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有关MEGA²的译介文章以来，许多重要的杂志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外理论动态》等译介了大量关于MEGA²的编辑出版情况、对专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的论文，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相关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MEGA²的讨

论、研究依然主要停留在介绍、翻译的层次，还谈不上对这个版本自身进行考查、研究，甚至提出独立的判断分析。再进一步讲，我国学者离MEGA²这一国际性的编辑出版项目本身还有一定的距离，很难参与到其具体的编辑活动中。^[2]正如魏小萍教授指出的，我们的外语水平同参与国际性工作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另外，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同国际性学术工作的要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远远地站在国外学者的身后，被动地接受、吸收其研究成果。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已经拥有四个MEGA编辑小组（分别是北海道小组、仙台小组、东京小组和西日本小组）^[4]。这些小组已经实质性地参与到了MEGA²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并且已然推出了高质量的编辑成果^[5]。另外，我们的邻国韩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具体的MEGA²卷次的编辑工作中，但已经准备在2016年前把MEGA²的前三部分译为韩文，包括其中极具分量的科学资料部分。^[6]

可以看出，单就MEGA²这一主题而言，中国学者已经落后于日韩学者。当然，MEGA²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也不是终极的标准，但是，中国学者要走出去，要发出中国学人自己的声音，阐发中国学人自己的思想，展现出中国气派，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借孙先生的那句名言勉励自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在编译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年第一辑，第136页。

[2]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韩立新教授参与到了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教授负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电子版的编辑工作中。这或许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位直接参与到MEGA²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学者。

[3] 参见魏小萍《与国际接轨，我们的差距在哪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际版第二版与中国合作意向性规划》，《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4] 北海道小组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小组（以下简称“BBAW”）共同承担MEGA²第IV/17卷的编辑工作；仙台小组独立承担MEGA²第II/12卷和第II/13卷的编辑工作（已完成）；东京小组同BBAW共同承担MEGA²第IV/18卷的编辑工作；西日本小组同BBAW共同承担MEGA²第IV/19卷的编辑工作。

[5] 大村泉领导的仙台小组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出版了MEGA²第II/12卷和第II/13卷。之后，大村泉教授又接受了MEGA²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电子版和第IV/14卷的编辑任务。

[6] 参见韩国高丽大学学者郑文吉在2011年2月19日于东京召开的MEGA专家科学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早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亚洲国家的译介史与影响史》（Die \square bersetzungs und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 \ddot{u} heren Marx-Engels-Werke in den asiatischen L \ddot{a} nder），收录在《“东亚马克思研究的到达点与课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8页。

参考文献

一 外文文献

1.MEGA¹

David Rjazanov,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1.1, Frankfurt a. M.: 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 b. H., 1927.

David Rjazanov,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1.2,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29.

David Rjazanov,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2,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0.

David Rjazanov,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II/1,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29.

David Rjazanov,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II/2,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0.

David Rjazanov,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II/3,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0.

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II/4,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1.

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3,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2.

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4,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2.

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5,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2.

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6,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2.

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Band I /7, Moskau-Leningrad: 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dSSR, 1935.

V. Adoratskij,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¹)*), *Sonderausgabe zum vierzigsten Todestage von Friedrich Engels* , Moskau-Leningrad: 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dSSR, 1935.

2.MEGA²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 /1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2,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3,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4.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6,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7, Berlin: Dietz Verlag, 1989.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8, Berlin: Dietz Verlag, 1990.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9,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10,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11,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5.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II/1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2.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4,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6,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7,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8, Berlin: Dietz Verlag, 1986.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9, Berlin: Dietz Verlag, 1991.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1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7.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26,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1.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31,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Band IV/3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3.著作

Franz Mehring,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Band 1,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02.

N. Rjasanoff,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ßlands in Europa* (Ergänzungshefte zur Neuen Zeit, Nr. 5), Stuttgart: Verlag und Druck von Paul Singer, 5. März 1909.

August Bebel und Eduard Bernstei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 bis 1883*, Band 1—4,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13.

N. Rjasanoff,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1862*,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20.

Eduard Bernstein, *Die Briefe von Friedrich Engels an Eduard Bernstein, mit Briefen von Karl Kautsky an ebendenselben*, Berlin: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1925.

David Rjazanov, *Marx -Engels -Archiv*, Band 1, Frankfurt a. M., 1926.

D. Rj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7.

D. Rjazanov, *Karl Marx als Denker, Mensch und Revolutionär*, Wien u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28.

Gustav Mayer, *Erinnerung. Vom Journalisten zum Historike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Zürich und Wien: Europa Verlag, 1949.

Victor Adler, *Briefwechsel mit August Bebel und Karl Kautsky*, Wien: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54.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The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Proband. Editionsgrundsätze und Probestück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D. Rjazanov, *Marx und Engels nicht nur für Anfänger*, Berlin: Rotbuch Verlag, 1973.

Victor Serge, *Erinnerungen eines Revolutionärs 1901—1940*, Hamburg, 1977.

Roy Medwedew, *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 -Stalin und Stalinismus*, Berlin: Dietz Verlag, 1992.

Die 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Amsterdam (IMES),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 Humanist , Dissident* ,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1,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2,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0.

Carl-Erich Vollgraf, Richard Sperl und Rolf Hecker,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Sonderband 3,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1.

IMES, *Marx -Engels -Jahrbuch 200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4.

Manfred Neuhaus und Gerald Hubmann, *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 Berlin, 2009.

4.文章

N. Rjasanoff, "Marx' Bekenntnisse", *Die Neue Zeit* , 31 (1912-1913), Band 1, S. 854-862.

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Die Neue Zeit* , 32 (1914), Band 2, S. 564-571.

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 11 (1925), S. 384-400.

Stephan Bauer, "Neue Marxstudien D. Rjasanow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 14(1929), S. 149-154.

Franz Borkena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 14(1929), S. 485-489.

Ernst Czöbel, "Rjasanov als Marxforscher (Zum 60. Geburtstag D. Rjasanov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 Jg. 4, Wien u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30, S. 401-417.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 15 (1930), S. 416-435.

Paul Kampffmey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und die Arbeit sozialistischer Forschung",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 Jg. 37, 1931 I, S. 335-339.

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 Band VI/VII, 1966/67, S. 5-198.

Georg Lukács, "Interview-On his Life and Work", *New Left Review* , Nr. 68, 1971, S. 49-58.

D. Rjasanov, "Marx und Engels Über Feuerbach (Erster Teil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Marx -Engels -Archiv* , Band I, Erlangen: Politladen-Reprint, 1971, S. 205-306.

Bernd Rabehl, "Über den Marxisten und Marxismusforscher Rjasanov", *Marx und Engels nicht nur für Anhänger* , Berlin: Rotbuch Verlag, 1973, S. 181-190.

Wladimir Sewin, "Die Marx-Engels-Forschung im Moskauer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zur Vorbereitung und Edition der MEGA", *IMSF Informationsbericht* , Nr. 24, 1976, S. 14-23.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 Jg. X X VIII, 1983, S. 105-142.

Jürgen Rojahn, "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 Der Fall der sog.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 vol. 28, 1983, S. 2-49.

Jürgen Rojahn,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Stand der Arbeit und geplante Fortführung",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 27 (1991), S. 470-482.

Rolf Dlubek, "Frühe Initiativen zur Vorbereitung einer neuen MEGA (1955-1958)",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43-55.

Martin Hundt, "Gedanken zur bisherigen Geschichte der MEGA",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2, S. 56-66.

Rolf Hecker, "Hans Stein -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und Korrespondent des Moskauer Marx-Engels-Instituts (1925-1929)",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 1993, S. 17-40.

- 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azanov",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3-16.
- Rolf Dlubek, "Tatsachen und Dokumente aus einem unbekanntem Abschnitt der Vorgeschichte der MEGA² (1961-1965)",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41-63.
-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0-37.
- Juri Steklow, "Meine ersten Begegnungen mit D. B. Rjasanow",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98-212.
- 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40-43.
- David Rjasanow, "Rede auf dem XI. Parteitag",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67-71.
- David Rjasanow, "Meine Aussage",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57-174.
- David Rjasanow, "An die Redaktion der Prawda",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93-194.
- David Rjasanow, "An das Präsidium der Zentralen Kontrollkommission", *David Rjasanow -Marx -Engels -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Berlin: Dietz Verlag, 1993, S. 194-195.
- Rolf Dlubek, "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 *MEGA -Studien*, 1994/1, S. 60-106.
- Jürgen Rojahn, "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 *MEGA -Studien*, 1994/1, S. 5-31.
- Rolf Hecke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Marx-Engels-Nachlaß 1935/1936. Bish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Moskauer Archiven", *MEGA -Studien*, 1995/2, S. 3-25.
- Jacques Grandjonc und Jürgen Rojahn, "Der revidierter Pla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Studien*, 1995/2, S. 62-89.
- 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MEGA -Studien*, 1996/1, S. 3-65.
- Ernst Czöbel,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Herausgabe der MEGA",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S. 132-143.
- Maja Davydovna Dvorkina, "Zum Erwerb der Bibliotheken von Mauthner, Pappenheim und Grünberg durch Rjazanov",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S. 42-45.
- Rolf Hecker, "Rjazanovs Editionsprinzipien der ersten MEGA",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S. 7-27.
- Jürgen Rojahn, "Publishing Marx and Engels after 1989-the fate of the MEGA", *Critique*, No. 30-31, 1998, pp. 196-207.
- Jakov Rokitjanskij, "Die 'Säuberung' - Übernahme des Rjazanov-Instituts durch Adoratskij",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1, S. 13-22.
- Rolf Hecker, "Fortsetzung und Ende der ersten MEGA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1, S. 181-311.
- Ladislav Ruda und Lev Chanonovič Falk-Segal, "Erklärung zur Herausgabe der MEGA, 25 März 1936", *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2001, S. 292-307.
- Manfred Neuhaus und Gerald Hubmann, "Das MEGA-Unternehmen", *Berliner Debatte Initial*, 14 (2003), S. 84-93.
- Gerald Hubmann, "Von der Politik zur Philologie: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Edition -Wandel und Wirkung*,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7, S. 187-201.

1.经典作家全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
-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
-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
-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 《列宁全集》第5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 《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2.著作

- 里亚扎诺甫：《马克思与恩格斯》，苏迅译，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年版。
-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 人民出版社资料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王东，丰子义，聂锦芳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张一兵：《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 衣俊卿，陈树林：《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侯才：《马克思的遗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魏小萍：《探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文章

- L.格尔曼，R.斯培尔：《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的出版》，燕宏远译，《世界哲学》1978年第2期，第17—21页。
- 周亮勋：《伟大的理论宝库——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301—309

页。

韦建桦：《“我们要肩负起出版MEGA的历史重任！”——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1年第6辑，第291—297页。

周亮勋：《MEGA：前景见好，困难不少——“MEGA编辑准则修订会议”纪实》，《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第9辑，第253—260页。

李国麟：《百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1期，第97—101页。

周亮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的产生、特点和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56—70页。

朱毅：《德国学者考普夫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出版的历史和现状》，《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第26—27页。

魏小萍：《与国际接轨，我们的差距在哪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际版第二版与中国合作意向性规划》，《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第29页。

鲁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异文处理方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第74—85页。

鞠立新：《关注国际马克思研究的新动向——MEGA2版即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介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第107—112页。

鲁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合法性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第43—48页。

赵玉兰：《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58—65页。

赵玉兰：《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铺垫——梁赞诺夫的前MEGA¹ 时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第35—41页。

曼弗雷德·诺伊豪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历史和编辑语言学基础》，黄文前、金建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27—31页。

卡雷恩·费斯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在德国——从20年前濒临夭折到重获重视》，李莉娜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第9—11页。

朱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完成过半：回顾与展望——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格拉尔德·胡布曼访问记》，《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第1—7页。

尤根·罗扬：《理论的诞生——以1844年笔记为例》，赵玉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第10—21页。